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赫鲁晓夫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赫鲁晓夫传

## 第一章

### 早年的生活——走向莫斯科

1894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继位。尽管宫廷里因送葬、迎立忙得不可开交，宫廷外却感受不到任何的变化，仍然是死气沉沉。工人依然困苦，农民依然贫穷。

在远离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省的农村，到处可见用长圆木构成的简陋小屋。那就是农民住的黑木屋。房屋低矮昏暗，屋内空气混浊，为使屋内白天也进些阳光，就在屋顶开上三四个天窗，没有玻璃，就蒙上个牛尿泡来代替。农民在这个小天地里做饭、纺纱、织布、缝制衣服、修理挽具。冬天，小牛甚至还要在这里过冬……俄罗斯的农民祖祖辈辈就这样生活。

4月17日（俄历4月3日），一个男婴诞生在该省一个名叫卡利诺夫卡的小村庄的一间毫无特色的小木屋中。孩子的母亲名叫克萨尼娅·伊万诺芙娜，孩子的父亲是谢尔盖·尼卡诺维奇，他们俩都是农民。孩子被起名叫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赫鲁晓夫。

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孩子，日后竟成为俄国乃至世界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19世纪末的俄国农村，不光只是贫穷，还有野蛮和愚昧。尼基塔自记事起，就跟着大人上教堂，学着大人的样跪在神像面前祷告。俄罗斯的农民从基辅罗斯时代起就信奉东正教，信教对于祖祖辈辈的农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在赫鲁晓夫家的小木屋中，张贴着圣像，由于没钱买新的进行交换，圣像总是被煤油灯熏得黑黑的。小尼基塔在这小黑木屋中渐渐长大。夏天，他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里放牛放羊；冬天，便在女教师莉季娅·谢夫钦科的指导下学习读书写字。虽然读的是圣经，但这位乡村女教师却给以无神论的解释，使赫鲁晓夫小小年纪对东正教就有不同于他那曾是农奴后裔的父母的看法。在他小小的心灵中萌生了初步的政治意识，懂得了穷人和富人的差别，知道了普加乔夫。但是，正当他求知欲旺盛的时候，他中断了学业。

1908年，赫鲁晓夫刚刚念完小学，父亲谢尔盖·尼卡诺维奇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带领全家来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在一个煤井里当上了矿工。全家住在尤索夫卡郊外一间窄小的平房里。周围住的都是来自各地的工人。每天下工后，工人们就聚集在镇上出售啤酒和伏特加的酒馆里借酒浇愁，清醒的时候谈论一些刚刚听到的消息。

城镇毕竟比闭塞的农村开化得多。赫鲁晓夫在这里听到了关于发生在彼得堡和莫斯科1905年革命的一些事情。诸如：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流血星期日”、君主立宪、全俄总政治罢工以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等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少年赫鲁晓夫的头脑中激发起丰富的想象力。

15岁的赫鲁晓夫，这时已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工厂里当钳工学徒，修理当地矿井使用的设备。由于工作关系，他结识了不少年轻的矿工。其中有一位名叫潘捷列伊·马希尼亚的矿工成了赫鲁晓夫的知己。少年赫鲁晓夫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开始了解文学和政治。他阅读从马希尼亚处借来的书籍，逐渐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找到一本《共产党宣言》，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这本书对两个人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他们的眼界从此不再局

限于小小的尤索夫卡。马希尼亚为此激动地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赫鲁晓夫对这位矿工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把这首诗工整地抄了下来，并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在 50 年后，他都能够脱口而出。这首诗表达了一位有志青年朦胧的革命情绪，诗中写道：

我爱用真实的书籍，  
点燃起情感的火苗，  
让它在我们纷忙的生活中，  
燃烧，燃烧，永远燃烧。  
让它产生力量，让它产生激情，  
燃烧起人们的心灵，  
同黑暗斗争到最后一息，  
绝不虚度一生。

哪怕给后代留下点滴的诚实劳动，  
死后才能安然瞑目，  
永远不受良心的责备，  
兄弟们，这就是我的义务。

这首诗不仅焕发起赫鲁晓夫的青春激情，更使他升华为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工余之后，他最喜欢的便是读书，尽管当时在尤索夫卡很难找到好书。书籍使他避免染上很多恶习，抵御矿区中所流行的污秽的和可恶的生活毒素。他读德国人的书，也读法国人的书，那些描写工人的书籍，往往令他震撼。他感到世界各国的工人生活是这样的相似。他在读爱米尔·左拉的《萌芽》时，真切地感到左拉写的不仅是法国，而且是赫鲁晓夫和父亲所工作的矿区。工人们在潮湿的矿井里干一天活，出来的时候，常常是浑身湿透，在料峭的寒风中，冻得哆哆嗦嗦，饥肠辘辘地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回家。是的，工人的命运，在法国和在俄国都是一样的。

“燃烧，燃烧，永远燃烧”。

.....

马希尼亚朗诵的诗句，深刻地铭记在赫鲁晓夫的脑海中。他生性勇敢、甚至豪放，把这作为自己终生的准则。他的主动性、毅力、喜欢冒险的精神令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小伙子羡慕。

在潘捷列伊·马希尼亚的茅舍中，赫鲁晓夫对聚集在一起的工友们说：“朋友们，我老在想，总有一天，工人会组织起来，打倒沙皇和全部资产阶级，自己在地球上当主人.....那时，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呢？”

“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主义的幽灵”，这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来到了俄罗斯。

从 1910 年下半年开始，俄国革命运动开始走出 1905 年革命后的疲惫状态，又有了新的起色，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进一步发展起来。各种各样的罢工，愈来愈频繁。

1912 年 3 月，西伯利亚勒拿采金公司爆发了安德列斯基矿坑工人罢工。罢工的直接原因是矿坑资本家自办的小铺卖给工人们质量低劣的马肉。

当时的勒拿矿区，到处都设有资本家自办的商店，规定工人必须在此购

物，工人的工资中有一部分是各商店的代金券，这些代金券在矿区流通。这是资本家控制和敲榨勒索工人的一种手段。用代金券购买的商品质次而价高。工人每天要在深至膝盖的冰冷的水中工作 10—12 个小时，拿到的仅有的一点点工资，还要被商店所克扣，自然是忍无可忍。

罢工迅速扩展到其他矿坑。工人们提出了改善居住、生活、卫生条件，提高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取消罚金等 18 点要求。外国资本家勾结沙皇军队逮捕了罢工委员会的成员，打死打伤工人 500 多人。

勒拿惨案一经披露，立即激起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赫鲁晓夫也积极地投身到罢工运动中。自然，他的一举一动受到了密布矿区的沙皇暗探的注意。他被认为是罢工的组织者之一而受到了警察的秘密监视。

按照警察的要求，赫鲁晓夫和其他参加罢工的工人一起被开除了。年轻的赫鲁晓夫不得不离开德国人开的鲍谢工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进入了法国人开办的鲁钦科夫矿，在 31 号矿井当上了钳工。他对工友们开玩笑他说：“伙计们，我换了国籍。原来给德国人干活，现在呢，去给法国人卖命……”

鲁钦科夫矿在尤索夫卡算是数得着的大矿，规模大，工人人数多。那里工人运动比较活跃，工人的思想比较倾向布尔什维克。1912 年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问世，赫鲁晓夫成了这份报纸的热忱读者。他通过报纸了解了布尔什维主义，逐渐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国开始了紧张的参战准备。赫鲁晓夫没有应征入伍；因为大部分矿工被免服兵役。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钳工，在尤索夫卡附近的帕斯图霍夫矿的发电厂做金属装配工，收入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他娶了妻子叶弗罗辛娅，租了一套带有厨房、客厅、饭厅、卧室的房子。然而，好景不常，随着战争的进行，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工资却纹丝不动，矿工的生活状况是江河日下。骚动和罢工并未因战争而减少。

1915 年 3 月，鲁钦科夫爆发了一次大罢工。赫鲁晓夫又成为领导人之一。他在群众聚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警察想要逮捕他，但他在工人们的保护下逃脱了。最后罢工胜利了，矿主被迫妥协。赫鲁晓夫又回到了帕斯图霍夫矿。罢工期间，矿上来了许多奥匈军队的战俘。罢工结束后，他们同俄国工人一起为资本家干活。同为被压迫被剥削者，工人们开始由敌视变为友好相处。战俘中有一些是捷克人。赫鲁晓夫同那些捷克人相处得很好。捷克人告诉赫鲁晓夫，他们并不想同俄国人打仗，他们只希望过和平友好的生活。捷克人，俄罗斯人都是斯拉夫人，都是兄弟。赫鲁晓夫时常请捷克人到他住处吃果酱和茶。身无分文的战俘们为了报答他，就教他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钳工机械制图。当时的捷克工业比俄罗斯要先进得多、捷克人教给他的这些东西，使他受益匪浅，因为一个金属装配工必须能看懂机械制图。捷克人还常常同他谈起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告诉他共同的斯拉夫血统是斯拉夫人团结起来的基础。这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听到有关泛斯拉夫主义的事，他感觉十分新奇。捷克人讲到的所谓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兄弟关系的言论使他十分感兴趣。其实，捷克人所谈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言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个世纪，俄国的沙文主义者就鼓吹过。鼓吹者试图利用斯拉夫各民族求解放的愿望，以俄罗斯为核心合并斯拉夫各族，尼古拉一世就据此理论，四处侵略，梦想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斯拉夫帝国”。这实际上是一种大国争霸的理论。

赫鲁晓夫对这一理论的迷恋，说明他当时在政治上还十分幼稚，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团结的理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还远未理解。

赫鲁晓夫参加革命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在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锻炼得逐渐成熟起来。

1916年，戈尔洛夫—谢比诺夫卡地区周围的工人举行了罢工，矿主们急忙调来军队弹压，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开枪，死四人，伤两人。顿巴斯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面对警察的镇压，矿工们举行了总罢工。赫鲁晓夫也参加了。工人们在矿区举着反战标语游行。但他们很快遭到了报复，数百名矿工被押送到前线充当炮灰，可是，镇压并未让工人屈服。在顿巴斯，罢工和骚动仍未停止，直到1917年2月革命。

这天晚上，尤索夫卡人从火车站的工人截获的电报中知道了彼得格勒所发生的事情。矿工们立即召开会议选举出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赫鲁晓夫被选进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成为鲁钦科夫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他负责逮捕当地的警官，解散警察，建立工人纠察队。几个月后，鲁钦科夫的工人们又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赫鲁晓夫也在该委员会中任职。这个委员会是活跃在顿巴斯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帮助建立的许多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一。当时，在顿巴斯还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其他党派，谁胜谁负难以判断。但赫鲁晓夫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矿工们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高举红旗喊道：“打倒克伦斯基腐败政府，布尔什维克万岁！”

十月革命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顿巴斯。在卢甘斯克、戈尔洛夫卡、马卡耶夫卡等地，因为苏维埃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地方政权便顺利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然而，在尤索夫卡市，苏维埃不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这些人拒绝承认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新政府。直到1917年12月，才被迫进行了选举，尤索夫卡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负责人雅科夫·扎马尔耶夫被选为苏维埃主席。由于赫鲁晓夫在此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本人当选为采矿工业五金工人工会矿场工厂委员会苏维埃主席。这个苏维埃管辖尤索夫卡八个大矿和其他企业的工会组织。

这时的赫鲁晓夫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儿子名叫列昂尼德，女儿叫朱莉娅。作为父亲，他简直无暇顾家。国内战争的爆发，使顿巴斯地区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卡列金将军的哥萨克部队从南面威胁着该地区。白卫军已经占领了顿河附近的几个据点。顿巴斯也受到了中央拉达等资产阶级党派的围攻，中央拉达在基辅掌握了政权，并且宣布建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顿巴斯建立了战斗赤卫队，赫鲁晓夫参加了第一顿涅茨无产者团，领导鲁钦科夫矿工营，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1918年春，德国军队入侵乌克兰，同中央拉达签订条约，取得了对乌克兰的开发权，联合中央拉达（乌克兰民族政府）军进逼尤索夫卡。矿工战斗赤卫队第五军虽然进行了抵抗，鲁钦科夫还是被敌人占领了。赫鲁晓夫这时刚从抗击卡列金的战斗中返回家乡，结果被通缉。他不得不逃离家乡。他躲进矿井，出没于草原，绕过敌人控制区，逃往库尔斯克省。

不久，赫鲁晓夫加入了红军，在一个步兵师政治部工作。1918年夏，他在察里津（后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前线作战。这年的秋天，他又被派往刚刚组建的第九军政治部。第二年春，他成为第九步兵师第74

团第二营政委。当时，第九步兵师隶属于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指挥的骑兵第一军。赫鲁晓夫的部队开始时被迫从奥廖尔撤退到姆岑斯克，后来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在 1919 年圣诞节时抵达塔甘罗格，突破了白卫军的防线，于 1920 年 4 月抵达黑海，攻克阿纳帕后将白军赶下了海。赫鲁晓夫所在的第九步兵师在阿纳帕暂短地休整五六天后，就向塔曼半岛进发，迫使邓尼金部队于 5 月 2 日投降。

1922 年初，赫鲁晓夫同 100 多名党员一起被派往家乡尤索夫卡。他们的任务是尽快恢复顿巴斯的生产。因为顿巴斯是苏联的主要能源基地。赫鲁晓夫担任鲁钦科夫矿区副经理。

国内战争后的国家满目疮痍：工厂停产、火车停运、工人们饥寒交迫。人们无法生火取暖。商品奇缺，物价飞涨，一块面包竟卖到 100 万卢布。

1922 年，顿巴斯矿区发生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乡村比矿区的情况更糟。赫鲁晓夫一方面要带领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恢复生产，另一方面还要抚养两个幼小的儿女，因为孩子的母亲已经死于 1921 年的饥荒。

要恢复生产谈何容易。首先是没有图纸，其次是没有工程师。没有图纸，就找一些老工人，把老旧设备拆开，画好图纸，了解结构，研究如何投入生产。没有专家，一方面用高薪招募资产阶级专家，一方面自己培养。

随着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顿巴斯的情况开始好转。矿井实行了实物支付的办法——矿工挖的煤越多，得到的面包也越多。从国外买来了第一批采煤机。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被动员的平民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了顿巴斯，同时还运来了食品和衣服。货车从顿巴斯运走了第一批数千吨煤。在顿巴斯，鲁钦科大矿区被认为是管理最好的。赫鲁晓夫从公寓到工人宿舍，从公家开的商店到希腊人开的私人肉铺，不仅视察他所管辖的地区，而且还召开各种会议，发表讲话；还时常亲自下井采煤，帮助工人修理矿井设备，林林总总，无事不管。

鲁钦科夫恢复了生气，私营商店和公家商店进行竞争，大量的蔬菜、西瓜和家禽上市了。物价也随之降了下来。肉只卖 15 个戈比一磅。

但是，矿区仍然缺人才，缺少专家和工程师。

尽管高薪聘用了资产阶级专家，但对他们除了不信任之外，还非常反感。

革命初期，大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不稳，他们中有些人逃往国外，有些人则抱观望态度，有些人搞破坏，有些人干脆参与反革命活动。工人们对于资产阶级专家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如果只是这种情绪，党组织还可以做做工作：资产阶级专家也并非都是一种类型。可是，因给这些专家特殊照顾和高工资而引起的工人们的反感，却无法消弭。工人们认为，随着革命的胜利，他们的物质生活应有所改善。假若人们在法律上真是平等，那么他们在物质保障方面也应该是一样的。然而，现在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却如此特殊，而工人所拿的工资却比革命前的旧社会还要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专家有设备齐全的私人公寓，而工人却一无所有。如今这种状况仍然存在。工人的福利是什么呢？所谓“公共福利”就是离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很远的水井或水管。工人上市场去经常要走泥泞的路，而专家们却可以骑马（一个总工程师有两匹马和一个驭手）。工人怎么能服气，他们不但对专家，而且对专家们的妻子和佣人都非常仇视。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下，工作经常出问题。赫鲁晓夫很希望能有无产阶级的专家，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专家。

当上级领导根据他的业绩、准备派他去负责帕斯图霍夫矿区的全面工作时，赫鲁晓夫却提出申请：免去其党内的职务，以便去尤索夫卡工人专科学校读书。经过多次坚决的要求，地方党委书记阿布拉姆·帕夫洛维奇·扎维尼亚金最终同意他去工人专科学校学习。

根据赫鲁晓夫的政治经历，他当选为这所学校的党委书记。

学校的学生都比较成熟，其中有的学生甚至有 10 年以上的工龄，并且有一半以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生们一边上学，一边建设校园。建立了新的校名，还建起了实验工厂。学生们从大量的旧设备中找来旧机床，自己修理和改装。

有些学生文化水平较低，为了帮助他们进行专业学习，先要进行必要的文化补习，学校成立了工人系。赫鲁晓夫便在这个系里学习。他结识了州委党校的教师和工人系的讲师尼娜·彼得罗芙娜，并于 1924 年同她结婚。赫鲁晓夫的家庭生活因为有了新的女主人而一天天好起来。没了后顾之忧，他在工作上可以更加放开手脚干了。

1925 年，全国的行政管理机构进行了改组，在各州建立了新的行政管理单位，即区级机构。赫鲁晓夫又被选为顿巴斯彼得罗夫斯克—马林斯克区委书记。

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国民经济情况开始明显改善。矿井得到了所需要的采煤机、推土机、装卸机、运输机和电力机车。短短的一年内，彼得罗夫斯克的煤产量就从 2600 万普特增加到 3600 万普特。第一批集体农庄在赫鲁晓夫所领导的这个区里建立了起来（区委还管辖毗邻的农村）；农业获得了大丰收。赫鲁晓夫的组织才能通过工作上的成绩显露了出来。1925 年，党的第 14 次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选为代表派往莫斯科。

尽管他在列宁逝世时曾作为顿巴斯代表团成员到过莫斯科，但那时逗留的时间很短，且气氛不合适，对莫斯科的印象还很肤浅。这次，他对莫斯科的认识就要全面的多了。代表们住在加雷特尼大街 3 号的苏维埃大厦里，大家睡的是通铺，像木料似地排在一起。早晨，赫鲁晓夫独自一人乘车去克里姆林宫，结果迷了路。后来的几天，他便早早地步行去会议厅，甚至不吃早饭，为的是可以早一点到达，同时还可以熟悉和了解莫斯科的市容环境。赫鲁晓夫所在的乌克兰代表团坐在会议厅的正中，而尤索夫卡代表团又在这个代表团的第一排，位置特别优越。他在这里距离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有几步远。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斯大林。会议期间，他还同代表团一起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这件事令赫鲁晓夫高兴并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于一个农夫出身的矿工，能够进出克里姆林宫这个从前只有沙皇和 大臣才能进出的地方，已经是莫大的荣誉，更何况还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斯大林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辞都给他留下了新鲜而神奇的印象：斯大林平易近人、为人正直。

两年之后，赫鲁晓夫又参加了第 15 次党代表大会。作为正式代表，他积极地支持斯大林、李可夫和布哈林，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投票赞成把他们及其几十个追随者们开除出党。

这时期，顿巴斯的煤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平；工人文化馆已经在区内各个城镇建立了起来。许多电影院开始放映电影，区电台也开始播音……这些成绩再次证明了他的才能，但是尽管已经从工人专科学校毕业，他的文化水平仍然不高，与老一代党的领导人相比，他所受过的教育简直算不上什么。



如果按照正常渠道选拔干部，按照综合素质考查，赫鲁晓夫退休时，充其量不过是个党的中层干部。一个偶然的机，使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1928年，卡冈诺维奇把他叫到当时乌克兰的首都哈尔科夫，告诉他准备让他担任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卡冈诺维奇的意图是，调赫鲁晓夫去加强组织部中的工人代表的成分。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希望让他回去考虑考虑。赫鲁晓夫这样说，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认为组织部内有很多不可靠的人，如果他硬着头皮接受这项工作，将会遇到许多麻烦。哈尔科夫人对尤索夫卡人表现了不应有的地方主义倾向，赫鲁晓夫认为，这完全是妒忌，是对顿巴斯，或者准确他说是对尤索夫卡地方组织所取得的成绩的妒忌。

但是，卡冈诺维奇与赫鲁晓夫认识时间不短了，早在1917年2月革命时期，两人就有过交往。如今，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集体领导中的地位十分不稳，一些领导，比如彼得罗夫斯基、丘巴尔总是找机会挑他的毛病，降低他的威信。卡冈诺维奇需要有人支持，尤其是在乌克兰的党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同尤索夫卡党委书记斯特罗加诺夫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考虑到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恶化，还是走为上策，赫鲁晓夫于是同意了卡冈诺维奇的建议，调到了哈尔科夫。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若有机会，还是将他调到另一个工业地区。

正如赫鲁晓夫所料到的，他在哈尔科夫的工作并不惬意。他只是做些文牍工作——通过看一大堆表格和档案来了解外部世界。他是个好动的人，伏案工作对他简直苦不堪言。他感觉上当了，他开始三番五次地软磨硬缠，要求卡冈诺维奇给他调工作。

终于，有一天，卡冈诺维奇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基辅组织部需要人，如果同意，那就自己买张火车票，动身吧。

赫鲁晓夫第二天便到达了新的工作单位。同哈尔科夫相比，赫鲁晓夫在基辅过得要愉快得多。只是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时常出些难题。一些失业者打着红旗上街游行，要求工作。他想去顿巴斯工作，但遭到了反对，人们说，他们宁肯在基辅失业，也不会去顿巴斯。对于基辅人来说，顿巴斯是个落后而野蛮的地方，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火。

同基辅相比，尤索夫卡仅是一个小村庄而已。赫鲁晓夫在这里感到了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他对大城市居民的那种傲慢与偏见非常反感。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工作。他决定离开这里去学习，去深造。他来到哈尔科夫。此时卡冈诺维奇已调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找到接替卡冈诺维奇工作的柯秀尔，希望柯秀尔写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去莫斯科工学院学习深造，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冶金家。

莫斯科工学院于1929年开办，为的是培养又红又专的从事国民经济工作的党的高级干部。就入学申请而言，学院优先录取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赫鲁晓夫完全符合这一标准。

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经研究决定免去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以便他去莫斯科工学院学习。赫鲁晓夫如愿以偿了。

赫鲁晓夫在工学院的头一年并不顺利。学校对他说，由于他在行政管理方面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不适合在这里学习，这里可是培养经理和厂长的地方，他还不如转到中央委员会的马列主义课程班去。赫鲁晓夫眼看理想即将成为泡影，不得不去请求老上级卡冈诺维奇。又是卡冈诺维奇在这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赫鲁晓夫得以在学院留下来。

莫斯科工学院的院长是曾任卫生人民委员的卡明斯基，督学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古比雪夫，可见这所学校很受联盟中央的重视。学校左右两派的斗争是中央党内派别斗争的缩影。尽管赫鲁晓夫刚到莫斯科不久，但是他已经以其支持总路线的鲜明政治态度而崭露头角。他虽然未被提名为第16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中央委员会还是发给了他一张大会的长期列席证。使他听到了斯大林所作的总结报告。

在第16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学院内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以致赫鲁晓夫一度被排挤。学院内支持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人曾一度占了上风。当《真理报》发表了一封反映学院情况的信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学院课程停了下来，召开了党组干部会议。赫鲁晓夫成为学院党组书记。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党内的活动自此开始了。从他参加革命到在莫斯科站住脚，只经历了短短的13年。这13年中，赫鲁晓夫连续几个三级跳，从一个矿区的副经理一变成为莫斯科高等学府的党组书记，很难分清是才能还是机遇，使他如此升迁。

在14次代表大会上，他和多数派反对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在15次代表大会上，他支持斯大林、李可夫和布哈林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而第16次代表大会后，他又支持斯大林反对李可夫和布哈林。

那么，赫鲁晓夫真的理解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右倾反对派”与总路线支持者之间分歧的实质吗？按照赫鲁晓夫以前的阅历及后来所表现的理论修养，可以说他根本弄不懂，他自己也承认不懂。是支持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还是支持停止这一政策；能够靠掠夺农村，让农民交付“贡税”来实现工业化吗？在农村是要急风暴雨式地消灭富农阶级以实行全盘集体化还是发展多种经营走合作化道路；是保持党内的民主还是树立个人崇拜；所有这些问题，对于赫鲁晓夫来说都过于复杂。一切妨碍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和行动都必须被清除。阶级本能是赫鲁晓夫作出抉择的依据。

不久，赫鲁晓夫就闻名于莫斯科的党组织和中央委员会了。在30年代，党组织生活比较频繁，莫斯科市每半年或一年要举行一次区党代表会议。每次会议上，都会有人事变动。1931年1月，又召开了一次鲍曼区党的代表会议。赫鲁晓夫接替了他的反对者——希林，被选为区党委书记。希林曾在选派第16次党代表会议时，反对赫鲁晓夫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看来，“坚冰已被打破”，曙光就在前边。赫鲁晓夫这时已经预感到，他的前途将是很光明的。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被调到莫斯科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接替柳京担任区委第一书记。柳京作为党内反对派已被流放。派赫鲁晓夫上任，无疑是要他去肃清该区党组织中的“柳京分子”。红色普列斯尼亚区是个比较重要的区，它曾在1905年革命中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个区比鲍曼区在政治上更重要。实际上，它是莫斯科的首要区。又过了半年，赫鲁晓夫在又一次市级会议上被选为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担任这一职位对赫鲁晓夫而言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完成高等教育的机会。事实上，这几年他就没有怎么好好读过书。党内一直在肃清反对派。反右倾、反左倾，一个斗争接一个斗争，赫鲁晓夫始终冲在前头，他诚心诚意地站在斯大林一边，尽管他反对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等都是老一辈革命者，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他问自己，他若不站在多数派一边，怎么知

道自己是正确的呢。作为战士，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取胜。一个“聪明人”不要自以为是，只有服从大家才符合党的要求，因为每次晋升时，每次选举时，必须是以多数票通过方能算数。

赫鲁晓夫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接过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的职务。他没有退路，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往前闯。一年之后，他又成为莫斯科州委的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卡冈诺维奇。几年来，赫鲁晓夫的晋升几乎都是卡冈诺维奇的举荐。起初，他以为应该感谢这位老上司和老相识，但后来发现，这同斯大林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党的莫斯科市委委员及莫斯科各区的区委委员的选举，都是要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是否可以选举某人进区委或者市委，最后的决定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次，在莫斯科党代表会议上，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位军事委员作为候选人参加市委委员的选举。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一位好同志，当念到他名字准备进行表决时，突然有人送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条子。条子上说：“请采取措施，不让这个人进党的市委。他不可信，他同人民的敌人有联系，即将逮捕他。”这时，任何人的表态都是没有用的。

赫鲁晓夫的晋升肯定是经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后通过的，选举和推荐虽然起一点作用，或者说是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可以将前两者完全推翻。卡冈诺维奇如果不弄清上面的意图，他也不会冒然推荐，要知道，他并不是那种甘为人梯的人，更何况赫鲁晓夫的职位离自己越来越近，这本身就是一个威胁。

赫鲁晓夫觉得是斯大林一直在通过其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那芙娜·阿里卢耶娃注意着他。

阿里卢耶娃是赫鲁晓夫在工学院的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里，但是都是党员干部，赫鲁晓夫作为书记经常要和下面的干部碰头。学院里发生的事情，阿里卢耶娃会在家里的餐桌上提起，赫鲁晓夫的一些表现，积少成多会在斯大林的脑子里留下印象。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后，曾到斯大林家做客。他发现阿里卢耶娃将学院维护总路线斗争的情况反映得非常详细，其中有些细节，甚至连赫鲁晓夫自己都忘记了。

赫鲁晓夫后来的经历，愈发证实了这一点。在随后的年代里，学院中的大多数同学，在党组织中一起战斗过的同事，都被当做人民的敌人而被处决，而他却活了下来。这说明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的汇报影响了斯大林对他的态度。

1934年，赫鲁晓夫在第17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比全票只差六票当选。赫鲁晓夫感到非常兴奋：他的票数居然和斯大林的票数一样多。

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免去了在莫斯科党组织内的职务，赫鲁晓夫被提升，接替了卡冈诺维奇的职务，成为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这是一个要职，因为当时的莫斯科州包括后来苏联的图拉州、卡卢加州、梁赞州和加里宁州。赫鲁晓夫这一年刚刚40岁。

五年来，他从一个工学院的学生成为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对此，他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害怕。他想到，党内的职务是选举的，若有朝一日他不再当选，他于什么呢？他把自己一直保留下来的钳工工具——卡钳、千分尺、直角尺收拾好，以便有一天能回到金属装配工的老本行去。

莫斯科的工作是紧张而辛苦的，插手的人也很多。事无巨细，都有人过问。

一天，赫鲁晓夫得到通知，叫他打一个电话。接话人是斯大林。斯大林在电话里告诉他，有人反映莫斯科的公共厕所的情况很糟，人们到处寻找，却找不到地方大小便，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尽快建造起足够数量的清洁的现代化收费厕所。

当时的莫斯科简直是个巨大的基建工地，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锤子的敲击声，掘土机的挖掘声，混凝土搅拌机的搅拌声。到处是一堆堆等待清理的渣土：轴承工厂正在建造，煤气和电力厂在安装设备，炼油厂在吊装油罐，莫斯科河上的桥梁计划改建……100 多项工程同时并举。赫鲁晓夫的工作担子相当重，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除了对诸如工厂、住宅、学校、文化宫、电影院、公共厕所建设工作进行监督之外，还具体领导在莫斯科建立苏联的第一批无轨电车路线及建造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工作。

这两项工作都代表着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地下铁路。按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人们把建造地下铁道几乎当做是不可思议的事，甚至在后来考虑进行宇宙飞行时也没有这样为难。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工程动用了七万多人。赫鲁晓夫几乎每天都要穿上工作服，视察正在施工的隧道，检查进度，帮助解决问题，有些技术问题甚至要向斯大林汇报。

1935 年，莫斯科市民庆祝地铁第一期工程落成。由于赫鲁晓夫对地铁的建成所做出的努力和功绩，他被授予列宁勋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一枚勋章。

这一年的《工人莫斯科》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中说：“赫鲁晓夫同志是一位经受过斗争和党的工作考验的工人，是从基层提拔上来的，他是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教育下的那一代党的工作人员中的杰出代表。尼·谢·赫鲁晓夫是在运用斯大林的工作方法的著名能手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指导下，在近年里和党一起逐步成长起来的，他是我们光荣的莫斯科党组织的好领导。”这是对赫鲁晓夫从顿巴斯走向莫斯科以及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斯大林三者关系画龙点睛的描述。

## 第二章

### 乌克兰第一书记

1934年12月1日晚，赫鲁晓夫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卡冈诺维奇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我在政治局里打电话。马上到这里来。有紧急事情。”

赫鲁晓夫赶到克里姆林宫，看到卡冈诺维奇一脸的惊慌神情。卡冈诺维奇告诉他，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了。现在要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去，代表团成员包括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再加上从莫斯科党组织和莫斯科工人阶级里选派的60个人。由他率领这个代表团去列宁格勒，守灵后伴送基洛夫的遗体回莫斯科。

赫鲁晓夫直接赶到莫斯科市委，凑齐了一个代表团，当夜就动身去了列宁格勒。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已坐专车提前动身了。

对于事情的原委，赫鲁晓夫他们都不大清楚，只知道谋杀基洛夫的凶手是一个叫尼古拉耶夫的人。12月22日，苏联在有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中说，尼古拉耶夫是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该恐怖组织是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名为“列宁格勒总部”。

党的领导们轮流站在灵柩旁守灵。卡冈诺维奇的情绪始终没有调整过来，像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斯大林守灵时，人们看不透他的心理活动，其实，在他平静的外表下，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基洛夫惨遭暗杀的秘密信，警告各地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泰然自若和庸俗的粗心大意”。信里说：“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这封信完全是斯大林的口气。

被控和“列宁格勒总部”有牵连的干部陆续被逮捕，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开始了。

从1935年到1938年，大约3年半的时间，苏联的“间谍”越肃越多、越杀越多。人人自危，互不信任，整个国家出现了一种危机。卡冈诺维奇等人向斯大林报告，希望停止肃反运动。叶若夫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由贝利亚接替，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才逐渐平息了下来。

肃反的结果是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被杀害。第17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有51名被处死，2名被迫自杀；68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47名被处决。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连列宁在内共15名委员，最后还剩5名，除列宁病逝之外，8名被杀，1名被驱逐出苏联。在6名元帅中，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叶戈罗夫、赫留赫尔4名被杀害，只留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

肃反运动同样未能使乌克兰幸免。州委和区委书记、人民委员、工厂厂长、市苏维埃和区苏维埃主席、学者和作家都纷纷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牢房里丧生。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遇难，其中有：С·库德里雅夫采夫、Л·柳布钦克、Н·吉米洛、В·查东斯基和М·哈塔耶维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著名的历史学家Н·波波夫被捕后死于狱中。乌克兰领导人中未被逮捕的只有被委派短期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

斯·柯秀尔及被委派短期担任古比雪夫州委第一书记的帕·波斯特舍夫和在莫斯科被任命为革命博物馆长职务的T·彼得罗夫斯基。1937年，被捕的乌克兰共产党员约达15万人。不久前出席乌克兰共产党（布）第13次代表大会的原共和国领导干部，几乎无一幸免。

1938年初，斯大林让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此前的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成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全会，会上，赫鲁晓夫被提名取代帕·波斯特舍夫，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成了苏联党和国家10位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在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和中央全会结束之后，1月29日，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公告，宣布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尼·赫鲁晓夫担任代理第一书记。

肃反扩大化使赫鲁晓夫在前进的道路上加快了步伐，换句话说，赫鲁晓夫是这次大清洗运动的受益者。很多比他更有资历和才能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死于非命。这几年，他虽也是战战兢兢，惟恐噩运降临在他的头上，但总算挺了过来。

现在让他去担任乌克兰的最高职位，他却不太想去，原因有三：首先，让他取代科秀尔，他实在于心不忍。1929年，当科秀尔接替卡冈诺维奇担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是他批准了赫鲁晓夫去莫斯科上学，没有科秀尔的批准，赫鲁晓夫绝没有今天的地位。其次，科秀尔无论从经验和资格方面都强于赫鲁晓夫。何况，科秀尔在乌克兰的影响和口碑都不错。赫鲁晓夫怎能超过他呢？赫鲁晓夫认为这顶乌克兰第一书记的帽子对于他自己的脑袋来说简直有些太大了。最后，是民族问题，他担心乌克兰人，特别是乌克兰知识分子会对他很冷淡。

赫鲁晓夫基于这种想法，对斯大林说：“派我一个俄罗斯人到乌克兰去没有什么意义。”

“柯秀尔不是俄罗斯人，对吗？他是波兰人。为什么一个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相处会比一个波兰人更感困难呢？”斯大林反驳说。

“柯秀尔可能是波兰人，但是他能用乌克兰语发表演说。再者，柯秀尔比我有更多的经验。”赫鲁晓夫解释说。

“不许多辩，你就去乌克兰。”斯大林生硬地打断了他。

“那很好。我将尽我所能去工作，使乌克兰党重新健全起来，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赫鲁晓夫不得不结束了谈话。

赫鲁晓夫对离开莫斯科深感惋惜，但也为进入政治局和受命于这样一个高职位而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他将成为仅次于俄罗斯共和国的第二大共和国的首脑。

赫鲁晓夫临去乌克兰前，斯大林对他说：“我知道你对于城市和工业有偏爱，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不要只注意工业和城市的管理，忽略了你对农业的责任。特别要注意，不要将你的全部时间放在顿巴斯。你在工业方面不会碰到像在农业方面那样多的问题。要记住：乌克兰的农业对于苏联是非常重要的。想一点儿办法，把我们在那里的农业生产组织得更有效一些。”

尽管赫鲁晓夫偏爱矿业和工业，因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斯大林的话，赫鲁晓夫称之为“警告”，不能不认真对待。他尽其所能地学习关于农业的各项知识。他用了很长时间到乌克兰各地旅行，

访问农庄与农村，同农学家和农庄主席谈话。

从 1939 年 1 月起，在沿波兰边界的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所有农庄里，马匹不断死亡。当时，战争正在逼近，对于军事工业还不发达的苏联，马匹不单是牲畜，还是重要的运输工具。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赫鲁晓夫决定调查此事。内务人民委员乌斯品斯基认定是德国人的间谍在破坏苏联的经济和作战能力。他列举了两个人，一个是哈尔科夫兽医学院的教授，犹太人；一个是哈尔科夫畜牧学院院长，乌克兰人。

通过审问，赫鲁晓夫发现了疑点，便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马匹神秘死亡的原因。然而，委员会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曾经成立过类似的委员会，然而当马匹继续死亡时，委员会就被解散，委员会成员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清洗。人们认为，被选入这个委员会，就注定会交上厄运。

赫鲁晓夫召见了乌克兰科学院院长鲍戈莫列茨，这是一名非党人士。

赫鲁晓夫对来说：“你知道在我们的农庄里马还在继续死亡。我们一定要想些办法。”

“有什么办法好想呢？”科学院院长问。

“我无法相信科学在这里竟会完全无能为力。如果我们一齐努力的话，我们是一定能够找出并查明死亡的原因的。我们应该再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我知道，因为过去的委员会的成员遭到逮捕，你的同事都怕被派到这些委员会去。但是如果由你科学院院长来当主席，我肯定其他的专家们会自愿地同你一道工作的。我答应亲自参加委员会的所有全体会议，并听取你的科学家们的报告。为了使你的委员会不致受到任何控告的危险，内务人民委员乌斯品斯基同志也将参加。我提议我们同时采取另一预防措施：我们将建立两个委员会，彼此平行地工作。这样，其中一个委员会取得结论的机会将增加了一倍。”

实际上，赫鲁晓夫建议设立两个委员会的想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万一破坏分子打入其中一个委员会，还有另外一个委员会可以进行正常的工作。

科学院院长勉强同意了。两个委员会经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批准之后，赫鲁晓夫为保证绝对安全，又成立了一个以维尔京斯基教授为首、由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家组成的第三委员会。

结果，多勃罗特科教授所率领的乌克兰委员会首先得出结论，认为马匹生病是干草受潮后滋生出一种病菌造成的。

由于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隔阂与偏见，维尔京斯基教授的委员会极力否认上述结论。赫鲁晓夫为避免两委员会的冲突，建议继续调查。

最后，维尔京斯基承认多勃罗特科教授委员会的结论是正确的。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不使用受潮的干草、不再让干草受潮。斯大林始终密切地注视着这一调查的进行。当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汇报这一工作结果时，斯大林签发了授予多勃罗特科教授劳动红旗勋章、维尔京斯基教授荣誉勋章的决定。

这一事件的圆满结束，不单是农业上的胜利，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胜利。此前，已经有很多乌克兰族的集体农庄主席、牲畜饲养员、农学家、畜牧专家和科学家被当做人民的敌人而失去了生命。

在这一事件之后，随着乌斯品斯基的被撤职，人们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的气氛逐渐消除了。镇压减少了，党的队伍与管理方面的工作人员得到了补充，农业的情况开始好转。然而，战争却毫不留情地在日益逼近。

1939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赫鲁晓夫因来莫斯科参观全苏农业展览馆

中的乌克兰馆，回去之前在斯大林的别墅做客。斯大林告诉他，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将要来苏联访问。斯大林笑着并观察赫鲁晓夫听到该消息后会有什么反应。赫鲁晓夫一开始瞠目结舌，以为斯大林在开玩笑，他说：“为什么里宾特洛甫要来看我们？他叛变到我们这边来了吗？还是什么？”

“不，”斯大林说，“希特勒给我们发来一份电报说，‘我要求你，斯大林先生，接待我的部长里宾特洛甫，他将带去一些具体建议’。我们已同意明天与他会见。”

赫鲁晓夫告诉斯大林，他已与布尔加宁和马林科夫约好第二天在伏罗希洛夫的猎场打猎。斯大林对他说：“行啊，明天你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将与莫洛托夫一起会见里宾特洛甫。当你打猎回来后，我会让你知道希特勒有些什么想法以及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结果。”

第二天，当赫鲁晓夫回到别墅将猎物烹制成菜肴时，斯大林告诉“猎人们”，里宾特洛甫带来一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双方已经签了字。

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此前，从8月12日到21日，苏法英正在进行三国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三国军事行动的方案。苏联认为只有结成包含具体军事义务的可靠有力的同盟才能保卫世界和平。尽管波兰危机日益尖锐，欧洲战争一触即发，但英法仍未采取积极认真的态度。苏联派出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大元帅为首的具有签约全权的代表团，而英国代表团团长是一名中将军衔的兵团司令，英国代表团团长仅是一名没有全权证书的退休海军上将。英法两国代表团不顾形势的紧迫，不乘飞机而乘轮船，用了近一周时间，于8月11日方才到达莫斯科。8月12日军事谈判开始后，苏联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提出了一项关于三国共同抗击侵略的联合军事行动方案。方案中具体规定了相互实行军事援助的内容和方式。英法代表团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只空谈军事合作的目标和原则，不提具体方案，不愿承担任何具体的军事义务。在苏联代表的一再追问下，英国代表表示英国只能派出五个步兵师和一个机械化师参加共同抗德作战。在讨论相互援助的方式时，苏联提出苏德之间无共可的边界，苏联要援助英法必须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国土，因此要求英法政府敦促波罗两国同意苏军过境。对此，英法政府久久不作答复。斯大林认为英法在“过境权”问题上的推诿态度以及英德在幕后进行的秘密谈判已证明它们没有同苏联进行有效的军事合作的真诚愿望。因此，他对英法的怀疑和不满大为增加，决定中断同英法的谈判，8月21日，伏罗希洛夫宣布，由于谈判中的基本问题得不到答复，苏联被迫决定无限期地休会。正因为休会，伏罗希洛夫才有暇在自己的猎场接待赫鲁晓夫一行。

8月23日，斯大林出席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字仪式。条约的主要内容是：苏德双方保证绝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采取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将就与他们的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交换情报，进行协商。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缔约双方应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条约有效期为10年。在这个互不侵犯条约中还附有“秘密附加议定书”，对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界线作了规定：当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属苏联势力范围，德国和苏联在波兰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为界。在东南欧方面，德国表示对苏联所关心的比萨拉



比亚的利益将不插手。

斯大林知道这是希特勒的一个骗局，他对赫鲁晓夫等人说：“我知道希特勒想干什么。他以为他会令我上当，但实际上倒是我愚弄了他！”

当时，伏罗希洛夫、贝利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都在场，斯大林接着说：“有了这个条约，可以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置身战争之外，我们将能保持中立并能保存我们的力量。然后，我们将会看到情况的发展。”

随后，赫鲁晓夫返回了基辅，开始以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的身分参加战争的准备工作。数十个师被调到波兰边界并于9月17日越过边界，以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土地，几乎没有什么作战行动。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部队和当地的居民都为西乌克兰并入苏维埃乌克兰而感到高兴。但也有些乌克兰人对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十分不满，认为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只是临时的，应该以寇松线作为边界，这条线比条约规定的新界线更向西。

西乌克兰的许多波兰知识分子对红军的到来则感到惊恐。这些人刚刚经历了德国的统治。他们眼见波兰政府被纳粹击溃，华沙成了废墟，其他城市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红军会来做什么呢？

为了取得西乌克兰波兰知识分子的支持，赫鲁晓夫努力在波兰人中做工作。他选择了一个名叫华西列夫斯卡的女作家。这位妇女刚从华沙步行逃到西乌克兰，她身穿羊皮外衣，脚登黑色靴子，就像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这也许是为了避开德国人的注意。她告诉赫鲁晓夫，西乌克兰的波兰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苏联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是对波兰主权的践踏，苏联人比德国人好不了多少。

波兰和俄罗斯自古以来战争不断，苏维埃俄国与波兰在政治制度上又不一样，波兰人有这些看法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赫鲁晓夫一方面逮捕那些对苏维埃政权抱不信任态度的人，一方面筹划建立西乌克兰人民的组织。

10月，在乌克兰成立的人民会议通过了关于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共和国版图的宣言。赫鲁晓夫和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作为贵宾参加了这些会议。

对波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合并是斯大林将国境线向西推进，以便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构筑一条“东方战线”防御地带的的第一步。

11月1日和2日，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分别并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共和国。并入的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

建立东方战线的另一重要行动是与芬兰的领土交涉。从1938年4月起，斯大林就以加强北方防务需要为由，多次提出要求允许苏联租借芬兰和芬兰湾的芬兰所属岛屿，以便设防。芬兰政府表示坚持中立政策，拒绝斯大林政府的建议，但保证不允许任何外国利用芬兰领土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在苏联的倡议下，1938年12月苏联和芬兰在莫斯科举行秘密谈判。1939年10月，苏联向芬兰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为了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要求靠近列宁格勒的芬兰边界向北推后20—30公里，并把卡累利阿地峡南部等地区2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割给苏联，苏联将以两倍于此的东卡累利阿的地区作为交换。此外，备忘录还要求每年以800万芬兰马克租借汉科半岛30年，并割让芬兰湾的一些岛屿。芬兰拒绝租借海军基地汉科港，但答应调整边界，割

让芬兰湾的一些岛屿。11月28日，苏联宣布废止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天，苏联宣布断绝两国外交关系，并向芬兰提出最后通牒。

这一天，赫鲁晓夫来到莫斯科。斯大林邀请赫鲁晓夫去他那儿吃饭，并告诉他莫洛托夫和库西宁也来。库西宁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

当赫鲁晓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住处时，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库西宁正在谈芬兰问题。库西宁将成为新的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谈话中，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应该给芬兰人最后一次机会来接受苏联人的要求。如果芬兰不答应苏联人的最后通牒，苏联就将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今天就开始。”

四个人围坐在房间里，等着电话。最后通牒的时限早就规定好了。规定的时间到了，炮兵元帅库利克开始指挥炮轰芬兰边界。斯大林认为芬兰人立刻就会屈服。赫鲁晓夫也认为，只要他们把嗓门稍微提高一些，芬兰人就会服从。在座的人都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

突然，电话铃响了，芬兰人并没有沉默，他们开始用炮火还击。苏芬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几天后，赫鲁晓夫回到了乌克兰。赫鲁晓夫仍然相信苏联的优势是不可估量的，苏联和芬兰的争执会很快得到解决，苏联不会有什么伤亡。然而事与愿违。

战争顽固地拖下去。芬兰人英勇而善战。他们在卡累利阿地峡沿着“曼纳海姆防线”出色地部署了防御设施，使苏联部队试图从这条战略通道向前推进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斯大林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失算了。苏联军人所面对的是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和部署得很有成效的火炮阵地。苏军伤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到了冬天，斯大林决定绕过卡累利阿地峡，从拉多加湖去袭击没有防御工事的北方。但当苏军试图从背后袭击芬兰人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更为不妙。芬兰人本是个生长在北方而又爱好体育运动的民族，他们几乎在学会走路之前就已经学会了滑雪。苏联人遇到了用速射自动步枪武装起来的滑雪部队。苏联人也试图学芬兰人的样子穿上滑雪板，结果是行动更为笨拙缓慢，因为大多数人未经过专门的滑雪训练。于是，全苏联各共和国开始招募专业运动员。政府官员们隆重地欢送他们，人们相信这些运动员定会凯旋。结果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且得道多助的芬兰人使这些滑雪运动员受到重创。

斯大林同赫鲁晓夫讲起战况时沉重而忧郁他说：“我们的部队在深雪中前进。部队里有许多乌克兰人。最初，他们精神饱满他说：‘那些芬兰人在哪里？让我们去干掉他们！’这时，机枪突然打来，我们的人倒下去了。”

芬兰人在林海雪原中，身披白色斗篷，以树枝为掩护，像布谷鸟一样隐藏在树丛中，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自己的家园，与苏联人顽强地周旋着。

斯大林对军方、对伏罗希洛夫大发雷霆。他当着赫鲁晓夫的面责骂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也气得发疯，胀红着脸，对斯大林大喊大叫：“所有这一切只能怪你自己！消灭我们老一辈红军的就是你这个人，我们最好的将军都是被你杀害的。”斯大林厉声打断了他，伏罗希洛夫立时拿起一只盛有烤小猪的盘子在桌子上砸得粉碎。对于伏罗希洛夫的指责，斯大林不能容忍。要在前两年，伏罗希洛夫很可能会作为人民的敌人被镇压，现在他只是被免去了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

赫鲁晓夫在这次不愉快的会见后回到了基辅。铁木辛哥元帅来看他，告诉他，他已被通知去莫斯科，接替麦列茨科夫去指挥苏军驻卡累利阿地峡部队。

铁木辛哥指挥苏军全力从正面发起进攻。他动用空军、炮兵，切断铁路运输线，轰炸桥梁，炸毁火车头，摧毁碉堡。经过四个月，苏芬战争终于结束了。

苏芬战争暴露了苏联军队的弱点。希特勒观察苏芬战争所得出的估计是不难想象的：“苏联对付这样一个国家很勉强，而我们只要几个小时就能解决它。如果用我们最好的装备和训练良好、组织完善的大部队去进攻俄国人，他们还能剩下些什么呢？”

实际上，希特勒想的不止是这些，他比苏联人看到的还远。他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分已于1937年被斯大林消灭了。这样一来，那些正在成长的接班人暂时还缺乏作战所必需的“智慧。”这一点，希特勒和伏罗希洛夫看法是一致的。

建立东方战线的最后一次行动是占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比萨拉比亚的归属问题自十月革命后，在苏联和罗马尼亚之间一直存在争议。1940年6月26日，苏联照会罗马尼亚政府，要求归还被强行夺去的原苏联领土比萨拉比亚，并要求将布科维纳北部移交苏联，作为罗马尼亚占领比萨拉比亚22年的补偿。罗马尼亚在向英国、德国、意大利求援无望后，答应了苏联提出的要求，将整个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割给苏联。这些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乌克兰人。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直到这时才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因此它与比萨拉比亚的大部分地区合并成一个新的加盟共和国，即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比萨拉比亚的其余部分和布科维纳并入乌克兰。因此，几乎所有乌克兰人都住在一个单一的共和国里了。

苏联通过建立东方战线把西部国界向西推进了150—400公里，扩大了苏联的防御空间，增加了苏联人心理上的安全感。而斯大林的讲话使人们更加认为战争不会来临。斯大林说，人民应该相信，席卷欧洲其余部分的这场战争不会把他们卷进去。不只是斯大林，其他政府领导人也这样讲，致使人民放松了警惕。加里宁在庆祝十月革命23周年时发表讲话说：“在所有大国当中，苏联是唯一没有卷入战争并严格奉行中立的国家。……在全世界都处在这场战争的魔掌下的时候，没有参加战争是极大的幸运。”这种看法似乎不错。1941年农业收成不错，工业生产形势也看好；煤产量蒸蒸日上，西乌克兰的石油滚滚不断。赫鲁晓夫跑遍了乌克兰共和国的许多地方，到处发表演说。他在一次演说中对玉米大加赞赏。他认为玉米是一种大有前途的极好的农作物。他要求在乌克兰大大增加玉米的播种面积。

赫鲁晓夫在共和国的知名度也如日中天，已经有几个集体农庄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且在庆祝顿涅茨克工学院建立20周年之际，他的名字也加到了这所学院名称的前头。

尽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十分尊敬信赖，但对他关于德国两年内不会在东线开战的说法还是不大放心。苏德边界的情报时时困扰着他。基尔波诺斯上将也是如此，他现在是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赫鲁晓夫经常同基尔波诺斯一起到边境去，查看防御工事的构筑情况。工事的构筑十分缓慢；大多数部队的兵力仍然处在和平时期的水平，而且弹药不足。有一次，赫鲁晓夫听说坦克部队由于缺少弹药无法进行射击训练，

十分气愤。他利用乌克兰本身的条件做了些补救。1941年4月，赫鲁晓夫和基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呼吁迅速构筑防御工事，使边防部队处于满员状态，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然而，这些要求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战争爆发前夕很长一段时间，赫鲁晓夫一直留在莫斯科。他很着急，想早些回去。斯大林一再对他说：“瞧，为什么要这样急着要回乌克兰呢？你不在场可以给基辅的那些人一次锻炼的机会，还没有到需要你动身的时候。”

赫鲁晓夫看不出留在莫斯科有何必要性。这些天来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通宵达旦的宴会。赫鲁晓夫对这样的宴会已经开始厌恶了。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接触中，赫鲁晓夫发现斯大林对苏军部队的战斗力已失去了信心。当斯大林听到法国败降的消息时，竟毫无掩饰地破口大骂：“现在希特勒肯定要打破我们的脑袋了。”

赫鲁晓夫最后终于直截了当地请求说：“斯大林同志，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如果战争发生时我仍在莫斯科，或者正在回基辅的途中，那将是太糟糕了，我还是应当尽早赶回基辅。”

“是的，我认为那是对的，你还是去的好。”斯大林的回答使赫鲁晓夫明白了，斯大林之所以将他留在莫斯科，是需要人给他作伴，特别是当他害怕时，他受不了孤独无伴。斯大林估计战争早晚要打，但也许近期不会打。

回到基辅的当天晚上，大约是10时，赫鲁晓夫接到指挥部的电话，要他从家里立即赶到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处去读从莫斯科来的急件。急件要求乌克兰委员会在几天乃至几小时内作好战争准备。

接着，赫鲁晓夫又接到捷尔诺波尔指挥站打来的电话。电话中报告说，一个德国兵刚从德国部队那里逃过来。他带来的情报说，明晨3时，德国将向苏联发起进攻。

那天夜里，赫鲁晓夫没有回家，他要一直等到凌晨3点，看看到底会不会发生战争。天快亮的时候，赫鲁晓夫得到报告说，德国人已经向他们开火了。赫鲁晓夫立即向莫斯科汇报，莫斯科的命令是：不许还击。赫鲁晓夫对此大惑不解。斯大林不相信战争会真的爆发，他认为进攻只是德国某野战司令的挑衅行为，绝不是希特勒的命令，一句话，谨防上当。

天亮时，基辅军区司令部已得到德军飞机已经接近基辅的报告。电话刚挂，德国飞机已经飞到基辅城市上空，轰炸开始了，机场被炸，机库着起了大火，情况迅速恶化。

斯大林战前曾估计，一旦战争真的到来，德国人的主攻方向将是乌克兰，因为他们首先要夺取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因此，他把防卫重点放在了乌克兰。西南方面军所管辖的940公里的国境线上驻扎着第5、第6、第12和第26四个集团军，领有32个步兵师、16个坦克师、8个摩托化师和2个骑兵师。战争开始前，又有第19和第16两个集团军开到这里，再加上驻扎在罗马尼亚边境的南方方面军的13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和3个骑兵师，部署在乌克兰境内的总兵力大大超过了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总和。

实际上，希特勒在南方也投入了重兵。按照巴巴罗莎计划，进攻苏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消灭苏联西部军区的军队，然后在空军的掩护下，以坦克部队为先导，长驱直入，向苏联腹地进攻。进攻路线分南、北、中三路。北方集团军群共29个师，在10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由东普鲁士出发，经德文斯克、奥斯特洛夫，直取列宁格勒；中央集团

军群共 51 个师，在 1600 架飞机的掩护下，由华沙以东出发，经布列斯特、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进攻；南方集团军群共 63 个师，在 1400 架飞机的掩护下，在卢布林至多瑙河口地区展开，向基辅进攻，然后向顿巴斯进击。在包围并歼灭这三个城市的苏军后，分别占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顿巴斯。第二阶段，进攻苏联的后备军，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和阿斯特拉罕。

基辅特别军区正好位于希特勒入侵的路线上。这个军区的地形对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十分有利。道路四通八达，且路况很好。按外国报纸上的说法，“在波兰与基辅之间的地区是一个真正的‘坦克场’”。坦克在那里可以随心所欲地行进。身兼全联盟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赫鲁晓夫，此时感到肩膀上的担子有千钧重。从南线攻击开始之时，他就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军事问题上。

6 月 22 日日落时，焦急的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处接待了刚刚从莫斯科飞来的朱可夫大将。朱可夫与赫鲁晓夫曾在乌克兰一起共过事，苏芬战争结束后，原基辅军区司令铁木辛哥接替伏罗希洛夫担任了国防人民委员，基辅军区司令就由朱可夫担任。在战争爆发前 4 个月，也就是 1941 年 2 月，朱可夫才离开基辅去莫斯科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职务。赫鲁晓夫对朱可夫的印象很好，他认为朱可夫是一个有才能的组织者和坚强的领导者。朱可夫的到来，使他感到精神振奋。

赫鲁晓夫告诉朱可夫，不能再往前飞了，前方已被德国飞机控制，只能坐车。两人用高频电话与莫斯科统帅部的瓦杜丁进行了联系，询问了最新情况，然后便乘车前往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捷尔诺波尔，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正在那里指挥。

到达指挥所时已是深夜，他们立刻同瓦杜丁通了电话。瓦杜丁告诉他们：“到 6 月 22 日止，尽管采取了有力措施，总参谋部仍无法从各方面军、集团军和空军司令部获得关于苏军和敌人的准确情报。关于敌人突入苏联领土深度的消息，矛盾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受到的损失，没有准确的报告。只知道西方方面军航空兵受到极大的损失。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无法同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和帕夫洛夫取得联系，他们也没有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就跑到某个部队去了。这两个方面军司令部也不知道他们的司令员目前在什么地方。”

“据空中侦察获得的情报，战斗在苏联国境线筑垒地域进行，局部地区敌军已深入苏联国土 15—20 公里。各方面军司令部企图直接与部队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因为它们与大多数集团军和独立军之间既没有有线通讯联络，也没有无线电通讯联络。”

瓦杜丁将军还说，斯大林同意了国防人民委员第 3 号命令草案，并叫朱可夫签上自己的名字。

朱可夫问道：“是什么命令？”

“转入反攻，粉碎主要方向上的敌人，并向敌国领土挺进。”

“可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以多少兵力实施突击，”朱可夫看了一眼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说，“天亮以前先把前线发生的情况弄清楚，然后再定下必要的决心，是不是更好一些。”

瓦杜丁表示同意朱可夫的观点，但事情已经决定，必须这样办。

朱可夫只得表示同意，让瓦杜丁在命令上代签上朱可夫的名字。

这个命令晚上 12 点钟左右才到达基尔波诺斯手中。基尔波诺斯是在朱可夫调任后来基辅的。按赫鲁晓夫的看法，这是个典型的好心而无经验的指挥官，提升像他这样的一批人，是为了填补红军高级将领被清洗后留下的空缺。基尔波诺斯担任基辅军区司令，只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委派。他在苏芬战争期间指挥过一个师，立了功并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但要他担负西南军区的重任，实在是勉为其难。。

不出朱可夫所料，第 3 号命令引起了方面军参谋长普尔卡耶夫的激烈反对。他认为方面军缺乏执行这个命令所需的兵力兵器。

赫鲁晓夫等人对当前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军事委员瓦舒金力主进攻，认为一开始就转入防御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司令员基尔波诺斯认为，命令总要执行，攻下卢布林或许不太可能，但应对入侵之敌实施强大的反突击。最后，朱可夫建议基尔波诺斯立即下达预先号令，集中机械化部队对突入索卡尔地区的敌人“南方”集团军的主要集团实施反突击。反突击应有方面军全部航空兵和统帅部部分远程轰炸航空兵参加。基尔波诺斯等立即编写出预先号令，并将它们传达给各集团军和各军。

6 月 23 日，赫鲁晓夫和朱可夫来到机械化第 8 军军长利亚贝舍夫中将的指挥所。利亚贝舍夫在地图上指明了他的军所在的位置和部署方法，扼要地报告了部队的状况，他说：“我们军需要一昼夜的时间来进行集结，维修武器和补充储备品。同时还要在这段时间内进行战斗侦察，组织指挥。因此，要到 6 月 24 日清晨才能全部投入战斗。”

“好吧，”朱可夫答道：“当然，这次反击最好是和机械化第 9、第 19、第 22 军共同实施，可惜这三个军进入出发地区迟了。情况不允许把几个军全部集中起来。机械化第 8 军实施的反突击可能会遇到敌人猛烈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火的抗击。考虑到这种情况，必须对地形和敌情进行周密的侦察。”

赫鲁晓夫陪同朱可夫就一些原则问题同利亚贝舍夫谈妥以后，傍晚时分回到了捷尔诺波尔的西南方面军指挥所。

西南方面军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和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报告说，战斗在所有的地段进行，而以布罗德、杜布诺、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地区战事最激烈。机械化第 9 军和第 19 军将于 6 月 25 日到达罗夫诺地区森林中。基尔波诺斯说：“我们的决心是：不等所有的军全部集中，即于 6 月 24 日向克列瓦尼和杜布诺开始反突击。第 5 集团军司令员除了协调机械化第 22 军的行动以外，还应协调机械化第 9 军和第 19 军的行动，给这两个军以必要的帮助。”

朱可夫和赫鲁晓夫认为基尔波诺斯的决心是合理的，他们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建议他检查一下各个军同方面军航空兵之间协同动作的保障。

6 月 24 日，利亚贝舍夫指挥的机械化第 8 军在别烈斯帖奇科方向转入进攻。这个军装备有比其他各军都要好的最新式的坦克，而且训练有素。卡尔别卓将军指挥的第 15 机械化军在拉选霍夫以东进攻。这两个军给予德军的打击，特别是机械化第 8 军的顺利行动，很快便引起了敌人的重视。特别是当负责掩护克列斯特集群第 48 摩托化军右翼的敌军第 57 师被歼之后，尤其是这样。

德军第 48 摩托化军这天陷入了非常危急的境地，希特勒不得不用全部空军来抗击苏军的反突击，这样才使这个军免于被歼。德国人不得不增派第 44 军及其他部队，以对抗苏军部队的反突击。

就这样，西南方面军胜利地实施了最初的一次反突击。要是基尔波诺斯手中有更多的航空兵用来与机械化军协同动作，要是再多一二个步兵军，那么反突击可能会更加强有力。

西南方面军组织的积极反击，使侵入乌克兰的德军遭到很大的困难，打破了希特勒迅速攻击基辅的狂妄梦想。特别是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拉泽胡夫、杜布诺三角地区的坦克大战，不失为苏德战争初期的威武壮举，使敌人在西南战线方向上整整一周停滞不前。

6月26日，西方方面军形势告急，敌人逼近明斯克。斯大林将朱可夫召回。临行前，朱可夫再次要求西南方面军调集一切可以调集的兵力实施坚决的反突击，他对赫鲁晓夫说：“既然实施反突击，那就要用全力实施。”

由于仓促地实施了反突击，未能集中足够的兵力，结果只能短时间地阻止敌人前进。往往在一个地段阻止住敌人，而在另一个地段被敌人突破。经过五昼夜的激战，基尔波诺斯终于认识到：不暂时转入防御是不行了。应该把分散在广阔空间上的军队集结为几个强大的反突击集团。他向部队下达了相应的命令，并要求在基辅、舍佩托夫卡、伊贾斯拉夫、旧康斯坦丁诺夫、奥斯特罗波尔等筑垒地域整顿荒弃已久的设备。可是莫斯科大本营对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上述报告的回答却是：继续反突击，不许退却。基尔波诺斯只好发出停止退却的命令，继续组织反击。但是，在27日，敌人已经突破杜布诺，直指基辅，形势危急。

赫鲁晓夫仍然留在捷尔诺波尔，协助基尔波诺斯处理各种军事问题。当时，大本营要把驻扎在舍佩托夫卡的卢金领导的第16集团军调往斯摩棱斯克。这样一来，西南方面军的右翼就有被分割的危险。鉴于此种情况，赫鲁晓夫亲自同大本营联系，争取留下第16集团军尚未开走的部队。身兼数职的赫鲁晓夫还要时时兼顾乌克兰的其他工作，这些天他忙得团团转。

基尔波诺斯命令在28日恢复总攻，把全部兵力都调来进行反突击，旧筑垒地区的防守明显不足。由于总攻击力量不足，机械化第8军有被合围的危险，而机械化第15军被敌拖住无法进攻。苏联军队处境十分艰难。赫鲁晓夫同军事委员会成员瓦舒金将军来到一个坦克兵团，传达斯尔波诺斯的命令，以便更好地使用这个兵团的力量。瓦舒金从兵团回来时心情颓丧，他对赫鲁晓夫说：“全都阵亡了，一切同在法国进行得一样，全都完了。我要自杀。”赫鲁晓夫劝道：“你冷静点……”然而，话音未落，瓦舒金已经开枪自杀了。

6月30日，莫斯科命令西南方面军立即改变原计划，于7月9日前撤退到科罗斯坚、沃伦斯基新城、舍佩托夫卡、旧康斯坦丁诺夫、普里斯库罗夫等筑垒地域一线。但是，由于前些天的反突击，双方战线已犬牙交错。为了拉平战线，司令部命令还在边界附近作战的两翼部队第5、第12集团军在6月30日夜开始撤退，处在中央的第6、第26集团军在7月1日夜开始退却。德国人很快便觉察到苏军的行动，向布罗德—捷尔诺波尔急进，7月2日就攻占了捷尔诺波尔，这时西南方面军的指挥部已经撤到普罗斯库罗夫。敌人分割了第6集团军的正面部队，又威胁到第26、第12集团军的后方，西南方面军处于困难境地。

为了保卫基辅，将筑垒地域恢复至战备状态，赫鲁晓夫从前线驱车回到基辅，组织和动员全体居民拿起武器。他打电话给莫斯科，要求运一些武器来。电话接通时，只找到马林科夫。

赫鲁晓夫对着话筒喊道：“请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弄到步枪？我们这

里有很多工厂的工人想同红军士兵一起与德国人战斗，但是我们没有东西去武装他们。”

电话里传来马林科夫的声音，令人寒心：“你最好放弃从我们这里得到步枪的任何想法。这里民防组织的步枪已经被全部送到列宁格勒去了。”

列宁格勒的情况非常紧急。

“那么，我们拿什么战斗呢？”赫鲁晓夫着急地问。

“我不知道——长矛、剑、土制的武器，以及你们工厂里可以制造的任何东西。”

“你认为我们应该用长矛来打坦克吗？”

“你只能尽你的最大努力。你可以在瓶子里装上汽油或火油制成燃烧弹，向坦克投掷。”

可以想象，听了这些回答，赫鲁晓夫有多么沮丧和愤怒。居然已经到了这般境地，要设法击退敌人的进攻，却没有步枪和机枪，更不要说大炮和自动化武器了！

赫鲁晓夫呆坐在电话机旁，一动不动，半天没说一句话。



### 第三章

#### 军事委员会委员

马林科夫对他的回答，给他的刺激太大了。

正当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大大激发、纷纷要求拿起武器与德国法西斯分子决一死战之时，却没有武器发给他们。赫鲁晓夫怎样向人民解释，解释后将会产生怎样的反应？人们会对党和政府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林林总总，一大堆的问号，让赫鲁晓夫一筹莫展。

早在苏芬战争时期，赫鲁晓夫就觉察出一些问题，尽管当时拿不准主意——是什么削弱了苏军，是指挥员不够，还是军备不足。国防部用部队的检阅和演习显示苏联的军队有多么强大，实际上，它掩盖了苏军的缺陷和不足，使人误信苏联很安全。苏芬战争之后，本应该重新估量一下苏军的实力，特别是机械化部队；早就应该把工业转向战时需要。然而，实际情况是，战争开始时，仍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

作为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虽然已经下台，但仍应负有主要责任。他的疏忽是有罪的。他的部下肯定向他报告过军备非常缺乏的情况，但这些报告就如同鸭子背上的水，一晃就没有了。他忘却了自己的责任，而只是对着摄影师微笑，在电影摄影机前趾高气扬地走着。早就听人说，伏罗希洛夫在画家格拉西莫夫的画室里摆姿势所花的时间要比他在国防人民委员部所花费的时间还要多。总之，伏罗希洛夫的主要兴趣不是放在武器配备和部队的部署等方面，而是如何在公开庆祝集会上表现他那动人的军人气派。

该死的伏罗希洛夫，你简直是误国误民啊。赫鲁晓夫想到这里，重重地叹了口气。

至于斯大林，他也有一定的责任。他过高地估计了国家现有的战备。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被那些表现部队检阅和演习的影片所蒙蔽。他没有看到战备的真实情况。他很少离开莫斯科。事实上，他除了到他的别墅或到索契去休假之外，很少离开克里姆林宫。他有关国防方面的情报全部来自伏罗希洛夫的汇报，而伏罗希洛夫本人就是一个脱离实际的人。

责怪有什么用，责怪干事无补。想到这里，赫鲁晓夫反倒有些振作起来。当没有指望和对援助不抱希望时，人们往往能积极地去想办法。

赫鲁晓夫指示乌克兰各地利用一切现有的条件制造武器和弹药，主要是制造简单的反坦克手榴弹和装有易燃物的燃烧瓶。

基辅周围的筑垒地域也已修复。城市居民全部来到城郊，在城的四周挖了一条很深的反坦克壕沟。身强力壮者组成了预备役，随时听候调遣。

赫鲁晓夫部署了基辅的防卫工作以后，又回到了方面军的指挥部。西南方面军向旧筑垒地区撤退的行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个原因是德国人的进攻。7月7日，德国的坦克部队已经推进到了别尔季切夫，9日便逼近到离基辅城不远的日托米尔。另一个原因是驻扎在罗马尼亚的德罗两国军队的进攻。他们在6月底渡过普鲁特河向南方方面军发动进攻，经过六昼夜的战斗，两支敌军突破了南方方面军的防御，继续向莫吉廖夫——波多尔斯克方向进攻。西南方面军的第12、第26、第6集团军被夹在了中间。赫鲁晓夫同基尔波诺斯亲自赶到别尔季切夫地域，以便就地分析情况。他们从望远镜中看到德军正在接近这一地区。情况实在不妙，心事沉重的两名领导人不得不立即

返回司令部。

7月11日，德军克莱斯特坦克兵团突破了基辅周围筑垒地域的前沿防线。形势极为严重。赫鲁晓夫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布尔米斯坚科、基辅州委书记米申与基尔波诺斯共同研究了保卫基辅的方案，通过了在敌占区组织游击队和准备党团地下活动的决定。

为了加强和协调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作战行动，斯大林成立了西南战区司令部，任命布琼尼元帅为总司令，赫鲁晓夫为军事委员。赫鲁晓夫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的职务由布尔米斯坚科代替。

7月的下半月和8月初，基辅城外进行着激战，大量的德军被牵制在那里。但是德军却在南北两面紧逼苏军，又向东推进了一段，结果基辅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如果德军从中央向南推进，那么大部分苏军就要被切断；后果不仅是基辅要失陷，而且整个南面防区也要遭受重大失败。让军队撤离基辅，并在通往哈尔科夫和顿巴斯的路上组织防御，为时并不算太晚——这是基尔波诺斯、赫鲁晓夫、布琼尼的共同想法。

8月8日，斯大林电话询问基尔波诺斯：“我们得到消息说，好像是由于防守基辅的兵力不足，方面军已经决定放弃基辅。这个消息是真的吗？”不知斯大林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基尔波诺斯对这一询问不得不作了否定的回答，因为在此前朱可夫因提出把西南方面军全部撤过第聂伯河，放弃基辅，而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基尔波诺斯向斯大林保证，将全力以赴不使基辅落入敌人之手。这时，德军将领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集群已南下同克莱斯特的坦克部队会合把六个苏联集团军切断在第聂伯河曲一带。

9月4日，西南战区司令员布琼尼向大本营报告说，敌人已在西南方面军的两翼构成包围态势，并有突入后方的危险。9月7日，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也向大本营发去电报，说退却不能延迟了。9月10日，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通知基尔波诺斯继续在阵地上作战，一个师也不允许从基辅筑垒地区调走。基尔波诺斯请求布琼尼再向总参谋长解释，方面军撤退稍有延误就会有致命后果。沙波什尼科夫代表大本营坚持，西南方面军东撤为时尚早。9月11日，斯大林亲自给基尔波诺斯打电话：“你们关于把军队撤到那条河以东的建议，我看是危险的。”他在部署了战术后又补充说：“应当停止寻找退却地区，而应寻找抵抗的途径。”当基尔波诺斯解释说没有撤退的想法时，斯大林向他读了布琼尼的电报，说：“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是赞成撤退的。”9月12日，大本营解除了布琼尼西南战区总司令的职务，委派铁木辛哥接任。赫鲁晓夫仍然留任西南战区的军事委员。

9月16日，新任西南战区总司令铁木辛哥指示西南方面军作战处长向基尔波诺斯转达如下命令：放弃基辅筑垒地域，迅速将主力撤至后方防御地区。根据上次的经验教训，基尔波诺斯不敢执行这一口头指示，而是向大本营发了询问电报。直到9月17日夜，莫斯科才同意西南方面军向东运动，但是为时已晚。西南方面军被合围在基辅大包围圈中。9月20日，基辅陷落，苏军45万人被俘，基尔波诺斯以身殉国。

基辅失陷后，西南战区被撤销，建立了新的西南方面军，由铁木辛哥担任司令员，赫鲁晓夫任政委，指挥第40、第21和第38集团军的一部分以及从南方方面军调来的新编第6集团军，负责堵住库尔斯克至哈尔科夫防线中的缺口。

在1941年的夏秋两季，赫鲁晓夫没有像和平时那样到处发表演说，他

只是在7月8日向乌克兰人民发出呼吁，号召乌克兰人民与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布琼尼来基辅后，他又和布琼尼一道以西南战区的名义签署了一项声明，呼吁乌克兰人民与敌人进行游击战，在敌人的后方破坏军用设施，焚烧仓库和军团物资。由于他不是军事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几次改组都把他留了下来。

1941年冬天，苏联军队阻止了德国军队向莫斯科的进攻，接着又赢得了莫斯科会战的胜利，希特勒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受到重创。11月初，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再次合成西南战线，铁木辛哥任总指挥，赫鲁晓夫任军事委员。为了减轻莫斯科的压力，西南战线在罗斯托夫方向发动了进攻，一度迫使德军从顿河一带全线后退。12月中旬，第13集团军又挡住了那列茨到利夫内的德军的主要退路，包围并击溃了德军主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1942年1月，西南战线所辖布良斯克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分别向奥廖尔、哈尔科夫、克拉斯诺格勒方向发动进攻，在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夺得了一些城镇并在顿涅茨河对岸建立了防御设施。

1942年春，苏德战线处于相持阶段。夏天，希特勒再次在南线发动攻势，企图消灭顿河以西的苏军，夺取高加索的油田和通道。德军一方面向塞瓦斯托波尔发起进攻，另一方面准备消灭哈尔科夫以南的伊久姆突出部的苏军。

就在德军准备发动进攻的前几天，铁木辛哥指挥的西南战线·部队于5月12日在同一地区向哈尔科夫发动了一场进攻。进攻共动用了23个步兵师、2个骑兵军和2个坦克军。开始，苏军进展十分顺利。赫鲁晓夫当时的感觉是太容易了。德国人没有集结部队来抵挡他们。苏军这时简直像是在大路上行军，3昼夜前进了25—50公里，一直深入到敌占区。侦察兵报告说，敌军正在南线的阿尔瓦扬斯克集结。可以判断德军计划攻击苏军的左翼。情况十分危急，必须立即征得上级的许可取消这次进攻，把队伍撤回。

对于这次进攻，以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为首的西南战线指挥部是全体同意的，大本营也是同意的。现在必须劝说大本营取消这次战役。赫鲁晓夫知道请求斯大林停止进攻是非常困难的，但事情摆在眼前，不停止进攻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指挥部决定立即停止进攻，并采取措施加强防卫，将大炮、坦克部队和反坦克部队调到左翼。

当所有的命令都传达完毕、一切工作都安排好之后，赫鲁晓夫便回到住所，躺下休息，这时是凌晨3点，天已经有些亮了。突然，巴格拉米扬冲了进来，这次进攻作战计划就是他制定的。他说：“我很抱歉来打扰您，赫鲁晓夫同志，有件事您必须知道，莫斯科不同意我们停止进攻。”

“什么？这怎么可能？是谁决定的？”赫鲁晓夫边说边坐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们继续发动攻势，我们将走向灾难。我们在战线突出部分的队伍将要被毁灭。我请求您亲自去对斯大林同志讲。我们唯一的希望您能说服他，改变他取消我们命令的决策。”

赫鲁晓夫从未见过巴格拉米扬同志这个样子。赫鲁晓夫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必须同斯大林谈谈，必须改变斯大林的想法。

赫鲁晓夫起床后同大本营通了电话，巴格拉米扬就站在他的旁边。接电话的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他已经知道事情的原委。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赫鲁晓夫说，“作为一个军人，你熟悉地图，也了解敌人的战略，你知道的情况比斯大林同志知道的要详细得多。”

请你带着地图向斯大林同志说明，如果我们继续这次战役会发生些什么。”华西列夫斯基当然明白赫鲁晓夫的意思。他回答说：“斯大林现在在近郊别墅。”

“那么到那里去跟他谈，你知道他在任何时间都会接见你的。现在毕竟是在进行一场战争。带一张地图去，指给他看，为什么我们决定取消这次进攻，这是我们能做的唯一合理的事。”

“不，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同志已经下了决心。他已经发出了命令。”华西列夫斯基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没有办法，只得亲自打电话给斯大林了。

电话打到了别墅，接电话的是马林科夫。赫鲁晓夫问：“我可以同斯大林同志讲话吗？”赫鲁晓夫知道，斯大林肯定在那里。他也知道斯大林坐在什么地方以及需要走几步路来接电话。赫鲁晓夫听见马林科夫在同斯大林讲话，马林科夫拿起电话对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同志说你应该告诉我需要什么，我可以把你的口信转达给他。”赫鲁晓夫预感到事情要糟。他坚持说：“我希望同斯大林同志亲自讲。我必须向他报告前线的情况。”

马林科夫转告了斯大林，又回来拿起了电话说：“斯大林同志仍然说你应该告诉我需要什么。”

赫鲁晓夫看到无法再坚持，就告诉马林科夫，如果继续进攻，部队将落入敌人的包围圈。由于阵线拉得大长，已向敌人暴露了左翼。当马林科夫向斯大林报告时，赫鲁晓夫又等了一会儿。他回来说：“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没有得到前线指挥官的同意，就作出了停止进攻的决定。他知道取消这次战役是你的主意，完全是你一个人的主意，他是反对的。”赫鲁晓夫不相信铁木辛哥会同斯大林这样讲，很可能是斯大林想把他弄得一时不知所措，以致无法同他继续争论。

“马林科夫同志，你是知道铁木辛哥的性格的。他绝不会接受这个决定，除非他也相信这次战役必须停止。”

“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斯大林说了，进攻必须进行。”

“那好，”赫鲁晓夫生气地说，“命令就是命令。继续进攻是很容易的，因为在我们的前面没有敌人部队。使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马林科夫挂上了电话，事情已没有挽救的余地，站在赫鲁晓夫身边的巴格拉米扬终于抑制不住，哭出声来。他已预见到将要发生什么。他是为了那些战士哭泣。

不出指挥部的所料。5月17日，德军的克莱斯特集团军群由斯拉维吾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转入了反攻，突破了苏军防御，两昼夜推进了50公里，西南战线的第6、第57集团军和第9、第38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全部被合围。德军损失兵力2万人，而苏军西南战线仅被俘就达21.4万人，损失坦克1200辆，火炮2000门。西南战线的前方战术指挥所也陷入重围。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科斯坚科、第6集团军司令员哥罗德尼扬斯基和第57集团军司令员波德拉斯都在突围时壮烈牺牲。

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几天后，赫鲁晓夫接到莫斯科打来的电话，要他速回莫斯科。

失败本身已使赫鲁晓夫万分沮丧，更何况要只身回莫斯科受罚。

在飞机上，他感到自己身单影只，孤立无援，前景暗淡。等待着他的可能是逮捕，也许是枪毙……

斯大林接见了，但从斯大林的脸上看不出是发怒还是同情，“德军已经宣布，他们俘虏了我们20万人。他们是说谎吗？”斯大林问。

“不，斯大林同志，他们没有说谎。那个数目差不多。我们大约有那么多人，也许还要多一些。我们必须设想，有些人阵亡，其余的成了俘虏。”

斯大林没有再说什么，但是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正在斗争，如同一只沸腾的锅炉，一旦爆炸就会有人被烫伤。但是，他终于克制住自己，什么话也没说。

后来，斯大林开始同赫鲁晓夫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沿顿涅茨河设防阻止敌人的可能性有多大？以现有的兵力如何阻止德军？等等。讨论结束后，两人共进了晚餐。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逗留了好几天，等待使他焦躁不安。对前途的思虑，使他感到痛苦；对失败的懊悔，使他痛心疾首；这几天，就像是过了几十年。他等待着，不知道他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

一天，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那儿吃饭。斯大林用一种平静的、不作定论的语调说道：“你知道，”他看着赫鲁晓夫的眼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我们的部队在东普鲁士陷入德军包围，指挥部队的将军受到沙皇的军事法庭的审问。他被判罪并处以绞刑。”

“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答道，“我还记得这件事。沙皇是做对了。当时那位名叫米亚斯尼科夫的将军是个叛徒，他是个德国特务。”

斯大林没有再说什么，但他所说的这些话已经足够让赫鲁晓夫浮想联翩。斯大林大概在提醒他，提醒他这个对哈尔科夫溃败应负重大责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如何处理，也是有“章”可循的。何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已经有了先例：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里，当德军长驱直入占领了白俄罗斯之后，帕夫洛夫将军连同他的参谋以及负责该地区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都被逮捕，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处决。

斯大林是要赫鲁晓夫做好心理准备，告诉他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他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处罚。

但是，战役失败的责任能全都推到赫鲁晓夫身上吗？赫鲁晓夫感到非常委屈。他在事情还未发生前，曾提出过挽救的办法，曾经试图说服斯大林取消这次进攻，马林科夫、巴格拉米扬同志是可以作证的，还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当然，还有那些在他给马林科夫打电话时，坐在斯大林身边的人。赫鲁晓夫知道，当时在场的肯定有贝利亚、米高扬、莫洛托夫。尽管这些人都很接近斯大林，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他曾竭力反对继续进攻的这一事实。要是这次进攻胜利了，他们很可能成为对赫鲁晓夫非常不利的证人。但是现在事情正好相反，他们现在都成了不利于斯大林的证人。

赫鲁晓夫晚上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以往的生活场景一幕幕地从脑海中闪过……

赫鲁晓夫有两次被列入嫌疑之列，险些被清洗。当时第三国际的成员一个个被清洗，波兰代表实际上全部被逮捕，被当做敌人的代理人枪毙了。赫鲁晓夫到莫斯科参加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时，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同他站在一起。斯大林走到他们跟前，用手指戳戳赫鲁晓夫的肩膀说：“你叫什么？”

“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惊愕地回答，“我是赫鲁晓夫呀。”

“不，你不是，”斯大林冷冷地说，“有人告诉我，你的真名不是这个。”

“您怎么可以这么说，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有些沉不住气了，“我

的母亲尚健在，您可以去问她。您还可以到我工作过的工厂、或者去库尔斯克我的家乡卡利诺夫卡去调查，核实。”

“好吧，”斯大林回答说，“我只能告诉你，我是听叶若夫讲的。”

叶若夫矢口否认讲过任何有关这件事情的话。斯大林便又叫来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作为证人，说他曾说过赫鲁晓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马林科夫立刻表示他不记得自己曾说过这种话。

还有一次，斯大林叫赫鲁晓夫去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脸像平时一样毫无表情，他死死盯着赫鲁晓夫的眼睛说：“你知道，安季波夫已经被捕了。”尼古拉·安季波夫来自列宁格勒，赫鲁晓夫同他并不熟悉。

“不，我不知道。”赫鲁晓夫答道。

“好吧，”斯大林说，“他有许多于你不利的证据。”他神情温和下来，并且仍旧盯着他。

赫鲁晓夫回视着他，想了一下，说道：“对这事，我一无所知。可是，我知道安季波夫无法提供任何不利于我的证据。因为我们只是点头之交。”

赫鲁晓夫感觉，斯大林很可能是想从他的眼神中找到什么，如果赫鲁晓夫表现出手足无措、心慌意乱的话，那么斯大林立刻会得出他试图隐瞒什么的结论。无疑，赫鲁晓夫会成为清洗名单中又一个苏维埃的敌人。

俗话说，“事不过三”，赫鲁晓夫估计这次是逃不过去了……

最后，斯大林把几天来变得憔悴不堪的赫鲁晓夫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他可以回到前线去了。赫鲁晓夫对此将信将疑。他知道，曾经有很多人带着宽慰的消息离开斯大林的办公室，后来却在一个他们料想不到的地方突然被捕。

赫鲁晓夫离开斯大林的办公室后，时刻提防着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夜都没有睡安稳，第二天早晨就飞回了前线。

回到前线后，赫鲁晓夫发现局势很糟。铁木辛哥元帅告诉他，军队已被德国人完全击溃，集合部队的唯一办法是设立流动厨房。铁木辛哥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运用过这种办法。

在哈尔科夫失利后，最高统帅部对西南战线进行了调整。铁木辛哥改任西南方面军司令，赫鲁晓夫仍为军事委员。从此，南方战线上的西南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都归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

6月28日至7月2日，德军在沃罗涅日方向使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受到重创，大批苏军士兵被俘。7月6日，德军占领了沃罗涅日。此后，德军兵分两路，一路南下进攻高加索以夺取该地区的油田；一路直指伏尔加河，目标是河上咽喉城市斯大林格勒。7月12日，最高统帅部把西南方面军改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并为这个方面军从预备队中抽调了三个新的集团军：即第62、63、64集团军，加上西南方面军第38、第28、第57、第12集团军残部，这个方面军的力量大为加强，成为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主力。但是，由于铁木辛哥在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地区连吃败仗，7月23日他被召回莫斯科，由戈尔多夫继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司令，赫鲁晓夫仍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军事委员。

7月25日，德军开始在顿河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无法阻止德军的攻势，向东撤退。7月28日，最高统帅部发出命令：必须坚守住顿河以西地区，不准再向后撤。8月5日，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这个方面军一分为二：一个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戈尔多夫指挥，赫鲁晓夫任军事委员；另一个是东南方

面军，斯大林从莫斯科医院中调来受伤未愈的叶廖缅科为司令员，拉伊奥克任军事委员。

苏军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一般由三人组成，即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戈尔多夫对军中设政委颇有微词，因此赫鲁晓夫对他很不满，两人合作很不默契。

8月9日，最高统帅部为了使斯大林格勒和东南两个方面军的军队更加密切地协同作战，决定由叶廖缅科指挥两个方面军，戈尔多夫和戈利科夫都成了叶廖缅科的副手，赫鲁晓夫则兼任这两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政治委员。

8月23日，德军第6集团军坦克第14军渡过顿河，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叶尔佐夫卡地域进至伏尔加河，切断了第62集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他部队的联系。23日下午，德军出动几百架飞机对城市进行密集轰炸，入夜又出动飞机进行袭击。斯大林格勒市区遭到严重破坏，伏尔加河岸的油库中弹起火，燃烧的石油沿河漫流，城市成了一片火海。赫鲁晓夫等指挥官发现与伏尔加河左岸的通讯被切断，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商量后决定将指挥部迁出斯大林格勒城区。

他们送出了急件，要求最高统帅部准许他们将司令部转移到左岸，使之能同几个军保持密切联系。一天过去了，没有回答。他们重复了这个要求，仍旧没有回音。赫鲁晓夫干脆在同斯大林的通话中直接提出了这一请求。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经不得不两次提出我们的请求，希望准许将我们的指挥部迁到左岸，但最高统帅部仍然没有回答。时间是重要的，所以我要求您现在就准许我们这样做。”

斯大林说：“不，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的部队发现他们的指挥官已经将指挥部迁出斯大林格勒，这个城市势必失陷的。”

赫鲁晓夫解释说：“斯大林同志，我不这样认为。崔可夫的第62军已经担负起防守斯大林格勒的责任。我们又任命了古罗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指派他留在市内，加强对这个军的领导。崔可夫和古罗夫会执行他们的任务，这是我们有绝对把握的。他们将使敌人无法突破我们的防线，无法占领这个城市。”

斯大林答应说：“那么好吧。如果你能肯定可以坚守阵地，使我们的防线不被突破，我可以答应你转移到左岸。但一定要在斯大林格勒的前线指挥部留下一个代表，他可以向你报告战斗进行的情况。我要你一定做到，你在市内有一个可以证实崔可夫的报告。”

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商定，让戈利科夫将军留在斯大林格勒，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崔可夫在城市保卫工作方面的情况。

他们叫来了戈利科夫，叶廖缅科告诉他：“戈利科夫同志，我们已获准将我们的指挥部搬到左岸。我们希望你留在这里的指挥部，同崔可夫同志保持联系。”

戈利科夫的面部露出了恐惧的表情，但是马上又控制住了。等叶廖缅科走出房间，戈利科夫就急忙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将他单独留在城里。他面如土色，一遍一遍地讲：“斯大林格勒是完了，不要将我留下来！不要毁掉我！让我同你们一起走！”

自战争开始以来，赫鲁晓夫还从未见到一个军人，甚至一个老百姓有如此表现。他气愤地对他说：“你在说些什么？你怎么敢说斯大林格勒完了！你没有看到情况已经改变了吗？我们不再后退了。我们的军队要在这里固

守。你怎么了？振作起来。你怎么敢有这样的举止？你奉命留在市内，你要服从。”

几天以后，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得知，这个将军举止完全失常，像一个疯子。他现在对于军队来说已没有任何益处，甚至是一个负担。赫鲁晓夫等解除了这个失常者的职务，将他调回。

戈利科夫回到莫斯科后，在斯大林面前抱怨赫鲁晓夫等人待他不公。斯大林听后很生气，因为戈利科夫是他派去的，他责备赫鲁晓夫不该用错误的态度对待他，并称叶廖缅科为无用的东西。赫鲁晓夫十分震惊，因为在这以前他只听到斯大林称赞叶廖缅科，夸他是苏联最好的野战将军等。如今怎么会发生这 180 度的转弯呢？

斯大林是因德军冲进了斯大林格勒而借口所谓叶廖缅科苛待戈利科夫大发脾气。

赫鲁晓夫认为，必须说出真相。

“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戈利科夫向您说了些什么，但是如果他抱怨我们错待了他，我只得告诉您我们所以这样对待他的理由。”于是赫鲁晓夫就把当时戈利科夫的表现告诉了斯大林。原来斯大林对此事一无所知。赫鲁晓夫最后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戈利科夫撤职。我实在不懂为什么您如此地责骂叶廖缅科和我。任何人如果遭到不公正的处罚，我一定出来替他辩护，但是戈利科夫确实得到了他应得的处罚。”

听了赫鲁晓夫这一席话，斯大林的口气逐渐缓和了下来。他告诉赫鲁晓夫，已经作出决定解除叶廖缅科斯大林格勒指挥的职务。赫鲁晓夫告诉他，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赫鲁晓夫说：“我知道这里对叶廖缅科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同任何人一样，他有他的对头以及对他不尊敬的人。但是我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曾同叶廖缅科在一起经历过一个很危急的时期，以我之见，他是完全适合他的地位与目前的任务的。我仅仅是就当指挥官而言。我不是谈论他的其他品行。重要的是，他有效率、有经验，他是他的部队的好领导。”

斯大林听了他的话后表示：“我很高兴我将你找回来商量。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这些情况，我肯定要撤换叶廖缅科，我原已经决定这样做了。你的论点改变了我的想法。叶廖缅科可以留任。”

“您不会遗憾的，斯大林同志，您做了正确的事。”

赫鲁晓夫同斯大林道别后，飞回了前线。

作为方面军的政治委员，赫鲁晓夫除了同斯大林保持密切的联系外，还负责政治宣传工作。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作家西蒙诺夫来到斯大林格勒体验生活。赫鲁晓夫在指挥部接见了。这位作家有根强的感召力，他写的一首诗《等着我，我要回来的》，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对前线士兵的士气鼓舞很大。

1942 年 12 月中旬，赫鲁晓夫来到上察里津斯克，见到了德国共产党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当时他在前线通过扩音器向德国人进行反战宣传。

当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特别是崔可夫指挥的第 62 集团军同德国鲍卢斯指挥的第 6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激战时，斯大林同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反攻计划。9 月 28 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被任命为司令员，热尔托夫任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负责扼守顿河北岸与顿河—伏尔加河之间的陆桥。东南方面军再次易名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叶廖缅科继续任司令员。11 月，赫鲁晓夫重返斯大林格勒前线，



任政治委员。这两个方面军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此前，还重新建立了西南方面军，由瓦杜丁担任司令员，热尔托夫任政治委员，部署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之间。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由北向南发动进攻，顿河方面军向西南出击。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路向西北进攻，另一路向西南进攻。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不到四天的时间便在卡拉奇会合。德军鲍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赫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一部分被合围。此后，苏军一面不断缩小包围圈，一面由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对付企图从科贴尔尼科沃方向救援第6集团军的曼斯坦因的顿河集群。为了加强叶廖缅科的南翼，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第2近卫集团军由顿河方面军划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1943年1月1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方面军，并且把这个方面军的第62、第64、第57集团军划归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把最后消灭苏军包围圈以内德军的任务交给了罗科索夫斯基，这一部署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然而，在斯大林格勒长期坚持苦战的叶廖缅科对此却十分难过，他甚至当着赫鲁晓夫的面流下了眼泪。赫鲁晓夫劝慰他：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难道不明白我们必须划分战线？我们的部队已经转向了南方，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高加索攻击敌人的侧翼。斯大林格勒可以照顾自己。剩下的事就是包围敌人、封锁敌人。然后，我们的同志只需静待他们耗尽食物和弹药。

叶廖缅科痛苦地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不了解，你是一个文职人员。你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奋斗过来的。你忘记了战争开始时是怎么样的，那时我们认为我们完了，斯大林常常问我们是否还可以坚守三天。我们都以为德军将占领斯大林格勒，我们将成为失败的替罪羊。可是现在，我们开始反攻了。你也许没有预见到将要发生什么，但是我看得很清楚：新的顿河战线将得到斯大林格勒胜利的全部光荣，而我们新的南方战线的部队将被人忘记。”

赫鲁晓夫试图使他安静下来，以政治委员的口吻说道：“个人的光荣尽管很重要，但与人民的胜利，我们事业的胜利相比还是次要的。”

赫鲁晓夫知道自己是无法安慰他的，同时也为叶廖缅科感到惋惜，为自己感到难过。为了反攻的这一天，他们殚精竭虑，现在就要获得成功时，他们却不得不成为旁观者。

1月27日至31日，第64、第57、第21集团军对南部德军集群实施突击，第62、第65、第66集团军展开歼灭北部集群的战斗。31日，德军南部集群停止抵抗，刚被希特勒提升为元帅的鲍卢斯及其参谋长施密特少将被俘。德军北部集群继续顽抗，在强大的炮火压力下，被迫于2月2日停止抵抗，德军第11军军长施特雷克尔被生俘。

当天下午4点，罗科索夫斯基向最高统帅部报告，完成了歼灭斯大林格勒被围敌军集团的任务。

苦战了200多个昼夜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终于结束了。顿河方面军俘虏德军9.1万人，其中军官2500多名，将军24名。

赫鲁晓夫以少将文职人员的身份参加了整个战役，在生死考验的紧要关头，与一批重要的军队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些人包括朱可夫、叶廖缅科、莫斯卡连科、格列奇科、马利诺夫斯基等，这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给予

了很大的帮助。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领导的南方方面军进行了整编，马利诺夫斯基接替了叶廖缅科，赫鲁晓夫仍任原职。斯大林格勒会战后，苏军将战线从斯大林格勒地区向西推进了200—250公里。由戈利科夫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占领了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和沃尔昌斯克。形势正在向有利于苏军的方向转化。

一天，马利诺夫斯基闯进赫鲁晓夫在上察里津斯克的住所，激动异常，眼泪从他的脸上滴落下来。

“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究竟出了什么事？”赫鲁晓夫问。

“一件可怕的事。拉林自杀了！”

拉林是第二近卫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同马利诺夫斯基的私人关系很好。马利诺夫斯基第一次担任军团指挥时，拉林是他的政治委员。

拉林留下了一张很短的字条，字条上说 he 不能再活下去了，在他的签名上面写着一句口号：“列宁万岁”。

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立即将拉林的遗书送到莫斯科。由于拉林是赫鲁晓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中的一员，不久，赫鲁晓夫就被召回莫斯科。像往常一样，初到莫斯科，总要到斯大林那里去参加宴会。宴会中间，斯大林问赫鲁晓夫：“这个马利诺夫斯基是什么人？”

“我过去不止一次地向您报告过马利诺夫斯基的情况，”赫鲁晓夫答道，“他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将军，他在战争开始时指挥一个军团，后来指挥一个军。再后来他成为南方战线的指挥，您知道，他受过一些挫折。”赫鲁晓夫所说的挫折是指罗斯托夫失陷后，马利诺夫斯基曾被剥夺指挥职务，调到后方工作，在那里组建了第二近卫军。

谢尔巴科夫一直跟在斯大林后边，这时插话说：“你知道，整个事件非常令人费解，拉林写了‘列宁万岁’而不是‘斯大林万岁’，这可能不是偶然的。他提到了列宁而不提斯大林是什么意思？”谢尔巴科夫是苏军政治部主任，赫鲁晓夫认为他的插话简直是不怀好意。他是在有意煽动斯大林的疑心，对死者的疑心，以致对马利诺夫斯基和赫鲁晓夫的疑心。

“我不知道，”赫鲁晓夫答道，“拉林自杀时显然是因为心理发生变态。”

赫鲁晓夫不愿让拉林一事牵连更多的人。

后来，斯大林再次问赫鲁晓夫：“这个马利诺夫斯基是什么样的人？”

“斯大林同志，我从战争一开始就认识马利诺夫斯基，我可以给他最好的推荐，不管是作为一个将军，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普通人。”

赫鲁晓夫从斯大林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马利诺夫斯基目前的处境很糟。他早期的经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是沙俄军队中的一名机枪手），罗斯托夫战役的失利以及政治委员拉林的自杀，这都是斯大林对他不信任的依据。

“你回到前线后，”斯大林说，“最好对他进行严密监视。我希望你也留神第二近卫军的指挥部。检查他所有的命令与决定。注意他的每一个行动。”

“很好，斯大林同志。我不会让马利诺夫斯基离开我的视线。”

赫鲁晓夫回到前线后，不得不时时刻刻观察马利诺夫斯基的一举一动。甚至就寝入睡时，他也要看看马利诺夫斯基是否闭上了眼睛。

马利诺夫斯基对赫鲁晓夫从莫斯科回来后的反常表现也有所觉察。经过

大清洗的苏联人，对这种形影不离的注视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赫鲁晓夫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作为一个苏联军人，一方面要与敌人斗智斗勇，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别人的陷害，真是太苦了。马利诺夫斯基渐渐理解了拉林的死。据目击者说，拉林显然早就不想活了，他在视察前线时，有意暴露在德军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当德国人开枪时，他不但不钻进掩体，反而在阵地上大摇大摆地踱步，这明明白白的是去送死。子弹打中了他的腿肚子，伤并不重，伤好后也不会留下残疾。死之前，他情绪一直很稳定。

马利诺夫斯基相信赫鲁晓夫，只要自己忠实地、胜任地去做好每一件事，他不会在斯大林面前做不利于自己的汇报。尽管赫鲁晓夫在隔壁随时注意着他这边的动静，他仍然坦然地处理着军务，晚上躺下后也能安然入睡。

由于赫鲁晓夫的帮助，马利诺夫斯基的处境渐渐好转起来。

1943年3月，德军在南部突击到哈尔科夫，迫使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撤退到顿河以东。德军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斯大林又对沃罗涅日方面军进行了改组，瓦杜丁任司令员，赫鲁晓夫任政治委员。这时，苏军战线在库尔斯克地区形成了一个弧形凸出部。沃罗涅日方面军处于突出部之南，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中央方面军处于突出部的北侧。

德军为了打乱苏军1943年可能发动的夏季攻势，积极准备从库尔斯克突出两侧，即从北侧的奥廖尔和南侧的别尔哥罗德发动钳形攻势，以歼灭苏军在突出部的兵力，从而重新威胁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4月12日，赫鲁晓夫同司令员瓦杜丁及参谋长科尔热涅维奇向总参谋部报告：敌人可能由别尔哥罗德和奥廖尔实施向心突击，并预测进攻可能在5月初发动。

苏军最高统帅部根据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送来的情报，准备在库尔斯克地区进行一场反突击。参加这次反突击行动的除了沃罗涅日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外，还有突出部东北部的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东南部的西南方面军。另外，还组建了由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部署在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以东，任务是阻止敌人向纵深突破，转入反攻时增加苏军的攻击力量。

对于这一战役，最高统帅部确定采取积极防御、消耗敌人、然后转入反攻的战略。瓦杜丁虽不反对采取防御措施，但建议最高统帅部先针对敌人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集团实施突击。赫鲁晓夫对这一建议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集团军计划在7月20日开始进攻。

大约在行动前的半个月，赫鲁晓夫接到第6军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中说，从前线德军的党卫师团逃来了一个德国兵，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德军将在次日晨3时进攻。”赫鲁晓夫命令将俘虏立即带来，与瓦杜丁司令员一起进行了审问。

赫鲁晓夫问：“你怎么知道将要进攻？”

“我当然没看到进攻的命令，”他答道，“但是士兵们可以感到将要发生些什么。这不仅是凭直觉，而且是有根据的。第一，发给了我们三天的口粮。第二，坦克都调到前线来了。第三，命令在重炮与野战炮旁边放置充足的炮弹，以便开火时减少运输弹药的时间。”

“但是为什么你这样肯定攻击将在早晨3点开始？”赫鲁晓夫问。

“您自己可以算得出。目前这个季节大约在3点钟天亮，那是德军指挥部喜欢发动攻击的时刻。”

这个德国兵是一个年轻人，英俊、文雅，来自著名的党卫装甲师团之一，部署在苏军的正对面。

赫鲁晓夫问这个德国人是不是纳粹。

“不，我反对纳粹。所以我跑到你们这边来。”

“但是，你是属于党卫师团的，他们都是纳粹。”

“不再是那样了。在战争的头一两年是那样，但是现在党卫师吸收任何它能弄到的人。他们选中我是因为我的身高与外表。无论如何，我不是纳粹那类德国人。我的父母来自阿尔萨斯，他们是把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来培养的。我的父母反对希特勒，他们也这样教育我。我不愿意为希特勒卖命。所以我才逃了出来。德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在于希特勒的失败与灭亡。”

审问结束后，赫鲁晓夫和瓦杜丁立即向莫斯科打电话，报告统帅部说德军正准备发动进攻。

斯大林很快就给赫鲁晓夫打来了电话询问情况。斯大林平静地听着赫鲁晓夫对情况的分析。这次，他没有表现出粗暴和不耐烦的态度，这使赫鲁晓夫感到很高兴。

赫鲁晓夫向斯大林简单扼要地报告了形势。斯大林问：“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办？”

“瓦杜丁同我已经交换了意见，我们很乐观。如果德军明天发动进攻，我们反倒感到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防御阵地很坚固，如果敌人想突破，我们将使他们付出血的代价。虽然我们仍在等待增援，我们可以守住阵地。防守比攻击需要的军队少。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通过实践懂得了这一点。”

赫鲁晓夫讲这些话是胸有成竹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一起已经构筑好五六道防御地带，工程构筑纵深达 250—300 公里，防御阵地有完善的堑壕配系和其他工事配系，对坦克防御的纵深达 30—35 公里。

中央方面军第一梯队由五个集团军编成；第二梯队是坦克第 2 集团军和坦克第 19 军，由空军第 16 集团军支援战斗。沃罗涅日方面军第一梯队由四个集团军编成；第二梯队是坦克第 1 集团军和第 69 集团军，由空军第 2 集团军支援战斗。两个方面军共有兵力 133.6 万人，火饱和迫击炮 1.9 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3444 辆，飞机 2172 架。草原方面军有五个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六个独立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三个骑兵军、一个步兵军，由空军第 5 集团军进行支援。

7 月 5 日拂晓，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和瓦杜丁率领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在空军的掩护下，用强大的炮火向德军阵地射击。两次共一个小时的射击使德军的前沿部队损失不小。同两年前不一样，苏军是先发制人，德军在苏军进攻发动两个多小时后才开始进攻。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北部正面苏军中央方面军地带内，德军在奥利霍瓦特卡方向将 300 多辆坦克同时投入战斗。德军进攻部队前面是“虎式”重型坦克和“斐迪南”强击火炮群，每群 10—15 辆，随后是中型坦克群，每群 50—100 辆，再后面是摩托化步兵。苏军航空兵和炮兵对德军坦克实施了猛烈轰击。当天，德军发动了五次强击，突入苏军防御 6—8 公里。第二天，苏军中央方面军以第 13 集团军和坦克第 2 集团军及坦克第 19 军实施反突击，阻止了德军进攻。至 7 月 11 日，德军的进攻只前进了 10—12 公里，因损失惨

重而转入防御。

在库尔斯克南面，瓦杜丁和赫鲁晓夫所辖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地带内，德军向奥博扬、科罗恰两个方向进攻，将约 1000 辆坦克同时投入战斗，其中 700 辆配置在奥博扬公路的主要方向上。沃罗涅日方面军以三个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团军抗击德军突击。德军在进攻失利后将主要力量转到普罗霍罗夫卡方向，以坦克第 4 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和“凯姆普夫”战役集群的坦克第 3 军从西面和南面进攻，企图围歼在顿涅茨河和北顿涅茨河之间的苏军，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再从东南实施突击，夺占库尔斯克。7 月 12 日，沃罗涅日方面军以加强的大本营预备队近卫坦克第 5 集团军和近卫第 5 集团军的全部兵力，以及坦克第 1 集团军、近卫第 6 集团军和近卫第 7 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实施反突击。近卫坦克第 5 集团军与进攻的德党卫坦克军和坦克第 3 军在普罗霍罗夫卡相遇，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坦克遭遇战。双方共投入 1200 辆坦克，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飞机和自行火炮参加战斗。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苏军阻止了从西面向普罗霍罗夫卡进攻的德军主力。德军被击毙 1 万多人，损失坦克约 400 辆。7 月 13—15 日，德军在进攻中虽在突出部的南部推进了 35 公里，但因缺乏兵力坚守已占领的阵地，于 7 月 16 日在后卫部队掩护下撤回原出发地。沃罗涅日方面军乘势追击。7 月 18 日，草原方面军也开始了追击，并以一部分兵力协助沃罗涅日方面军恢复了 7 月 5 日时的态势。7 月 23 日，德军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集团退到原进攻出发地，转入防御。

苏军从 7 月 24 日起，开始准备在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发起反攻。

苏军的部署是，沃罗涅日方面军从别尔哥罗德西北地域向西南实施深远突击，以切断德军从哈尔科夫向西和西南的退路；草原方面军向别尔哥罗德进攻，并攻占该城，随后向哈尔科夫进攻；西南方面军第 57 集团军（即将编入草原方面军）向哈尔科夫东南发起进攻，以切断德军向南的退路。

8 月 3 日，苏军在别尔哥罗德西北地域发起了进攻。沃罗涅日方面军近卫坦克第 5 集团军和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先头旅投入战斗。8 月 5 日，草原方面军攻占别尔哥罗德。8 月 11 日，沃罗涅日方面军切断了哈尔科夫—波尔塔瓦铁路，从西面包围了哈尔科夫。草原方面军从北面 and 东南面逼近该城。德军为避免陷入合围，于 8 月 11—17 日，以 3 个坦克师从博戈杜霍夫以南地域向沃罗涅日方面军实施反突击；18—20 日，又以 3 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师由阿赫特尔卡实施反突击。德军的两次反突击一度迟滞了苏军的进攻，但终被苏军击退。8 月 17 日，草原方面军已突入哈尔科夫市郊，8 月 23 日草原方面军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协攻下攻占了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乌克兰的东部大门。赫鲁晓夫进入该城后，在 8 月 30 日组织了庆祝哈尔科夫解放的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打败了敌人，但是还没有把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还很顽强，我们还不能感到满足，应该争取解放乌克兰的首府——我们光荣的基辅。”

8 月下旬，苏军在几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罗科索夫斯基和瓦杜丁指挥的部队向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发动攻击。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队打到顿涅茨河中游，随后解放了斯大林诺。托尔布欣的南方方面军渡过了米乌斯河。9 月中旬以后，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奉命进攻基辅。草原方面军负责进攻克列缅丘格。9 月底，几个方面军强占了第聂伯河的多处渡口。

10月22日，最高统帅部把在乌克兰作战的所有方面军改称乌克兰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草原方面军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为乌克兰第3方面军，南方方面军为乌克兰第4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则改为白俄罗斯方面军。赫鲁晓夫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军事委员兼政委。由于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赫鲁晓夫已从上次哈尔科夫战役失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被授予了一枚军功章——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他从哈尔科夫的失利中吸取了教训，又从哈尔科夫的收复中找到了自我。他为自己曾在参与斯大林格勒与库尔斯克重大战役的几个方面军中担任过军事委员会委员而感到得意。

乌克兰第1方面军指挥部的干部配备中，除了增添了副司令员格列奇科之外，还增加了一位政治委员。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很明确，准备让赫鲁晓夫兼顾乌克兰共和国的战后恢复工作。

11月初，乌克兰第1方面军发动了解放基辅——乌克兰首府、俄罗斯城市之母的战斗，赫鲁晓夫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自从1941年6月22日以来，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在退却，甚至退却到了斯大林格勒，如今，明天或者后天，他将重返基辅。想到这里，他不禁热泪盈眶。

格列奇科从麦日戈拉战地司令部返回乌克兰第1方面军设在基辅城外的指挥部时，太阳正在西沉。赫鲁晓夫和身材高大的格列奇科走出掩体，披着外套，在温暖的秋日夕阳下，向远处古老的俄罗斯名城——基辅眺望。

突然，从基辅城内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一团浓烟直冲天空，笼罩在基辅城的上方。赫鲁晓夫知道，这是德国人在实施破坏。从爆炸的方向来看，这是基辅西区的“布尔什维克”工厂，这是德国人在做逃跑前的最后挣扎。

赫鲁晓夫立即回到指挥部对炮兵司令说：“瓦连佐夫同志，下令向基辅零星地进行射击。”瓦连佐夫惊愕地看着赫鲁晓夫，不明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向这个到处都是古迹的城市开火。赫鲁晓夫忙向他解释说：“零星射击，将使德国人急速逃跑，而顾不上破坏。少量炮弹所造成的破坏，比那些集中爆破所造成的损坏要容易修复得多。”

在向基辅发动进攻之前，赫鲁晓夫命令派出特别小分队，在大部队冲进基辅之前，直奔中央委员会大厦、科学院以及其他重要场所，防止德军纵火或安置爆炸物。

11月6日清晨，赫鲁晓夫和一些乌克兰领导人驱车入城，直奔部长会议大厦。汽车穿过市郊到达克列夏季克——基辅的一条古老的林荫大道。沿途的中央委员会大厦、科学院和剧院安然无恙，只是“布尔什维克”与“克列夏季克”两座工厂已被破坏殆尽。整个城市给人一种凄惨异样的感觉。战前它曾是那样的热闹、熙熙攘攘和充满生气。当赫鲁晓夫一行沿着克列夏季克一路向列宁大街走去时，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他们的脚步声在这空荡荡的街面上回响。当步行到歌剧院前时，忽然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一名青年男子向他们迎面跑来。他不断地大声喊着：“我是活下来的唯一犹太人！我是基辅城里还活着的最后一个犹太人！”赫鲁晓夫试图让他平静下来，问他是怎样活下来的。年轻人告诉他：“他有一个乌克兰人妻子，她把他藏在阁楼上，秘密地给他送食物，否则他早就死了。”

赫鲁晓夫巡查基辅后向斯大林汇报了基辅被破坏的程度和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并向斯大林保证尽快修复供电和供水系统，以使人民能正常生活。

基辅解放后，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尽管他还穿着中将

军衔的军服，尽管苏军已开始准备向南发动新的进攻，但是赫鲁晓夫却没有随军作战。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重建这个共和国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恢复乌克兰的秩序。1944年2月6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他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仍然担任该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 第四章

### 官场荣辱

赫鲁晓夫从满是尘土的指挥部掩体走进了明亮宽敞的办公室。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过轻松愉快的生活。作为乌克兰人民的父母官，他要帮助人民医治战争的创伤，要领导人们生产自救。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粮仓，现在则满目疮痍。集体农庄的大多数机械设备都被破坏了，没有足够的生产工具，就连一头牛都没有。田野里只见到妇女在拉犁耕地。大多数身强体壮的青壮年劳力，不是被作为劳工运到德国，就是上了前线。

工厂、矿山、电厂要重建；公路、铁路待修复。

赫鲁晓夫在视察完一些重要的地区之后，起草了一份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并把建议发给州委和州执行委员会，通过报纸告之于人民。

乌克兰的经济恢复工作进展顺利，尽管住房和劳动力仍十分缺乏。

1944年3月，苏军再次发动进攻，并前出到苏联在普鲁特河上的旧国界，解放了尼古拉耶夫、切尔诺夫策、敖德萨、捷尔诺波尔。基辅举行了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听取了关于解放乌克兰和恢复共和国国民经济任务的报告。代表们对赫鲁晓夫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颂扬，“他的名字是与乌克兰的繁荣昌盛，与乌克兰从德国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联系在一起”。

194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50岁的生日。这天，各家报纸不但发表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生日贺词，而且还刊载了作家雷利斯基和季钦娜等人的回忆文章。在报纸上还刊登了授予赫鲁晓夫第二枚列宁勋章的决定。这一天对于赫鲁晓夫也是悲痛的，与他在前线有生死之交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瓦杜丁的葬礼在这一天举行，赫鲁晓夫作为瓦杜丁生前战友参加了葬礼，并讲了话。

瓦杜丁是被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伏击受伤后，因医治无效而去世的。

乌克兰的重建工作除了物质方面的困难之外，令人感到头疼的还有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赫鲁晓夫从乌克兰的共产党游击队司令别格马那儿得知，乌克兰起义军、乌克兰人民革命军以及三个民族主义者集团——班杰拉分子、麦尔努克分子和布尔巴分子——在乌克兰西部的森林和农村地区活动频繁。其人数因旧警察、乌奸的加入而有所增加。西乌克兰的部分居民对他们表示支持。绝大多数居民却在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胁迫下不得不向他们提供食物和藏身之处。为了平息这一运动，赫鲁晓夫下令将西乌克兰数百个大小村庄的居民一个不剩地迁到西伯利亚。例如，在赤塔州的工厂和矿山就有数万名这类“特别移民”在工作。在西乌克兰无人区出没的班杰拉分子、梅利尼科分子和布尔巴分子，最后大部分被歼灭，少数人设法躲藏起来或逃往西方，被俘的民族主义分子或被枪决或被判刑监禁。

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活动在严厉镇压下有所收敛，但民族主义思潮仍然存在。为了对这一思潮进行引导，联共（布）中央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为了民族团结，对乌克兰的爱国主义进行适当的鼓励和强化：凡是同著名乌克兰作家和其他乌克兰活动家有关的周年纪念仪式，均作为重要的政治活动来对待，出版了乌克兰百科全书、发表了大量关于反对波兰统治的17世纪哥萨克的领导人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的文章，而且将别列亚斯拉夫市改名为别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在乌克兰恢复了东正教，被德国人



破坏掉的一些教堂又重新修建起来。赫鲁晓夫甚至邀请基辅东正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代表到人民委员会来座谈。

随着战争向西推进，苏联政府又面临同波兰之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1937—1938年，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解散了波兰共产党，并杀害了几乎所有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1939年，苏联通过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及其秘密条款与德国一同瓜分了波兰。这本已深深伤害了波兰人的民族感情。苏德战争爆发后，受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影响的波兰将军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在苏联组建了一支波兰军队，但斯大林改变了主意，拒绝让安德斯指挥的三个波兰师在苏联对德战线上作战。这支军队只得从伊朗前往北非。1943年4月16日，波兰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就数千名波兰军官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被杀一事进行调查。苏联政府在4月27日声称波兰军官是德国盖世太保所杀，并宣布同在伦敦的波兰人断绝关系。

斯大林极力促使在苏联的波兰人建立一支新的波兰部队和成立一个新的领导组织。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原安德斯部下的一个师参谋长齐格蒙特·贝林建立了一个波兰师，1943年发展为一个军，1944年发展为波兰第1集团军，隶属于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苏联的帮助下，一批亲苏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在苏联建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作为未来波兰政府的雏型。这两件事都是由莫斯科直接插手和过问的，而赫鲁晓夫作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参与了许多具体工作。他经常从斯大林那里接到命令，要他帮助那些取道基辅前往波兰的波兰共产党人。1944年，第一批波兰人就是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防线越过边界的。赫鲁晓夫同波兰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人贝鲁特、华西列夫斯卡和贝林来往密切。作为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与波兰的交往成为战后初期赫鲁晓夫的一项比较重要的活动。乌克兰与波兰一界之隔，赫鲁晓夫的国际活动实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44年7月23日，苏军渡过布格河攻克了波兰东部重镇卢布林。波兰临时委员会随即迁到这里，并正式宣布临时委员会成立。当时，临时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包括贝鲁特、贝林和华西列夫斯卡等，经常到基辅来通过赫鲁晓夫与苏联商谈各种具体问题。赫鲁晓夫在波兰问题上往往比斯大林更偏重维护俄国的利益。卢布林委员会为了取得波兰人民的信任，不得不同苏联商谈苏波边界的问题。为了恢复波兰人民对苏联的好感，斯大林重新审查了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确定的边界，决定沿所谓的寇松线重新划定波兰东部边界。这就意味着苏波边界要由1939年苏联实际占领的边界向东移动。赫鲁晓夫却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没有考虑到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民族利益。“乌克兰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自己联合成一个国家，一个苏维埃国家。”“我们的国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领土，同时也满足了乌克兰人的热切愿望”。“而现在，在战后，斯大林却决定把西乌克兰一部分土地归还给波兰”。尽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这一决定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继续执行斯大林的决定，同白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连科一道去卢布林，同波兰临时政府拟订了改变边界线后交换双方居民的计划。赫鲁晓夫指派乌克兰食品工业部部长波德戈尔内为驻波兰的代表，去解决交换居民条约中的所有问题。后来，他还和波诺马连科到卢布林参加了为此举行的盛大宴会。

华沙解放后，卢布林委员会迁到了华沙郊外的普腊加。委员会面临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华沙城的任务。1945年1月，斯大林打电话给在马克兰的赫鲁晓夫，要他立刻去莫斯科。赫鲁晓夫到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告诉他：“华沙

的波兰同志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市政设施，尤其是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我们已经解放了华沙，但是他们仍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他们说，华沙成了一片废墟，不知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工作。既然你在迅速恢复主要市政设施方面已有了不少经验，我们想派你去华沙照料一下那里的工作。”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请求带几名市政管理方面的专家和电气工程师同去。

赫鲁晓夫带着为他调配的几名专家飞到华沙。他会见了波兰临时政府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总理、波兰共产党书记贝鲁特和华沙市长彼哈尔斯基。他参观了华沙市区。这座城市破坏严重，到处是颓垣断壁，只有郊区还有一些建筑物孤零零残存着。赫鲁晓夫把苏联工程师和波兰工程师分成发电、供水和下水道系统三个小组，由电气专家斯特拉缅托夫全面负责，以检查和修复该城的基础设施。3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重建工程的参加者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受斯大林元帅的委托，同中央机关的一批工作人员以及莫斯科和基辅两市的专家一道来到这里，来到你们光荣的首都，为的是就地了解这个城市的情况，从而能够更好、更具体地解决重建华沙工作中的问题。

“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过波兰人与乌克兰人、波兰人与俄罗斯人互相仇视的时期。这种仇视是由人民的敌人人为地煽动起来的，结果让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敌人从中捞取了好处。不过，经过一场空前的毁灭性战争给波兰人民、乌克兰人民、俄罗斯人民和其他斯拉夫人民带来严重考验，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两国人民曾经共同经受了苦难，肩并肩地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德国法西斯分子而斗争。在这伟大的斗争过程中，苏联人民和波兰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巩固。这种由我们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红军会同波兰军把波兰从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给波兰人民带来自由和独立。”

华沙的发电、供水、下水道系统破坏的程度并不像想象得那么严重，赫鲁晓夫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同时，像他在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他在政治上也做了许多弥补工作。他还根据贝鲁特的建议看望了正在病中的哥穆尔卡。赫鲁晓夫同后来的波兰领导人都有了接触，彼此增进了了解，这是赫鲁晓夫战后外交活动的开端。赫鲁晓夫不久就回到了苏联。1945年春，赫鲁晓夫同伊·布罗兹·铁托见了面。铁托是从莫斯科返回南斯拉夫，途经基辅而逗留两天的。

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前往莫斯科。6月24日，莫斯科举行了祝捷游行。他同斯大林及其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站在列宁墓上，苏联军队组成纵队从红场上通过。胸前佩戴着三枚勋章的勃列日涅夫少将迈着正步，走在纵队之中。

乌克兰经济恢复工作的问题很多，尽管这一工作进行了差不多已经有一年，但离斯大林的要求仍很远。斯大林对乌克兰这一粮仓的期望是，为战后的苏联提供足够多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而如今的生产水平只相当战前的25%。

赫鲁晓夫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经常到乌克兰各地巡视。1945年7月，他视察了乌克兰共和国的南部各州；秋天，他又在西乌克兰和原喀尔巴阡山下的乌克兰度过了几个星期。此时，乌克兰全境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

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士兵和指战员复员了。乌克兰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热烈欢迎他们的归来。然而，许多人却无法分享这种普遍的喜悦。战争爆发时告别家乡奔赴战场的人为数众多，而如今返回的只是少数。大多

数人都在战场上牺牲了，烈士的墓地遍布各地。那些在希特勒集中营里活下来的被俘人员则受到歧视，他们同许多被送到德国进行强迫劳动的人一样，必须在人们的冷眼下度日。在有些村子里，有一半人是被遣返回国的。1941年因战争东迁的成千上万名工人也开始陆续返回故乡，一大批在部队里执行附属军务的妇女也回来了。重建工作因劳动力的增加而有所改善。

工农业生产在恢复。1945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报告说，较之战前1940年的生产水平，乌克兰的煤炭生产已经恢复到40%、钢铁23%、生铁30%、锰54%、铁矿34%。全共和国的土地播种面积已达到战前总面积的71%，谷物和甜菜产量分别达到战前1940年水平的80%和50%。尽管如此，1945年乌克兰仍未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因为数万顷的谷物和玉米直至11月份还没收割，既缺人力，又缺机器。为了补救，只有加强春播，可是由于农庄里缺少机器、马匹和耕牛，播种时只得使用奶牛，这又影响了牛奶的产量。夏季炎热，旱灾从摩尔达维亚开始，后来蔓延到西南部，不仅影响到整个乌克兰，而且还影响到伏尔加河流域。旱灾的受灾程度比1921年严重，与1891年相似。

赫鲁晓夫预感到1946年的生产计划无论如何难以完成。他指派了一个以斯塔尔钦科为首的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小组，对这一年乌克兰的实际产量进行预测和估算。小组考察研究后向赫鲁晓夫提交的数字是1—2亿普特之间。战前，乌克兰的产量曾经达到过5亿普特，而国家的定额是4亿普特。

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他认为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他能向斯大林坦率陈明情况，斯大林也许会把计划交售数字压下来。

赫鲁晓夫指示人民委员会各部准备一份呈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的文件，文件中要求政府发放粮食定量分配卡，将一部分农产品供应给农村居民，并救济灾民。

斯大林给赫鲁晓夫发来了一封电报作为答复。电报中，斯大林说他是一个靠不住的人，文件中所附的数字试图表明乌克兰自顾不暇，粮食定量分配卡的想法简直荒谬绝伦……这封电报对于赫鲁晓夫简直是当头一盆凉水。赫鲁晓夫知道，悲剧即将发生，饥荒不可避免，斯大林的电报打碎了他想要避免饥荒的最后希望。

斯大林刚从索契休假回来。赫鲁晓夫就立即离开基辅前往莫斯科。他做好了一切准备，准备受到可以想象到的最严厉的申斥，甚至准备好了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立刻送往卢比扬卡（位于莫斯科中心的内务部监狱）。但他还是决定向斯大林说明，他的报告准确地反映了乌克兰的状况。赫鲁晓夫坚持要求经济援助。他告诉斯大林，乌克兰不仅饿死了人，而且出现了人吃人的惨事。他曾接到过一个报告，说在基辅郊外瓦西尔科沃镇附近的一个小桥下，发现一个人头和两只脚底，尸体已经被人吃掉。敖德萨州委书记基里钦科也曾告诉他，一个妇女吃掉了自己一双饿死的儿女的尸体……

赫鲁晓夫的汇报，更激起了斯大林的愤怒。

“你的心肠太软了！”他对赫鲁晓夫喊道，“他们在欺骗你。当他们向你报告这一类事件时，他们指望能利用你的伤感，逼你把所有的贮备粮都送给他们。”

赫鲁晓夫知道，斯大林还从其他渠道获得了情报，并且相信这些情报的程度甚于他的报告。那些人给斯大林“火上浇油”，说赫鲁晓夫处于乌克兰

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在向乌克兰地方势力屈服，并在逐步转化为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有人对斯大林说，赫鲁晓夫不值得给予充分的信任。赫鲁晓夫知道，这些人无疑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他的报告原是写给柯西金的，而且柯西金私下已和乌克兰人通过气，同意发给粮食定量分配卡。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将这份报告直接送给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的。

斯大林提议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以讨论农业问题。自从上一次中央全会以来，赫鲁晓夫感觉已经过了很多年，30年代后期曾经举行过几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先是讨论与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的问题，接着是纠正对敌斗争中的扩大化问题。现在是第一次讨论农业问题。

会议结束后，由马林科夫和安德烈耶维奇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拟定决议，赫鲁晓夫也被斯大林指定为决议拟定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必须返回乌克兰，临走之前，他向委员会提议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的第一条纪律，允许农庄在按照比例上缴国家谷物后，留下种子储备。当时的情况是，国家没有给集体农庄的庄员留下任何东西。一个农庄主席曾给赫鲁晓夫写过一封信，讲到了他们的处境：“我们已经完成了上缴国家粮食的定额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去了，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绝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帮助的。”事实是，粮食一旦交到政府的征集站，要回去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了。如果现在给他们留一些种子储备，他们就可以灵活使用，荒年可以作为口粮暂渡难关。

赫鲁晓夫提完建议就返回了基辅。过了几天，马林科夫打电话告诉他，决议已准备就绪，只是没有把他关于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留存种子储备的意见包括进去，问他是否仍然坚持这一意见。

赫鲁晓夫回答说，他还是要将这一意见写进决议。因为在讨论时，他多次提出这一建议，并为这一建议而力争，与会者都是知道的，如果提交给斯大林的决议中没有这一条建议，人们会以为他是个临阵脱逃的懦夫。

“那很好。”马林科夫回答说。于是他们向斯大林报告了赫鲁晓夫的意见。这一意见无疑又触怒了斯大林。最终，这一建议还是被否决了，赫鲁晓夫的处境也更加不妙。

斯大林问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是否需要帮助。他说：“看来，我们最好充实一下赫鲁晓夫在基辅的领导，乌克兰正在遭到破坏，这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接着，他又对赫鲁晓夫说：“我认为我们最好派卡冈诺维奇去帮助你。你的想法如何？”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这番话的话外音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他能表示反对吗？他不但必须同意这项对他说来带有惩罚性的决定，而且还得把这一决定当做对共和国的帮助来欢迎。他说：“好嘛，卡冈诺维奇以前当过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很了解乌克兰。乌克兰是如此大的一个共和国，不要说派一个人，就是派几十个、几百个人来都有工作可做。”

斯大林于是说：“我们还要派帕托利切夫去协助你。”

赫鲁晓夫赶紧点头称是。

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认可了斯大林的决定。全会在1947年3月3日发表的公报上说：为了加强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全会决定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全会选举卡冈诺维奇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继续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帕托利切夫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

几天以后，在赫鲁晓夫本人的请求下，他的基辅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被免去。在6月召开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为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也没有露面，赫鲁晓夫似乎消失了。这一段时间，他屡受挫折，心力交瘁，一直卧病在床，休息了很长时间。

病愈后，赫鲁晓夫继续负责农业生产，卡冈诺维奇则负责恢复工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乌克兰得到了联合国价值两亿多美元的物资，其中有粮食、医疗用品、生活日用品等。乌克兰从这些援助中渐渐恢复了元气。

1947年获得了好收成，还提前完成了任务。乌克兰和全苏的食品供应情况开始好转，这样一来，年底就可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卡。

工业企业开始恢复元气，1947年乌克兰的工业生产产量提高了30%。

194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几个决议发表以后，由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领导的在文学、音乐、哲学、历史等领域“整顿秩序”的思想运动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乌克兰自然也未能幸免。在乌克兰，这一运动的首当其冲者是雷利斯基。雷利斯基是乌克兰著名的诗人和学者，自1943年来便担任乌克兰作家协会的主席。大战期间，他写了《谈谈我们的祖国》、《闪闪发亮的武器》等作品，因而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卡冈诺维奇初到乌克兰，反对“民族主义”自然要从雷利斯基开始。他不但被撤销了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并受到了所谓“善于在爱国主义的外衣下塞进敌对的民族主义观点”的公开指责。1947年11月20日，《乌克兰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文章中说：雷利斯基在加入苏联文人队伍以后，写了许多积极的作品。但近年来，他的创作却证明他恢复了昔日那种敌视我们苏维埃文学的民族主义观点……雷利斯基在诸如《我是苏联大地的儿子》和《谈谈我们的祖国》的作品中，不仅表现出了一种虚假的爱国主义，而且还暗含着实际上与苏维埃爱国主义背道而驰的思想。

对雷利斯基的批判在广大乌克兰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困惑和愤慨。不过，这一运动没有持续多少时间。1947年12月，卡冈诺维奇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走后，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继续维持党政两个最高职务分开，推荐杰·谢·科罗特钦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就许多方面而言，1948年可算是决定性的一年。年初，隆重纪念了苏维埃乌克兰成立30周年。成千上万的工人、农庄庄员和职员被授予勋章和奖章。其中获得列宁勋章的有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科罗特钦科。赫鲁晓夫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乌克兰的农业上，但他也密切注视着工业和铺设从达沙瓦到基辅的煤气管道工作的进展情况。

卡冈诺维奇调走之后，乌克兰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空气并没有轻松多少。雷利斯基的境遇虽然有所改善，但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8月会议之后，乌克兰共和国内又开始了大批特批“摩尔根—孟德尔信徒”的运动。在《关于乌克兰音乐艺术状况及改进措施的决定》发表后，在希特勒德国入侵之后幸免于难的艺术家的帽子扣上了“资产阶级音乐追随者”、“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和“异己分子”的帽子遭到镇压。赫鲁晓夫自知对此无能为力，只得听之任之。他将全部精力贯注于农业问题之上，再加上乌克兰农业部长伏·马茨科维奇的出色工作，1948年的农业收成比上年还要好，向国家提供的粮食不仅比1947年多1.15亿普特，而且比战前的1940年还多3300万普

特。尽管机械化程度和从事农业的人数都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乌克兰还是超额完成了这一年的计划要求。

1949年是赫鲁晓夫呆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也是在乌克兰最美好的一年。在各个共和国之间的竞赛中，乌克兰超过了白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由于乌克兰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乌克兰的形象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赫鲁晓夫的威望也因此而提高了。斯大林又开始器重他，多次指示他，要他在一些农业问题上，诸如牲畜饲养、农作物浅耕耕作法等提出报告，并把报告登载在《真理报》上，作为向全国推广的范例。

这一年，在基辅举行了乌克兰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重新当选为乌克兰第一书记。他一方面继续抓农业，另一方面出席诸如教师、建筑师的各种会议，监督重建克列夏季克大街，宣传中国小米的优点，并且还腾出时间组织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正当这时，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并使赫鲁晓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48年12月25日，列宁格勒州第10次党代表会议和列宁格勒市第8次党代表会议闭幕。会议选举出州委和市委领导。波普科夫继续担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州委第二书记是巴达耶夫，市委第二书记是卡普斯京。

不久，一个曾是党代表会议选举委员会成员的人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说在第10次州代表会议和第8次市代表会议上，很多代表在选票上划掉了波普科夫、巴达耶夫、卡普斯京的名字。但是，选举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却宣布这些人全票当选。匿名信还说这种作弊行为在党的区代表会议上也有。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并不确切。据查，投票反对波普科夫当选的只有4人，反对巴达耶夫的票2张，反对卡普斯京的票15张。但这封信却被人利用，成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导火线。

1949年2月初，列宁格勒市委重工业部长吉洪诺夫被召到党中央马林科夫那里，后来，又有一些人被召到党中央书记处。1949年2月15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把波普科夫叫去。波普科夫回到列宁格勒后，精神恍惚。2月21日，州委和市委常委举行了联席会议。马林科夫和党中央组织局成员安德里阿诺夫出席了这次会议。第二天，第二书记巴达耶夫主持了州委和市委的联席会议。马林科夫宣布，党中央委员库兹涅佐夫、候补中央委员拉季奥诺夫、波普科夫有反党行为，说他们建立小组织，采取反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把自己和中央对立起来。

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从1937年到1945年一直担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日丹诺夫被召到莫斯科后，他接任第一书记。1946年3月，他被任命为党中央书记，并被委托监督保安机关的工作。拉季奥诺夫曾同日丹诺夫一道密切共事，但没有在列宁格勒担任过任何职务。他在早年就当上了俄罗斯联邦的部长会议主席。波普科夫1902年生，1925年入党，1939年到1946年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1946年起任州委第一书记。

马林科夫在联席会议上提出三项指责。他说，波普科夫等人擅自在列宁格勒组织全苏批发市场，挥霍国家商品储备，给国家造成物质损失。波普科夫则辩解说，这次全苏批发市场是于1949年1月10日到20日进行的。他事先不知是全苏性质的，只是在开幕式上听到俄罗斯商业部长马卡罗夫演说时

才知道有其他共和国参加，即市场是全苏性质的。马林科夫还指责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正在酝酿成立俄罗斯共产党，说他们准备像当年的季诺维也夫那样把列宁格勒党组织同中央对立起来。波普科夫否认这点，他只承认自己有些话讲得不对，曾说过中央很少帮助列宁格勒建立自己的燃料电力工业。马林科夫还指贵州委书记明知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与实际不符，却不向中央报告。但是，会上没有人能证实州委书记确实知道这一事实真相。波普科夫在发言中，极力把责任揽在自己和卡普斯京的身上，说列宁格勒的党组织是纯洁的。联席会议最后决定解除波普科夫的州委第一书记职务，并给予警告处分。卡普斯京也受到了同样的处分。吉洪诺夫则被开除出党。联席会议根据马林科夫的建议，选举安德里阿诺夫担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安德里阿诺夫从 1938 年起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1946 年起任政府的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安德里阿诺夫担任列宁格勒领导后，整天看过去的会议记录，把很多党员干部解职，开除出党。但他对此还不满足。1949 年 6 月，根据安德里阿诺夫的请求，中央又派了一批干部到列宁格勒，加紧迫害活动。他们先后对州党委会、市党委会、州和市的苏维埃、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进行改组，随后又扩大到区党委会。先后一共撤换了 2000 多名各级领导干部。

不久，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又进一步把这一事件变成案件，说库兹涅佐夫在全国建立反党组织，并把沃兹涅先斯基拉入案件之中。

沃兹涅先斯基是一名经济学教授，1935 年起负责列宁格勒的经济计划工作。三年后，他在 35 岁时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1941 年他成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战争期间，他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战后成为政治局委员。1948 年，他因写了《苏联的战时经济》一书而获斯大林奖金。他还写了《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这部著作未能出版。1949 年 3 月，沃兹涅先斯基获得斯大林奖金之后仅仅几个月，就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1949 年 7 月 21 日，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卡普斯京是英国间谍。提出这一控告的唯一证据是，卡普斯京曾于 1935—1936 年在英国学习蒸汽轮机的制造。7 月 23 日，卡普斯京被捕入狱，但 8 天之后，检察院才签署逮捕令。8 月，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被逮捕。随后，42 岁的拉季奥诺夫，44 岁的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拉祖京也成为阶下囚。

“列宁格勒案件”尚在进行时，莫斯科也发生了类似的控告。

1949 年秋季的一天，赫鲁晓夫在利沃夫的林学院主持一个会议。作家加兰刚在那里被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杀害。会议是对作家的悼念，对民族主义分子的谴责。会议尚未结束，突然接到马林科夫的电话，斯大林要他去莫斯科。

赫鲁晓夫问：“情况紧急吗？”

“非常紧急。明天早晨马上乘飞机来。”马林科夫说。

赫鲁晓夫将诸事一一吩咐停当，以便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谁知道是凶是吉，赫鲁晓夫甚至不能料定能否回来。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当赫鲁晓夫抵达莫斯科时，斯大林热情地迎接了他。

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赫鲁晓夫：“告诉我，你是否感到在乌克兰呆的时间够长了？你正在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乌克兰农学家！现在是你回到莫斯科

工作的时候了。我们的意见是，你应当就任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老职位。”

赫鲁晓夫没有想到要他来是要告诉他这件事。回莫斯科他是梦寐以求的，听到这个消息，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但为了不让斯大林看出他的心事，他半推半就地说道：“在乌克兰，我一向得到很好的待遇，我感谢协助我管理乌克兰事务的每一个人。然而，我仍旧乐于返回莫斯科。”

“好呀。我们需要你在这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阴谋已经暴露，有你负责莫斯科市及州的组织，中央委员会就一定可以指望得到地方党组织的支持来同阴谋人物作斗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在列宁格勒破获了一个阴谋，而莫斯科也充斥着反党分子。我们希望这个城市能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堡垒。”

事情很明显，斯大林认为莫斯科也存在着一个“阴谋集团”，与列宁格勒的“阴谋集团”遥相呼应。

赫鲁晓夫讨好地说：“我将尽我的力量去做。”

“好呀。这儿有一封落在我们手里的重要信件。你先熟悉一下它的内容。你搬来之后，我们就着手处理这件事。”说着，斯大林将一份厚重的信件递给赫鲁晓夫，信件最后的署名看起来像是假的。信中指出，在莫斯科有一个阴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集团，其领导人是莫斯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波波夫，成员包括区委员会的书记们、工厂经理和工程师。

在拿到这份控告信前，赫鲁晓夫并没有看到有关“列宁格勒案件”的文件，并不知道列宁格勒的阴谋是怎么回事，因此，他无法将它同列宁格勒的事进行类比，或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他对控告信的第一个感觉是，写信的人不是个无赖便是一个别有用心者。不管这个人是谁，其用心显然非常歹毒。赫鲁晓夫把信件放进保险箱，并且决定如果斯大林不再问起，他就永远不主动提起它。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好事，希望此事就此了结。

赫鲁晓夫回乌克兰安排好政务后，在1949年12月21日，即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会之前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党政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而且近在咫尺。毛泽东坐在斯大林的右边，赫鲁晓夫坐在斯大林的左边。

赫鲁晓夫不仅是官复原职，而且还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庆祝会后的一天，斯大林提起了那封信的事情。

他凝神注视着赫鲁晓夫问道：“我给你的那个文件你仔细看了没有？”

“是的。我仔细看过了。”赫鲁晓夫知道搪塞不过去了。

“怎么样？”斯大林眯缝着眼睛看着他。

赫鲁晓夫鼓起勇气，直视着斯大林的眼睛，肯定地说：“这封信一定是一些无赖或疯子拼凑起来的。”

“什么？”斯大林有些不高兴了，在他看来，写告发信的人对他是忠诚的，而对告发信发表异议的人，倒是值得怀疑。

“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急忙解释说，“我百分之百地肯定，信中提出的指控与真实情况毫无共同之处。信上指名为阴谋家的那些人，有不少我个人是认识的。他们都是诚实的、忠诚的人。我可以肯定地说，波波夫不是一个阴谋家。毫无疑问，他处世不够圆滑，他的工作也不是无可挑剔的，然而他不可能卷入任何性质的阴谋案件。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关于他，我从未有过任何怀疑，并且这封信丝毫没有改变我对他的看法。”

斯大林被赫鲁晓夫这种确信无疑的态度所影响，口气变得缓和下来，好



像与赫鲁晓夫商量似地说：“你的意思是否说你不认为应该认真对待这封信件。”

“是的，”赫鲁晓夫发现自己的一番话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便进一步说道，“是的，我绝对不认为它值得认真对待，斯大林同志。当然，我没有调查，但依我推测，那是挑拨分子干的。”

斯大林气愤地骂起来，这个问题便就此搁下。

赫鲁晓夫认为，当时他只要随声附和，支持信中所提出的控告，就可轻易获得斯大林的信任与欢心，接下来的便是一连串的逮捕与审讯……

为了使波波夫能躲过这一灾难，赫鲁晓夫提议将他调离莫斯科。波波夫当时担任城市建设部长，他还蒙在鼓里，既不知有人控告他，也不知自己的生命岌岌可危，他只知有人在排挤他。当赫鲁晓夫通知波波夫去古比雪夫一家工厂任职时，波波夫还尖酸刻薄地把赫鲁晓夫臭骂了一通。在波波夫看来，正是这个原乌克兰的领导人顶替了他，使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殊不知，赫鲁晓夫是在冒险救他。如果斯大林产生怀疑，认为是赫鲁晓夫在保护他，或者认为赫鲁晓夫也参与了波波夫的阴谋，那么赫鲁晓夫也就自身难保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布尔加宁有一次对赫鲁晓夫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分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将回到家里去，还是将被汽车接走——送到监狱里去！”

这时的赫鲁晓夫，多多少少是有些后悔的。莫斯科好是好，实在是太危险了。他时常回忆起在乌克兰的日子。

在乌克兰的12年对赫鲁晓夫的一生来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乌克兰作为最高领导人，几乎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不必像在莫斯科的那些人那样整天忙于巧妙应付、相互拆台，而可以我行我素，发挥自己的才干，形成自己的性格；尽管他在理论修养、总的文化水平方面比不上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一些领导人，然而他比斯大林周围的任何一个人更了解实际问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和职员的生活状况。在乌克兰独立工作的12年使他更加成熟：果敢、坚定、刚毅，富有勇气。

列宁格勒的事件在继续发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上任时，库兹涅佐夫已经被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尚未被捕，但已被免除了一切职务。这位失业的经济学家仍然时常到斯大林那里吃饭，但他这时已不是原先那个开朗、自信、意志坚定的沃兹涅先斯基了。令人感到悲伤和惋惜的是，正是这些优点使他遭到了毁灭。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时，他曾有足够的勇气与贝利亚争吵。他曾试图把国家的经济资源重新分配得更为公平些，而这就意味着要削减受贝利亚所偏袒的几个人民委员部的那些拨款。问题当然还不仅于此。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还是贝利亚政治舞台上的竞争者。

30年代后期的肃反扩大化使许多新人被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上来。卫国战争又促进了一批年轻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成长。战争结束后，这一批新秀脱颖而出，有希望成为取代克里姆林宫老一代领导人的接班人。而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就是这类新星中的佼佼者。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畔休假时突然大发感叹，使周围的人大为惊诧。他说，他老了，应该考虑接班人了，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库兹涅佐夫……斯大林的话，贝利亚不会听不到。

贝利亚想搞掉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并非易事，因为没有斯大林的命令，他是不敢贸然行事的。

这一时期，斯大林还不止一次地询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我们决定如何处置他们的时候，不让沃兹涅先斯基工作是不是一种浪费？”

两人总是敷衍地回答说：“是的，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又提起这事说：“我们是否应当让沃兹涅先斯基负责国家银行。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位真正的金融方面的奇才。”

仍然是表示同意，然而毫无下文。

作为旁观者，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沃兹涅先斯基还抱有一点尊重。在整个列宁格勒事件开始之前，他对那几个年轻人组成的领导班子抱有很大的希望，并且已经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库兹涅佐夫看来有望取马林科夫而代之。沃兹涅先斯基曾经当过斯大林的第一副手，并经常受托主持部长会议。柯西金曾被授以负责商业与金融财政的重要职务，赫鲁晓夫清楚地看到这三个人的提升意味着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以及米高扬的失宠。到莫斯科不久，赫鲁晓夫就认识到，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破坏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柯西金这三人的威信。马林科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有机会接触所有呈送给斯大林的情报资料。他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些材料来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和猜疑。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所负责的这一案件，对他们来说是真是假不难辨出，但事情已经进行到这一步，退是退不得的，且不说功亏一篑，一旦事情有了转机，就是谁死谁活的生死攸关的大事了。

一天在吃饭时，斯大林问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喂，沙胡林和诺维科夫仍在狱中吗？”

沙胡林曾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斯大林的儿子、飞行员瓦西里·斯大林在他父亲面前攻击沙胡林，说他在战时生产的飞机质量不高。斯大林为此下令调查，马林科夫也受到牵连。因为他在战时分管航空工业。沙胡林进了监狱，而马林科夫则被解除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并调往中亚的一个地方。贝利亚说服斯大林让马林科夫返回莫斯科，马林科夫为了感恩，从此对贝利亚言听计从。

诺维科夫是空军元帅，他也受到瓦西里的控告，说他接受质量不好的飞机，遂遭逮捕。

在这两人被捕之后，斯大林仍对他们怀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对斯大林的提问赶忙回答：“是的。”

“你们看，将他们释放好不好？把他们关在监狱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还能继续工作。”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听到这话，没有回答，面面相觑。

他们害怕将两人放出来会引起连锁反应。按贝利亚的话说，“可能要及其他人”——这是赫鲁晓夫在洗手间听两人小声说的。所谓其他人是指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就是说，一旦沙胡林和诺维科夫获释，斯大林可能回到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的问题上来。斯大林可能会考虑在他们受审之前就释放他们。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担心，被视为列宁格勒阴谋案的首犯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如果获释，那么整个案件很可能被翻过来。因此，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尽力设法将沙胡林和诺维科夫继续关在狱中。这时，对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的审查开始了。

1950年9月，在列宁格勒举行了公开审判。法庭宣称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拉季奥诺夫、波普科夫、卡普斯京、拉祖京背叛祖国，进行反革

命破坏活动，参加反苏集团，并判处他们死刑。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废除死刑，审讯此案时又恢复了死刑。

不久，又进行了一次审判。州委第二书记巴达耶夫、州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哈里托诺夫、列宁格勒市古比雪夫区委书记沃兹涅先斯卡娅（沃兹涅先斯基的妹妹）等人被判死刑。其他一些前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如俄罗斯联邦计划委员会主席巴索夫，摩尔曼斯克市委第二书记韦尔比茨基，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索洛维约夫等人也被处死。1951年到1952年，逮捕和审讯仍在继续。

柯西金在这一案件中却神奇般地幸免于难。赫鲁晓夫对此无法解释，要知道，他是列宁格勒组织中的一个突出人物，也许是被捕者的口供对柯西金十分有利，也许是口供明显是虚构的。总之，他没有死，而只是被解除了所有的职务。

“列宁格勒案件”审理完之后，整个莫斯科和中央委员会都在全力准备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自第18次党代表大会召开至今已整整13年了，党的生活一直不正常。这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斯大林在党政机关的建设上，把国家保安系统放在了极不正常的位置上。党内的很多问题不是依靠党代会，而是依靠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等人。

19次代表大会如期举行。斯大林因身体有病不能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由马林科夫来作。赫鲁晓夫受委托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的一条修改是“把党原来的名称，即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改为苏联共产党”。

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建议选出由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主席团（根据新的党章，中央主席团起政治局的作用）。主席团选出不久，斯大林建议从中分出一个人数较少的执行局，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这次都没有入选。在这个执行局中，斯大林又挑出“五名”主席团委员，其使命是处理国内的重大问题。这五人为：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地位又提高了。

## 第五章

### 清除贝利亚

1952年年底，白雪覆盖的莫斯科宁静而神秘。19次代表大会的结束并未给这个城市带来多少生机，却使它充满了不祥之兆。

斯大林对没有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选入执行局的解释是，他们不应得到党的信任，他们是某些西方政府的代理人。赫鲁晓夫尽管进入五人核心圈，但仍然心存畏惧。因为在斯大林身边实在没有安全感，今天不晓得明天。不知哪天，哪一个人又会成为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这全取决于斯大林的判断。晚年的斯大林在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认识：即身边被敌人所包围，应该考察每一个人，从中找出暗藏的叛徒或破坏者。他把这称做“警惕”，并常常说，一个报告只要有10%是真的，我们就应当认为这个报告是真实的。况且，这时他还怀疑由美国和英国间谍网培植的犹太复国主义和铁托主义正在酝酿阴谋。他还相信，在他的老同事中有一个要取代他或者至少要削减他权力的阴谋。晚年的斯大林变得越来越疑。

一天，斯大林把主席团成员紧急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向他们宣读了一个名叫莉季娅·季马舒克的女医生的来信。信中断言，某些著名医生，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内科医生维诺格拉多夫，企图利用手中的处方权来谋害领导人。据说，这些医生已经造成了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的过早死亡，而且他们正在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伏罗希洛夫、科涅夫元帅、戈沃罗夫元帅以及什捷缅科将军等人。自然，如果真是这样，它将是最无法无天的罪恶，因为医生不去挽救生命而去毁灭生命是违反天理的最坏的一种罪行。这是赫鲁晓夫听完这封信的第一个想法。

然而，季马舒克的信有10%的真实性吗？能进克里姆林宫的医生，无疑都是苏联医学界最有名望的人，都是受过严格审查的，不但医术高超，而且政治上也是绝对可靠的。再说日丹诺夫在去世前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恶化。喝起酒来不能控制。在斯大林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常常见到斯大林大声喝令他停止饮酒。斯大林通常是鼓励人们喝醉的。斯大林能这样阻止一个人喝酒，足见他已病得不轻。他的死很可能是饮酒过度。

但是，与日丹诺夫之死有关的医生都被逮捕了。其中有曾经给斯大林看过病的维诺格拉多夫，以及刚从中国回来的瓦西连科。这些医生都是主席团成员和苏联元帅们身旁多年的医生，他们都是在没有通报主席团的情况下被捕的。此外，主席团成员当时无权同他们以前的医生进行接触。主席团成员只能看到被捕者的书面供词，不允许过问案件和对指控进行核实。

审讯开始了。赫鲁晓夫经常听到斯大林在电话中对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捷夫大发雷霆，训斥他办案不力，命令一定要将医生们关进监狱，将他们打成肉酱，磨成粉末。结果，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招认了他们的“罪状”。在拿到审讯记录后，斯大林对主席团成员们大加指责，说他们就像一群小猫，对一切视而不见，“如果不是他，恐怕国家就要灭亡了”。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医生案件”的官方公报。公报披露有9名医学教授已被揭露出来是美英间谍机关的特务，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有害的治疗来缩短苏联积极的领导者的生命。”他们被指控按照美英间谍机关的命令，谋害了党的两个领导人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并进一

步打算谋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戈沃罗夫元帅、什捷缅科大将、列夫钦科海军上将和其他人，以削弱国家的防务。这些医生大多是犹太人。沃夫西、科冈、克林、费尔德曼、埃廷格、格林施泰因、马约罗夫等医生被控通过犹太人慈善组织“联谊会”与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国际犹太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在它们的唆使下行动；而另一个英国机构则“招募”了维诺格拉多夫、叶戈罗夫等纯粹俄罗斯族的医生为它卖命。

同一天的报纸还发表了带有斯大林口气的社论，社论中说：“……有些人得出结论，认为现在已不存在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的危险性……但是只有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立场上的人才会这样想和这样判断。他们不理解或者不能理解，我们的成绩不是导致斗争熄灭，而是导致斗争尖锐化，我们越是坚决地向前进，人民的敌人的斗争也就越尖锐。”社论认为，历史上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像列文、普列特涅夫这样的凶手和叛徒就是在医生的面具下从事活动，他们按照苏联敌人的指令害死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高尔基、苏维埃国家杰出的活动家古比雷夫和缅任斯基。社论最后向医生们的“外国主子”以及他们在国内的“鼓舞者”发出了严正警告：“苏联人民必将把那些出卖自己来换取美元和英镑的卑鄙走狗作为最肮脏的败类予以粉碎。”

在一个时期，《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声称对于“卑鄙的间谍杀人犯，暗中的敌人，应该像对下贱的蛆虫一样来镇压他们”，而且文章都是以“克服我们队伍中警惕性不高”的口号来结束的。与此同时，赞扬季马舒克的文章铺天盖地充斥于各家报纸的版面。1月21日公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由于协助政府揭露医生杀人犯案件有功，决定授予季马舒克列宁勋章。”给诬告者授予列宁勋章，这在苏联还是第一次。此后，《真理报》还杜撰了一个一个普通医生识破具有世界声望的名教授阴谋的故事：

在病床前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一个资历很高，具有很高的名望和职称；而另一个女大夫除了有20年的医务工作经验之外，则什么也没有。这时，他们的手中拿着同样的化验单，看到的是同样的病症。但那个名教授却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诊断，并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治疗方法，而这将会导致病人的死亡。是的，那个名教授具有很高的学问和经验，不太可能做出如此错误的诊断，更何况他还放弃了任何可以纠正它的做法。他为什么这样做？是否意味着站在你面前的并不是医生？解答这一问题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许多小时的紧张思考，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充分的信心，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熟悉本行工作的爱国者，这样你才能明白一切。是的，在女大夫面前的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伙苏联的敌人，一伙凶恶的、狡猾的、伪装得很好的敌人。斗争开始了，斗争十分艰巨。要知道，这些带职衔的人占据着很高的地位，他们在四周安排了“自己的人”，但是这个女大夫像与祖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人们一样，不是为生存，而是用死亡去斗争。

过了不久，正在生病的科涅夫元帅也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大林，声称他受到了据认为是毒死了日丹诺夫的同种药品的毒害。主席团的所有成员显然都感觉到科涅夫的控告缺乏真实性，并对他的信产生了反感。但大家并没有公开地进行讨论，只是私下交换了意见，认为这封信所造成的后果是将进一步扩大嫌疑犯的范围，因为被控谋杀日丹诺夫的那些人已经入狱，该信无疑将

会煽动起斯大林对医生的普遍不信任。

这次对克里姆林宫医生的控告，不过是一场大战前的小接触。作为医务人员，他们在政治上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他们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夺取政权。如果对他们进行审讯，也只能把他们说成是受人指使，是那些醉心于权力的阴谋者的爪牙。阴谋者只能出自统治集团中居于高位的人，因而揭露这次阴谋的“真正”指挥中心将会轰动一时，成为这次审讯的高潮。

1953年2月末，斯大林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他要求3月中旬审理“医生谋杀案”，并把“罪行结论”的抄件分给大家。“罪行结论”抄件说，战争时美国人不仅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医疗管理机构，甚至在党中央和保安部内建立了自己的联络站；英国人战前也是这样做的，而在战争期间又扩大了通讯网，从克里姆林宫内部网罗了中央委员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吉昂诺夫等人。这一解释将“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谋杀案”联系在一起，互相证明。事件有扩大的趋势……

但是，“医生谋杀案”最终还是没能演绎下去，3月5日，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是在1953年2月发病的。2月28日是星期六，晚上，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看了电影以后，应斯大林的邀请，来到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近郊别墅”。同往常一样，晚饭一直吃到早晨五六点钟。斯大林喝得有点醉了，但兴致很高。他的身体看不出有丝毫患病的迹象。到了大家终于要离开的时候，他还出来送客人。像往常情绪好的时候一样，斯大林高声说笑着，用手指打趣地戳戳赫鲁晓夫的肚皮，学着乌克兰话的腔调叫他“尼基塔”。在这次“会议”（他们称这种长时间的宴会为“会议”）散会后，大家回去时都很高兴，因为在吃饭当中没有出什么岔子。在斯大林那里吃饭并不总是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

第二天是星期天，赫鲁晓夫以为斯大林会召集大家去开一个什么会。他呆在家里哪儿也没去。傍晚，他仍等着斯大林的电话，以至把全家的晚饭都推迟了，但是仍没有得到通知。晚饭后仍旧没有消息。赫鲁晓夫不相信这一整天斯大林会不召集他们就这样过去了，但斯大林还是没有来电话。当赫鲁晓夫最终脱了衣服上床时，电话铃响了。讲话的是马林科夫，他说：“你听着，契卡人员刚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电话。他们认为斯大林出了什么事。我们最好去一下，我已经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你最好立即动身。”

赫鲁晓夫立即动身前往斯大林的近郊别墅，15分钟便到了。值班员说：“斯大林同志几乎一向是在11点钟叫人送茶点。但是今天晚上他没有叫人。”契卡人员说，他们曾派马特雷奥娜·彼得罗芙娜去看看他。这名女仆出来说，斯大林躺在他平常睡的那间大房间的地板上。契卡人员赶忙进去把斯大林从地板上抱起来，把他放到小餐室的沙发上。

四个人了解了这一情况后，认为既然斯大林处在不便见人的状态，大家进去不合适，于是就分头回家了。深夜，马林科夫又打来电话，说契卡人员又打来电话，认为斯大林肯定是出了毛病，女仆又进屋去看了一下，说斯大林睡得很熟，不过这种睡眠不正常，大家最好还是再去一下。

赫鲁晓夫认为如果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就应该叫上主席团执委会的其他成员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并把医生请来。大家都到齐后，在值班官员办公室碰了一下情况后就赶紧进了房间。

斯大林正睡在沙发上。医生卢科姆斯基走向斯大林身边时显得异常小

心。赫鲁晓夫知道卢科姆斯基在想些什么——是在担心，担心被人控告谋害斯大林。在“医生谋杀案”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医生都会这样想的。医生在拿起斯大林的手时，神经质地抖动不已，好像碰到的不是手，而是一块烧红的铁块。贝利亚见状粗暴他说：“你不是一个医生吗？查看下去，好好捏住他的手呀。”

卢科姆斯基医生说，斯大林的右臂不能动了，左腿瘫痪，甚至不能够讲话了。他的情况严重，也许能活下来，但不能再工作了。这种病一般不会拖得太久，结局往往是致命的。

斯大林的神志有一度曾清醒过来，但不久又昏迷过去。贝利亚在斯大林失去知觉时，就在他的旁边踱来踱去，口吐怨言，简直不堪入耳。但一等到斯大林脸上显出一些恢复知觉的迹象，大家认为他可能清醒时，贝利亚就跪下来，抓住斯大林的手吻起来。当斯大林又失去知觉闭上眼睛时，贝利亚就站起来吐唾沫。对此，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都看在眼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斯大林活着时，贝利亚对他百般颂扬，万般崇拜；如今，斯大林不久于人世，他就向他吐唾沫。

一天傍晚，轮到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值班。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坦率地交换意见。赫鲁晓夫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大林的病是治愈无望。医生们已经讲过斯大林活不成了。你可知道，斯大林死后，我们将会处于什么地位？你可知道贝利亚将为自己攫取什么职位？”

“哪一个职位？”

“他自己想当国家安全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担任这一职位。如果他当了国家安全部长，那就是我们未日的开始。他是为了毁灭我们才谋取这个职位的，而且，如果我们让他谋取到这一职位，他肯定是要这样干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得逞，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当上。”

布尔加宁表示同意后，两人就开始商量办法。赫鲁晓夫自告奋勇愿去同马林科夫谈一下，赫鲁晓夫估计马林科夫会同意的，尽管表面上看去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好。

值班结束后，赫鲁晓夫回家刚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又是马林科夫打来的，他说：“赶快来一下，斯大林的病情恶化。马上到这儿来。”

当大家又一次到齐时，斯大林停止了呼吸。

斯大林刚咽气，贝利亚就跳上他的汽车离开了。

留下来的人决定召集常务委员会和主席团全体成员。在等待时，赫鲁晓夫看到马林科夫神经质地踱来踱去。

赫鲁晓夫认为马林科夫从未真正有过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不过是个认真的执行者。斯大林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不止一次他说过：“马林科夫是个好秘书。他能很快地起草决议。你交给他一些任务他可以完成得很好，但他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缺乏创造性。”马林科夫一直认为迎合贝利亚对他有利，即使他明知贝利亚在愚弄他挖苦他。事实也是这样，他凭借着与贝利亚的密切关系，才受到斯大林的器重。贝利亚也曾对赫鲁晓夫说过，马林科夫是个易于驾驭的人。

赫鲁晓夫决定同马林科夫谈一谈。他走近马林科夫，并说：“格奥尔基，我要跟你谈谈。”

“谈什么？”马林科夫冷冷地问。

“现在斯大林去世了，我们得商量一下。目前咱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谈什么？等大家一起来了，咱们再谈吧。”

从马林科夫的回答中，赫鲁晓夫看出，马林科夫已经就斯大林死后的每一件事同贝利亚商量过。

看来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赫鲁晓夫只得到此打住。他说：“好吧，等以后再谈吧。”

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贝利亚要指手画脚地支配每一个人，一旦让他得逞，党和国家就要完了。赫鲁晓夫对未来忧心忡忡。

所有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的主要成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些成员立即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不足 20 人。会上没有争论，大家还沉浸在斯大林刚刚去世的悲痛之中，没有人愿意被人指责在斯大林尸骨未寒时就争权夺利。

会议决定撤销第 19 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央主席团。新的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组成。一些有关的部被合并。根据贝利亚的提议，马林科夫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马林科夫提议选举贝利亚为该部的部长。赫鲁晓夫虽然不同意，但没有作声，布尔加宁也是这样。他们看到事态正在朝着他们所担忧的方向发展。权力在重新分配：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伏罗希洛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调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随后，经贝利亚提议，解除了赫鲁晓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以便使其能够集中精力搞好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同日被任命为书记的还有伊格纳捷夫、波斯别洛夫和沙塔宁，他们都是不大出名的党务工作者。赫鲁晓夫还被大家推举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的主任。

3 月 6 日发表的这些决定被认为是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三头政治”的形成，这三人依次在斯大林葬礼上发言，在公布中央主席团委员名单时，这三人的名字也最靠前。然而，如果不是看表面现象，而以实际权力大小来衡量的话，这个三头政治的成员其实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尽管有威望，有地位，但并不掌握任何实权，他只是领导外交部和苏联驻外使馆的活动。反之，赫鲁晓夫却掌握整个党的机构——苏共中央各部和各州委、市委的工作。此外，他当时还得到了布尔加宁及其副手朱可夫的全力支持。布尔加宁虽然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他作为国防部长却控制着全苏武装力量。要知道，军队在政治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1953 年，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职务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从 1920 年直到逝世前一直担任此职。当然，斯大林不仅是政府首脑，而且还是党的首脑。但是，他的后一个职务却很少提到。这一现象证明了党的最高机关在苏联国家权力机关系统中的作用受到削弱。赫鲁晓夫懂得，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党和中央委员会在权力机关系统中的主导作用。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完全取决于能否除掉贝利亚。但此事不但复杂，且很危险。首先，贝利亚是原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的首脑人物，这两个部在国内各个组织和部门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和自己的人员。此外，守卫克里姆林宫以及所有苏联政府官员和党的主席团委员的警卫人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国家安全部还负责领导边防部队和不下于 10 个师的内务部队。斯大林的葬礼已成为这些师驻扎莫斯科近郊的最合适不过的借口。尽管这些部队是步兵师，缺少重型武器的配置，但其实力足够发动一场政变。



新领导班子宣布后的头几周，出台了几项取信于民的措施。第一项是对在押犯实行大赦，但只限于释放刑事犯。第二项是降低食品和消费品价格，这是战后第二次，也是幅度最大的一次降价。面包和面粉的价格降低了 10%，肉类食品减价 15%，土豆和蔬菜降价达 50%，食糖和糖果下跌 15%，伏特加以及其他烈性饮料降价 10—15%，服装、鞋类、玩具和男子服饰用品普遍向下调价 10—15%。降价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刑事罪犯的大赦，却使国内犯罪率有所上升。内务部的权力因此又得以进一步扩大和加强。

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贝利亚开始在内务部进行人事调整。为了使阿巴库莫夫无罪开释，必须把“医生谋杀案”的炮制者，调查局局长柳明搞掉。当初，贝利亚也是这个案件间接打击的目标，斯大林指责他警惕性不高，没能揭露出这个隐藏在克里姆林宫的披着医生外衣的“美国—犹太人间谍网”。

1953 年 4 月 4 日，也就是斯大林逝世后一个月，苏联各家报纸公布了对“医生谋杀案”平反的通告。通告说，据“原国家安全部”的命令而逮捕克里姆林宫医生一案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法的。此外，为了得到所需要的口供，国家安全部使用了“人们无法接受的、苏联法律也绝对不允许的审问方法”。通告还说，所有的被捕医生均已释放，对他们的被捕负有罪责的人已被逮捕。《真理报》还在显著位置刊载文章，指出：潜伏在原国家安全部内部的奸细企图“离间各族人民”；“破坏以国际主义精神融为一体的苏联人民的大团结”。

当天，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追回已发给季玛舒克医生的列宁勋章。追回勋章，这在苏联还是首次。同案件有关的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捷夫被解除了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柳明则被枪决。

赫鲁晓夫密切地注视着内务部领导层的一切变化。赫鲁晓夫毫不怀疑，贝利亚正在密谋策划夺取国家的权力，他也毫不怀疑参与密谋策划的不仅有贝利亚的副手，而且有内务部所属部队的一些高级军官。

赫鲁晓夫决定加快行动，因为他知道，贝利亚也在严密地注视着他。一旦有人走漏消息，贝利亚会毫不费力地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赫鲁晓夫在 3 月时就已经把布尔加宁争取过来。得到朱可夫的支持估计不会太困难。只是没有马林科夫的支持，撤换和逮捕贝利亚是不可能的。

在主席团讨论贝利亚提交的关于乌克兰政府机构民族成份问题的备忘录时，赫鲁晓夫找到了与马林科夫对话的机会。贝利亚在备忘录中提出，本地官员应当在本共和国里担任领导职务，而不应当调升到莫斯科中央机构来。接着，他又提出了两个类似的备忘录，一个是关于波罗的海诸国，另一个是关于白俄罗斯的。两个备忘录都强调提拔本地人担任本共和国领导的原则。主席团通过了一个决定，规定各共和国第一书记的职位均须由当地人担任，而不是由莫斯科派遣的俄罗斯人担任。

尽管贝利亚的提案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一致，但贝利亚的目的却是不可告人的，他是为了加剧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对立情绪，加剧莫斯科中央领导和各共和国地方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

赫鲁晓夫将马林科夫拉到一旁说：“马林科夫同志，你明白吗，这样会把我们引向何处？这是要把我们引向一场灾难。贝利亚在磨刀了。”

马林科夫问：“我看是看到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是抵制他的时候了。确实，你必须看出贝利亚所持立场的反党性。我们绝不能容忍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加以反对。”

“你的意思是要我一个人来反对他吗？这我不干。”

“你怎么能认为只有你一个人单独反对他呢？这里就有你和我——这样已经有两个人了。我看布尔加宁肯定会同意我们的行动。我和他已经不止一次交换过意见。我相信，只要我们从坚定的党的立场出发提出我们的论点，其他人肯定也会参加到我们这一边来。问题在于你在主席团会议上从不让别人有发言的机会。只要贝利亚一提出什么动议，你总是迫不及待地支持他说：‘这个很好，贝利亚同志，真是个好建议。我赞成，有谁反对吗？’然后就径自付诸表决。你不妨试一试，给我们其余的人一个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你将看到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深信有很多人会跟我们站到一起来反对贝利亚。你和我一起来搞一个会议议程，把我们认为贝利亚是错误的一些问题也排在议程之内，然后，我们就反对他。我深信，我们能争取到其他主席团成员的支持，通过我们的决议。让我们这样来试试。”

马林科夫最后同意了。两人为下一次主席团会议排好了一个议程，把能获得大家支持的争议排进了议程。结果，正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贝利亚的意见被否决了。接连几次，他们都采用了这套办法获得了成功。马林科夫开始相信主席团可以运用党的制度来对付贝利亚，否决那些不利于党和国家的提案。贝利亚很快就觉察到了这一切，他不但加快了对内务部系统的改组，而且还直接控制了苏联的原子能工业、冶金工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莫斯科军区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赫鲁晓夫觉得已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说，必须尽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谈一谈，争取支持。马林科夫表示同意，认为必须行动。

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商定，由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谈话，马林科夫找伏罗希洛夫谈。

赫鲁晓夫了解莫洛托夫对贝利亚的态度。早在莫洛托夫受到斯大林充分信任时，赫鲁晓夫就常常听到莫洛托夫声色俱厉地指责贝利亚。当赫鲁晓夫把事情同他谈清后，立即发现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对，”莫洛托夫说，“我跟你想的一样。但是我想问一下，马林科夫的立场怎么样？”

“我是代表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来同你商量的。我们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了。”赫鲁晓夫向他摊牌说。

“做得对，但我知道，你们究竟想怎么进行？最后又将如何？”莫洛托夫不无担心地问。

“首先，我们必须解除贝利亚担任的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内务部长的职务。”

莫洛托夫认为这样做不行，他说：“贝利亚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因此必须采取更极端的措施。”

其实，赫鲁晓夫也主张对贝利亚采取极端措施，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之所以有所保留，是因为尚未揭发出贝利亚的刑事罪行，贝利亚的挑拨行为还不足以作为逮捕贝利亚的证据。前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在1938年曾对赫鲁晓夫说，贝利亚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木沙瓦特的暗探。尽管对这件事没有调查过，但卡明斯基在阿塞拜疆工作过，他了解贝利亚。卡明斯基也正是由于了解贝利亚的底细被迫害而死。贝利亚肯定有问题，只是有待查实。

赫鲁晓夫把同莫洛托夫的谈话经过告诉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这更增强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处理贝利亚的决心和信心。不久，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意见也达成了一致，只有米高扬采取了特殊的立场。米高扬对赫鲁晓夫说，贝利亚并不是不可救药的人，还是可以继续和他一起工作。他的这一立场使赫鲁晓夫深感不安。但是已没有退路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讨论了逮捕贝利亚的技术问题。主席团的警卫人员是由贝利亚指挥的。由谁逮捕他呢？必须调动一支不受他控制的部队才成，要依靠军队来保护主席团成员的安全，保证这一行动不受阻碍和干扰地顺利进行。赫鲁晓夫向马林科夫建议，让布尔加宁以苏军要在莫斯科举行夏季军事演习为由，调西伯利亚的部队进莫斯科，以迷惑贝利亚，并派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 11 位元帅和将军来执行拘捕任务。由布尔加宁事先安排好，让元帅和将军们带着枪支进入克里姆林宫，并等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一旦马林科夫发出信号，将军们就立即冲进会议室，把贝利亚看管起来。

事情决定之后，赫鲁晓夫给朱可夫元帅打了一个电话：“明天，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可能要逮捕他。您带上几位可靠的将军，时刻准备行动。”

会议如期举行。应邀前来开会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赫鲁晓夫口袋里放了一支手枪。贝利亚带了公文包，进来后把它放在窗台上。

贝利亚进来后，参加行动的将军们就给贝利亚的住宅打电话，把贝利亚身边的警备队负责人萨尔基索夫上校和纳多莱上校叫到中央办公楼谈话，以便随时将他们控制住。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将帅已经悄悄进入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待命，只等马林科夫的一声铃响。

马林科夫宣布会议开始，并提议：“我们来讨论党内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务必马上讨论。”与会者没有表示异议。按照事先的计划，赫鲁晓夫首先向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要求发言，提议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就坐在赫鲁晓夫的右边。他听到这话，吃了一惊，抓住赫鲁晓夫的手，面露惊慌之色，瞪着赫鲁晓夫说：“干什么，尼基塔，你在说什么呢？”

赫鲁晓夫厉声喝道：“听着，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赫鲁晓夫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早在 1937 年 6 月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格里戈里·卡明斯基就曾揭发贝利亚在担任巴库党组织书记时曾为英国情报机关和木沙瓦特的反谍报机关服务。木沙瓦特反对共产党，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阿塞拜疆。但像很多其他中央委员一样，会议后不久卡明斯基就被逮捕，从此杳无音讯。而卡明斯基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杰出的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接着说：“我对卡明斯基的揭发一直感觉到奇怪，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明卡明斯基所提出的疑问的真相呢？”接着，赫鲁晓夫指控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来经苏共中央批准即在内务部内搞大换班，并处处把格鲁吉亚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以此来制造民族不和。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我对贝利亚所作所为的观察，使我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他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出于个人主义目的钻进党内的野心家。他的傲慢自大令人不能容忍。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绝非一个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所能做出的。”

赫鲁晓夫发言之后，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等人在发言中支持了赫鲁晓夫。只有米高扬态度不明朗，仍然重复了他在会前同赫鲁晓夫交谈时所说的话，认为贝利亚会接受批评，改造他自己，他不是不可救药的，他会在集体领导中发挥作用，等等。

大家发言完毕，出现了可怕的冷场，按照议程，马林科夫这时应该把所有的发言总结一下，然而，他却显得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赫鲁晓夫一看形势不妙，立即要求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撤消他在政府中的其他一切职务。而马林科夫仍然紧张地不知如何是好，没有提议主席团对动议进行表决，而是去按动了秘密电钮。门开了，第一个冲进来的是朱可夫元帅，紧跟在他的后面的是莫斯卡连科等人。马林科夫有气无力地对朱可夫元帅说：“我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要你把贝利亚看管起来，以便对他被控的罪行进行审查。”

“把手举起来！”朱可夫命令贝利亚。

贝利亚曾一度企图炮制一个“军事阴谋”，将朱可夫牵扯进去，是斯大林出面保护了朱可夫，否则他早被处死了。斯大林说：“你可不要找朱可夫的麻烦，我了解他，他不是叛徒。”现在终于轮到朱可夫逮捕贝利亚了。朱可夫在此前已经下了命令，所有的出入口都要看守住，包括窗户和阳台。

莫斯卡连科及其他一些人都解开了自己的枪套，以防贝利亚反抗。贝利亚像是要伸手去拿窗台上的提包。赫鲁晓夫立即扑过去抓住他的手臂。事后检查，提包中没有武器。

贝利亚在武装监护下被押进了部长会议大楼马林科夫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人们担心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和内务部人员会来干预。根据朱可夫的命令，坎捷米罗夫坦克师和塔曼摩托化步兵师进驻莫斯科。战车开到了莫斯科市中心。

贝利亚被押进一位元帅的汽车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关进莫斯卡连科司令部的一处防空洞里。小院的四个角落都布置了坦克，炮口对准牢房。

贝利亚被押走后，与会者又讨论了对贝利亚的处理方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要对贝利亚进行审讯和侦查。为使总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能够公正、客观地办案，赫鲁晓夫建议任命鲁坚科为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在乌克兰曾经担任过10年检察长，1945—1946年以苏联总起诉人的身份参加了纽伦堡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是个信得过的人。

赫鲁晓夫等主席团成员离开克里姆林宫后，斗争并未停止。紧急调遣来的一营海军边防部队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保卫工作。主席团成员身边更换了新的保卫人员。内务部大楼被包围、戒严。在内务部副部长谢罗夫的领导下，搜查和逮捕了贝利亚的同伙和亲信，其中有刚从监狱被贝利亚释放出来的阿巴库莫夫（原国家安全部部长，列宁格勒案件的炮制者）、麦尔库洛夫（国家监察部长）以及贝利亚的秘书处处长柳德维戈夫和代理顾问沙里亚等几十名内务部官员和内务部部队各师的指挥员。几乎没有人反抗。逮捕行动组织得很好，以致莫斯科市民竟毫无觉察。逮捕于第二天继续进行。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在各共和国、州、市一级机构的头头脑脑纷纷被捕入狱。

当中央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全体会议、批准把贝利亚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以后，内务部就不再是一度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的权力最大的组织了。赫鲁晓夫在这一事件中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他的勇气、刚毅和主动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朱可夫以军队为后盾支持了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第一次看到军队在最高层发生重大事变时的决定性作用。

贝利亚的被捕标志着第一届“三头政治”的结束。苏联领导的大权顺利地过渡到由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组成的第二届“三头政治”。马

林科夫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无疑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必须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工作。另外，他还对贝利亚一案的调查深感烦恼。贝利亚在供词中为了解脱自己，将很多事都说成是受马林科夫指使，向这个一直被视为盟友的人身上栽赃。布尔加宁的权力则有名无实。因此，在这新的“三头政治”中，赫鲁晓夫成为最积极和最活跃的成员。他在1953年9月的中央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权力更加扩大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时不仅全面控制了内务部的活动，而且还严格监督所有苏维埃政府机构，包括马林科夫所领导的部长会议的工作。国家和党的所有工作的创意都将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发起。换句话说，未经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任何提案都是无效的。

## 第六章

###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3年12月17日，苏联检察院宣布，贝利亚及其同伙的案卷已经准备就绪，他们的案件将由苏联最高法院的特设法庭审理。按照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被告不得当堂提出抗议或任何形式的上诉，判决应当立即执行。

贝利亚曾依据这一法令，使许多无辜善良的人无法申辩，含冤而死。如今终于轮到了他，这可真是自食其果。

特设法庭的庭长由科涅夫元帅担任，法庭成员包括一些著名的军队领导人和各部委领导人，其中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尼·米·什维尔尼科，莫斯卡连科和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兹亚金。全部审判工作持续了整整六天，但审判记录从未公开发表。

贝利亚的罪行尽管足以被定罪和处以死刑，但与其所作所为有关的党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的问题则不宜公开披露。对贝利亚的罪行调查愈深入，触及他人，尤其是目前在位者的问题就愈多。因此，中央不允许将审查结果公之于众。

报刊上关于审讯和判决贝利亚及其同案犯的报道极为简略。只是在市和区一级的党组织会议上宣读了有关审判过程的较为详尽的材料。然而，全国的反应却十分强烈。贝利亚被处决一事使劳改营的千百万囚犯受到震动。斯大林的逝世已经在这里燃起了获释的希望。对“医生案件”的重新审查和贝利亚之死更加助长了这种情绪。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变得和善了，制度也有所松动：宿舍窗户上的铁栏杆被拆除了；特种劳改营的犯人可以同家人见面。

苏联检察院收到的要求平反的申诉书堆积如山。对这些申诉，尤其是直接受害于贝利亚的受害者的申诉，不能不予受理。根据中央主席团的决定，总检察长开始对“列宁格勒案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使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等2000多人恢复了名誉。随着“列宁格勒案件”调查工作向纵深发展，再想掩盖马林科夫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已是不可能了。危险笼罩在马林科夫的头上。

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了第5次会议。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做了总结性的报告。这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

马林科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一项“迫切任务”，即要在两三年内大大增加供应给人民的食物和制成品，大大增加供应给居民的各种消费品。马林科夫回顾了苏联工业发展的历史，指出苏联共产党是以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国家工业化的。经过1/4世纪的努力，终于解决了发展重工业的任务，使苏联拥有了强大的、技术上完备的重工业。在工业总产量中，生产资料的产量1953年已占70%。马林科夫认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为了保证更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能够、也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马林科夫接着说，政府和党中央认为，必须大大增加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发展农业的投资，广泛地吸收机器制造工业和其他重工业企业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为了确保人民消费品生产的急速提高，必须确保向人民提供粮食、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谈到这里，马林科夫承

认农业方面的问题还很多。不少集体农庄、甚至整个地区的农业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集体农庄的实物和现金收入很少；畜牧业发展不顺利；马铃薯和蔬菜方面生产落后。马林科夫认为要从组织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巩固集体农庄，以便生产充足的粮食和生产充足的轻工业原料。为了提高农业生产，马林科夫提出，政府将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肉类、奶类、羊毛、马铃薯、蔬菜的收购价格；高价收购农民完成义务交售以外的剩余农副产品；降低农民个人副业义务交售的标准；降低农业税额；国家预算拨款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水平，增加矿质肥料的生产。1953年，国家给农业的拨款增加到520亿卢布。

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还提出要进一步扩大贸易，增加商品量。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贸易，现在是、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成员中消费品分配的主要形式，是借以满足劳动人民个人日益增长的需要的主要形式。因此，他提出要增加消费品生产，开辟供应市场商品的其他来源，利用贸易机关在经济中的杠杆作用。

同时，他还提出要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改善医疗设施，扩大学校和儿童福利机关网等。

马林科夫在苏联人民面前展示出一幅崭新的图画，要改变斯大林时期发展经济的传统方针，要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以增加投资、改变政策、发展贸易等办法迅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过了一个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九月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报告的前提同马林科夫在8月份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上的报告完全一致，就是在今后两三年内大大增加对全体居民的食品供应，同时保证把全体农民的物质福利提高到更高水平。赫鲁晓夫对苏联农业状况的估计也一样。他同样指出，农业生产水平低和许多重要部门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国家把主要的力量和资金用于扩大重工业，当时没有可能保证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同时迅速发展。他认为，农业落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业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许多农业部门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违反了劳动组合章程，对农业机械拖拉机的设备利用得不好，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领导不力。他提出的改进农业的措施更具体一些。但是，赫鲁晓夫在对待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关系上与马林科夫稍有不同。他的提法是：“在现阶段，最迫切和最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是：在继续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求得农业所有部门的迅速高涨。”

此后，9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加马铃薯和蔬菜生产和采购量的措施》的决定；10月1日，发布了《进一步改进机械拖拉机站工作措施》的决定；10月31日，发布了《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和改进日用品质量》的决议；11月1日，发布了《关于扩大食品生产和改进食品质量》的决议。这些决定和决议是对马林科夫演说和赫鲁晓夫报告的具体化和进一步落实的措施。当时，人们看不出政府和党的领导人之间有什么分歧。11月6日，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36周年的大会上作了报告。他首先强调了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上的演说的精神。他指出，根据这一主旨，党和政府通过了若干决议，保证日用品产量的迅速增加，农业进一步的大力发展，苏维埃贸易的改善，销售量的增加等。他还说，这些决议标志着苏维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二天，布尔加宁在红场阅兵

式上的演说也重复了这一意思。1954年元旦，马林科夫在答美国新闻记者问时，祝愿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新的一年里得到加强。他认为，“在1954年内，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是存在着有利条件的”。伏罗希洛夫的新年祝词仍然把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和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相提并论，说它们的精神是“关心人民的福利和幸福”。

这时，贝利亚案件已审理完毕，贝利亚于1953年12月23日被处决。因“列宁格勒案件”而受牵连的人被平反后，平反者关于监狱、劳改营中的生活，以及对审讯时的回忆，在舆论方面已构成了对马林科夫声誉的威胁。

1954年1月1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命令。13日，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只提九月全会的决议，而没有提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而且强调党的中心工作有两个：一方面尽力使国家的经济基础——重工业得到发展并推向前进，一方面要在两三年内迅速提高农业各部门的生产，向居民大量供应食品和工业品。接着，在1月21日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的大会上，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帕洛夫作报告时开始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他说，只有重工业才能为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可能。

第二天，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封名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的信。赫鲁晓夫在信的一开头就批评了马林科夫在联共（布）19次代表大会工作总结报告中关于苏联谷物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的说法，说它“不完全符合国家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他说，1940年国家收购粮食22.25亿普特，1953年只收购到18.5亿普特。赫鲁晓夫在信中提出，增产粮食的一个重要的、而且完全现实的来源，就是今后几年内在哈萨克斯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地区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据他计算，1954—1955年有可能在新垦区把粮食播种面积扩大1300万公顷，若每公顷生产11—12公担粮食，就可多收获8—9亿普特粮食，使国家的粮食总收获量达到72亿普特，就可以满足国民经济的需求。国家从多收获的粮食中通过收购、实物交付、采购可以得到5—6亿普特。这些粮食国家平均每公担花费68卢布，而出售每公担是150卢布，这样就可以使国家收入260—280亿卢布。实行这一措施所需要的基本投资为55—60亿卢布，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回投资。

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独辟蹊径，既能立即增产粮食，又让农停止缴纳“贡税”，赢得了国内苦于长期缴纳“贡税”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拥护，得到一大批干部的支持。

1954年2月23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赫鲁晓夫的报告除了重述1月22日信中所写的内容以外，还着重指出垦荒的意义。他说：“开垦荒地的计划是一件辉煌的事业。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按其规模及其对全国的意义来说，可与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相媲美。”

3月2日，苏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为保证开垦荒地计划的实现，1954年将把12万台拖拉机、1万台联合收割机、相当数量的其他农业机械运到新垦区。为了鼓励近10万名技术工人和驾驶员去新垦区，中央还出台了有吸引力的物质待遇：去垦荒地的人一次发给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补助金；旅费报销，工资增加15%；在新播种的土地上，凡产量超过单位面积计划规定的收获量，30%作为额外报酬；每出售100卢布谷物，全苏消费



合作社就必须供应价值 50 卢布的计划商品，等等。

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不是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所作出的决定。他在苏联大“粮仓”乌克兰生活与工作的经历，他因农业的丰收和歉收所经历的荣辱，对他都是刻骨铭心的。1949 年，他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工作期间，已了解到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的实际产量之间的差距。他明白，如果以提高农产品义务交售指标、加重农民负担的办法来增加粮食征购量，将会引起农村的不安定，并使农业生产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他曾采用合并小农庄、建设农业城、改善农民生活设施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受到了斯大林的斥责。实践也表明此路不通。不过，失败的实践也为他寻求解决农业问题积累了经验。开垦荒地是赫鲁晓夫经过调查研究、比较了各种措施的利弊之后作出的决定。

马林科夫坚决反对垦荒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他的理由是：垦荒会使哈萨克斯坦的新地变成一洼灰土；花那么多基本建设投资去冒这种风险是不值得的。他动员卡冈诺维奇一起来阻止这一计划的实行。原赫鲁晓夫的上司、一直提携和帮助他的卡冈诺维奇，甚至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拒绝把钱和物资调拨到新垦区去。

马林科夫了解农业生产的落后，但是只想用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业投资的办法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不愿大动，不愿改变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的基本体制结构。因此，对于农业和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来说，马林科夫的计划远没有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有吸引力。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固定体制是党指挥政府，当赫鲁晓夫以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开展垦荒运动时，马林科夫只能消极对抗。这种消极对抗策略使马林科夫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他的计划不能兑现，落得说大话的罪名；不支持垦荒工作，又落得对抗中央决议的罪名。马林科夫的处境实在不妙。

主席团和中央委员的大多数成员之所以支持垦荒计划，是因这一计划能继续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西方国家正积极援助西德，接收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紧张起来。在斯大林领导的 30 年中，苏联国内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规律。谁要是対这一点表示怀疑并试图改变，很容易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是企图削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有意危害国家的国防。从 3 月 6—13 日，主席团的成员在各个选民区的选民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大多是在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意义。布尔加宁说：“重工业是我们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它为一切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并保证我们武装力量的加强。”莫洛托夫说：“我们都记得列宁的遗训，重工业是繁荣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防的基础。”伏罗希洛夫也随声附和：“我们将继续发展我们的重工业，使它愈益完备，因为它是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赫鲁晓夫在答英国贝尔纳教授问时讲得更明确：“我知道，国外有人说，农业方面的新措施意味着苏联的整个经济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并没有放松对工业发展的注意，我们并没有因为农业而牺牲工业。工业部门将继续根据拟订的计划发展。在将来，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重工业上。”

由于传统观念的惯性力量，也由于赫鲁晓夫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必须由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赫鲁晓夫的报告一般来说也是党的决议的基础。马林科夫所提出的“迫切任务”自然就成为靠后的、不迫

切的了。

鉴于农业政策上的教训，马林科夫为了改变自己不利的状况，在工业方针上组织了防御性反击。1954年，经济学硕士叶·卡西莫夫斯基在莫斯科财经学院作了题为《论社会生产两个部类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的报告。另一名经济学硕士德·库兹涅佐夫发表了《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进程中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专题论文。经济学硕士普·穆斯齐斯拉夫斯基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都阐述了这样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目的是人和人们的需要，生产是为了消费。既然人和人们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和重工业，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律。只有在苏维埃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即苏联还处在落后阶段时，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才是必要的。这些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年月，党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是把重心转移到发展轻工业、发展日用品生产上来的时候了。穆斯齐斯拉夫斯基在文中明确地提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比例应当彻底改变，应确定新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

但是，马林科夫要求既遵守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方针，又增加消费品生产。马林科夫试图在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框架内寻找增加消费品生产的途径，这是十分困难的。

1954年4月20—27日，第四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通过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新名单。马林科夫仍然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6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排列次序发生了变化。过去马林科夫总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则是按姓的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排列。这样一来，马林科夫在党中央主席团内成为平等的一员，已失去了最高领导的地位。

事实上，1954年是赫鲁晓夫的影响大为扩张，而马林科夫却遭受极大困难的一年。由赫鲁晓夫倡导并由他亲自抓的垦荒运动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马林科夫直接管辖的全国工业生产却受到很大的冲击。在4月26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在讲话中不得不承认：“若干部在某些重要项目上没有完成计划，其中有钢铁工业部、石油工业部、运输和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木材工业部等。许多部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不好……”

1955年1月5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告诫地方党委不要“机械地对待党和国家的决议”，“各种类型的吹牛大王，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没有研究技术进步中的棘手问题”。

社论的发表，表明马林科夫的去职只是时间问题了。1月24日，《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发表署名文章说：“试问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生产为什么不应该高速度地发展呢？为什么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比消费品工业生产的速度快些呢？”谢皮洛夫称马林科夫宣传的观点“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下降曲线论”。文章认为：“只有在全面发展和重工业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保障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以及农业各部门的持续发展，保障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这一原则，即使是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不容置疑的。”谢皮洛夫不指名地称马林科夫为“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分子”，说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可怜又可笑”的。赫鲁晓夫也不留余地地指责马林科夫，说“口红不能代替车床”，说马林科夫的错误政策减缓了工业的发展，“只是使人们

可以在街上搞到一块巧克力糖”。

1955年1月25日，苏共中央召开了讨论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的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报告说，有些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了，这些人企图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就要让位于发展轻工业。赫鲁晓夫声色俱厉他说：“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林那一伙人就曾宣传过这种观点。”这段火药味很浓的话显然是指向马林科夫的。进入1955年之后，对马林科夫的批评和指责不断加码，马林科夫的政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敏感的西方开始纷纷议论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之间的分歧。2月5日，美国记者赫斯特和史密斯采访了赫鲁晓夫，问他对此有何看法。赫鲁晓夫闪烁其词地回答说：“这些报纸可能在把他们的愿望当做事实看待。”史密斯进一步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自己有权利引用赫鲁晓夫的话？”赫鲁晓夫回答说：“这在于你们自己。”赫鲁晓夫这是在向全世界放风，他们的议论并非捕风捉影。三天后，也就是2月8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期间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席会议上，联盟院主席亚·沃尔科夫宣布，两院联席会议收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关于请求解除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申请书。马林科夫在辞呈中说：“我清楚地看到，由于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没有在部里或其他经济机关中直接管理过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我在执行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复杂和责任重大的职务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现在，当苏联共产党和我国劳动人民正在集中力量争取急速提高农业的时候，我特别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对农业中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应负有责任，因为在这以前好几年中，我一直负责监督和领导中央农业机关的工作。苏联共产党在它的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和领导下，已经制订并且正在实行若干重大措施来克服农业中的落后状况。在农业税方面的改革无疑是重要措施之一……现在，大家知道，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和领导下，已经制定了关于克服农业中落后状况并以最快速度发展农业的总纲领。这个纲领是以下面这一唯一正确的原则为依据的：继续尽力发展重工业，并且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为一切必需消费品生产的真正高涨创造必要的条件。”

马林科夫在辞呈中承担了导致农业落后的责任，几次把提高农业的新措施归功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和领导。马林科夫的辞呈宣布了马林科夫1953年8月所提出的新纲领的失败和赫鲁晓夫的胜利。

其实，马林科夫去职的原因除了工农业政策上的失败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作为斯大林的接班人，他必然要维护斯大林的偶像地位。马林科夫已经看到，干部和群众由于肃反运动和遭受迫害，积怨极深，因而他强调增强社会主义法制；但是，他自己背的历史包袱实在太重了。1937年，他曾和叶若夫一起主持过白俄罗斯的肃反工作；他还曾主管过亚美尼亚的肃反工作。1954年12月14日，赫鲁晓夫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并且逮捕和枪毙了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阿巴库莫夫。对“列宁格勒案件”的复查证实，马林科夫曾同贝利亚一起制造“列宁格勒案件”的假材料。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在制造“列宁格勒案件”中负有责任，使得本来威望就不高的马林科夫更加威信扫地，在主席团中形成一种孤家寡人的局面，处处

退守。而赫鲁晓夫与他形成鲜明对照，处处表现得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紧迫不舍。在这种形势下，马林科夫只好辞职。

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马林科夫的辞呈，解除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他为苏联电站部部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接着，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决议，任命布尔加宁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任命朱可夫为苏联国防部部长。至此，第二个“三头政治”宣告结束。赫鲁晓夫如今成了由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朱可夫三人组成的第三个“三头政治”的领头人。

2月8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国际局势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报告。莫洛托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了，1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莫洛托夫在报告中强调：美国的侵略政策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莫洛托夫反对改善苏南关系，他说这方面同样也取决于南斯拉夫，希望南斯拉夫改变立场。赫鲁晓夫对他的讲话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莫洛托夫在外交政策上的指导思想依然是保守的。

这事还得从1947年说起。当年9月，苏联作为召集人，与欧洲八国共产党、工人党在波兰举行会议，宣布成立“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南斯拉夫对苏联在兄弟国家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惟我独尊的大国主义十分不满。1948年1月，苏联通知南斯拉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会谈。南共总书记铁托借口有病没有前往，派自己的副手卡德尔率代表团出席。会谈期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横加指责，并要求卡德尔在苏联事先拟订好的一项条约上签字，该条约保证南斯拉夫就所有外交政策问题同苏联进行协商。3月1日，南共中央开会，听取了从莫斯科归来的代表团的汇报，回顾了与苏联的关系，决定不理睬斯大林的有关指示。

18天后，苏联通知南斯拉夫，苏联将立即从南撤走全部苏联顾问和军事教官。铁托当即写信给莫洛托夫，对苏联的行动表示“痛心和惊奇”，要求说明这一行动的背景和根据。此后，苏联连续几次来信，对甫进行了一系列更为严厉的指责，说南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微不足道的”，南是由于苏军的援助才得到解放的。苏联要求南共同意把这一分歧提交到共产党情报局，遭到南的拒绝。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决议，谴责南共在国内外政策中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

南共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后，苏联和东欧各国随之断绝了与南的一切贸易关系。南斯拉夫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不得不向西方国家谋求援助。这又成为铁托“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的证据。1949年11月情报局第4次会议通过了《由刽子手和间谍控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把南共领导人说成是帝国主义间谍、法西斯匪帮、杀人凶犯，这大大伤害了南共领导人和广大共产党员的感情。苏南僵局一直持续到斯大林逝世。

斯大林逝世后，铁托对改善苏南关系采取了比较积极和友善的态度。1953年4月，铁托就苏联外交政策评论说：“我认为，他们战后的国际政策已把他们推到一个死胡同里了，他们只要考虑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就能够从死胡同里找到一条出路……如果有一天他们承认对我们国家犯过错误的话，我们南斯拉夫将会感到满意，甚至非常高兴。我们在等待他们。”当年5月，苏联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

莫洛托夫在 1955 年 2 月的讲话中曾就苏南关系评论说：“我们并不认为在苏南关系方面已经大功告成，但是，我们相信在这方面也要看南斯拉夫的态度。在最近几年里，南斯拉夫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里所走的道路。”铁托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去年年底以前，东欧国家停止了反南斯拉夫的宣传……但奇怪的是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即在正常化问题上，人们在各种会议上，在党员和一般老百姓面前尽力把我们描绘成依然是他们指控我们的那种情况，不过我们总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努力纠正自己的错误。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南斯拉夫时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上述说法倒是相符合的。这是企图在他们人民面前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这是对我们的又一次损害。”苏联各家报纸一开始不加评论地报道了铁托的讲话，几天后才发表了一个温和的评论，而且引述了莫洛托夫的上述言论。苏联党中央的这一态度，一褒一贬已跃然纸上。

早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就提议成立了一个研究南斯拉夫问题的委员会。委员会中既有党务工作者也有学者，他们的任务是分析该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以判定它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家、《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也是该委员会委员之一。他的结论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原来对南斯拉夫的认识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他认为，南斯拉夫的经济完全附属于美国垄断资本。在那里，私人银行和工业私有制已经恢复，更不用说个人经营的农业了。赫鲁晓夫对此从未怀疑过，因为这是斯大林对他说的。斯大林当时对赫鲁晓夫说：“只要我动动小指头，铁托就完了。”然而，当时斯大林不只动了小指头，而且开动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及宣传机器，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岿然不动。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一经得出，赫鲁晓夫就认为斯大林据以在两国间制造争论的基础就不再有效，反对同南斯拉夫和解的论点也就站不住脚了。赫鲁晓夫决定同南斯拉夫共产党重建联系，恢复友好关系。考虑到其他兄弟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都曾卷入苏共同南共的争论，因此，必须先向他们通报一下，征得他们同意之后才能同铁托接触。在与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取得一致后，赫鲁晓夫决定派代表团出访。解铃还是系铃人。是苏共主动断绝了同南共的往来，是苏共首先攻击南共的，因此苏共就应该主动去结束分裂，赫鲁晓夫是这样考虑的。

5 月 13 日，苏联和南斯拉夫就两国最高级代表团会晤达成协议。苏联方面的代表团成员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和苏联外贸部长普·库米金。赫鲁晓夫没有让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参加，一方面怕引起南斯拉夫方面的不快，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对他确实另有想法和安排。

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是：共和国总统铁托，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兰科维奇、富克曼诺维奇—泰波，外交部长波波维奇和外交部副部长韦·米丘诺维奇等。

5 月 26 日，苏联代表团来到贝尔格莱德，受到了一个外国代表团应有的礼遇，但是，看不到有任何兄弟般的感情，气氛拘谨。赫鲁晓夫被邀请讲话。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表示决心要消除破坏苏南关系的一切障碍。但是，他却把

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咎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说他们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铁托对于他的话不以为然，对他说：“你看，我们用不着把你的讲话翻译出来，在场的人都懂俄语。”赫鲁晓夫理解铁托的意思，他是苏联人的保留态度不满。在离开机场时，赫鲁晓夫感到担心，如果这次访问失败，国内反对同南斯拉夫恢复关系的势力会再度活跃起来。

会谈开始后，赫鲁晓夫又将肃反扩大化和错误对待南斯拉夫和所有外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推到贝利亚身上。对此，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只不过以讥讽的神情笑了笑。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斯大林应当对两党之间的分裂负全部责任。但是赫鲁晓夫出于谨慎，只是说对此种说法还没有心理准备。

6月2日，赫鲁晓夫同铁托达成了协议，双方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表示要在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宣言还说：“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式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承认。长达七年之久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暂告结束。

在与南斯拉夫和解之后，赫鲁晓夫的外事活动明显增多。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是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就是在莫斯科周围保持一天24小时的防空警戒。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对赫鲁晓夫等人说：“你们看吧，我死后帝国主义国家会把你们当成小鸡一样地拧断脖子。”

斯大林总是在国内接见外国代表团，很少主动到国外访问。斯大林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斯大林去世后，外交方面的活动对新领导是个挑战。马林科夫辞职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在赫鲁晓夫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和调整，赫鲁晓夫代替莫洛托夫跻身于国际舞台。从南斯拉夫回国后，赫鲁晓夫就着手准备7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

7月18—2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自1945年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第一次四大国巨头聚会。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莫洛托夫尽管也参加了，但只是作为外长和其他三国外长一起为首脑会议做程序性的准备。美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英国是艾登和麦克米伦，法国方面的代表是富尔和比内。

出席这次会议令赫鲁晓夫非常得意。这是他与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次见面。上次见面是战争刚刚结束、莫斯科举行庆祝会时，他和艾森豪威尔在列宁墓的检阅台上碰面。当时艾森豪威尔是将军，而他是乌克兰的党政领导。10年后，在第三国，他们各自作为自己国家的代表在一起举行会谈，成为平起平坐的对手。想当年，艾森豪威尔是位世界知名的将军，而他赫鲁晓夫在国际上还没有什么名气。如今艾森豪威尔是美国总统，而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实际上的苏联最高领导，两者间已没有什么差距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气派还是无法与这些西方元首相比。他们的飞机都是四个引擎的，而赫鲁晓夫乘坐的却是一架极普通的双引擎的伊柳辛式飞机，实在有失体面。

会议上讨论了四个问题：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和发展东西方接触问题。结果一个问题也没达成协议，只给四个外长发了一个联合指示。但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次会议却开始了他同大国首脑之间的直接接触和对话，为他以后的外交活动打下了基础。临行时，赫鲁晓夫接受了英国首相

文登对他的邀请：在适当的时候，“光临”英伦三岛。

9月9—13日，赫鲁晓夫又出席了苏联与德意志联邦两国政府间的会谈。赫鲁晓夫强烈的领袖欲给德国总理阿登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本是阿登纳与布尔加宁之间的会谈，赫鲁晓夫却向阿登纳保证，在建交后一个月内提前释放9626名德国战俘，从而促成了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

1955年11月18日到12月18日，赫鲁晓夫又同布尔加宁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三国。

赫鲁晓夫已完全代替了莫洛托夫，陪同布尔加宁在五大洲四大洋上空飞来飞去。莫洛托夫的去职只是时间问题。

莫洛托夫在2月份的讲话中曾说到“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赫鲁晓夫抓住这句话不放，迫使他做出公开检讨。1955年10月，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14次《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承认错误。他在给编辑部的信上说：“我认为，1955年2月8日我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为从这一说法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建成的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这种说法之所以在政治上有害，就在于它造成了思想问题上的混乱，同党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决议相矛盾，使人们对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生怀疑。”莫洛托夫在世人面前承认了自己是个“蹩脚的理论家”。这是下台的前兆。

1956年6月1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莫斯科。在铁托夫妇到达莫斯科前，苏联塔斯社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辞去苏联外交部长职务的请求。《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升任新外长。

莫洛托夫终于丢掉了外长的职务。这是继贝利亚垮台、马林科夫辞职之后，赫鲁晓夫在取得最高领导权道路上的又一胜利。莫洛托夫自1939年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以来，除几年短暂的间断外，从事外交工作将近15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他在外事工作中习惯于传统的思想方法。时代变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已明显发生了变化，然而莫洛托夫却还停留在斯大林时期，显然这是令赫鲁晓夫无法容忍的。

## 第七章

### 向个人崇拜发难

经过三年时间组织上和政策上的调整后，1956年2月14—25日，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苏联共产党召开了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

有关苏共20大召开的消息在半年前已见诸报端。报道说，代表大会将要批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还将听取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预计中央的总结报告也将简略地提及社会各界愈来愈关注的“个人崇拜”问题。

早在贝利亚被处决之后，中央就成立了以党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到苏共20大前，根据这个委员会提供的材料，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已恢复了73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都是死后才恢复名誉的。1955年，苏联取消了中央和地方国家安全机关中的一长制领导。5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颁发了《苏联检察机关条例》，并决定重新审查所有的政治犯案件。

随着冤假错案的披露，群众要求揭露和改正错误的势头愈来愈猛。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如果再把过去一切错误的责任全部推给贝利亚就愈发难以自圆其说了。赫鲁晓夫在讨论提交20大的有关报告的内容时，向主席团提议，应当在总结报告中设专章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大对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表示反对。他们声称：“这可不是你的个人报告，而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接着，赫鲁晓夫又建议，应当从二三十年代曾是党的干部、其后受诬陷而此刻已平反的人当中，选出两三名，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他还特别提名阿·斯涅戈夫和奥·莎图诺夫斯卡娅两人。莎图诺夫斯卡娅曾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做过多种工作，目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负责调查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等问题。他的这一动议同样遭到主席团大多数人的否决。卡冈诺维奇的理由是：“你这是要让当年的被告来审判我们呀。”

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以及来自世界55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与前几届代表大会不同的是，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悬挂斯大林的画像。

赫鲁晓夫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接着，他向代表大会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苏联的国际形势”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三个理论问题，并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赫鲁晓夫说，这是列宁提出的原则，这个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不是出于权宜的考虑，策略的考虑，“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也不想用“输出”革命的办法去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它只能在两个体系的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肯定，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目前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间关系的最好准则。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就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说道，过去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原理的基础是，当时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反对战争的社会政治力量软弱，组织得不好。现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还有一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反战国家。因此，“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越积极，防止新战争的保证就越大”。

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以列宁关于不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将具有不同形式的论断为根据，指出二战后出现的人民民主国家事实上已走上各自的独特道路，中国和平改造工商业以及南斯拉夫经济管理和国家机构的特殊形式证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在历史条件有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

“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三条原则与斯大林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理论有所不同。斯大林对战后国际局势的估计及对苏联总路线的概括是：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条件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完全针锋相对，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时刻要提高警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只能以苏联为中心，服从苏联的指挥，实行一种模式，否则即离经叛道。苏南关系的破裂，以及与苏联“列宁格勒案件”相呼应的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进行的一系列清洗，都是斯大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体现。斯大林去世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新领导主动结束了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与奥地利缔结了条约，参加了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同德意志联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赫鲁晓夫提出的三条原则就是对于上述一系列做法的理论概括。这三条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以缓和代替对抗，以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在总结报告的第二部分，即“苏联的国内状况”中，赫鲁晓夫一开头就提出：“苏联共产党遵循伟大的列宁的遗训，一直关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为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的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他接着又说：“这就是我们党的总路线。”他在整个报告中前后五六次强调，今后要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的发展，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在报告中，他又一次批判了马林科夫的观点。他说：“有一些‘聪明人’居然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才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他说，党对那些脱离实际、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造成有害的混乱的空想家的错误作了纠正。

接着，赫鲁晓夫提出，在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同时，还要迅速地增加农业产量，扩大消费品生产。他说，第六个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使谷物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年产量达到110亿普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具体办法，就是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赫鲁晓夫的计划是，使前两年已经开始的垦荒运动，到1956年至少完成2300万公顷到3000万公顷的任务。平均每年从新开垦的荒地上至少得到20亿普特谷物。有了新开垦的土地上所出产的大量商品小麦，国家就可以大胆地扩大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玉米播种面积，使这些地区大大提高肉类、奶类以及经济作物的产量。

赫鲁晓夫在重申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开垦荒地的方针之后，强调要加强苏维埃法制。他说：“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法制稍微削弱一点，就会使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乘机进行他们卑鄙的破坏活动。”报告特别列举了“列宁格勒案件”，并说中央委员会决心采取恢复正义的措施，恢复那些被无辜判罪的人们的名誉。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后果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米高扬在发言中接着赫鲁晓夫的调子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米高扬还具体地批评了斯大林的观点，他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其中有一些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家知道的论点，这些论点对我们未必有帮助，未必是正确的。”这是自20年代末布哈林被批判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对斯大林的第一次公开批评。

2月24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中央委员会在它的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和结论。这是以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肯定了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此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大会的一切都按照预想在顺利进行。赫鲁晓夫的报告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应，但是他并不满意，他为这样一个思想所烦恼：“大会将要结束，大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无非是形式主义地走过场。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仍将使我们的良心不安，这些人包括第17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入中央委员会的2/3委员。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党员不是被枪决，就是被镇压了。”在波斯别洛夫委员会所看到的一切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当室内只有主席团的委员时，赫鲁晓夫鼓起勇气，又把在会议前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了出来，他对主席团的成员们说道：“同志们，我们对波斯别洛夫同志的发现准备怎么办？对所有被捕的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但对斯大林统治下的滥用职权行为却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我们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远不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是一些忠实的男女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十月革命，忠于列宁主义事业，一心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他们被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回来。”

赫鲁晓夫的话音刚落，休息室就像炸了锅一样，大家七嘴八舌地群起而攻之。伏罗希洛夫叫喊说：“你怎么了，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以为在代表大会上把这全部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消息会泄露出去，说斯大林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于是手指就要直接指向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自己充当的角色，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卡冈诺维奇也随声附和，用同样的调子激烈反对他。赫鲁晓夫心里明白，

他们之所以反对，并不是害怕对党的原则作深入分析，而是想逃避他们在过去的问题上应担负的责任。赫鲁晓夫沉着而冷静地回敬他们，他说：“即使从你们的出发点来看，我仍旧认为掩盖一切是不可能的。迟早会有人要走出监狱或集中营，回到城市，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同志们和家乡的每一个人。全国和全党将会发现，人们在监狱里花去了10年到15年的时间——所有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对他们的控告是捏造的！他们曾受过审问，对他们提出公诉的理由是捕风捉影地凭空想象出来的！同志们，我请你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想一想。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那些年代里党领导的一切行动。我们已经就斯大林逝世后一段期间里我们自己的行动作了说明，但作为斯大林在世时的中央委员，我们也应当讲讲那段时期里的情况。我们怎能装作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呢？”

“因此，同志们，我请求你们支持我。代表大会将近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散会以后，新释放的罪犯很快就将陆续回家，就要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人民。到那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当然要问：‘这怎么行呢？为什么在第20次党代表大会上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呢？你们是一定知道的。’他们问得很有道理，我们将无言以对。要说我们不知道，那是谎言。我们手头有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我们知道一切。我们知道党内有过高压统治和专横统治，我们必须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代表大会。”

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几乎异口同声地喊起来：“我们将会受到责难！党有权要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我们那时也处在领导岗位，即使我们并不知情，那只是活该——我们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

赫鲁晓夫回答说：“如果你们考虑到我们党是以民主集中的原则作基础的，那么我们作为党的领导人就没有权利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之中有些人对许多事情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即人们只把要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别的事情你一概不必多管。于是我们就不闻不问。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处于这种地位。有些人是知情的，有些人甚至在这件脏事中插了手。可是，尽管我们各个人对这些事情应负责任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作为17大以来的一个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即使党认为在专横的做法被强加于党的那一段时期内所有领导人都应受到责备，也在所不辞。”

这时，一直在旁静观的莫洛托夫开口了，他说：“你可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伏罗希洛夫仍争辩不休，说赫鲁晓夫的设想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如果这样做，必然遭到党对主席团成员的愤怒。他反复他说：“是谁要我们这样做的？谁说我们应该告诉代表大会这些事情？”

赫鲁晓夫回答说：“没有一个人要我们这样做。可是，罪恶终归是犯下了，是不是？我们至少得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人民将会发现那些事情，那是必然的；如果我们闭口不说，他们以后问起我们那些事情来，那他们就已经是在审判我们了。我不愿意发生那样的情况，我也不愿意那样被动地承担责任。我宁愿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最后，经过协商，双方作了妥协。主席团决定：赫鲁晓夫不是在正式大会上，而是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一个专门报告，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

夫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赫鲁晓夫同意不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公开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而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后，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二个报告。

2月24日深夜11时至25日凌晨，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举行了一次未列入议程的内部会议，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书记贝鲁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被邀请参加，这是例外）。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有100名在30年代遭受迫害，现已恢复名誉、重返工作岗位的早年党的活动分子，这份名单是由赫鲁晓夫亲自审定的。大会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并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个报告即著名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开始时说：“现在我们要谈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的阶段变成了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报告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集体领导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斯大林破坏了这一原则。赫鲁晓夫说，集体领导是列宁为党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斯大林与列宁不同。他不是耐心地对人们进行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依靠集体从思想上影响的办法，而是用强迫的办法。他抛开了列宁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从思想斗争走上了强迫命令的道路，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恐怖的道路”。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却不征求中央委员、甚至不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个人崇拜的最大危害是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们遭受迫害。赫鲁晓夫讲道，当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剥削阶级基本上消灭、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斯大林采用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凡是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或者只是被怀疑有敌对打算的人，或者仅是受到诬蔑的人，都可以被加上这个罪名，对他们横施镇压，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都遭到破坏”。

赫鲁晓夫追述了30年代肃反运动的过程，指出：大规模恐怖行为的高潮是1937年，被诬告犯有反革命罪而遭逮捕的人数，1937年比1936年增加了9倍多。第17次党代表大会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遭到逮捕和枪决，占70%；出席17大的有表决权 and 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被逮捕，占一大半。赫鲁晓夫谴责国家保安机关使用严刑逼供，以获取虚假的口供；国家保安机关之所以敢于为非作歹，就是因为斯大林的支持。最最粗暴地破坏苏维埃法制，对无罪的人实行严刑拷打，以逼迫他们招供，这种行为是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崇拜使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受到不应有的严重损失。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独一无二的权力给卫国战争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战争爆发前，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不少非常重要的信息，斯大林都主观地予以否定，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希特勒开始军事行动前夕，斯大林又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提醒，忽视了德国逃兵的口供，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结果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数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歼灭了大量空军、炮兵、军事设施，歼灭了我们大量军事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使我们处于无法防止敌军深入国境的局面”。肃反运动摧残了各级有指挥经验的

军事干部。

第四，个人崇拜阻碍了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战后时期，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他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将许多民族大规模地迁出其生息之地。所谓“列宁格勒案件”是伪造出来的。格鲁吉亚的明格尔民族主义组织案件也未经政治局讨论，中央决议是斯大林独自作出的。“南斯拉夫事件”是斯大林臆造和扩大起来的。“医生间谍案件”实际上什么“案件”也没有，只有季玛舒克医生的一封诬告信。

第五，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是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道：“个人崇拜达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百般地鼓励和支持对其个人的颂扬。”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归纳为：任性、专横、粗暴、傲慢、滥用职权、病态的猜疑、自我吹嘘和缺乏最基本的谦虚精神，等等。这些不良品质在列宁在世时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由于列宁的严肃批评，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还稍加检点，以后就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到他晚年已经达到今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结尾说，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有害方法，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而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所应当做的。

“秘密报告”进行了四个多小时，报告内容事先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查。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手里拿的仅仅是一份提纲。赫鲁晓夫形成文字的能力较差，平时从不亲自起草讲话和报告稿，他或委托写作班子准备，或向速记员口授，让助手加工润色成文。这一次报告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只能在波斯别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专案材料上即兴发挥。赫鲁晓夫的特点之一是，演说中的即兴发挥往往很出色。那些即兴发挥的部分总是他讲话中最精采的地方。据统计，在整个报告中有七次“暴风雨般长时间的掌声”。报告对于没有思想准备的听众来说，感觉只有一个——震惊，其中有几位代表由于身体不适，甚至被抬出了会场。

2月25日晚，赫鲁晓夫报告的速记稿经审定后打印成册。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来到克里姆林宫，看完速记稿后如数交回，他们被通知说不得做摘录，不得泄密。

然而，“秘密报告”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引起了全国的反响。在斯大林的故乡第比利斯爆发了一场骚乱。1956年3月，第比利斯人民群众为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举行集会。在中央广场，斯大林纪念碑前，格鲁吉亚青年高喊“打倒赫鲁晓夫！”“打倒布尔加宁！”“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集会很快变成了动乱。一些人准备占领中央电报大楼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结果与军队发生了冲突，伤亡数字无法统计，因为伤员大多被亲友掩护起来。

第比利斯事件使赫鲁晓夫决定将“秘密报告”部分内容在全国的党的积极分子中间传达。从3月中旬开始，全国举行了数万次集会，市委和区委的负责人在会上宣读统一印发的报告材料。接着，又在工厂、商业机关及其他基层组织的党员会议上传达。最后，报告在全国已家喻户晓。

“秘密报告”很快又在外国传播开来。6月初，美国《纽约时报》在世界上最先刊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又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发行。

于是，赫鲁晓夫的名字连同他的“秘密报告”一同闻名于世界。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情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本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如今出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口，在全世界仍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美国报刊公布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要求苏共中央就报告是否属实作出公开答复；如果属实，他们还要求说明，报告中谴责的那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瑞典共产党机关报《新日报》6月20日发表社论说：“尽管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比保持沉默好，因为沉默会使各种各样的解释、形容和诬蔑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不知道苏共为什么不让全世界得到赫鲁晓夫的演说的权威文本。”

英国共产党在4月1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苏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问题发表一个公开声明。6月22日，英国《工人日报》刊登了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声明，对苏共中央没有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问题发表公开声明表示遗憾，声明说：“发表公开声明本可以使各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忠实朋友充分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所牵涉到的一切。我党没有收到关于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任何正式文本。”

美国共产党也于1956年6月25日发表声明说：“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本应主动发表这篇演说。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所谈到的问题，不管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恶，完全是苏联共产党内部的事情。我们不能同意把犯下这样严重错误的原因完全归于一个人。把所有的错误和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行为都归于一个人同把苏联社会主义进展中的一切成就和伟大成绩归于一个人一样，都是错误的。”

除了对苏联共产党的抱怨之外，不少国家的共产党还提出要根据各国特点，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应有多个中心。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出：意大利要规划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继续探求和实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大利道路。陶里亚蒂还说：“由于制度的复杂性，产生了不止一个中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再也不能谈论唯一的方向，而应该谈论根据不同的道路而取得的进展。”对于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陶里亚蒂说：“苏联的模式已经不能并且也不应该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在共产党统治的每一个国家，必须使客观条件、主观的条件和传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运动的组织形式中产生它们的影响。”6月24日，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会议上再次强调：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经验，不能解决其他国家共产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个人崇拜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生活中作为一种生活准则结束了；“秘密报告”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摆脱了斯大林的某些教条、僵化思想的束缚；以斯大林模式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以苏联共产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时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

然而，“秘密报告”产生的副作用随之而来。东欧一些共产党国家出现了政治危机。

在保加利亚，维尔科·契尔文科夫被免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以托多尔·日夫科夫为首的新领导释放了全部政治犯，为无辜受审并已被处决的共产党人平反，宣布对待拉伊乔·科斯托夫的假审判案为非法审判，并给科斯托夫追授了英雄称号。

在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

事件的起因还得从斯大林时期说起。1948年苏南冲突后，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不同意苏共和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采取的极端措施，被撤销职务，关进监狱。此后，党的第一书记贝鲁特在经济上、政治上一味照搬“斯大林模式”，采取了一系列不切合波兰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错误的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波兰国内在政治上大搞阶级斗争，对宗教活动横加干预，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苏联控制波兰的大国主义行径，又严重损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尊严，群众的不满情绪在滋长。政治上的不满，思想上的混乱，经济上的困难，以及贝鲁特在苏共20大期间突然病逝，使波兰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出现了动荡。

波兹南的大罢工是从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开始的。该厂在波兰是生产较好的工厂之一，有12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1.3万名职工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就有4600人。1956年1—5月，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没有完成计划，致使工人的报酬连续下降，1956年的工资甚至比上年还低20%。尽管工人们长时间的抗议，仍没有给予解决。

1956年5月16日，策盖尔斯基工厂的职工代表在厂内同党中央代表会见。当天的厂报《斯大林卫士》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批评工厂的失误和缺点。工人们提出了增加工资、降低税收等经济要求。对此，工厂无权决定，立即与机械工业部和党中央联系。工人遂即发出请愿书，并选派代表团前往华沙。6月11日，在工厂领导与省的负责人会议上，有人对工厂积极“带头闹事”的人组织集会，提出“无理”要求及给党中央写信等行为发出责难。于是，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于6月21日开始停工举行集会，声称如不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就将举行罢工和上街游行。消息立即传遍了波兹南其他各厂。6月22日，在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和省人民委员会主席会见时，当局代表再次斥责所谓的“挑衅分子”企图在波兹南“冒险”，会见气氛异常紧张。6月23日，该厂约3000人在食堂自发集会，要求答应工人的要求，否则就要上街游行。与会者推选了27人组成工人代表团到华沙与机械工业部部长交涉。机械工业部同意考虑代表团的有关要求（减少税收可以考虑，但增加工资不行）。代表团返厂后，由波兰党、政、工会负责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也前往波兹南，以便就地解决各厂提出的问题，平息工人正在高涨的不满情绪。

6月28日，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工人们得知当局不答应代表团的的要求，群情激愤，走出工厂向斯大林广场进发。波兹南其他工厂的工人和沿途不少群众也自动加入队伍，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游行队伍高唱《波兰没有亡》的国歌和《上帝给了波兰什么》、《我们要上帝》等宗教歌曲，高呼“提高工资”、“降低税收”等口号，队伍的大标语上写着：“面包和自由！”在队伍中还出现了政治性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滚出去！”“俄国佬滚出去！”“我们要自由的波兰！”“我们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在省委大楼，还出现了“这是雇佣大楼！”“杀死叛徒”等标语。

示威群众冲向市人委大楼，打碎玻璃窗和电灯，破坏办公室，冲散前来的民警队伍，把列宁的肖像和红旗扔到大街上，抢劫食堂，打伤工作人员。另一部分人则进攻省民警局大楼。上午9时50分左右，从省邮电局开来一辆广播车，以便更好地指挥示威群众。示威群众和省市领导人都抢着到麦克风前讲话，其中一名上台讲话的领导人被推下讲台并遭毒打。个别煽动分子进

行蛊惑人心的演说，声称在波兹南完成了革命，应到克拉科夫、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等地去，要求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现政权。这时出现了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口号。有人乘机高呼“到姆温斯卡大街去！”“释放政治犯！”“捣毁监狱！”

游行队伍在广播车的带领下来到了监狱，高喊“我们受压迫受够了”、“释放无罪的人”等口号，并向监狱岗楼投掷石块、铁棍和竹杆。卫兵企图用水龙头阻挡进攻的人，但没有成功。部分青年沿着绳梯翻墙进入院内，打开了大门。游行队伍一拥而入，用铁棍撬开牢房，放出犯人。示威者在囚犯的参与下大肆抢劫和破坏，并抢得卡宾枪等武器弹药。

还有一些人占领了检察院和法院，把档案抛到街上焚烧。接着，游行队伍开始向省公安局聚集。在示威者向公安局冲击时，省公安局局长德沃拉克下令用消防龙头反击。公安人员先向空中后向示威者脚下开枪警告，不少群众被误伤。示威者包围了大楼，用从墙上挖出来的石头和砖头砸门窗；他们占领了汽车库，往楼房内扔装有汽油的啤酒瓶。在双方的对峙中，很多妇女儿童受伤。

附近的装甲兵和机械化部队学校在省公安局的要求下，派出40人在三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开向省公安局。

波兹南市民盼望最高当局早点作出决定，以结束这场悲剧。但从华沙传出消息说，在监狱被捣毁、省公安局等处被进攻的情况下，政治解决已不可能。波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向波兹南派出中央党政代表团（其中有总理约·西伦凯维兹、党中央书记耶日·莫拉夫斯基和国防部副部长斯塔尼斯瓦夫·波普瓦夫斯基大将）。但他们去的目的不是为了政治解决冲突。他们到达波兹南机场后，迅速组成了军事司令部。两个装甲兵团接到命令，于当晚开进波兹南。晚上，第19坦克师和第10苏台德坦克师也开进了波兹南。他们在市内遭到枪击和燃烧瓶的袭击。示威群众从古城堡的塔楼上、波兹南大学大礼堂、大学生宿舍里向坦克射击。部队开炮向被包围的持枪示威者还击。大批警察部队也参加了平乱活动。枪声一直延续到29日凌晨。

此外，还有两个军和公安部队开到波兹南城郊待命。

波兹南事件中死亡74人，伤575人。伤亡者青年居多。

波兹南事件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第一次出现的工人阶级抗议自己政权的行动。波兹南事件推进了党政民主化的进程，为哥穆尔卡的复出创造了条件。

波兹南事件平息后，波兰党政领导人及时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并于7月召开了党的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扩大工人权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及提高人民生活的措施。全会决定给哥穆尔卡恢复名誉，让他重新出来工作。这些措施使国内政治局面趋于稳定。

消息一传到莫斯科，赫鲁晓夫马上意识到这表明哥穆尔卡已在波兰东山再起。当时，波兰工人还在游行罢工，集体农庄纷纷解体，哥穆尔卡的复出对事态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这对苏波关系又会带来些什么影响？赫鲁晓夫立即安排苏联党政代表团准备访问波兰。为适应谈判需要，中央主席团任命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组团前往，随团前往的还有10名陆军上将，时间是10月19日。

由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是“不请自来”，是企图阻止哥穆尔卡的复出，因而华沙机场不准飞机降落。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小时后称油已耗完，波方才准许降落。波党中央委员会派奥哈布和哥穆尔卡等前往机



场迎接。在机场，双方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赫鲁晓夫一下飞机就对波兰人不客气他说：“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血，而有人却企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绝办不到！”

哥穆尔卡毫不示弱地回答说：“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出卖任何人。”

赫鲁晓夫把脸转向说话的人，气哼哼地问奥哈布：“他是谁？”

不等奥哈布回答，哥穆尔卡就回敬道：“我就是被你们关进监牢三年多的哥穆尔卡！”

赫鲁晓夫恼怒地质问奥哈布：“他来这里干什么？”奥哈布左右为难地告诉赫鲁晓夫：“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他为第一书记。”

奥哈布以往一直站在亲苏的立场上，但现在看到形势变成这样，就有些退缩了。

在从机场前往市区的途中，双方仍在争论。赫鲁晓夫要求直接前往波党中央全会会场，结果被哥穆尔卡等人婉拒。司机把汽车开往国宾馆——贝尔凡德尔宫，苏共代表团被安排在这里下榻。贝尔凡德尔宫是一座古老宏伟的建筑，曾作为俄国沙皇驻波兰总督、尼古拉一世之弟康斯坦丁的官邸。波兰人的这一安排，也许有某种象征意义。

赫鲁晓夫等人到达后，一放下手提包，就立即开始与波兰政治局举行会谈。

波兰方面出席会谈的是奥哈布、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萨瓦茨基。会谈是在充满怨恨和尖酸刻薄的气氛中进行的。赫鲁晓夫首先拿奥哈布开刀，指责他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早点把哥穆尔卡释放出来，因此他应对整个局势负责。

奥哈布十分委屈地为自己辩护说：“你为什么要攻击我呢？我是完了。我不能再做什么事了。”

接着，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又指责波兰领导人“盲目地仿效南斯拉夫”，哥穆尔卡回答说：“我们并未仿效任何人，我们在走我们波兰自己的道路。”在谈到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哥穆尔卡说：“这种关系应建立在国际工人团结、相互信任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帮助、相互友好的批评基础上……这样才能解决所有争端。在这种相互关系中，每一个国家应拥有充分的独立和自主，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应该得到完全的尊重。我曾经说过，过去应该是这样，现在也必须这样。遗憾的是，在过去，我们同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苏联的关系却常常不是这样。”

会谈进行中，赫鲁晓夫接到苏驻波大使馆的报告，说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者表示支持哥穆尔卡。赫鲁晓夫便与同机来的华沙部队司令科涅夫以及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一起商量，并命令科涅夫元帅调动靠近德国边境驻在波兰西里西亚的苏军向华沙挺进。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时，几乎所有通往华沙的道路都已处于波兰公安部队的控制之下。负责公安部队的瓦·科马尔将军当时就坐在哥穆尔卡旁边，他向哥穆尔卡报告了苏军调动的情况。华沙盛传苏军调动的情况，甚至说苏联坦克已开到华沙城下。赫鲁晓夫这时对会谈的波兰人威吓道：“华沙已被包围。”哥穆尔卡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刚刚接到一个报告，说你们的一支部队正在向华沙移动，我请求——我要求——你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并返回他们的驻地。否则将会发生一些可怕的和不可逆转的事情。”哥穆尔卡当场对

苏联人宣布，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谈判。如果苏军不撤走，会谈将停止。他宣称，如苏军不解除包围，他将立即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呼吁。赫鲁晓夫说：“这里一定有误会，你得到的情报不准确。”哥穆尔卡神情紧张地走出去，几分钟后又走回来，非常激动他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我现在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你们的坦克在移动。”赫鲁晓夫知道，哥穆尔卡已经核对了情况，再坚持下去，很可能出现僵局。赫鲁晓夫明白，哥穆尔卡与贝鲁特和奥哈布不是一类人，这是一个在监狱中受过磨难、静思过三年的人，他的骨子里有一股倔强的不畏强暴的力量，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想到这里，赫鲁晓夫只得向科涅夫下令停止前进，但不是让坦克返回驻地，而是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暂时打乱行军的队形。同时也把这项命令传达给罗科索夫斯基。

赫鲁晓夫被迫下了命令之后，心中十分恼火，便迁怒于哥穆尔卡。他对波兰人说，若想会谈顺利进行下去，最好请哥穆尔卡离开会场，因为他是“局外人”，不能代表波兰统一工人党。这时，西伦凯维兹回敬道：“哥穆尔卡是代表党和全国讲话的。”西伦凯维兹的回答让赫鲁晓夫吃惊不小，甚至有些糊涂了。在他眼里，西伦凯维兹虽然身居总理高位，但威信却不高。在贝鲁特去世和奥哈布升任第一书记之后，波兰领导层曾提出解除西伦凯维兹职务的问题。由于赫鲁晓夫的插手，他才得以保住职位。在那次谈话中，赫鲁晓夫还记得当时是这样对他们讲的：“你们应当记住，你们在战后之所以能够掌权，完全是因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两党合并的结果。西伦凯维兹同志代表社会党人，如果你们把他推开，就会破坏这个联合，并使统一工人党中的大部分人离心离德。而且，我个人认为西伦凯维兹同志是无愧于部长会议主席这一职位的。”

对于他的话，仍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争辩说，西伦凯维兹是个坏人，他有一些弱点，等等。赫鲁晓夫还是以他演说家的才能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地位让他们服从了，他对他们说：“同志们，你们应当理解，如果他看来有些优柔寡断，那只是由于他缺乏自信；他感到得不到你们大家的支持。还有一点，如果你们撤换西伦凯维兹，那么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将会带来很大损害。”

赫鲁晓夫当时说这一席话，还有其他的考虑。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同波兰一样，也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党人一直认为，共产党人之所以与社会党进行合并完全是为了本党的利益，因为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他们就不能取得多数；而共产党的地位一旦稳固之后，他们就把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伙伴一脚踢开。赫鲁晓夫不愿意让西方的这一说法得到证实。因此，赫鲁晓夫认为，西伦凯维兹的去留，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情。

在赫鲁晓夫的劝说下，西伦凯维兹最后保住了职位。

西伦凯维兹尽管不知道他未被免职的幕后情况，但为了保住他的职位，赫鲁晓夫是做了工作的这一点，西伦凯维兹总该是知道的吧。仅仅因为这一点，西伦凯维兹也应该站在亲苏立场上，帮赫鲁晓夫说话。真没想到他居然明显地站在哥穆尔卡的一边。难道哥穆尔卡的威望真有这么高吗？

西伦凯维兹的话音刚落，赫鲁晓夫还没有回过味，刚才还唯唯诺诺、不敢与赫鲁晓夫正面交锋的奥哈布也作了同样的表示。

赫鲁晓夫知道，他们两人的态度的变化，完全是因为苏军的推进，这一消息已唤起了两个亲苏分子的民族感情。在民族利益面前，一切成见，一切隔阂都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感到了自己的草率与鲁莽，他感到自己的防线开始坍塌……

西伦凯维兹接着又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

这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所有波兰人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如果再争吵下去，便用不着哥穆尔卡说话，所有的波兰人将用同一口径回答。武力威胁已犯了众怒。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为了缓和气氛，便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同意哥穆尔卡进入政治局，但要求不把罗科索夫斯基排除在外。罗科索夫斯基尽管生于华沙，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1918—1920年他参加了苏联国内战争，并加入了俄共（布）。他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41—1945年曾率领苏军参加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大会战以及白俄罗斯、东普鲁士、柏林等战役。他指挥过波兰第一军和其他波兰部队，1944年获苏联元帅称号，1949年才回到波兰，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波兰人的眼中是苏联人，至少是苏联在波兰的代理人。尽管他没有做什么对波兰不利的事情，但在波兹南事件之后，全国上下都有一股反苏情绪，此时他的留任无疑是很困难的。

西伦凯维兹对此回答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已公布于众，这个新名单是不能取消的。”

与此同时，华沙的广大群众在双方会谈的地点贝尔凡德尔宫外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以支持和声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准备自卫和抵抗苏军入城。工厂沸腾了，特别是华沙“热兰”小汽车厂，许多高等院校也沸腾了。工人们还选出自己的代表到军队中串连、做工作，呼吁他们支持哥穆尔卡，支持民族独立。“热兰”小汽车厂的工人用自己厂的汽车随时向党中央报告各地苏军的动向。公安部队根据科马尔将军的命令，守卫着八中全会的会场，把守着通向华沙的各条要道，一方面监视苏军进入华沙的动向，另一方面准备发生武装干涉时进行抵抗。其他部队也做好了保卫中央委员会的准备。华沙周围的郊区和工厂也把群众组织起来。首都四周的16个大企业的临时民兵在周末也不回家，坚守岗位值班，随时准备通知工人向城里进军。华沙市委第一书记斯太凡·斯塔舍夫斯基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派市委的一些“演说家”深入工厂和大专院校劝告群众不要主动挑衅，以免苏军借口出兵干涉。总之，大多数工人、学生和波兰军队指战员都站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一边，支持中央委员会，反对苏军的干涉。

面对波兰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赫鲁晓夫考虑再三，决定让步。他对波兰人说，你们选什么人进政治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要求发一个重申波苏友谊的公报。占了上风的哥穆尔卡则回答说：“那是没有意思的。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哥穆尔卡就连这个台阶也不给赫鲁晓夫下。此前，罗科索夫斯基告诉赫鲁晓夫，他已经指挥不动波兰军队了。赫鲁晓夫硬着头皮命令科涅夫将进行“军事演习”的苏军撤回出发地。

紧张的会谈进行了几乎一昼夜。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将于近期内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继续进行会谈。

为使赫鲁晓夫安心回国，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保证，波苏友好是波兰对

外政策的基础，只要苏军撤退，使波苏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波兰将仍然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内。他说：“同苏联相比，华沙条约更符合波兰的切身利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波兰更关心华沙条约的巩固。”他还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胜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

哥穆尔卡的讲话，使双方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同时也打消了赫鲁晓夫的疑虑。

赫鲁晓夫最后代表苏共中央向波兰领导人表示：承认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领导体制；同意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承认波苏贸易中的不平等行为，同意予以补偿。

波兰“十月事件”平息了。

翌日，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离开华沙回国。

## 第八章

### 多事之秋

1956年的金秋10月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并不美好。在他眼里这是个多事之秋。波苏会谈刚一结束，在东欧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长期以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按照苏联的模式处理国内事务，并把苏联对匈牙利的意见都当做至高无上的指示。

1948年苏南冲突后，拉科西按照苏联的要求，在国内发起了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以防止民族独立的倾向。1950年前后，匈牙利肃清“铁托分子”的运动达到了高潮。在这股潮流中，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英雄，匈牙利国内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袖拉伊克·拉斯洛被戴上了“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霍尔蒂警察局的特务”、“南斯拉夫间谍”的帽子，于1949年9月24日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同时遭难的还有帕尔菲·久尔吉、瑟尼·蒂博尔等领导人。当时全国的“铁托分子”和“拉伊克分子”达20万之多。随后，拉科西又提出了“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清查运动。许多当年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出生入死的党员干部，包括地下斗争时期参加党的活动的将军，都成了清查对象。在党外，大批的作家、记者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或被处死或被判重刑。1953年春，全国被关押人数达到15万。

拉科西在1944年9月随苏联红军来到匈牙利之前，只有1918—1919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匈牙利，其余时间不是在监狱就是在苏联度过的，因此他对匈牙利的国情十分陌生。

在经济建设中，匈牙利以苏联为榜样，实行了以行政命令为主的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制定了发展钢铁工业的庞大计划，号召把资源贫乏的匈牙利变成一个“钢铁国家”。这一做法的结果使得农业生产备受冷落，一方面对农业的投资减少，另一方面无法向农业提供农业机械和消费品。在行政管理上，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实行带有强制性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随意提高交售指标，任意压低收购价格，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一五计划”时期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

农业生产的低下使轻工业得不到大量的农产品作原料，再加上对轻工业投资比率的下降，直接影响了轻工业的生产。这一时期内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大大地下降了。

这样一来，从1951年到1953年，国民经济恶性循环，生产的各项计划指标均未完成，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就在匈牙利经济处于全面危机的困难时刻，苏联不但没有给予帮助，反而向匈牙利索取了两亿美元的赔偿。经济困难的匈牙利只能靠农副产品、牲畜和金属原料来偿付巨额的赔款，使得本来就供不应求的农副产品更加短缺。

苏共20大以后，匈牙利国内要求克服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经济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3月，布达佩斯的新闻记者、作家、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党员干部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选出由20人组成的执行局，其中13人是党员。3月底，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很多人发言指名批判拉科西和格罗，表示拥护上任两年便被拉科西赶下台的纳吉的改革政策。6月27日，为纪念1953年纳吉任总理时实施“六月新政策”

三周年，俱乐部举行了辩论会，听众达 6000 多人。会上介绍了 1955 年拉科西将纳吉赶下台的经过，激起广大听众的强烈反响，全体起立，一致要求恢复纳吉的党籍和工作。拉科西认为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必须给予坚决打击。党中央通过决议，指责裴多菲俱乐部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宣称要严惩“集合在纳吉周围的右派分子”，并准备逮捕一批人。拉科西的高压政策使得人民群众深为不满，政局进一步动荡。这一切让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深感不安。赫鲁晓夫深有感触地慨叹道：“斯大林治理时，人人都听话，没有震荡。现在，他们上台了，就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先是波兰，接着就是匈牙利。”

7 月，赫鲁晓夫派米高扬赴匈牙利进行干预。在苏联的压力下，7 月 18 日，拉科西被迫辞去了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格罗接任第一书记。刚从狱中放出来的卡达尔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米高扬要纳吉出来共同合作，稳定局势。

然而，拉科西下台后，格罗对其错误路线并未进行公开揭露。这一切都表明，匈牙利仍然在过去的道路上徘徊。

10 月 4 日，纳吉给党中央写信，要求重新审查他的问题，恢复其党籍。党中央对此置之不理。

纳吉是在 1953 年 6 月中央扩大会议上接任拉科西总理职务的。他上任后，根据中央扩大会议精神，提出了“新阶段的新政策”，强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他主张调整农、轻、重比例，贯彻自愿入社原则，允许农民退社、发展私人小企业，实行对外开放，满足教会的正当要求，加强法制建设，关闭集中营等。“六月新政策”对克服匈牙利的困难起了积极作用。但拉科西和格罗却制定了一个所谓“合理调整计划”与之对抗，同时收集纳吉“材料”，向苏共领导人报告，指责纳吉的政策使匈牙利面临危机。随后，在 1955 年 3 月和 4 月的两次中央全会上，拉科西指责纳吉有个人野心，搞派别活动，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阻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鼓动农民退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并因此撤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当年 12 月，纳吉因“纠集反党集团”、“搞分裂活动”的罪名，被开除出党。

对于纳吉的请求，以格罗为首的党中央置之不理。这时，舆论界要求为清洗“铁托分子”运动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裴多菲俱乐部为拉伊克冤案举行了专题讨论会。拉伊克夫人在会上进行了演说，披露拉伊克受害的经过，并讲述自己在狱中六年的悲惨遭遇。在场听众无不为之震怒。讨论会把要求平反的斗争推向了高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格罗下令释放了 300 多名“铁托分子”，并为拉伊克平反。10 月 6 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为拉伊克等 4 名被害的领导人举行了国葬仪式，布达佩斯 30 万群众自动上街列队为死者致哀。这次活动成了向拉科西—格罗错误路线示威的行动。此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活动，掀起了平反热潮。10 月 13 日，格罗被迫下令逮捕判决拉伊克死刑的前国防部长法尔卡什及其儿子，恢复纳吉的党籍，但已无法平息群众的不满。而格罗这时却看不到国内日趋严重的形势，忙于出国向盟国的领导人去解释新领导班子的良好愿望。党的代表团先后出访了中国、苏联和南斯拉夫，10 月 23 日清晨才从南斯拉夫返回。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仍无视国内紧张的局势，断然否决了布达佩斯大专院校学生团体联席会议所作出的 10 月 23 日举行声援波兰的示威游行的决定。

10 月 22 日，裴多菲俱乐部向中央提出 10 点要求。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也

向政府提出了 16 点要求。这两份要求的共同点是：调整与苏联的关系，反对苏联的控制和干涉，争取民族平等和独立；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清算拉科西时期的错误和罪行，改组党政领导。

10 月 23 日中午，由大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游行有秩序地进行着。学生们散发了学生联合会向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6 点要求”，游行队伍在裴多菲广场和贝姆广场举行了简短的仪式，然后分成两路，一路到国会大厦请愿，另一路向匈电台进发，要求电台广播“16 点要求”，游行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市民、军人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队伍到达国会大厦时，人数已达 20 多万。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工人学生团结紧，匈牙利人一条心”，“错误我们已经厌烦，新经济政策赶快实现”，“苏匈友谊——平等、自由”，“让纳吉出来执政”等口号，也有人喊出了“俄国佬，滚回去！”在电台大楼前，由于电台负责人不同意广播“16 点要求”，双方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

到了晚上，格罗似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晚 8 点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人民的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的关系……我们是爱国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因此我谴责那些在青年中散布沙文主义的毒素、利用我们的国家给予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来煽动民族主义性质的示威游行的人们。”格罗的讲话无异于火上浇油，事态更加扩大。

当天晚上，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改组了政治局。纳吉和他的一些支持者，如洛松齐·格佐，进入了政治局。纳吉本人还被迫答应出任政府副总理。前总理赫格居斯留任总理，格罗仍是党的第一书记，掌握着实际大权。当天夜里，格罗就向苏联提出了出兵的请求。24 日凌晨，苏军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在苏军的坦克面前，匈牙利人民感到莫大的侮辱。游行群众同保安部队的冲突，立即转变为匈牙利人与苏联军队的冲突。匈牙利全国最大的“兰帕尔特”兵工厂的工人把工人们和工人区的许多居民武装起来，军官学校的学生们把武器分发给群众，甚至城市边的有些兵营也打开了他们的军火库。大批军人，包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及陆军的四个团站在示威群众一边同苏联坦克展开了斗争。

这一天，赫鲁晓夫派遣米高扬、苏斯洛夫到达布达佩斯，同匈党领导人讨论当前的时局。此时上台的纳吉实际上已经无法行使正常的领导职责，党政机关已经瘫痪，群众自发建立了工人委员会、民族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等政治组织，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纳吉为使局势稳定下来，于当天下午发表了《告匈牙利人民书》，呼吁停止冲突，恢复秩序。他说，“今后将按照 1953 年 6 月决议精神拟定新的纲领行事。”纲领的要点是，对匈牙利的社会生活实行广泛的民主化，根据匈牙利的具体特点建设社会主义，并从根本上改善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他的呼吁毫无效果，格罗控制下的保安部队和苏军坦克正在与布达佩斯的市民及站在群众一边的部分匈牙利现役军人和警察部队激战。首都街道上的一切交通都中断了。国内外反动势力乘乱破坏，杀害劳动人民党员和无辜的士兵，流血事件不断扩大。

下午 2 时，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乘坐一辆装甲车来到匈党中央所在地。他们对格罗进行了指责，说他是“跛脚的政治家”，没有按照“20 大”精神制定新的政策，不听从苏联的劝告去同纳吉和解，他的广播演说不但未能平息事态，反而激怒了人民，等等。他们抱怨格罗对于形势作了“夸大”和“歪曲”

的报告，使得莫斯科匆忙作出了派兵进入布达佩斯的决定。这时苏共中央已经意识到格罗的存在只会使问题更加尖锐化，决定改组匈党中央。10月25日下午3时12分，新上任的卡达尔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了匈党中央的最新决定：免去格罗匈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卡达尔接任，纳吉主持匈牙利政府的工作。

卡达尔在广播演说中还指出，青年的正当和平游行被反革命分子引上了武装进攻人民政权的道路，号召运用一切手段打败反革命武装进攻。这时，米高扬与纳吉举行了会谈，要求采取武力措施迅速镇压暴乱。但纳吉仍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拒绝了苏联的要求。

事态进一步恶化。

10月27日，苏军控制了布达佩斯局势，形势有所好转。但纳吉对局势缺乏清醒的估计，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反革命势力，相反却作出了向反动势力让步的决策。28日，纳吉政府声明取消国家保安局，成立有暴动者参加的公安军，并要求赫鲁晓夫将苏军撤出布达佩斯。29日，米高扬等人再次来到布达佩斯，带来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表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指出匈牙利事件中人民要求纠正错误是正确的，但反革命分子混入运动，企图复辟资本主义。30日，苏联政府正式公布上述宣言，并宣布苏军撤离布达佩斯。当天下午，纳吉宣布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然而，新政府已经控制不住局势，加上苏军撤离，反革命势力如脱缰野马，“剑与十字”、“白色卫队”、“血盟”等250多个不法组织大肆进行破坏活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通过“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进行煽动，并加紧向匈牙利派遣特务，运送武器。大批流亡分子也由奥地利拥入。与此同时，政府释放了一万多名刑事犯和政治犯，这些人出狱后大多拿起武器屠杀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刚被释放的红衣主教明曾蒂成了反动势力的领袖，他宣布不承认纳吉政府，要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建立新制度。30日这天，武装叛乱发展到最高潮，暴动者攻占了布达佩斯市委机关，杀害了市委书记和守卫大楼的27名保安人员。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屠杀共产党员，捣毁党政机关，把死者倒挂在树上示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反革命势力已在运动中起支配作用，致使十月事件向反革命性质转化。

莫斯科方面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匈牙利事态的发展。中央主席团天天在开会。为了进行协商并协调行动，赫鲁晓夫向毛泽东请求派人来一起讨论匈牙利局势。毛泽东答应了赫鲁晓夫的要求，刘少奇奉命飞到了苏联。

在斯大林别墅中，双方商讨了一夜。会谈中间，刘少奇多次与毛泽东电话联系。最后，赫鲁晓夫同意了刘少奇不以武力解决的建议。

赫鲁晓夫安排刘少奇休息之后，回到自己的住处，但久久不能入眠。在这必须作出明确抉择的历史性时刻——两种决定都有危险。尤其令他忧虑的是，匈牙利共产党的改组和联合政府的建立将会引起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连锁反应，以致纷纷与苏联分庭抗礼，使国内反对派可利用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来向他发难……

次日早晨，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全体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报告了同中国代表团讨论的结果是不使用武力。接着，他又讲了自己的担心。会议开了很久，最后通过了另一个决定——使用军队“帮助”匈牙利的工人阶级。

赫鲁晓夫问科涅夫元帅：“整顿匈牙利秩序和粉碎反革命势力需要多少



时间？”

科涅夫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三天，不会再长。”

当时，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都认为，应当尽快了结这件事。

赫鲁晓夫急忙去向中国代表团通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但由于刘少奇已准备启程，所以主席团全体成员一起到了机场，双方在机场举行了会议。赫鲁晓夫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告诉了刘少奇。刘少奇回答说，此时无法同毛泽东通话，等他一到北京，就马上把中方的意见通报过来。

此后，赫鲁晓夫开始同东欧各国领导人协商。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在布列斯特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等进行了会谈，此后赫鲁晓夫又同马林科夫一起飞到布加勒斯特，同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捷克斯洛伐克的诺沃提尼进行了会谈，接着他又到索非亚同保加利亚领导人会谈。没有人反对进行军事干预。不仅如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还提出他们的军队是否也应该参加行动的问题。但赫鲁晓夫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他的理由是，根据波茨坦协定在匈牙利驻扎的军队足以平息这一骚乱。赫鲁晓夫甚至还开玩笑说，罗马尼亚人如此参战心切，是否因为他们过去参加过对 1919 年匈牙利革命的镇压。

在取得了东欧四国的同意之后，赫鲁晓夫飞往南斯拉夫。天气简直糟透了。飞机在狂风暴雨中穿行，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飞行。他紧张得一夜未睡。飞机抵达机场后，他又坐上一艘小艇向铁托所在的布里俄尼岛驶去。随同前往的马林科夫面色苍白：刚结束了一场令人心悸的飞行，现又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簸，对于平时坐车都晕的他来说，简直难以忍受。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匈牙利的形势瞬息万变，若不取得铁托的支持，事情不知向何处发展。

小艇载着忐忑不安的赫鲁晓夫与昏昏沉沉的马林科夫到了布里俄尼岛。

铁托在岸边迎接了他们。双方拥抱、亲吻。赫鲁晓夫向铁托直抒来意，并告诉他苏联准备向布达佩斯派兵的决定。

赫鲁晓夫本来准备进行一场困难的谈判，但使他意外的是，铁托表示赞同。他只问了一句：“苏军何时行动？”赫鲁晓夫告诉他，就在近期。

从 11 月 1 日凌晨起，纳吉的办公桌上有关苏军带着大量军用物资进入匈牙利国境、包围军用机场、控制铁路要塞的报告越来越多。这使得纳吉、卡达尔等匈牙利领导人十分震惊，因为就在昨天，他还在同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进行有关苏军撤出匈牙利的谈判。在谈判中，苏联特使还同意匈牙利进行自由选举，建立多党制政府以及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米高扬甚至还宣布，苏联政府和他本人都信任匈牙利领导人，他还担保，苏军不会再有新的部队进入匈牙利。纳吉立即召见了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1982 年继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向他询问此事。安德罗波夫答道：“不管表面上情况怎样，撤军工作仍在进行。”纳吉又向他问道：“如果情况确实如您所说，那么匈牙利北部和东部的一些村庄送来的报告说，有 7.5 万名左右的苏联军队和 2500 辆坦克正开进匈牙利，这是怎么回事？”安德罗波夫没有回答。当时，安德罗波夫或许是真的不知道。关于何时出兵一事，主席团会议并未作出最后决定。

当天下午，匈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苏联的做法已经解除了匈牙利对华沙条约的义务。据此，党向政府建议，匈牙利应退出华约组织，并宣布中立。”到了下午，从莫斯科又传来了苏联政府的照会：“苏联 10 月

30日宣言仍然有效；匈政府应指定一个委员会，授权它就退出华约所涉及的政治问题进行谈判；再派一个委员会谈判撤军的军事和技术的细节问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报告表明，苏军的军事调动更加频繁。

11月1日下午4时，纳吉通过广播宣读了“中立宣言”，并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呼吁承认匈牙利为中立国，要求苏联撤退军队。在这危急关头，卡达尔解散了已经瓦解的劳动人民党，成立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卡达尔当选为第一书记。在苏联的支持下，11月1日晚上，卡达尔等人于纳吉政府决裂，离开首都，苏军用飞机将卡达尔接到莫斯科会谈。赫鲁晓夫要求卡达尔组织新政府。11月2日，纳吉政府派代表团前往苏联总指挥部商谈关于苏军撤离问题，遭苏方逮捕。11月3日，在索尔诺克成立了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4日清晨，苏军向布达佩斯进发，纳吉闻讯后，便向全国广播，宣告苏军正向布达佩斯进攻，目的是推翻合法的民主政府。但是，这时的纳吉政府已陷入困境，它既抑制不了反革命势力的破坏，也阻止不了苏军坦克的推进。同日上午，卡达尔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宣布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并指出：“10月23日，在我国掀起了一个群众运动，其崇高目标是纠正拉科西和他的同谋所犯下的反党反人民的错误，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纳吉政府的软弱及钻入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日益得势，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的人民国家、我们的工农政权和我们整个祖国的生存面临危险。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匈牙利爱国人士建立了匈牙利工农政府。”他还宣布为了工人阶级和祖国的利益，请求苏军帮助粉碎反革命势力，待秩序恢复后即同苏联商议撤军问题。

11月4日凌晨，猛烈的枪炮声划破了静谧的夜空，苏军坦克的轰鸣声震撼着布达佩斯。

科涅夫元帅实现了他的诺言，确实只用了三天。

红衣主教明曾蒂逃往美国大使馆。

纳吉与其他政府要员躲进了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经交涉，纳吉于1956年11月22日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并立即被苏军逮捕。

匈牙利的这一场事变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相当于匈牙利一年国民收入的1/4；死亡约4000多人，受伤者达2万多人，外逃人数达20万以上。

匈牙利事件不仅使匈牙利受到了损失，还使苏南关系发生了新的分歧。

铁托在得知纳吉被捕的消息后十分气愤。他责成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立即就释放纳吉一事进行谈判。大使米丘诺维奇会见了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不愿进行任何谈判。铁托在了解到赫鲁晓夫的态度后，对苏联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抨击，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说。铁托在演说中分析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对苏联的出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一场悲剧。他特别指出，苏联人在20大谴责了斯大林的行为和他的政策，“但是他们错误地把整个事情当做个人崇拜、而不是当做制度问题。而实际上，个人崇拜是一种制度的产物”。铁托还认为，斯大林问题的根源“在于官僚主义的组织机构，在于领导方法和所谓的一长制，在于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

赫鲁晓夫对铁托的演说大为光火，通过塔斯社的一篇评论进行反击。他评论说，铁托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说成是“一定制度的产物”，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一种反动的言论。

由于铁托的演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展开了争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又趋于恶化。

赫鲁晓夫本想通过批判斯大林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进而削弱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为代表的保守派力量。但是，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后果却降低了他的威信，削弱了他自己的力量。在匈牙利事件平息之后，莫斯科和西方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苏联最高层将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将失去自己的职务。赫鲁晓夫将被任命为农业部长，马林科夫将再次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将领导党的工作。这些流言连赫鲁晓夫自己都听到了。

赫鲁晓夫的威望发生变化的集中反映是 1956 年 12 月党的中央全会。会前，赫鲁晓夫一再透露，这次会议将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他将在会上作主题报告。但是，12 月全会上讨论的是经济问题，而并非赫鲁晓夫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会上作报告的是巴伊巴科和萨布罗夫以及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而没有赫鲁晓夫。会议通过了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方针的决议和关于改进国民经济领导的决议。会议强调了国民经济领导工作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此决定，要大力改进计划工作，加强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制定计划工作中的作用，也就是要加强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所领导的机构的作用；同时还要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会议还决定，暂时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要增加住房建筑，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饮食方面的投资。这次会议的决议表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萨布

罗夫、别尔乌辛在中央的影响增强了，布尔加宁至少同他们采取了一致的立场。

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从三个方面着手来扭转危局。

第一，从谴责斯大林转向肯定斯大林。1956 年岁末，在迎接新年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当着 1000 多名客人的面宣称他“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就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彻底性而言，他是“斯大林分子，并以此感到自豪”。1957 年 1 月 17 日，赫鲁晓夫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说：“斯大林的名字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苏联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愿意像斯大林那样，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忠于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事业。”“但愿上帝保佑，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一样的战斗。”赫鲁晓夫在各种场合颂扬斯大林，试图努力改变他的反斯大林形象。

其次，从 1956 年 12 月起，借 1956 年农业的丰收来宣传自己。1956 年，苏联总共收获了 1.2 亿吨粮食，其中向国家交售了 5700 万吨。其他作物也获得了好收成，肉类供应也大大增加。赫鲁晓夫为此指示制造了数以吨计的勋章和奖章，亲自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去发奖，发表演说，渲染丰收的气氛，扩大影响，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这一丰收是他领导的结果。

第三个方面，就是接过口号，把已经开始进行的改进国民经济领导的工作抓到自己的手中。同几年前利用农业问题逼马林科夫下台、利用外交斗争排挤莫洛托夫一样，现在他又接过中央十二月全会关于改进国民经济领导、改进计划工作、扩大加盟共和国权力的决议精神，起草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筹备召开了 1957 年 2 月会议。他在报告中指出，目前由各个专业部管理工业和建筑业，不仅适应不了国民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而且存在本位主义的恶劣影响。因此要寻求更加灵活的管

理形式，要把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重心转到地方上，按地区原则管理。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拟定具体的建议。3月底，赫鲁晓夫提出的供最高苏维埃审查的提纲公开发表，交全民讨论。5月7日，赫鲁晓夫亲自向最高苏维埃会议作了报告。苏维埃通过了相应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一个经济行政区设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本区所属工业和建筑业。由于工业和建筑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因而相应地撤销了部长会议所属的28个专业部委。通过这次改组，不仅中央大部分机构都被撤销，而且把原来的“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委员会”和原来的“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委员会”合并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机关只对各经济委员会提出建议，而无权进行领导。部长会议被架空，工业的实际领导权通过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地方党委完全落在赫鲁晓夫手中。因此，工业改组便成为促成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联合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市召开的俄罗斯联邦西北地区各州自治共和国农业工作者会议上讲话时忽然提出一个口号：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产量方面赶上美国。尽管1956年苏联农业大丰收，但肉类按人均产量上只相当于美国的1/3。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三四年内实现这一口号。而这个口号事先未经中央讨论。赫鲁晓夫这一置中央委员会于不顾、随意发号施令的做法，终于使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忍无可忍了。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联合起来，要求召开主席团会议，正式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

1957年6月5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率苏联政府代表团离开莫斯科访问芬兰，在那儿逗留了一周多。赫鲁晓夫的外出对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来说不啻为天赐良机。他们将撤换赫鲁晓夫的行动计划部署停当。

6月14日，赫鲁晓夫结束了对芬兰的访问，返回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处成员都前往火车站迎接。在车站上，莫洛托夫告诉赫鲁晓夫，定于18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列宁格勒建成250周年的庆典安排事宜。赫鲁晓夫对事变毫无觉察。

6月18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如期举行。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会议开始后，并没有讨论什么列宁格勒建城纪念活动的问题，甚至连会议的主角，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科兹洛夫也未到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轮流登台发言，指责赫鲁晓夫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在经济政策上是“唯意志论”和一意孤行。他们认为垦荒运动是在“冒险”，把力量不适当地集中于具有冒险性的农业计划上，打乱了经济上的平衡，并且妨碍工业进步。他们称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是“右倾的农民路线”，并说马克思主义者一向以工业化为出发点，而现行的农业政策会使苏联人民对发展工业失去兴趣。他们还指责赫鲁晓夫过分揭露斯大林，动摇了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般运动中的威望。他们要求重新考虑苏共20大的所有决议以及所制定的国内外政策。莫洛托夫等人原以为此事轻而易举，因而已考虑好对赫鲁晓夫去留的处理方案：如果赫鲁晓夫承认错误，将给他一个较低的职务，例如农业部长；如果他死不悔改，就把他逮捕立案。由于在大多数人民心中，在构成中央委员多数的各州委书记当中，他的威望是很高的，因此，如果他下野后自由自在，会带来麻烦。赫鲁晓夫去职后，将由莫洛托夫

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马林科夫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谢皮洛夫升任外交部长。

会上，赫鲁晓夫断然拒绝了对他的一切指控。他为自己 1953 年至 1957 年期间的所作所为大加辩解，以自己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在激烈的争论中，他得到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的支持。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布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则结成了多数派，实力对比 4 : 7。在主席团候补委员中，情况则相反，除即得利益者谢皮洛夫外，全部支持赫鲁晓夫。候补委员福尔采娃为了拖延主席团会议的时间，故意作了一个长达六个小时的发言。

最后，主席团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主席团候补委员受委托起草了撤换赫鲁晓夫、改组党中央书记处的决议。莫洛托夫甚至要求将决议立即交塔斯社广播，并且在《真理报》上刊出。

赫鲁晓夫则拒绝服从主席团这一决定。他声明说，第一书记是由党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主席团选举的，因此撤换第一书记必须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决定，而不能由主席团来决定。他要求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莫洛托夫对他说，我们对中央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并不担心，但是主席团应当首先作出决定，而不必等到中央委员会之后再决定，因而开不开中央委员会并不重要。但是，这项决议没有付诸实施。他们过于相信了中央主席团多数成员所通过的这一决定。因为四年前，他们也是在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解决了有关权力分配的各种问题。然而，历史却没有重演。由于朱可夫和谢罗夫的不合作态度，逮捕赫鲁晓夫的方案宣告失败。

第二个失败还在等着他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撤消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在莫斯科的 21 名中央委员来到克里姆林宫，拥到主席团会议室外，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中央主席团对这一要求置之不理。于是中央委员们向克里姆林宫递交了书面声明。声明说：

我们，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已经得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一直在开会的消息。我们也知道，你们正在讨论有关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领导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党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若没有中央全体委员的参加，是不能决定的。对我们党的领导问题，我们中央委员会委员不能袖手旁观。

不过，声明还是不起作用。国家全部和军队开始发挥作用。谢罗夫利用情报网迅速通知所有的中央委员做好赴莫斯科的准备，朱可夫动用飞机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们接到莫斯科，效率非常高。在谢罗夫的率领下，中央委员们来到了主席团的会议大楼。主席团被迫接见中央委员会代表。不过，主席团认为，赫鲁晓夫已被撤职，应由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出面接见中央委员会代表。赫鲁晓夫则坚持说，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有权接见中央委员。米高扬表示支持，两人便一同跟了出来。

会见一开始，气氛便紧张起来。伏罗希洛夫一见谢罗夫便对他破口大骂，谢罗夫也毫不示弱，一把拽住伏罗希洛夫的衬衣领子，威胁说如果主席团反对召开中央全会，那么全会也可以不经主席团的认可便召开，因为中央委员

们决不允许秘密地决定党的领导人问题。这一威胁是很厉害的，布尔加宁等人完全没有料到。因为大多数中央委员已经到达了莫斯科并且态度坚决。主席团被迫召开中央全会。

苏共中央全会于6月22日正式开幕，会议一共开了7天。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苏斯洛夫被推为会议主席，向中央全会汇报了主席团会议讨论的情况。

第一次会议连续开了35个小时。全会听取了赫鲁晓夫题为《关于党内形势》的报告。全会也为莫洛托夫安排了讲话，使他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的国际地位》的报告。

赫鲁晓夫的报告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中央委员们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区的领导人都表示反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组成的三驾马车的领导。刚刚担任领导职务的年轻人更害怕恢复三四十年的集权体制。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的计划终于以失败而告终。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纷纷登台发言表示悔过。马林科夫也在发言中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要求收回原先的提案和决定。然而，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们都不同意，他们提出要揭露“反党集团”。

6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完全转到了揭露、批判“反党集团”这一议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进行了改组，全会撤消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会书记职务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的成员有：勃列日涅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朱可夫、伊格纳托夫、基里钦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和赫鲁晓夫。

中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责他们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形成“反党集团”。决议列举了他们的错误：反对党的路线，力图更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来的党的领导机构；反对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以及在立法方面的权力，并且反对加强地方苏维埃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的作用；在农业方面不承认有必要增加集体农民在扩大农产品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顽固地反对为消除个人崇拜后果、消除以前违反革命法制的行为以及防止这种事情重演提供条件的措施。

决议谴责莫洛托夫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改善苏南关系，反对缔结对奥地利和约，反对目前条件下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反对和平过渡，反对与其他国家政治领导人建立个人接触，等等。谢皮洛夫在会上被斥为“政治娼妓”。他被解除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接着，最高苏维埃也作出决定：解除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电站部部长的职务。解除莫洛托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监察部部长的职务。谢皮洛夫外交部长的职务由葛罗米柯接任。

卡冈诺维奇等人在政治舞台上绝非新手，他们深知“反党集团”一词对于他们的政治生命意味着什么。斯大林对付所谓的反党分子的做法，他们都是身临其境，甚至亲自参与过。如今他们也落到这般地步，其恐惧心理可想而知。

中央全会闭会两天之后，赫鲁晓夫接到了卡冈诺维奇打来的电话。卡冈

诺维奇在电话中恳求赫鲁晓夫宽恕，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您已经多年了。我恳求您别让那些人以他们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对待人们的方式来处理我。”

赫鲁晓夫回答说：“卡冈诺维奇同志，你的话再一次证实，你们曾经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你们曾经想把国家拉回到个人崇拜时存在的秩序上去，你们想镇压人们。你们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别人。可是，你们错了。我们坚定地遵守并将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如果你们能像全体苏维埃人那样诚实劳动的话，你们将得到工作，你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赫鲁晓夫遵守了诺言。“反党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更没有被处死，而是都被安排了工作。莫洛托夫的特长受到尊重，他担任了苏联驻蒙古大使。马林科夫被任命为哈萨克共和国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水电站站长，卡冈诺维奇则被派往彼尔姆州索利卡斯科著名的乌拉尔钾矿联合企业任经理。而谢皮洛夫则被派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当政治经济学教授。

“反党集团”被揭露后，在苏联社会上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赫鲁晓夫给他们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尽管是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惯用手法，但对他们的处理，比起斯大林时期对“反党集团”的处理来，要开明得多。可以说，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社会有了一定的进步，纠正和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弊端和政策。但是，正如铁托所言，问题在于制度。由于赫鲁晓夫并未改变斯大林的基本制度，个人崇拜仍然像个幽灵在苏联政坛游荡，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之后始终未能停息。

## 第九章

### 登上权力的顶峰

1957年的六月全会以后，取得胜利的赫鲁晓夫在布尔加宁的陪同下，安心地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后就去克里米亚休假。离上一次度假已经有九年的时间。这九年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浪，问题解决了不少，该好好休息一下，让身心在南方和煦的海风中得到松弛。按照预想，10月后还有几件大事要办。

赫鲁晓夫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长的职务。

作为一名国防部长，朱可夫比布尔加宁要称职得多。布尔加宁不是行伍出身，且对军事问题也不在行，但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却一直被提升，直至元帅。有些人运气就是这样好，布尔加宁就是个典型。他一生从来没有指挥过任何军队。而朱可夫身经百战，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屡建功勋，可圈可点的就有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作为一个职业军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光是只会执行命令，他在军队建设、适应现代化战争方面的设想也很有见地。比如，在精兵简政方面，他提出了限制司令员人数、削减军官的薪金、裁减军队以及规定军区司令的年龄，等等。这些建议都深得赫鲁晓夫的赞赏。

然而，一个人的优点发展到一定阶段则会引起别人的戒备，这就同一个人的权力过分膨胀，会引起更高层领导的不安一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朱可夫是苏德战场上众所公认的苏联最优秀的指挥员，然而战后却并未像布尔加宁那样受重用，而是被派到敖德萨和乌拉尔军区任职。原因无非是他的声望日隆、性格倔强。

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开始受到起用，从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一直到主席团正式委员。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令赫鲁晓夫不能容忍。另外一方面，对于他在逮捕贝利亚以及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三人的“反党集团”中的决定性作用，赫鲁晓夫不能不放在心上。他两次动用军队对赫鲁晓夫给予支持，他认为赫鲁晓夫是正确的，他这样做了。当莫洛托夫希望朱可夫给予帮助时，朱可夫曾断然拒绝，并说：“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不会动。”当然，当时幸亏朱可夫那样做了，否则，胜利的就绝不会是赫鲁晓夫了。可是，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朱可夫像对待莫洛托夫那样来对待他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会束手无策。朱可夫不只是个能征善战的将领，还是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赫鲁晓夫开始理解斯大林当时的处境。斯大林战后能那样对待朱可夫，还在于他身边有个贝利亚，还有他所控制的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部队。如今朱可夫的权力已不可与当时同日而语，而是权倾一方；其次，目前也没有一个能与朱可夫匹敌的贝利亚式的人物；更何况朱可夫的威望是以他的功勋为基础的，是坚实的、难以撼动的。总之，对这个人不能不防。

朱可夫成为主席团成员之后，主席团的其他一些成员不时地来找赫鲁晓夫，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赫鲁晓夫，是否看出朱可夫正在企图夺取最高权力。有人添油加醋地说，朱可夫在与军区司令的谈话中已流露出建立军政府的意图。苏联绝不能允许南美地区那样的军人政府存在。

“是的，”赫鲁晓夫对来人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



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

为了使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长职务一事做得较为顺利，赫鲁晓夫采用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所使用过的方法。确切地说，他是受到了莫洛托夫等人做法的启发。他将朱可夫遣到外地，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召开主席团委员会议，做出决定后，再举行会议让朱可夫到场后通知他。为此，赫鲁晓夫安排了朱可夫出国访问。在赫鲁晓夫从克里米亚回莫斯科的前两天，即10月2日，朱可夫去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进行长时间的访问。

赫鲁晓夫准备解除朱可夫的职务，并不是他整顿军队的第一个举措。在一年前，他已经解除了库兹涅佐夫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并将他海军元帅的军衔降为海军中将。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下大力气、花大本钱建造水面舰只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海军已不再是决定性的了，空军才是赢得胜利的关键力量。因此在军备建设上，必须集中力量发展防御性武器，发展将敌人水面舰只击沉的手段。

赫鲁晓夫对海军不像对陆军那样熟悉。一方面，他在战争时期很难与海军在一起配合作战；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机会去同海军熟悉，除非有特殊任务要同他们联系。赫鲁晓夫对海军重要人物的了解仅限于报纸、节日的观礼台和招待会，总之，非常肤浅。

他对海军开始有了较多的了解，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

1954年，赫鲁晓夫率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庆，回国途中在哈巴罗夫斯克作短暂停留，视察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所统辖的远东部队。库兹涅佐夫建议赫鲁晓夫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一下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海军基地的海军实战演习。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在库兹涅佐夫的陪同下登上一艘巡洋舰。在观看沿海防御行动时，赫鲁晓夫感到不快：鱼雷快艇在近距离发射时，尽管硝烟滚滚，震耳欲聋，但却无一击中目标，实在是令人沮丧，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赫鲁晓夫心中思量，敌人的驱逐舰岂不把这些苏联鱼雷艇打得一艘也不剩？

在下一个演习点，库兹涅佐夫向赫鲁晓夫展示了海岸炮台的对海上舰只的模拟射击，尽管射击技术比鱼雷艇要好些，但给人一种过时的感觉，颇有日俄战争时期旅顺口的驻军向进犯的日舰射击的味道。库兹涅佐夫等一些陪同人员看得津津有味，但赫鲁晓夫却无动于衷。他所想到的是另一幅情景：一架载着导弹的飞机向一艘军舰进攻，一枚导弹，只一枚，就将巨大的军舰击沉。这是他在斯大林去世前看到的一部电影中的镜头。这一镜头始终牢牢地印在他的脑子中，与目前看到的实战演习形成强烈的对比。无疑，核导弹的发展将使大型军舰成为敌人的靶子。在这个空对地导弹发展迅速的时代，发展潜水艇和配备有核武器的小型舰只才是海军军备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是赫鲁晓夫观看海军演习后所得出的结论。

但库兹涅佐夫仍然坚持斯大林时期的决定：建造几艘大型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一年后，他将一份关于海军建设的备忘录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将备忘录交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传阅，并邀请了方方面面的领导一起开会研究。

备忘录提出，自40年代末开始建造的数艘大型水面舰只到目前已接近完

成，在一些新型的巡洋舰上已经装上了远程大炮，但还需军费数十亿方能完成全部计划。

与会者对备忘录作了简短的讨论。由于所需费用实在不是一个小数，赫鲁晓夫认为还是慎重些为好，贸然作出决定，肯定是不合适的。他提议推迟到下周再作决定。中央主席团的会议每周都要开，时间延长些，有利于大家对问题作较为细致的考虑。会议暂告结束。

会后，赫鲁晓夫离开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时，发现库兹涅佐夫正在走廊里等他。看得出来，他有话要说。听到了赫鲁晓夫的脚步声，库兹涅佐夫猛然转过身，对赫鲁晓夫大声地说：“对我的海军采取这样的态度，难道我还能长久忍耐下去吗？”

“什么态度？你在说什么？我认为我们对待海军的态度是很好的。”赫鲁晓夫看到他这种态度，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吼道。

“那么，为什么今天你对我的建议不作出决定？”库兹涅佐夫看到赫鲁晓夫火了，便把嗓门降低了下来。在库兹涅佐夫看来，赫鲁晓夫与他是一辈人，因此说话随便一点也无妨。然而，在赫鲁晓夫看来，现在国家大事虽然不像斯大林时那样一个人说了算，但他毕竟是党内的最高领导，即便没有斯大林那样的威望，对他总该尊重些。库兹涅佐夫不要自以为是那一行的专家，就对别人发号施令，要主席团不加考虑地批准他的建议，那要政府做什么？想到这里，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来仔细地审查你的建议。”接着，赫鲁晓夫又严厉地对他说：“库兹涅佐夫同志，注意，我们没有拒绝你的备忘录——我们仅仅推迟一个星期作出决定。为什么你就不能耐心点呢？下次会议上，我们将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作出决定。”

谈话结束后，两人各自钻进自己的汽车，向不同方向驶去。

赫鲁晓夫被库兹涅佐夫的态度搞得心烦意乱。国防部的副部长怎能对党的首脑这样讲话。武装部队的一个高级代表难道可以认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主席团是正常合理的吗？难道他有权要求党的领导闭着眼睛在他的建议上签字吗？……赫鲁晓夫越想越气。这不仅是对主席团的藐视，这也是对他、对赫鲁晓夫的藐视，这些军人太傲慢了。

一星期后，又召开了主席团会议。这时，赫鲁晓夫已认定库兹涅佐夫的建议是不合理的，并准备了实质性的理由来反驳他。

会上，赫鲁晓夫向库兹涅佐夫问道：“库兹涅佐夫同志，请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拥有了你建议我们建造的全部舰只，这对我们同敌人对抗的地位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能够顶得住英美海军对我们发动的海上全力进攻吗？”

库兹涅佐夫回答说：“不能，比起英国人和美国人，我们还差得很远。”

“如果我们有了你所要求的全部舰只呢？”赫鲁晓夫又问。

“还是这样。”

“那么，投入这样的巨款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我们批准了你的建议，我们还需要花10年时间才能把你所要求的全部舰只造起来，到那时，美国可能更加远远地跑在我们前面，因为美国人有更大的生产能力。我看不出你要求我们花的钱会对我国的安全有所助益。”

会上，每个人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赫鲁晓夫总结说：

让我们把建设海军的问题无限期地推迟，而集中力量来发展我们的空军和导弹吧。任何未来的战争都将在空中决胜，而不是在海上；我们潜在的敌人拥有从空中来进攻我们的武器。因此我们首先应当考虑改进我们的反空降和反击的手段。

没有人反对赫鲁晓夫的提议，全体通过。

对于尚未建成的舰只，不再追加投入，而是将其拆毁。这一决议对库兹涅佐夫无异于当头一棒。他气愤地站起身，对赫鲁晓夫说道：“海军是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事情的。”

随后的一段时间，库兹涅佐夫的怨言不断传到赫鲁晓夫的耳朵里。主席团讨论了库兹涅佐夫的行为。在赫鲁晓夫的提议下，主席团同意解除库兹涅佐夫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将其元帅军衔降为中将军衔；提升戈尔什科夫海军中将为海军总司令，并接任库兹涅佐夫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军衔改为元帅。

朱可夫还在国外访问，赫鲁晓夫已考虑好了接替朱可夫的人选——马利诺夫斯基。赫鲁晓夫认为马利诺夫斯基除了威望低一些外，在各方面都不比朱可夫差，比如在组织和管理武装部队的方面；甚至有的方面比朱可夫还强，比如更冷静、更善于思考等。

威望不如朱可夫，正是赫鲁晓夫看中的优点，是可取之处。戈尔什科夫的任命也是如此。第二次大战时，戈尔什科夫只指挥过黑海的鱼雷艇和巡洋舰以及江河里的小舰队，资历远不如库兹涅佐夫。

从现象上看，赫鲁晓夫这时将那些敢于与他分庭抗礼者，一律视为异己而撤换。他要提升一批年轻的、资历不如他的、听命于他的人。政界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军界也要有点规矩。布尔加宁早在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时，就曾提议赫鲁晓夫担任武装部最高统帅，主席团其他成员当然也就随声附和，并以决议形式通过。这一任命限于内部，和平时期暂不公布。既然他是苏联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军队的几名司令若总是与他意见不一致，战争时期怎么领导。赫鲁晓夫的这些想法不无道理，但客观地讲，赫鲁晓夫无形中，或不知不觉中在树立个人的绝对威望。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正是赫鲁晓夫自己搞起来的。他也正是在自己胜利之时，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朱可夫是在阿尔巴尼亚时被召回国的。下飞机后，他直接去克里姆林宫参加正在举行的中央全会。朱可夫到达会场后，一些元帅、将军和政工人员纷纷登台发言，指责朱可夫。他们说他们轻视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要求政工人员学习军事并达到职业军人的水平，理由是在战争环境中政工人员往往不得不承担起军事指挥员的职能；对人粗暴无礼，爱好虚荣，喜欢夸大自己的成绩，等等。

当全会作出决定将他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并将给他安排其他工作时，朱可夫当着科涅夫的面直截了当地问赫鲁晓夫，谁将接替他担任国防部长。

问题问的既突然又直接，赫鲁晓夫一时感到很尴尬。他不想得罪科涅夫，但是不说又不行。他迟疑了一会儿。朱可夫再次问道：“你提名谁来接替我？”他不得不告诉他，已经决定由马利诺夫斯基接替他。

“太不合适了，”已经被撤职的朱可夫毫无顾忌地说，“我认为你应当改提科涅夫。”他像对手下人发命令式地喊着。

赫鲁晓夫最烦老军人的这种态度，他们总把他当成几年前的他，态度一点也不尊重。这种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心态的流露，他愈来愈难以容忍。

他冷冷地答道：“这个决定已经作出了。”

过了5天，11月3日的《真理报》上刊登了十月全会的公报和《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决议》。决议中这样写道：

我国陆海军的威力的主要泉源在于：它们的组织者、领导者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苏联共产党。应当永远记住列宁的这个指示：“军事机关的政策，像所有其他机关和机构的政策一样，应当严格地根据党通过它的中央委员会发布的总的指示并在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下实行。

苏共中央全会指出，近来，前国防部长格·康·朱可夫同志破坏了党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列宁主义原则，他所执行的路线是收缩党组织、政治机构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取消党、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对于陆海军的领导和监督。

中央全会查明，在格·康·朱可夫同志的亲自参加下，在苏联军队中开始培植对他的个人迷信。一些阿谀奉承的人开始吹捧他，演讲、报告、文章、影片和小册子开始颂扬他，过分地夸大他个人和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作用。为了讨好格·康·朱可夫同志，战争的真实历史被歪曲了，事实真相被曲解了。苏联人民的巨大努力，我国全体武装部队的英雄主义，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作用，各方面军、各集团军和各舰队司令员的军事艺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鼓舞作用被贬低了。

党和政府对格·康·朱可夫同志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授予他苏联元帅的称号，四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奖给他许多勋章。他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很大的信任：在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选他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随后又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是格·康·朱可夫同志由于党性不纯，没有正确地理解对他的功绩的这种高度评价，忘记了列宁要我们的党员谦虚的教导，狂妄地以为在我国人民和我国武装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中，他是唯一的英雄。他粗暴地破坏了党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列宁主义原则。

因此，格·康·朱可夫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他成了在政治上站不稳的人，无论是在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方面还是在领导国防部的工作方面，他都倾向于冒险主义。

由于上述原因，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撤消格·康·朱可夫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资格，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另行分配工作。

整篇决议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几个词，说朱可夫“培植对他的个人迷信”、“忘记……谦虚”、“狂妄”、“粗暴破坏党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列宁主义原则”。然而，这些罪名安到任何人的头上，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头上，都不会有太大出入。从决议可以看出，朱可夫并没有犯什么大错误，他甚至没有像库兹涅佐夫那样同赫鲁晓夫发生龃龉，但是他还是被剥夺了一切，甚至比“反党集团”的下场还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都分别被安排了工作，而朱可夫从此便赋闲在家，至死再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

朱可夫被解职时提到的科涅夫，不久也被通知退休。赫鲁晓夫知道他对提升马利诺夫斯基有看法。“让老师们靠边站吧，不要再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了。”赫鲁晓夫的这时想法就是这样。接着，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

的职务也被解除，他的去职不像处理朱可夫那样大张旗鼓，解职的理由是“身体状况恶化，不宜继续担任原职务”云云。

至此，赫鲁晓夫完成了军队指挥机构的改组。紧接着朱可夫的去职，是苏联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庆典。

在庆典纪念前不到一个月，苏联向宇宙空间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这件事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它证明了苏联在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苏联的人造卫星对美国的科学界、政界和军界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美国因此对教育体制以及中学和大学的课程进行了修改。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太空计划的成功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献礼，反党集团被铲除，朱可夫下台，这一年对他来说是有惊无险，好事成双。

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后，在莫斯科又召开了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此后 60 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又召开了一次通过《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会议。

毛泽东同志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于 11 月 2 日率中国代表团飞往苏联。

飞机中途在伊尔库茨克稍事停留，赫鲁晓夫派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副外长费德林专程从莫斯科飞往那里迎候。此前，毛泽东主席已让杨尚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打过招呼，让苏联方面免除一切仪式。“接的人不要多，也不要搞仪仗队，最好是一下飞机就走”。

赫鲁晓夫心中明白，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是相当有分量的，丝毫怠慢不得。而且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在某些方面与苏联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当天下午 3 点多钟，毛泽东走出机舱，赫鲁晓夫率苏联中央委员会及兄弟党领袖胡志明等大约 500 多人前来迎接，仪仗队整整齐齐。

礼宾仪式过后，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同车前往下榻的克里姆林宫。在车里，毛主席开口说道：“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解释道：“是啊，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是照惯例办的，您来了，像毛泽东这样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

毛主席说：“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都没有用了。”

毛泽东第一次到苏联是在 1949 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为庆祝斯大林 70 岁寿辰，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到了莫斯科。

火车到达莫斯科是半夜 12 点钟，列车在克里姆林宫自鸣钟的敲击声中徐徐驶进车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以及军政领导几乎无一例外地在雅罗斯拉夫车站顶着凛冽的寒风迎候。不过，真正的主人斯大林却没有到。他从来不到车站迎客。

毛泽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月台上受了凉，所以莫洛托夫领导的欢迎仪式不得不简化，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便驱车前往住地。

祝寿是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世界各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主席团就座，以便轮流登台发表词藻华丽的祝词。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是用俄语来宣读事先准备好的讲稿。

“他们干吗用俄文演讲，难道没有本国的语言吗？”斯大林不满地问庆典的主持人。嗓门相当高。

“请问，斯大林说了什么？”坐在一边的毛泽东转过脸来问当时还只是翻译的费德林教授。

听完费德林的翻译后，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话说：“哦，知识多了也害死人。我就不必担心啰，反正一个俄文字也不懂。”

主持人结结巴巴地对斯大林说：“我们的来宾事先准备的都是俄文稿，现在不好改了。”

轮到毛泽东发言时，他请费德林同他一起走上讲台，以便他讲完后可以立刻翻译成俄文。

剧场里发出热烈欢呼。听众对来自中国的领袖表示欢迎，对他这种不同于别人的发言方式表示赞赏和敬佩——它象征着友好和尊严。

会谈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孔采沃别墅进行的，而且常常是在深夜。会谈时，斯大林坐在大桌子的顶头，接下去是严格按名单次序排列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位置紧挨着斯大林，只有翻译坐在中间。中国代表团按名单依次坐在毛主席旁边。一会谈话题广泛，没有严格议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双方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看法。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基本条款便是在这种气氛中达成的。1950年2月14日，苏中双方的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和周恩来签署了条约，斯大林、毛泽东、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签字仪式。

在军事战略方面，条约规定，双方保证共同努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复活，制止日本以及在直接或间接的侵略行为中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就是说，如果其中一国遭到日本及其盟友的侵犯，另一国将立刻提供军事援助或其他物质援助。根据条约，两个邻国愿根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双方还表示，愿本着真诚合作的精神参加一切保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行动，为加速其实现而贡献全部力量。双方相信，加强苏中两国的睦邻关系和友谊，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同意本着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原则，在涉及苏中双方共同利益的一切重要国际问题上互相磋商。

缔约双方承诺，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来发展和巩固苏中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相互提供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实现必要的经济合作。

除中苏条约之外，毛泽东和斯大林还就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内容达成协议。

苏联政府同意将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签订对日和约后，苏军将撤出双方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工程建筑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晚不得迟于1952年末。中国政府则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为恢复和建设上述工程所支出的费用。

双方还决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立即研究大连港问题。不久，大连就移交给中国。

苏联政府还同意向中国提供贷款，以支付苏联给中国提供设备和其他物资的费用。双方协议贷款额为三亿美元，年利优惠

毛主席在苏联待了近两个月，办成了很多事，双方都很满意。第一次苏

联之行给主客双方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毛主席临别前在莫斯科车站讲话时表示，中苏两大国人民在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通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对中苏两大国的繁荣产生影响，而且必然要对人类的未来、对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产生影响。

签约是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晤谈的顶峰。所签协议无论就其意义还是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签约实现了列宁的预见，也实现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理想。

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在中苏友好的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在苏联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一次出访苏联，与第一次不同，具有更为鲜明的国际性，数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聚集一堂。

在离开北京之前，毛泽东已经了解到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所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上台以来，苏联一直不太平。真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毛泽东对此评价说，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们采取的万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他同时还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也能捅娄子，在内外的某些事情上可能日子不太好过，“多灾多难”。

就在苏共 20 大之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论十大关系》为题作了讲话。讲话中多次提出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千万不能盲目跟着苏联跑。他在讲话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

在谈到同农民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了斯大林时期的问题所在，他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毛泽东在苏共 20 大后，虽然没有从正面对苏共中央提出批评，但从他的谈话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对赫鲁晓夫的一些做法是不赞成的，中苏的分歧，实际上，从这时已露端倪。毛主席这样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

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赫鲁晓夫政策措施，正在观其行，见其效，为了维持中苏友好关系而没有公开点名批评。但他提醒全党同志注意苏联人的做法，要多加分析，不能盲从。

毛泽东向苏联打招呼，不希望有隆重的接待仪式，也是从中苏关系不同于50年代初这一角度出发的。毛泽东已经预感到赫鲁晓夫一系列的自作主张、贸然行动定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苏关系带来危害。毛泽东希望两国关系降温，以便在必要时向赫鲁晓夫进一言。

在60多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即席演说。他在讲话中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毛泽东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向会议代表阐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要有一个领导中心的思想。

哥穆尔卡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在波兰十月事件中的表现仍耿耿于怀，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毛泽东对他讲道：“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在毛泽东的劝说下，哥穆尔卡等东欧一些国家的兄弟党消除了一些怨气。

毛主席在这次会上，为赫鲁晓夫解决了不少难题。毛主席也已看出，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已十分勉强。赫鲁晓夫执政以来在国内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并未树立起较高的威望，今后共产党国家之间，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能够维持到怎样一个程度，已经不容乐观。

对于容易捅娄子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好言相劝说：“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各个党都有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讨论，着急不行。”

赫鲁晓夫承认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很生气……”

毛泽东问到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的情况时，赫鲁晓夫泛泛地回答说一切都还不错，主席团成员正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工作。不过，同志们认为布尔加宁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已经有人提出给他调换工作岗位的问题。

赫鲁晓夫准备把曾经在六中全会对他发难的人一一替换掉的想法早已有之，但他为做得隐蔽些，需要些时间。他做此事还担心兄弟党们对他的做法不理解，所以还必须事先吹吹风，尤其是对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已经责怪他在处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三人的问题没有打招呼。布尔加宁去职一事若再不说，事后毛泽东定会责怪他。



赫鲁晓夫说：“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掌管全局。”

赫鲁晓夫所说的由柯西金来接替布尔加宁的想法，纯属虚晃一枪，伏罗希洛夫已几次提议让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了。他不是不想接受，而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在一年前的 20 大上他刚刚批评了斯大林一人身兼两职，现在他步斯大林的后尘，别人会怎么想？赫鲁晓夫只是想拖上些日子，如果再有人提起，就可顺水推舟，接任该职。

毛泽东对他的话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告诉赫鲁晓夫，他正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接替的人有好几位，而且都够条件。

对于毛泽东的这番话，赫鲁晓夫感觉不是滋味。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他能听出毛泽东话中的弦外之音。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愈发戒备。他想起在会议期间，每当他向毛泽东谈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他如何出生入死、向斯大林提出妥善方案并屡遭拒绝的事情时，毛泽东总是不以为然的样子。赫鲁晓夫预感到，他和毛泽东之间终会发生磨擦，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

为了引开话题，毛泽东问赫鲁晓夫对“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有什么想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议上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这篇讲话在 1957 年 6 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想必赫鲁晓夫已有所闻。

赫鲁晓夫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楚你们提的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的——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

毛泽东向他解释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他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

对于毛泽东话里面的哲学思想，辩证法，赫鲁晓夫不愿多想，他对百花齐放的理解很直接；百花齐放就是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意在鼓励人们更加公开地表现自己，以便将那些开放出来的颜色或气味不正的花统统摘掉丢到垃圾堆里去。

如果赫鲁晓夫能够心平气和地考虑并理解毛泽东话中的思想，在后来解冻思潮汹涌而至时，就不至于手足无措了。

在随后的谈话中，两位领导人对问题的理解以及对未来战争的构画更是大相径庭了。

毛泽东以持久战的思想来设计未来战争的策略。中国地大物博，如果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赫鲁晓夫很纳闷。

“退却。”

“什么叫‘退却’？”

“我指的是撤退，并且坚持一年，两年，甚至三年。”

“我们又为什么要撤退？要知道，这样做就等于是自我失败啊！”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这一说法感到不可理解。

“未必。”毛泽东平静地解释道，“请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吧。你们不是一路撤到斯大林格勒，然后动员力量进行反攻，并且一直推进到了柏林吗？”

“那是当然的，可那时的撤退既不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也不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是敌人把我们赶跑的，敌人逼着我们后撤。

有些人以为斯大林是把希特勒引入纵深以后再消灭之——或者以为当年库图佐夫故意让拿破仑一直推进到莫斯科，然后把他打败。

毛同志，看来，你就有这种想法。其实，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事实。

斯大林在德国人打到斯大林格勒之前根本扭转不了战局，正像库图佐夫在法国人推进到鲍罗季诺之前不能打败他们一样。如果你想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建议你读一读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作好反希特勒战争的准备——而这种无准备状态几乎送了我们的命。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撤退三年以后再来顶住敌人的入侵。”

“我不同意，”毛泽东说，“如果你们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人就能参战了。”

赫鲁晓夫紧紧盯着毛泽东，他不知道毛泽东是严肃的呢，还是在同他开玩笑。他想努力说服毛泽东：“毛同志，下一次战争可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了。今天美国人的原子弹多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也有核武器，并且正在加紧用这些武器来装备我们的部队。下一次战争不会是以敌人跨过国界发动入侵开始的，而一开始就会是敌人用导弹或炸弹袭击我们主要的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因此，我们的政策是用足够的武器武装自己，以便敌人给我们造成多大破坏，我们也能给他们造成同样大的破坏。”

赫鲁晓夫无法说服毛泽东。

同毛泽东相比，赫鲁晓夫在战争问题上的发言权要小得多。毛泽东对于战争问题的研究是有一整套理论体系的。这一体系经过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检验。毛泽东还撰写过多部军事著作，其中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打持久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等军事思想都有具体的战役作为诠释。然而，赫鲁晓夫作为军事委员主要负责的还是政治思想工作，对于战争怎么打多是执行，很少谋划，即便有些想法也要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按中国话说，他和毛泽东对于战争的理解还有着将帅之分。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将才而已。他害怕现代武器的杀伤力、破坏力。然而，毛泽东不怕原子弹。他认为，你如果怕它，它对你就有威慑力；相反，你不怕它，它不过是个纸老虎而已。

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认为，原子弹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一旦爆炸，威力巨大，怎么能是个纸老虎，它比真的老虎还要凶猛千万倍呢。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于辩证法和哲学的漠视颇有感触，他说：“苏联人原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

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害怕战争、害怕原子弹、想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是对列宁主义的背离。

## 第十章

### 鼎盛时期

1958年，赫鲁晓夫第二次来到北京。

赫鲁晓夫1954年曾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那是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一个邻国，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访问期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签订了一项协议。这一协议再次提到了旅顺口。苏联保证撤走在旅顺口的苏联驻军，并把该基地上的一切设施移交给中国。此外，苏联还把很多合资企业（有关金属和石油开采、造船和民用航空等）中属于苏联的股份转让给了中国，并且同意派大批苏联专家支援中国，帮助发展150多个大型项卧。

当时，随团一起到达北京的有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谢列平等。访问中有两件不太愉快的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建议从中国招募100万名工人到西伯利亚去帮助开发森林资源。赫鲁晓夫提此建议的前提有二：一是想帮助中国解决失业问题，二是帮助解决西伯利亚缺少劳动力的问题。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一举两得、互惠互利之事，无疑是个令人拍手称快的好建议。这就是赫鲁晓夫思想方法的特点，即很少顾及别人的反应，总有些强人所难；在外交场合中不注意礼节，处处要表现出自己的优越地位。他以为自己是在替别人着想，别人对他的每一提议如果不是感恩戴德，至少应该点头称是。

毛泽东沉默片刻，文静而宽容地对赫鲁晓夫说道：“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少年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人口过剩，失业普遍，因而是一个很好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很侮辱人的。现在你也这么看，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了。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以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是一样的。”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不觉心中一怔，他绝想不到这一问题有这么深的历史底蕴和政治意义。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心好意会伤害了别人。赫鲁晓夫这才深深地感到同毛泽东谈话太不容易了。他像卷帙浩繁的书籍，而自己却似生性鲁莽的村夫。

赫鲁晓夫内心感到很委屈，他根本就没有想这么远，他不过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符合中国人利益的建议而已，他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人的吃饭问题。

与毛泽东就这一建议谈话后，赫鲁晓夫又同布尔加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进行了商量。在随后的一次谈话中，他向毛泽东道歉说：“毛同志，我们当然不想给你们制造困难，我们当然不坚持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建议会损害中国的民族自尊心，那就当我们没有提过，务请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用自己的工人也行。”

赫鲁晓夫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了，会谈后便去哈尔滨、沈阳转了一圈。回到北京后，中国同志给赫鲁晓夫手下的人带去了一个正式口信，说毛主席同意接受苏方的建议，愿意帮苏联的忙。

赫鲁晓夫为此而踌躇不决。该建议首先是他提出来的，若不同意，还得

向毛泽东解释为什么，话说多了难免有误，不定又会出现什么不愉快之事。赫鲁晓夫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签订了一个协定，招募 20 万中国工人到西伯利亚做工。

这回，赫鲁晓夫反倒心神不定了，他认为中国人准是在打苏联的主意，准是想兵不血刃地占领西伯利亚，准是想渗入并接管西伯利亚的经济。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同意派 20 万中国工人去西伯利亚，无非是想确保在西伯利亚定居的中国人多过居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从而把西伯利亚变成中国人的而不是俄国人的。

赫鲁晓夫的思想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一问题上，他性格中的狭隘与偏激暴露出来。

另一件事是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争论。

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毛泽东向赫鲁晓夫谈了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令赫鲁晓夫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对待美国的威胁是如此坦然。赫鲁晓夫试图向他解释：“不要不以为然，一两枚导弹就能使所有的中国军队化力灰土。”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对战争所持的观点是非常幼稚的。殊不知，九年前，毛泽东就论述过原子弹能否解决战争的问题。毛主席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毛泽东在九年前已经批评过赫鲁晓夫的这种思想，赫鲁晓夫如果懂中文，或事先接触过毛泽东的著作，就不会再去自以为是地劝说毛泽东了。毛泽东是在高山上俯瞰这个世界，俯瞰世界未来的进程；而赫鲁晓夫却是无暇他顾地一天接一天地应付美国强权的挑战。

1954 年，毛泽东仍然相信人比武器更重要。对赫鲁晓夫来说，只要一个东西是能够摸得着的，就是真的。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是一位预言家，他对自己，对中国、对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的上升地位，都极有信心。赫鲁晓夫觉得毛泽东把他看成了一个胆小鬼。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不满略有表现。他在同西德总理阿登纳谈话时说：“中国也许会成为一个“令西方担忧的问题。”

游泳池畔的那一幕，成了中苏分裂的先声。对战争的态度——这就是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

1958 年 7 月 31 日，赫鲁晓夫的座机呼啸着停在了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

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北京正值盛夏。

陪同赫鲁晓夫一道访华的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

机场上举行了国家级欢迎仪式。奏国歌，仪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响亮地报告：“为……服务。”

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家领导人神情严肃，无可挑剔的礼节，握手寒暄。没有欢迎词，没有口号，没有长达数米的标语，也没有写着祝愿与感谢的语句的横幅。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没有群众像往常那样举着彩色小旗，举着已故的或活着的领袖的画像，市民们没有在贵宾车队驰过的街道夹道欢迎。一切都是静静的，寂然无声。不久前，还流行的歌曲《莫斯科—北京》，已经听不到了。

一长串黑色轿车，朝着北京西郊疾驰，前往苏联代表团下榻的地方。

次日上午，赫鲁晓夫一行驱车前往中南海拜访毛泽东主席。这次秘密来北京，有几件事要谈。

在苏联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海军就向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允许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苏联国防部能同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系。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此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议。赫鲁晓夫等人认为这一建议对苏联、对中国都是同样有利的。苏联和中国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方面毕竟是一致的。

另外，赫鲁晓夫认为中国方面会同意的另一个理由是苏联已答应了帮助中国建造潜艇的请求，并已经送交了图纸、派去了专家。

结果呢，当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这一要求时，毛主席十分生气，不客气地对尤金说：“你们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侵犯。”尤金被毛泽东批评之后赶忙向苏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描述了毛泽东的愤怒。

苏共中央主席团对电报进行了讨论，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由赫鲁晓夫去向毛泽东做工作。

在毛泽东宽敞的会客室里，来宾们被安顿在宽大的欧式沙发椅上。这里气氛拘谨，互抱戒心。赫鲁晓夫作了一般的开场白后便单刀直入，谈到他此次访问的目的。

关于苏联要求建立长波电台一事，赫鲁晓夫向毛泽东道歉说，苏联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

作为回答，毛泽东提议：“你们给我们必要的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这个电台。”

“很好，”赫鲁晓夫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会把图纸、设备和技术顾问都给你们送来，还会给你们所需要的贷款。”

“行，”毛泽东说，“我们同意。”

接着，赫鲁晓夫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允许苏联海军潜水艇在中国港口加油并让艇上人员上岸休假。

毛泽东仍然严辞拒绝了。

“毛同志，”赫鲁晓夫百思不得其解，向毛泽东抱怨道，“我们简直不能理解你。我们使用你们的港口，这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嘛。”

“话不能这么说。”毛泽东答道，“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果苏联潜艇可以进出我国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吗？”

“好吧。那么你也许会同意一种互惠的安排：我们有权使用你们的太平洋港口，作为交换条件，你们可以在苏联的北冰洋沿岸建立潜水艇基地。你看怎么样？”

“不行，”毛泽东说，“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只应驻扎在自己本国领土上，而不应驻扎到任何别的国家中去。”

“那好，我们不坚持原来的建议了。我们就用自己现有的设施凑合好了，用我们自己在远东的港口作为太平洋潜艇舰队的基地。”赫鲁晓夫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提议。

赫鲁晓夫的这两项要求，都表现出了大俄罗斯主义。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起，就为获得出海口在邻国攻城掠地，战事不断。鸦片战争之后，俄国曾

参加八国联军，并在中国东北地区烧杀抢掠。

1904 — 1905 年又与日本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搅得中国东北地区的老百姓没有安生日子过，为避战乱，四处逃难、背井离乡。中国人吃够了外国军队的苦。赫鲁晓夫作为俄罗斯人根本理解不了，也想不到这一层。二战前，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兼并，对芬兰的战争，作为当事者之一，他根本认识不到那是错误，以致仍然不厌其烦地一会儿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一会儿又提出使用中国的港口。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对苏联的这类要求拒绝过不止一次了。

斯大林在世时，就曾给毛泽东发过一封电报，要求毛泽东给苏联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建立橡胶种植园。毛泽东的回电是这样说的：“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来橡胶作为对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毛泽东不卑不亢的回答，对斯大林来说如同一剂必须吞下去的苦药。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与互利的，而这种平等与互利又必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的。

还有一次，斯大林突然对菠萝罐头感兴趣起来。他指示马林科夫给毛泽东发一个电报，说苏联希望中国拿出一块地方来让苏联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赫鲁晓夫当时也在场，斗胆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话很不高兴。瞪了他一眼，赫鲁晓夫立即就不敢再作声了。电报最终还是拍了出去。两天后，苏联人收到了中国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赫鲁晓夫看到电文在旁默不作声，庆幸此事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斯大林则在那里发火骂人。

赫鲁晓夫作为当事人，目睹了这两件事的经过，当时他还不是拍板人。如今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倒不是他不汲取教训（而是大俄罗斯主义使然。作为党政首脑，他自然认为苏联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赫鲁晓夫这次到北京总共只待了不到四天，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毛主席的游泳池边度过的，游泳池旁有一个凉棚，两位国家领导人躺在浴巾上晒太阳。赫鲁晓夫的水性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在他看来，毛泽东的游泳技能可与破世界纪录的专业运动员相比。当然，当两人“像海豹一样作着日光浴时”（这是赫鲁晓夫自己说的），他们谈的不是游泳，而是政治问题。

“苏共代表大会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决议，我看未必站得住脚啰。”毛泽东仿佛顺便说起来。毛泽东所指的决议是 1956 年 6 月 30 日苏共中央发表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毛泽东不用“崇拜”一词，而是用“迷信”。

“这个决议在我们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都是没有异议的。”赫鲁晓夫针锋相对。

“你们当然有权解决你们的内部问题，党内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不过，

斯大林……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中国也是其中一分子，关于他的杰出作用，恐怕不是一党一国说了算的，应该考虑到国际上的联系。”毛主席平静而直率地说。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这首先是一个民族现象。它在苏联发生，也在苏联形成。我们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问题，我们也这样做了。”赫鲁晓夫的态度很强硬。

“决议虽然通过了，不过内容是片面的，做法也不妥。你们把它当做一党一国的问题来解决，把它局限在一个地域内，这种看法太狭隘了。”

“之所以说斯大林个人迷信是民族的产物，是因为它是在我国形成的，我们要对此负责。”

“既然斯大林主义具有国际意义，那么把它局限在苏联一个国家内，这种做法对吗？”

“在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上，只有我们苏联共产党人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谴责斯大林的决议是否做得过于匆忙和主观了呢？要知道他对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伟大的革命事业，包括中国在内，曾作过巨大的贡献。怎么能全盘否定或贬低了呢？”

对峙了一会儿，毛泽东站起身拿起桌上的茶杯，一口一口地呷着，然后放回桌，看着谈话的对手。

对于喝茶，赫鲁晓夫始终都没能习惯。在他看来，中国人款待客人的方式主要是敬茶——茶、茶、茶。只要你坐下来谈话，他们就要在你面前放上一个带盖的茶杯。如果你不立即喝掉，他们就会把这一杯拿走，再换上一杯——换了又换。出于对主人的尊敬，不得不一杯接一杯地喝，直到喝不下为止，第一次访华后期，赫鲁晓夫拒绝喝茶——一是他喝不惯绿茶，二是他喝不了那么多。

谈话在继续。赫鲁晓夫感到这种谈话比喝茶还难受。

“你说斯大林有巨大贡献，但是别忘记，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的独断专行，大规模地镇压和迫害，千百万人在集体化和伟大卫国战争期间送掉了性命，你怎么为他辩护呢？”赫鲁晓夫反问。

“问题不在这里。谁也不打算为斯大林在苏联集体化中的做法作辩护。这是你们的内务。这里究竟是谁之过，是斯大林个人或者不仅是他一个人，这点你们最清楚。我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斯大林的名字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受到尊敬，他树立了一个坚定革命者的崇高榜样。我们相信他，相信他的学说和经验。现在全部一笔勾销，这么一来，我们几十年来英勇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我们会失去共产党人的威信、失去信仰……”

赫鲁晓夫不等毛泽东说完，便打断毛泽东的话说：“这也叫信仰？这难道不是误解和欺骗吗？我们应该把一切公之于众。揭露谎言，说明真相，不管这对我们是多么痛苦。”

“我们尝过痛苦的滋味。我们的整个斗争历史都是痛苦的经验。中国有句老话：良药苦口。但是你们决议所谴责的不仅仅是失算和错误，谁能保险不犯错误呢？但是，凡是同斯大林名字有关的东西都统统否定了，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消极还是积极，一概否定。”

“我们说的是真话！”赫鲁晓夫变得有些蛮横了。

“苏共 20 大的决议使局势极端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两党关系



是不可能正常化的。”毛泽东的话如同晴天霹雳。赫鲁晓夫一怔，他简直没有料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知道这回是闯了祸，但仍然嘴硬。

“匆匆得出这样极端的结论未必妥当吧？”赫鲁晓夫无心将谈话再继续下去，试图想挽回。

这次谈话是赫鲁晓夫这次来北京与毛泽东争执得最厉害的一次。他们还谈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以及与之有关的如何对付美国、一旦战争爆发应该如何迎战等问题。

赫鲁晓夫从去年与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谈话中，已经大致了解到毛泽东对于未来战争的一些观点与想法。但这次在游泳池边听到了比过去走得更远的想法。这使他越发不能够理解。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未来的战争。”毛泽东提起话头，“美国有多少个师呢？我们知道美国的人口有多少，所以可以算出他们把壮丁招募起来能够动员多少个师。”毛泽东又加上了英国、法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估计出一个大约的数字，然后说：“那么，我们能够动员多少个师呢？想一想中国、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你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方法简直是不可思议。

“毛同志，”赫鲁晓夫怀疑自己能否说得通毛泽东，“你的算法有一个根本错误。自从苏沃洛夫（18世纪俄军统帅）那个时代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士兵再也不是按‘子弹是傻瓜，刺刀才是可靠的朋友’这一格言过日子了。同样的道理，现在的战斗既靠刺刀赢得，也不靠子弹赢得。就连苏沃洛夫也常常说，一支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部队能够打败数量上比它多的敌人。在他那个时代，武器就是剑和炮，随着机关枪的发明，战争性质就起了变化。几个机关枪手能像农夫用镰刀割草一样扫射倒大批步兵。现在则进一步发展到了导弹和核弹时代，一方或另一方拥有的师的数目对于战役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一枚氢弹可以把整师整师的人变成一堆熟肉。一枚氢弹的毁灭范围是非常大的。”

毛主席对他的话也不宜批驳，因为有上一次争执的前提。毛

主席告诉他，他是打游击起家的，他认为最后起作用的还是人，还要短兵相接。在大兵团作战时，氢弹等核武器可以起作用。短兵相按时，核武器就没有用了，它消灭的不只是对方的军队，也包括自己的军队。对付核武器也不是没有办法，可以建筑防空设施嘛！中国武装革命的历史经验是，小米加步枪能够打败飞机加大炮。以弱胜强，得道多助，用全民皆兵、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来淹没入侵之顽敌，是丝毫没有问题的。战争不就是打碎些坛坛罐罐嘛。中国有句话，叫不塞不流、不破不立吗，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弄明白毛泽东的这一整套有关战争的哲学思想需要一段时间，或许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方能理解。对于毛泽东的话，他因理解不了，也就听不进去。他仍固执地认为毛泽东不懂现代战争。

在战争问题上，斯大林认为：由于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世界市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矛头迟早要指向苏联。赫鲁晓夫则认为战争可以避免，而且必须避免。他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没有任何争端是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既然存在两种制度，那就必须加强二者之间的事务联系，而不应该挑起互相的敌视和仇恨，1955年2月，赫鲁晓夫在接见美国记者时说：“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力量的力量会有的，健康的理智是会占优势的。”赫鲁晓夫对于现代战

争的看法是：核武器将取代一切传统的常规武器，而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

由于苏联首先掌握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第一枚洲际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超过美国。由于苏联有了核优势，美国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苏联既然能把火箭发射到几十公里高的宇宙空间，就能把强大的火箭百发百中地发射到地球上的任何一点。

一个拥有核武器，一个没有核武器，这就是苏中两国领导人考虑战争问题的不同出发点。一个对核武器仰视、迷信，一个对核武器俯视、明智，这就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不同的思想高度。

赫鲁晓夫 1958 年的北京之行结果无功而返。

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

在与中国的分歧逐渐扩大时，苏联开始与美国寻求对话，力求通过首脑会谈，实现苏美合作。1957 年 5 月，赫鲁晓夫在接见《纽约时报》总编辑卡特勒奇时就公开表示：“我非常尊重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希望访问美国。”但艾森豪威尔没有理睬赫鲁晓夫的这些表示。此后，赫鲁晓夫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发出信息，要求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直到柏林问题出来之后，赫鲁晓夫才和美国方面正式接上了头。

1949 年第一次柏林危机后，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分别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原来被四大国分区临时占领的柏林，也被分割为西柏林和东柏林。东柏林驻有苏联军队。西柏林则被美、英、法三国占领，它们实际上把西柏林交给联邦德国控制和管理。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西柏林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州。但西柏林处在民主德国境内，因此民主德国一直坚持西柏林是其领土的一部分。由于对德和约未能缔结，西柏林的地位也没有确定。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就成了苏联同美国斗争的焦点。

东西柏林分裂后，边界线仍然开放。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由于东西德经济发展条件不同，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差距，因此民主德国的居民不断流入西柏林和联邦德国，其中不少是熟练工人和科技人员，因为具有一定专长的东德人在西德是不难找到工作的。精壮劳力的外流给民主德国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民主德国本身也缺乏劳力，更不用说技术人员了。第二个问题是西柏林人很易进入东柏林。西柏林居民能自由地进入东柏林享用各种公共福利。东柏林的物价比西柏林低，西柏林人把在西边挣的钱拿到东边来花，抢购各种食品。由于以上原因，每年民主德国的经济损失达上百亿马克，自东西德分裂以来，民主德国已为此垫付了上千亿马克。

1958 年 10 月 2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乌布利希发表声明，称西方没有权利再留在西柏林，因为它们违反波茨坦协定，采取了武装联邦德国的政策。11 月 10 日，赫鲁晓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支持民主德国的立场。他说现在是结束柏林占领制度的时候了，苏联将把自己在柏林行使的权利，交给民主德国政府。11 月 27 日，苏联政府同时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提出苏联的新建议。苏联宣布准备就移交柏林的权力与民主德国进行谈判。苏联认为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把西柏林的权利归还民主德国政府，但很可能西方不愿接受这一方案。因此苏联提议，使西柏林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作为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的自由城市，并由联合国进行监督。如果同民主德国签订一项协议，就可以保证国外与西柏林的交通和往来。同时，赫鲁晓夫

还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在六个月内不能达成协议，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苏联将单独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赫鲁晓夫声明说，西柏林是长在民主德国心脏上的一个“毒瘤”，苏联决心动“外科手术”，割掉这个“毒瘤”。

美国对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的攻势，毫不示弱。国务卿杜勒斯针锋相对地说：“和平与安全需要美军留在西柏林和西德。”当赫鲁晓夫发出封锁西柏林的威胁时，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将不惜冒战争危险，并开始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备战。美苏关系突然紧张起来。

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赴美“休假”。他在美国反复申明，苏联关于柏林的期限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开始双边谈判。在同月召开的苏共第21次非常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表示了早日结束“冷战”的愿望，并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苏联。3月5日，赫鲁晓夫在访问东柏林时又暗示，如果西方愿意谈判，苏联可以放弃六个月的期限。显然，赫鲁晓夫想用柏林问题发动攻势，压出一个首脑谈判。但是，西方认为召开新的最高级会议讨论德国和西柏林问题的条件不成熟，拒绝接受。赫鲁晓夫不得不让步，于3月底接受了西方提出的举行外长会议的建议。1959年5月，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开幕，东、西德各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讨论对德和约问题。会议因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去世而宣布休会，四国外长根据各国的指示，飞往美国参加葬礼。

7月，会议继续举行。会上，美国代表提出“一揽子计划”，主张先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然后再缔结和约。西方拒绝从西柏林撤军，只愿把驻军从1.1万人减少到3000人。苏联坚持东西德以两个国家身份举行谈判，实现德国统一。双方未能就德国和柏林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不过，会上苏联没有再提出六个月的限期。会议期间，美国主动提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柏林危机也就暂时缓和下来。

四国外长会议期间，苏联第一副总理科兹洛夫访问美国，主持苏联在纽约举办的展览会。在他回国前，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莫菲交给他一封信并让他将信转交给赫鲁晓夫。科兹洛夫抵达莫斯科后，径直从机场去了莫斯科市郊的赫鲁晓夫别墅。他告诉赫鲁晓夫，他给他带来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专函。

信的内容很简短，艾森豪威尔在信中提出邀请赫鲁晓夫到美国作一次访问。赫鲁晓夫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太想去美国看看了。他说，他去过英国、瑞士、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家，尽管它们都是外国，但不是美国。美国在赫鲁晓夫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赫鲁晓夫认为，美国是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头号敌人，是为其他国家定反苏调子的首领。美国对他的邀请，说明美国已经把苏联当成了平等伙伴，苏联已最后迫使美国承认了与苏联建立更密切关系的重要性。

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主席团决定接受邀请并表示感谢，并为此推迟了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预定访问。苏联驻美大使缅希科夫得到通知，为赫鲁晓夫不久后的访美活动进行必要的安排。

赫鲁晓夫为即将到来的远行进行着周密的考虑。他担心可能会受到歧视。按国际通行的惯例，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只能算是政府首脑，而不是国家元首。苏联的国家元首是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当时是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不知道自己到了美国，人家是按国家元首还是按政府首

脑来接待。要是美国人按后者来接待他，他认为是不能接受的。苏联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磋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对赫鲁晓夫的访问在外交礼仪上按“国家元首”接待。

这次访问，赫鲁晓夫又创下了苏联外交活动的先例：将携妻子和孩子同行。

出发的日子就快到了，还有几件事情没搞清。

华盛顿大使馆告诉国内，日程表上预定将有几天要在戴维营与总统谈判。戴维营是什么地方？赫鲁晓夫向外交部，外交部回答说不知道。赫鲁晓夫怀疑这个地方是否名声不好。记得革命胜利初期，苏联曾有一个代表团被邀请到一个叫太子岛的地方去与某资本主义国家会谈，去了后才知道这个太子岛是放逐野狗的地方，这种邀请分明是对苏联国家的污辱。美国人会不会也这么干，赫鲁晓夫让外交部赶紧向华盛顿苏联大使馆询问。大使馆也不能确切说明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只得派人去作专门的调查，最后从国家安全委员会那里得知，戴维营类似苏联领导人的别墅。赫鲁晓夫这才放心，感到满意。另一个问题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1955年夏天参加日内瓦会议时，赫鲁晓夫就为乘坐双引擎的伊尔-14而感到尴尬，这次去美国，无论如何也要体面些。坐船、坐伊尔-18飞机、乘坐外国飞机都是不行的，都不能显示出科技先进国家的气派来。当时，苏联飞机中能直达华盛顿而无需中途停留的只有图-114飞机。这种飞机座舱大、航程远、速度快的特点已引起技术界的关注，只是性能还不稳定，毛病和问题时有发生。总之，是不太保险。在图波列夫的再三保证下，赫鲁晓夫准备乘坐这一新式飞机。问题至此算一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琢磨与美国人怎样打交道了。

此前，赫鲁晓夫已经同美国政府领导人有过一次交锋，只不过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莫斯科。

7月23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举办的展览会主持开幕式，结果与赫鲁晓夫之间爆发了一场辩论。

展览会上最使人感兴趣的陈列是一套有六间房间的典型牧场住宅，在中央有一条参观走廊，能让观众看到里边的全部陈设。

当他们停步于样板住宅光洁漂亮、设备新颖的厨房时，辩论开始了。尼克松说这是一所典型的美国住宅，几乎任何美国工人都能住得起这样的或类似的房屋。赫鲁晓夫昂起头来表示蔑视。他说：“你以为苏联人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吗？可是，事实是所有新建的苏联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在人行道睡觉的权利。而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

尼克松回答说：“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将使苏联人惊讶，但是它会让他们感到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使我们感到兴趣一样。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最上头作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赫鲁晓夫插话说：“就政治差别而言，我们永远不会一致……”

尼克松说：“谈谈我们的洗衣机各有什么优点，岂不比谈论我们的火箭各有什么威力更好？您想要的不也就是这种竞争吗？”

赫鲁晓夫这时把他的大拇指顶在尼克松的前胸上说：“对！我们所要的

就是那种竞赛，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强大得很，能把我们摧毁掉。我们也能拿出点东西给你们看看，让您知道苏联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在这方面，我们也能让您看点东西。”

尼克松也用指头指点着赫鲁晓夫说：“我认为，你们是强大的，我们也是强大的。在某些方面，你们比我们强大。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更强大……”

在放着加利福尼亚名酒的桌子旁停留时，两人作了最后较量。赫鲁晓夫提议为“和平和废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干杯。

尼克松拿着杯子，但没有举起，他说：“咱们只为和平干杯。”

站在一旁的一名苏联人解围说：“祝赫鲁晓夫同志长命百岁！”

尼克松接话说：“我要为这个干杯。我们尽管不同意您的政策，但是我们愿您健康。祝您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举起酒，一饮而尽后说：“到99岁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着什么急！”

尼克松抓住赫鲁晓夫的话做起了文章：“您说您99岁的时候还当权，还没有自由选举吗？”

这一场辩论，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很像是两个好斗的人之间的争吵。尼克松在辩论上略占上风，但是赫鲁晓夫的热情奔放和直截了当更能赢得听众。当时各国记者挤在四周进行录音，麦克风几乎碰到他们的脸上。尼克松显示出是一个喜欢谈思想的人，赫鲁晓夫则像是热爱自己的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维护他们的人。

这一辩论被当时舆论界称为“厨房辩论”和“索科尔尼基最高级会议”。

尼克松回国后，苏美在8月3日同时宣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9月到美国访问。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秋后到苏联回访。接着，双方紧锣密鼓地做起先期的预备工作。艾森豪威尔与国会要员们进行了磋商，并专程去西德、英国和法国同阿登纳、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会晤。艾森豪威尔表示，在柏林问题和涉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问题上将“寸步不让”。他还说，我要作出“一番巨大的努力，以便在卸任前把苏联领导人哪怕软化一点点”。当然，赫鲁晓夫也没有等闲视之。在访美前夕，苏联向月球发射了第二枚宇宙火箭，以增加与艾森豪威尔谈判的资本。

9月15日，赫鲁晓夫乘坐的图-114降落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机场。苏联大使缅希科夫对着飞机舷梯大声喊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在美国土地上向您致敬。”在欢迎人群惊愕莫名之际，赫鲁晓夫走下舷梯，秃顶、身材粗短，黑色西装上别着三枚小勋章。陪伴他的有腼腆的妻子尼娜·彼得罗芙娜，女儿朱莉亚、拉达，儿子谢尔盖以及63名随行官员。

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走上铺着红地毯的讲台，然后以主人身份向赫鲁晓夫一行致了欢迎词。接着，乐队奏两国国歌，鸣21响礼炮。对于美国这一最高规格的接待，赫鲁晓夫有点飘飘然了。他感到莫大的自豪与荣耀。是啊，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现在以荣誉赋予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代表。过去，这个国家在资本主义美国的眼里是微不足道的。

此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苏联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为时两周的导游旅行。苏联代表团参观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艾奥瓦州、得梅因、匹兹堡，最后回到了华盛顿。赫鲁晓夫在整个访问期间，到处发表演说，大讲苏联和美国能够在和平友好中生活，两国没有克服不了的

障碍。

赫鲁晓夫访美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艾森豪威尔提出美国不反对在适当的条件下召开苏联建议的四大国最高级会议，但如果赫鲁晓夫坚持不收回他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那么“我就永远不参加这种会议”。赫鲁晓夫对此解释说，西柏林已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刺激物，非得早日解决不可。然而，艾森豪威尔坚持不后退，眼看戴维营会谈将归于失败，赫鲁晓夫不得不缓和下来。当会谈进行到最后一天时，他只带了他的译员，对艾森豪威尔交底说，他决定采取公开步骤，取消他的在一定期限内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的建议。这样，艾森豪威尔以强硬的姿态，迫使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再次作出了让步。

赫鲁晓夫也利用艾森豪威尔急于想达成一项裁军协议的心情，提出从其他国家撤走军队，拆除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这一建议意味着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但是，美国绝不会放弃它在西欧的既得利益。艾森豪威尔也针锋相对地提议，两国不再继续试验核武器，并为此建立国际监督。当时美国在核武器数量、运载工具、远程轰炸机、远距离探测仪等方面都超过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其实就是要将双方的核武器水平“冻结”起来，使苏联永远无法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这当然是苏联绝对不能接受的。在裁军问题上，苏联和美国无法取得一致。赫鲁晓夫认为建立国际性的裁军监督机制条件不成熟，其原因是当时双方并不具备真正对等的条件：苏联在核弹头和导弹方面都远不如美国，而美国又处在苏联远程轰炸机的航程之外。苏联可以把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炸为灰烬，但对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美国本身，却无能为力。

在戴维营会谈期间，艾森豪威尔还特别希望赫鲁晓夫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同意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美苏两国在此前曾交换过对中国的看法。四国外长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去世，葛罗米柯代表苏联赴美参加葬礼，与美英法三国代表同乘一架飞机。飞机上，美国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坐到葛罗米柯身旁谈起了中国。“‘黄祸’十分严重，”麦克尔罗伊对他说，“现在绝不能听之任之了。此外，不仅应当考虑到它，还应同它斗争。”他看葛罗米柯没作声，又继续说：“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葛罗米柯琢磨这个美国人的意图是什么？是否是随便说说，或许代表官方。对此问题他感到很棘手，因为他还未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什么指示，尽管他知道苏中关系问题的一些症结，但中央还没有统一的口径，不能乱讲。他搪塞地说：“我们同你们，换句话说，苏联和美国的重要任务是寻求解决欧洲尖锐问题的办法，争取改善苏美关系。”

“但是，这方面毕竟有问题，”麦克尔罗伊说，“而且问题很大。在这方面，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必须考虑。”

葛罗米柯没有接他的话茬，谈话也就不好再进行下去。回到莫斯科，他立即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谈话的内容。两人一致认为，这是美国人计划好的，是一种试探。因此，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一问题的可能性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赫鲁晓夫尽管没有明确表态，但他还是以“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不应诉诸武力，而应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作为回答。

按照日程的安排，赫鲁晓夫 28 日应当返回莫斯科，29 日就要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10 周年国庆。对于去中国，他的感觉不像去美国那样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之间关系愈来愈难处，有些分歧已经向世界公开化

了，比如中印战争。苏联塔斯社已于9月9日发表了声明，对中印边境冲突笼统地表示“遗憾”。这一声明貌似中立，实际上是在偏袒印度。这不仅暴露了中苏分歧，而且是赫鲁晓夫在访美之前对艾森豪威尔所作的姿态。毛泽东对此非常气愤。

赫鲁晓夫带着顾虑飞到了北京。在机场迎接他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陈毅。欢迎仪式使赫鲁晓夫感到一丝冷冷的气息。

中国人对赫鲁晓夫的这种态度除苏联对中印战争的声明之外，还因为1959年6月20日苏联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于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已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些事情都是刚发生不久，中国人已被严重伤害，他们能不冷淡吗？

在座谈会上，陈毅直言不讳地问赫鲁晓夫，苏联为何发表这样一个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声明。赫鲁晓夫则不甘示弱地回答说，因领土的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并援引苏联如何和平地解决同土耳其和伊朗的边界争端的例子加以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外交，不是战争。”赫鲁晓夫重申，“况且，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是在西藏人口稀少的高山上。为这样一些小块的荒凉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吗？这么多年来你们不打仗也过去了。这边界是几十年前确定的。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拿它来小题大做？”

“你说得不对，”陈毅的炮筒子脾气上来了，“我们需要那块土地，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于法于理它都是属于我们的。英国人把它从我们的手里夺去时，印度还是他们的殖民地。”

“也许是这样，”赫鲁晓夫开始诡辩了。“但从那时以来，印度已从英国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就像中国已从外国统治下获得解放一样。中国同印度都参加了同当今世界上的地主和资本家剥削者作斗争的那些国家的行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用战争去解决你们之间的争论呢？”接着，他越说越出格，“你们看，西藏正好在印度的边界上，你们难道不理解。印度人认为有一个独立的邻居是至为重要的吗？西藏是一个很弱的地区，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可是，一个属于中国的西藏就会对印度构成威胁。你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吗？”

赫鲁晓夫的言论不只是站在印度一边，而且是在替达赖喇嘛说话；不只是颠倒是非，而且是在反华、干涉中国内政了。

事实是，在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向中国提出了大片领土的要求。8月25日，印度派武装部队侵占中国境内的朗久之后，推进到马及墩地区南侧，并向中国边防军开火，挑起了第一次边境冲突。中国边防军被迫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度的进犯部队。9月8日，周恩来总理复尼赫鲁3月22日函，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绝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

赫鲁晓夫的信口雌黄，表明了苏联对恢复两党友好关系已无丝毫诚意。

讨论中，赫鲁晓夫又提出建立长波电台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毛泽东不容争辩地说：“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毛泽东再次一口回绝。

赫鲁晓夫仍不死心，试图说服：“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谈话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心怀不满的赫鲁晓夫在9月30日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招待会上，表现得不够友好了。他不指名地批评中国“不应当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随后，他按照艾森豪威尔的意图对台湾问题发表意见说，台湾问题是一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美国支持蒋介石，苏联支持中国，这就造成大战前夕的气氛，而苏联是主张创造一切条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根绝战争的。赫鲁晓夫这些话实际上就是要中国同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国领导人毫不客气地给予了驳斥。赫鲁晓夫恼羞成怒，指责中国“像好斗的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像托洛茨基那样既不战，又不和”，等等。

裂痕越来越大，已无法弥合。当年曾经芬芳扑鼻盛开友谊之花的两国人民友好同盟，顷刻间变成镜中花，水中月，中国的大门紧紧关上了。隔阂和敌对取代了兄弟情谊。赫鲁晓夫在冰冷的气氛中回国了。此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再没有见过面。



## 第十一章

### 从缓和走向紧张

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不久，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苏联同意收回限其他占领国在六个月内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的声明，美国也同意就柏林地位和德国统一问题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赫鲁晓夫还正式邀请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春季后访问苏联。

艾森豪威尔原定在出席巴黎四大国首脑会议以后，于1960年6月10-19日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打乱了原定计划。

美国的一架U-2型高空侦察机被苏联击落。

U-2型飞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要求特制的，其特点是机身长、尾巴高、翅膀宽、全身漆黑，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发动机，驾驶舱中只容一人驾驶。机上无任何炮火装置，只有透过机身下面的七个舱孔对外拍照的灵敏的红外线摄影机。这些摄影机能把宽200公里长500公里的地面景物全拍摄下来，洗印成4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的清晰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照片经过高倍数放大后，判读人员可以认出飞机在1.5万米高空拍摄的报纸的标题。其他的装置能够从空气中测出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证据，能够测定苏联雷达的效能。这种飞机靠飞行高度作为防护手段。由于充分利用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的原理，U-2飞机能在很高的高空保持有效的续航能力，据说超出了苏联雷达的探测范围。总之，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精密的侦察飞机。在五一节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鲍尔斯这次飞行要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美军基地起飞，在空中飞行6000公里后在挪威博德降落，这样就可以飞越过去从未拍过照的重要目标。

U-2飞机的驾驶员对于这一次飞行的目的有几种推想：一是因为当时苏联人在导弹制导方面的技术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中央情报局力图尽快地把更多的目标拍摄下来。其次是：即将同苏联人达成的缓和协议会使得以后不宜于再进行任何隐蔽的活动；再有就是艾森豪威尔在同赫鲁晓夫谈判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资料。飞行员对这种飞行的危险性还是很担忧的。鲍尔斯就说过：“在关键部位，一个螺丝钉松了，飞机就会栽跟斗。”他们还担心苏联雷达的水平已发展到可以跟踪他们飞行的程度。

鲍尔斯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年轻人。他从事这一飞行一是为冒险，二是为多挣钱。他认为这是极正常的事，挣钱多的事，就不好干。否则大家都去干了。不过，他也不是那种傻卖命的人，挣钱是为了花，没命了要钱也就没有用了。他的哲学是：冒险-挣钱-保住性命，他曾问一名情报官，“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人掉在苏联境内怎么办？那个国家那么大，要走到边境，可真够走的。在那里有没有接头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几个名字和地址？”然而，他得到的回答是：“不成，我们提不出。”“那好吧，假定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他应该怎么说呢？具体他讲，他应当说多少呢？”鲍尔斯还想搞得清楚些。情报官不耐烦地说：“你照实全说算了，反正他们会逼着你全说出来的。”

设计人员给飞机装上了自毁装置以及反雷达装置。如果迫降，可以飞往芬兰或瑞典备用机场。因为降落在任何地方，也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也考虑过出现意外后驾驶员的自杀问题，当时还没有统一规定，暂时由飞行员自己决定。氰化钾药片是现成的，随便拿。还有一种藏在银元里的毒针，轻轻一刺立即致命。鲍尔斯准备最后一次飞行时，上司曾问他是否要那银元。前几次飞行他什么都没带，这次他改变了主意，他想这枚毒针也许能当武器。他把毒针顺手放进他飞行衣的口袋。此外，他还带上了若干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和苏联卢布、金币、手表和戒指，以便在需要帮助时行贿或与人进行兑换。他还带着一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证件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执照，最后是一幅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面用俄文等 14 种文字印着“我是一个美国人”的字样。

鲍尔斯一到巴基斯坦就感觉事情要糟。因为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 U - 2 飞机已停飞进行检修。他这次飞行只好用备用的 U - 2360 号。360 号飞机油箱经常发生故障，有时不往发动机里供油，到时就得迫降。

如果油箱供油正常，其他一切也顺利，鲍尔斯的整个航线就会像个“之”字形。他从白沙瓦起飞后，本来将横越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兴都库什山，在阿什哈巴德附近进入苏联。然后，他得飞越咸海、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汉格尔斯克、坎达拉克沙和科拉半岛上的摩尔曼斯克；在穿过苏联之后，他还将飞越巴伦支海和挪威的北海岸，最后到达博德基地。这次飞行大约要九小时。整个航程的 3 / 4，即约 5000 公里，将在苏联境内。

飞行日期一推再推，最后定在 5 月 1 日。早晨，鲍尔斯爬进座舱。座舱里酷热难当，只一会儿，鲍尔斯便浑身湿透，又等了 20 分钟，白宫的命令才到（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当飞机升入高空时，鲍尔斯立即逐条填写飞行日志：机号，360；架次，4154；起飞时间，当地时间是早晨 6 时 26 分，莫斯科是凌晨 3 时 26 分。

飞机在咸海上空时，他朝下望去，看到一架单引擎喷气机排出一道白色的尾烟，在平行的航线上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到一条尾烟，这次的方向与上一次相反。他猜测苏联的搜索雷达已在屏幕上发现了他，派出了巡逻机。他并不惊慌。那两道尾烟在他下面很远，苏联的飞行员不可能看见他。

莫斯科时间早晨 5 点，赫鲁晓夫床边的电话铃响了，赫鲁晓夫拿起话筒。来电话的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他向赫鲁晓夫报告，一架美国 U - 2 侦察机越过阿富汗国界，进入了苏联领空。赫鲁晓夫回答说，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把它打下来。马利诺夫斯基说，命令已经下了，他还保证“如果防空部队能够睁大眼睛不打瞌睡的话，肯定会把它打下来”。马利诺夫斯基指的是 4 月份曾有一架 U - 2 飞机飞越苏联领空，当时没有及时开火让它跑掉了。

4 月的飞行是 1960 年中央情报局计划中的两次飞行的第一次，鲍尔斯当时被确定为那次飞行的后备驾驶员。结果这次轮到他了。

鲍尔斯来到苏联的卡纳维拉尔角，丘拉但发射场上空，朝下望去，可以看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的发射台。他拨动开关，打开了所有摄影机。前面的云层开始增厚，他关掉摄影机。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 80 公里的上空，无云，他清晰地看到一度被视为欧亚分界线的覆盖着冰雪的乌拉尔山脉。就在这时，飞机出了毛病。自动驾驶仪严重失灵，机身朝上倾斜。他关掉自动驾驶仪，人工操纵了一会儿，然后再次开动自动驾驶仪。飞机还是倾斜。他曾考虑是否要返回巴基斯坦——在无法完成飞行的情况下，驾驶员有权决

定。但是他已经进入苏联国境 2000 公里，而且往前飞能见度又极好。他决心用手操纵继续飞行。越过一片油库区和一处综合工业区，他侧转机头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向飞去。在这里，他在 10000 米的高空又侧转 90° 向北飞去。他再次逐项填写飞行日志：高度、时间、速度、气温和引擎仪表数据等。他突然感到什么东西轰的一声撞在机身上。飞机猛然向前一颠，一股炫目的桔色火光冲进了座舱。

当时，在白宫大约是午夜后半小时，在克里姆林宫是清晨 7 点半。鲍尔斯心想：“老天爷，这回让我碰上了！”

一经失控，飞机开始往下俯冲。他伸手要去打开自毁装置，又改变了主意；想先取得使用弹射舱座的位置。可是不成，金属座舱罩的横杆总是别着他的腿。若这样弹射出去，两条腿就保不住了。这时，他已跌落到 5000 米，而且还在快速跌落。一闪念间，他又想到自毁开关，但是他首先得解开安全带。解开安全带后，重力把他的半个身子拽出了机舱，而输氧管又把他拉住——他忘了把输氧管拔掉。恐慌中，他连踢带拉总算挣脱了身子，飘浮在空中，正想拉开降落伞，忽然感到身子猛的一抖。在 2000 多米的高空，降落伞已经自动张开。突然间，他看到黑色的机翼从他身旁滑过。机身完好，疾速下落。他想到了那枚银元。他把那金属环拧开，拔出那根自杀用针。然而，最后他还是把它塞进了口袋，他不想死。

鲍尔斯降落的地方是个很大的国营农场，农场的工人缴了他的手枪，把他看管起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很快便赶到了。

莫斯科红场此时正在举行军事检阅。天空阳光灿烂，广场上一片欢腾。防空部队总司令比留佐夫元帅走上列宁墓上的检阅台，在赫鲁晓夫耳边轻声说道：“U-2 飞机已被击落，驾驶员也已被捕，目前正在审讯之中。”

U-2 型飞机在苏联领空飞行已经有些年头了。苏联为此已提出过数次抗议，但因为没抓住把柄，美国人每次都进行反驳，说他们没有任何飞机飞越苏联的领土。苏联曾用战斗机进行拦截，但都因达不到高度而“望机兴叹”，眼睁睁地看着美国飞机从眼皮底下溜掉。近两年，U-2 飞机的飞行次数明显减少，如今，苏联制造出了地对空导弹，终于抓住了一次机会。

5 月 2 日，美国报纸刊载了一则消息说：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宣布，一架气象观察机在驾驶员报告供氧设备发生故障后，在土耳其上空失踪，驾驶员可能飘落到俄罗斯和土耳其边境。

5 月 5 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称“这一行动是旨在破坏最高级会议的侵略性挑衅”。但他却故意没有说飞机是在什么地方击落的，也没有说驾驶员是否活着，是否已经被捕。赫鲁晓夫的目的是要给美国政府造成混乱。只要美国人以为飞行员已经死了，他们就会继续编造谎言，这样就可以获得主动，以便进一步揭露美国人的谎话，让他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

果然，美国国务院在赫鲁晓夫 5 月 5 日的讲话后，派发言人林肯·怀特解释说：“美国绝对没有蓄意侵犯苏联领空的意图，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意图。”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确认该“气象观察机”驾驶员是弗朗西斯·鲍尔斯。这正是赫鲁晓夫所期待的。

接着，赫鲁晓夫宣布，飞机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击落的，驾驶员还活着，而且已向苏联当局提供了所需要的情报，另外还在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拍摄苏联飞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的详细情况的胶片。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提

出了正式抗议，美国国务院立即承认撒了谎，说从苏联拒绝了艾森豪威尔1955年在日内瓦提出的“开放天空”的建议后，美国便已开始这种飞行。国务卿赫脱为艾森豪威尔开脱责任说，艾森豪威尔只管批准飞行计划，但具体的飞行无须总统批准。

赫鲁晓夫命令把U-2飞机残骸送往莫斯科，在高尔基公园公开展览，赫鲁晓夫亲自前往，并在展览会上讲话说：“我要是欢迎一个向这里派遣间谍飞机的人，苏联人民会说我是疯子。”

由于苏联态度强硬，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公开承认U-2飞机的飞行应由他个人负责。他说：“这个决定是我做的，过去一切这类飞行，事先我都知道，并且亲自批准。他们把这次越过苏联上空的飞行计划送来的时候，我认为不过是已经确定的情报政策范围内的几项行动计划中的一项，因此也批准了。我丝毫不曾想到它对于最高级会议或对我即将进行的莫斯科之行可能会有什么影响。除非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这类事原本是不会有影响的。”他还说：“除非邀请被撤销，我目前仍计划飞赴莫斯科。”

距最高级会议的召开还有几天，赫鲁晓夫飞抵巴黎，随同人员有葛罗米柯和马利诺夫斯基。他在各政府首脑的预备会议上宣布，除非美国停止一切U-2飞机的飞行活动，对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道歉，并惩办对这类飞行活动负有责任者，否则他将不参加最高级会议。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希望赫鲁晓夫能够息怒，将态度缓和一下。他们说，如果他坚持要艾森豪威尔作出上述声明，四大国会议将会失败，要知道，美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作出那种说明。赫鲁晓夫坚持己见，说苏联不是个二等国家，按人口和领土，苏联比美国还大。如果美国这样的大国可以不受惩罚地凌辱小国的话，对待苏联这样的大国就要打破这个惯例。两位首脑见赫鲁晓夫不听劝告，也就不再说话。

5月16日，四国首脑会议在巴黎爱丽舍宫如期举行。赫鲁晓夫、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分别代表苏英法美四国，鱼贯步入会议厅。

会议正式开始前，赫鲁晓夫要求东道主戴高乐允许他发表一个声明。戴高乐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见他如此固执，只好答应。

赫鲁晓夫的发言是已经写好的，为防止美国人抓辫子，事先在代表团内部已经字斟句酌地推敲过。他一改往日即席演说、信口开河的做法，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声明要求艾森豪威尔停止间谍飞行并处分与U-2飞机事件有关的人员。他还建议最高级会议推迟六到八个月，等美国大选后再举行。艾森豪威尔坐在那里，面色阴沉。赫鲁晓夫一念完声明，他便站了起来回答说：“在最近的事件发生后，这种飞行已经停止，以后也不再恢复。”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回答仍不满意，他重申了声明中的一句话：如果不能得到美方满意的答复，苏联将收回让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的邀请。

接着，出现了长时间的冷场，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艾森豪威尔首先站起身，整个美国代表团也跟着站起身。赫鲁晓夫、戴高乐、麦克米伦也纷纷站起。赫鲁晓夫放了一炮，把四个代表团都赶回了各自的房间。

戴高乐通过法国外交部长给赫鲁晓夫捎话说，会议要在美、英、法三国代表团讨论苏联声明的结果后再决定是否复会。

赫鲁晓夫利用这空闲的一天，同马利诺夫斯基到离巴黎100公里处的普勒絮马勒乡村去旅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利诺夫斯基曾作为俄国远征

军的机枪手在这里驻扎过一段时间。当时的一位房东现在还活着，马利诺夫斯基很想去看看。

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与两名保卫人员一起从巴黎出发，沿着菩提树成荫的美丽的法国乡村道路前进。5月的巴黎郊外阳光灿烂，春风拂面，空气湿润而温暖。可以看出，不久前刚下过一场大雨，在一个地方，一棵被风刮倒的菩提树挡住了去路。赫鲁晓夫下车后，从一名护路工人手中接过一柄斧子猛砍，惹得四周的法国人围观。摄影师把整个场面都拍了下来。赫鲁晓夫此举的意图，是想让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看看，苏联政府是由工人组成的，政府的领导人虽然年事已高，仍然能用双手干活。

他们在村子里同当地的村民在小酒馆里喝酒谈天，回忆往事，无忧无虑地放松了一天。

巴黎，戴高乐和麦克米伦在作最后的努力，企图挽救会议。下午3时，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麦克米伦聚会。艾森豪威尔表态说：不道歉、不惩办。下午5时整，最高级会议终止。

当天傍晚，当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驱车回巴黎时，留守的葛罗米柯告诉他们：四大国会议取消了。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该离开巴黎了。当他们乘坐的敞篷车驶往机场时，路边的人有的向他们招手，有的挥舞拳头。赫鲁晓夫对路人的表示不屑一顾。他确信自己对这件事的处理是正确的。他感到骄傲的是，他们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给予了严厉而完全正当的反击，当美国人侵犯苏联主权时苏联就使他们安分下来。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勇敢地抵抗美国人，美国人就会继续派间谍到苏联来。艾森豪威尔不是说美国人有权飞越任何“封闭”社会的领土嘛。好吧，如果“封闭”社会是一种能控制其边界的社会，那么也许苏联就是这样的社会。苏联准备殷勤接待它邀请的任何客人——但是任何不速之客都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下场……

赫鲁晓夫带着这些想法，来到了机场，登上了飞回莫斯科的飞机。

最高级会议流产了；艾森豪威尔的访苏计划也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不能以接待美国总统时应有的那种殷切心情来接待他”的理由被取消。苏联报纸又开始公开谴责美国的政策。被赫鲁晓夫一度说成是标志着“人类历史新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不出一年就荡然无存。而艾森豪威尔更干脆，他表示“我从不知道有什么戴维营精神”。美苏关系又下降到“零点”。

1960年9月22日，苏联宣布，参加联合国大会第15次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已经组成。代表团将由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葛罗米柯，外交部副部长佐林，维诺格拉多夫，索尔达托夫。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美国总统访苏邀请被取消，令美国丢了面子，苏联国家首脑不经任何邀请竟能坦然踏上美国国土自由发表演说，实让公众舆论难以接受。

在美国政府看来，U-2飞机事件尚未平息，赫鲁晓夫再次来美国是极为讨厌的。此外，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竞选已进入决定性关头，赫鲁晓夫的来访势必会分散人们对竞选的注意力，而来访本身对共和党现政府来说更是一件不受欢迎的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仿效苏联，宣布他们国家出席本届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将由本国领导人率领。

到了预定启程去纽约的日子，赫鲁晓夫的座机出了毛病。现在只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或乘别的飞机途经伦敦去纽约，或者乘船去纽约。最后，赫

鲁晓夫决定乘船从加里宁格勒经波罗的海和大西洋驶往纽约。

这艘船的来历还较为复杂。它 1940 年建造于阿姆斯特丹并由德国人使用。二战后，它作为战利品交给苏联海军。1957 年前，也就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六月全会向赫鲁晓夫发难之前，这条船一直被命名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反党集团”被揪出之后，这条船改名为“波罗的海”号。

赫鲁晓夫别出心裁地邀请华沙条约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参加航海旅行，以便有机会与这些国家的首脑举行会谈和讨论问题，以保证对列入联大议程的各种问题采取一致的立场。航程差不多需要 10 天的时间，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准备他在联大上的发言。

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陆续来到船上与赫鲁晓夫会合：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罗马尼亚的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以及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每个要人都有一大批随行人员，船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坐满了苏联东欧的党政重要领导人。赫鲁晓夫这一想法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只要遇上一颗二战时期留下的水雷，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就要重新改组。

赫鲁晓夫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海军部门的专家们建议，用两艘扫雷艇护航，当“波罗的海”号驶离英法水域后，让在大西洋上航行的苏联船只靠近行驶，以便应急。

当船穿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辽阔的大西洋时，赫鲁晓夫感到自己被一种新鲜罕有的感觉所压倒。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处在一望无际的水面上。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心旷神怡”。

早晨，赫鲁晓夫走上甲板，坐进摇椅，让他的助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大声地给他读从莫斯科用无线电拍发来的最新的新闻摘要。

赫鲁晓夫在船上如同一个家长，同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愿意交谈。尽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安人员不赞成，他还是经常同各代表团合影。他以在甲板上运动为乐。天气晴好时，他总是找几个人玩掷木盘游戏，把一只大橡皮圆盘用一根棒子推过甲板让它停在写有不同号码的方格子中。每次玩时，都有很多围观者为他欢呼喝彩，在欢声笑语中，他越玩兴致越高，并总想多赢人几分。

他手里经常拿着一本书，然而他的文学知识是零碎而不系统的，始终未能善始善终地读完几本书。对于西方文学他更是所知甚少。他一直说，如果有时间要补上这门课。赫鲁晓夫不会外语，也不想学。“我还是把俄语学好吧。”他不无赧颜地承认说。在此问题上，斯大林也批评过他。一次，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不景气的农业状况。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他啰啰嗦嗦，拖泥带水，语法搞错，重音读错，外加不少口头禅，让人听得心烦。他还一个劲儿要求立刻通过决定，速战速决。当然，在这冗词赘语中还能让听者理解到他的见解与聪明睿智。斯大林耐心地听完了他的报告，以他特有的沉稳态度口授了一个决定。他说：“第一，由于时间紧迫，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边；第二，赫鲁晓夫同志必须认真学习俄语。”受到挖苦的赫鲁晓夫显然很难堪。他曾下决心要好好学一下，结果由于权力不断扩大，地位不断上升，终于没能腾出空来进行学习。一晃几年就过去了。1957 年以后外事活动频繁，就更没有时间了。如今他已是 66 岁的人，学起来谈何容易。现在他人胖了，行动也有些迟钝了。在手下的人看来，生活中的赫鲁晓夫是个笨手笨脚的人，一身上下乱糟糟；宽大的上衣加上既肥又皱的裤子。

他忽而满面春风，忽而大发雷霆。他独自一人或和亲近的同事在一起时，偶尔也流露出一种不常有的忧郁感，一种黯然神伤的厌倦情绪。但这种形象的出现往往很短暂而难以让人察觉，他很快便恢复到兴冲冲的样子。

起草决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外交部的内圈人物称之为“苏联新的重大主动行动”——的工作在莫斯科已基本完成。在“波罗的海”号上主要是定稿和润色，使它具有最诱人的宣传色彩。赫鲁晓夫指示秘书们使建议的条文和他的讲话文稿尽量做到简单畅晓，使更多的人，甚至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都能看懂。

秘书们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便整日搜索枯肠，寻找犀利的句子。在秘书们的工作中，生动而有力的对比、俄罗斯民间谚语和格言与阐明建议的实质内容同样重要。格言和谚语集是为赫鲁晓夫起草文件和报告的人的必备参考书。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米别伊和《真理报》主编萨丘科夫负责在文笔和宣传方面提出修改意见，是赫鲁晓夫形影不离的助手。他们在这方面技艺超群，远远胜过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也提建议，出些主意，但口才和文采较为逊色。葛罗米柯对赫鲁晓夫提拔阿米别伊颇有看法。虽然赫鲁晓夫也很欣赏葛罗米柯的英语能力和外事活动的经验，但他总忍不住要对他戏弄一番。他常常当着众人把葛罗米柯叫做“死板的官僚”。“瞧，”赫鲁晓夫常笑吟吟地指着葛罗米柯说，“安德烈·安德烈那维奇看起来多年轻，他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他准是老呆在一个舒服的角落里喝茶。”葛罗米柯尽管心中不满，但也得强作笑脸。

赫鲁晓夫有时也亲自修改秘书写好的讲话稿，以便说起来更顺嘴。在船舱里或甲板上，赫鲁晓夫一连几小时把他的想法快速口授成文稿，使得苦恼时速记员在速记本子上紧张地写完一页又一页。草稿常常是乱糟糟的，连最有经验的速记员有时也难以把他杜撰的许多笨拙词句编成合乎语法的俄文。

赫鲁晓夫在船上一改平时的习惯，痛饮杯中物。有时，他在痛饮了一天之后，在晚上就没了边没际地打趣，乱开玩笑。经常陪伴他喝酒的是亚诺什·卡达尔，此人也是海量，赫鲁晓夫一天几次去卡达尔的船舱。卡达尔机智、精明，为了少和赫鲁晓夫交谈，他在船上有空便打牌。哪怕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他也会掏出一副牌来，看那个架势，他已打定主意，美国之行就是彻底的休息。这让赫鲁晓夫非常恼火。纳吉已于两年前（1958年）被处决，卡达尔在整个旅行中绝口不提1956年匈牙利事件。与赫鲁晓夫常常在一起聊天则是托多尔·日夫科夫。他对赫鲁晓夫特别殷勤。他在与赫鲁晓夫交谈时经常表示他同意赫鲁晓夫的每一句话。日夫科夫能够听懂俄语，所以两人交谈较容易，而赫鲁晓夫与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交谈就要借助翻译。

罗马尼亚人显然不像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那样受宠。赫鲁晓夫在私下里对苏联代表团的人说，乔治乌·德治总的来说不是个坏共产党员，但作为领导人他没有魄力，太消极被动。他还说，在罗马尼亚，甚至在其共产党的队伍里，有害的民族主义和反苏态度正在发展，这种态度必须根除。“对此不能手软”，他曾公开宣称，“‘罗马尼亚稠粥’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个婊子。”赫鲁晓夫突然住口不再往下说了，他觉察到自己有些太过分。“我指的是，”他为了给自己开脱而牵强地补充说，“革命前的罗马尼亚”。

一天晚上，灌了一天杯中物的赫鲁晓夫想寻开心。他对坐在身旁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说：“你给我们跳个戈帕克舞吧。我很想看乌克兰歌舞。”

波德戈尔内吃惊地看着赫鲁晓夫。他已经是 60 多岁的人了，这把年纪根本跳不了戈帕克舞。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弄不好会要了老命。戈帕克舞是乌克兰青年跳的一种动作剧烈的舞蹈，跳时要下蹲并快速轮流踢两腿。赫鲁晓夫又说了一遍，再次要他跳。波德戈尔内看出这个醉鬼不是说说就算的。他勉强站了起来，很不是滋味地模仿戈帕克舞的基本动作比画了几下。令人难堪的是他显然不会跳，但醉鬼赫鲁晓夫却起劲鼓掌并称赞波德戈尔内：“跳得好！你呆在基辅正合适。”

赫鲁晓夫在船上还召开了一个讨论前比属刚果局势的会议。刚果当时刚取得独立，但事态的发展对莫斯科不利。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刚果从我们的手指缝中溜掉了。”

在整个航程中，赫鲁晓夫一直在考虑联合国插手刚果的事，特别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和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活动。“我啐联合国，”当助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向他读了来自非洲的一些特别糟糕的消息后，他怒冲冲地说，它不是我们的组织，那个乡巴佬废物蛋插手了与他毫不相干的重要事务。他夺取了不属于他的权力。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必须千方百计除掉他。我们得让他受不了。”他咆哮道。

他说，他准备提出在联合国中成立三个执行小组来取代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这是一个阉割联合国的办法。葛罗米柯提醒他这个想法同苏联反对对联合国宪章作任何修改的长期政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是赫鲁晓夫听也不听。

赫鲁晓夫性格固执，任何人都很难改变他的主意，尤其是他的权力现在已经变得至高无上，甚至当他已经知道别人的意见正确时，他仍然固执己见。

一天，在甲板上晒太阳时，赫鲁晓夫信口但却条理清楚地对站在旁边的助手说，他打算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来扩大苏联的影响。他用手抓住头上那顶心爱的草帽免得被风吹掉，“我不能没有它，”他笑着说，“它有助于我思考问题。另外，我想我的帽子也不合鲨鱼的口味。”他接着又说：“我们在纽约得和一大群而且是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鲨鱼打交道。”

接着，他开始分析西方各大国的情况以及苏联应采取什么策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英国强烈反苏，不可救药。“狮子的头上可能长疥，但还能咬人。俗话说，‘英国女人拉屎没个完’，这不是没道理的。”不知他说这些对他的结论有何帮助。这就是赫鲁晓夫的语言风格。

“法国则是另一回事，”他说，“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环把整个欧洲像一条铁链那样拉到我们这边来。”他瞧瞧自己的肚子，便回忆起最近的巴黎之行。“他们请我们吃好的，让我们喝香槟，真是棒极了。我们也不含糊，我们满足了戴高乐的自尊心。我们给他灌米汤。对他就得来这一手。”

他认为对付德国人比较麻烦。但德国的经济和技术是主要的争夺目标。他说，应该让德国明白，它永远别想统一德国。“如果有必要，”赫鲁晓夫想了想说，“我们可以显示一下力量，让那些看不情形势的西德政客们清醒过来。”但他认为一旦他们认识到了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有可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贸易上的让步。苏联可惜重德国经济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不要忘记，十月革命后成为我们第一个贸易伙伴的是德国。”

至于美国，赫鲁晓夫认为一时还看不到它改变态度的希望，但仍有许多机会可以在欧洲“激起”对美国的“疑虑”。“去年我们搞了个戴维营精神，



把北约国家小小地吓唬了一下。我们应该进一步使美国反对欧洲，使欧洲反对美国，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教给我们的策略。我们没有忘记他的教导。”他对部下摇晃着一个手指说道。

秘书们正在对赫鲁晓夫口授的联合国大会讲话进行最后润色。这一讲话以很大篇幅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秘书们认为应该把与主题无关的成就统计数字删掉一些以缩短讲话。他们把这一想法告诉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非常生气。“联合国那些人应该听听我们的观点，”他说，“他们只会空谈，每天浪费的纸张可以堆成凡座山。我们不考虑节约纸张，我们就是要在联合国进行政治灌输。”他说，列宁曾说“社会主义具有榜样的力量”，并说“有必要通过榜样来说明共产主义的含义”。接着，赫鲁晓夫兴冲冲地大谈把马列主义的理论遗产运用于实际工作是如何重要和有益，说他自己经常在马列著作中得到恰当的指导。

可以看到美洲大陆了。赫鲁晓夫时常站在甲板上，用挂在胸前的望远镜远眺波光粼粼的海洋。他同身边的人开玩笑说：“如果我掉到海里，古巴人会来救我的，现在离古巴不远，他们对我的接待可能要比美国人在纽约对我的接待强。”

“我希望，”他若有所思地说，“古巴会成为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灯塔。卡斯特罗带来了这个希望，美国人也正在帮助我们。”他说美国不与古巴建立正常关系，反而组织了反卡斯特罗运动，煽动拉丁美洲的国家反对他，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把它逼到了绝路上。

“这很愚蠢”，他扯着嗓子说，“这是美国那些热心的反共分子大叫大嚷的结果。他们看到什么都认为是赤色的，其实有些东西可能只是粉红色的，甚至是白色的。”

他接着预言：“卡斯特罗会像被磁铁吸住那样来找我们的。”他准备到纽约后与卡斯特罗会面。

上次，他到美国是从天而降。当时美国正值夏天，风和日丽，欢迎的人群穿着华丽的夏装就像五颜六色的花坛；仪仗队、红地毯，一切都光彩夺目。这次他从水上来。船只驶过自由女神像后，他的感觉越来越糟。作为“欢迎仪式”，一条满载示威者的船向他们驶来。穿着奇装异服的示威者朝他们挥动手中的标语牌，举起象征赫鲁晓夫的稻草人，并且用扩音器向“波罗的海”号喊口号。这些抗议者和示威者都是国际码头工人工会的会员。一年前，这个工会的主席曾经在旧金山设宴款待过赫鲁晓夫。如今是今非昔比，这一回工人们是专门花钱租船来请赫鲁晓夫吃“闭门羹”的。“波罗的海”号在美国水上警察汽艇的护送下来到了泊位。这个码头的状况极差，相比之下，示威简直算不了什么。赫鲁晓夫终于愤怒了。他大声喊道：“哼，哼，美国人对我们又耍了个鬼花招。”

其实，美国人这回是冤枉的。此事是苏联驻美国大使缅希科夫和不久前出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的瓦莱里安·佐林经办的，与美国人毫无关系。缅希科夫曾向莫斯科报告，在美国一切事情都是要用美元来办，租用一个好码头得花许多钱。当外交部请示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随口说道：“我们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租码头上呢？我们的船停泊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告诉我们的大使租最便宜的地方好了！”执行者缅希科夫是个抠字眼的人。他们费了不少劲才给赫鲁晓夫租到这么一个停泊点。俗话说，便宜没好货。这个靠近第35街的码头年久失修，在缅希科夫租用之前实际上早已弃置不用了。

在这样一个码头靠岸，其狼狈的状况可想而知。码头工人很难找，码头工人工会的有意抵制使情况更加糟糕。结果是只能靠自己。外交官和船员们配合，费了不知多大劲儿，花了不知多少时间，总算是上了岸。他们一个个满手油污，汗流浹背，衣服蹭脏了，领带也拽歪了。好在欢迎的都是自己人，是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警察还算“帮忙”，不让记者们接近。“波罗的海”号的旅行家们上岸后，急忙钻进车子，直奔驻地。

赫鲁晓夫在纽约帕克大街苏联代表团驻地安顿下来后，即指示佐林，安排同卡斯特罗的会面。

安排同卡斯特罗的会面对于教条主义者佐林来说是个难题。苏联代表团到达纽约后，卡斯特罗从纽约市区的中部搬到哈莱姆区古老的特里萨旅馆。这座旅馆年久失修，靠近街道的拐弯处总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在游来荡去。卡斯特罗认为住在这里没什么不好，这可以显示他是来自于人民。环境不安全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都劝赫鲁晓夫不要去特里萨旅馆进行拜访。佐林建议邀请卡斯特罗到苏联代表团来。但赫鲁晓夫坚决不肯。他要去哈莱姆区见卡斯特罗以示敬重。他想表明他虽然是大国的领袖，但对礼仪和安全问题并不在乎，他也是来自人民。

赫鲁晓夫在与卡斯特罗通过电话后便出发了。他没有通知美国警察就突然离开了帕克大街。起先，赫鲁晓夫的汽车在车流里平静地行驶。但在半路上警察截住了他的车。警车的出现，警报器的叫声，再加上笨拙的疏导方法，使整个车流陷入混乱，出现了严重的阻塞。许多人明白了混乱的原因，再加上政治上的怨恨，西红柿、苹果、鸡蛋开始飞向赫鲁晓夫的汽车，一片叫骂声……全靠苏联司机的高超技术和冷静的头脑才冲出了困境。特里萨饭店旁喧声鼎沸。这里有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古巴的反政府分子。一部分人高呼欢迎口号，另一部分人则大声咒骂。

赫鲁晓夫的保卫人员在人群中“打开了”一条狭窄的通道，簇拥着赫鲁晓夫进入了宾馆前厅。电梯把他送到卡斯特罗住的楼层。那个不大的房间挤进去许多人，不要说坐下，连站的地方也没有。

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热情拥抱。一个体态矮胖，秃顶的四周是一圈白发；一个身材高大，浓浓的黑胡须和松软丰厚的头发。这是一对忘年交。

拥人房间的人群愉快而激动，他们闪出一块地方让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单独交谈一会儿。窗外传来饭店前广场上群众的口号声：赫鲁晓夫！卡斯特罗！

赫鲁晓夫对哈莱姆之行很满意。当他在船上远眺美洲大陆时，一个想法已在他脑中形成：他要把古巴作为制约美国的前沿阵地，他要在美国的后院点一把火，让它“食不甘味、寝无安席”。卡斯特罗向赫鲁晓夫表示要同苏联建立亲密的友谊，并要求提供军事援助。赫鲁晓夫对卡斯特罗的评价是：“他会成为一个好共产党员，不过这是一匹没驯过的小驹子，性子烈，所以得小心。”

纽约当局通知苏联代表团，为安全起见，赫鲁晓夫不能到曼哈顿以外的地方旅行。这令赫鲁晓夫感到是受了侮辱。他原来计划在没事的时候到长岛的格伦科弗小住。格伦科弗是苏联政府在1948年买下的一处富丽堂皇的庄园。庄园很大，有花园、游泳池、喷泉和雕像。庄园的主楼是按苏格兰城堡的样式在20世纪初兴建的，是当年庄园的主人为新娘送上的结婚礼物。后来这对夫妇殉情而亡。人们传说新娘的阴魂时常在庄园出现，因此无人敢住，

售价不断下跌，让苏联政府拣了个便宜。经过修缮，这个庄园成了一个很好的修身养性的地方。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终于发作了，他把对他行动的限制变成了政治问题。他在联大讲话时指责美国和美国当局没有为会员国代表创造有利条件，限制和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他说：“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难道现在不是应该给联合国总部另选一个地方，一个将更有效地促使这个国际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地方吗？举例而言，这个地方可能是瑞士或奥地利。我可以最负责地宣布，如果人们认为把联合国总部设在苏联是可取的话，我们将保证为它的工作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并保证所有各国代表的绝对安全。”

赫鲁晓夫这一番话言不由衷，只不过是泄泄私愤而已。事实上，莫斯科最不希望联合国搬迁。在莫斯科或在“波罗的海”号船上为这次大会进行准备时，都没讨论过联合国总部的迁移问题。赫鲁晓夫关于把联合国总部迁往苏联的“负责的”宣布，是特别不负责任的。在莫斯科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会使苏联当局感到恐惧。当时，在莫斯科设立的联合国新闻中心尽管规模很小，苏联政府仍明令禁止雇佣一个外国人。其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不会同意这一动议，联合国迁出纽约意味着在纽约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谍报网将付诸东流。

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会议上，逢会必有发言。其中一次会议期间，他发言11次，从而打破了以往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言次数的最高纪录。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规矩。

在1960年10月1日的联大会议上，议题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但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对西班牙的佛朗哥进行攻击。赫鲁晓夫指责佛朗哥“建立了血腥的专制政权，并砍掉了许多西班牙最优秀儿子的脑袋”。

大会主席爱尔兰人弗雷德里克·博兰认为赫鲁晓夫的讲话太过分了，便打断他，要求他不要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恣意进行人身攻击。赫鲁晓夫受到如此对待，一下子火了，便继续谩骂佛朗哥。

他发言后，西班牙外长费尔南多·卡斯铁利亚针对他的发言回敬了他。赫鲁晓夫暴跳如雷，不顾一切地对这名西班牙部长破口大骂。他一面骂，一面用拳头重重地敲座位前的小桌子，苏联代表团的全体团员学着赫鲁晓夫的样子一起跟着敲。这时，赫鲁晓夫的手表掉了。他便开始在桌子下面摸，他那大肚子妨碍了他。他骂了几声“见鬼”，一腔怒火无法发泄。这时他的手忽然触到了皮鞋，他顺手脱了下来在桌上敲得噔噔响。葛罗米柯坐在赫鲁晓夫旁边，一开始还保持着斯文，后来也攥着拳头，使劲地敲打桌子……

卡斯铁利亚发言结束后，回到大厅里他的座位上。事有凑巧，他的位子正好在赫鲁晓夫位于的前面。这名西班牙部长走近他的位子时，肝火正旺的赫鲁晓夫控制不住自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挥舞拳头，向矮小的卡斯铁利亚冲去。这个西班牙人急忙摆出极生疏的防御架势。会场工作人员赶忙过来把他们分开。

会后，大家都感到很难堪。素来以行为严谨、循规蹈矩著称的葛罗米柯为自己的“超常发挥”激动得嘴唇都发白了。但赫鲁晓夫却若无其事。他放声大笑，还说些俏皮话。他说有必要“活跃一下联合国的沉闷气氛”。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不体面的行为会给其他国家的代表们留下什么印象。

10月中旬赫鲁晓夫离开纽约时，美国的大选即将开始。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声称对选举结果满不在乎。他把尼克松和肯尼迪这两个候选人称为“一双靴子”，并解释说，“说不上哪只好点，是左脚的还是右脚的”。

但是，在私下里赫鲁晓夫态度就不同了。他认为尼克松“是麦卡锡主义的典型产物，是美国最反动人物的傀儡。我们和他永远找不到共同语言”。他认为肯尼迪比尼克松要好些，尽管肯尼迪的看法常常是矛盾而含糊的，但他显然害怕战争，因而向苏联提出改善关系。这正是赫鲁晓夫所期望的。

## 第十二章

### 与肯尼迪的初次较量

约翰·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令赫鲁晓夫感到高兴。赫鲁晓夫的这一态度有其历史原因。首先，苏联领导层和社会舆论一直对民主党人更有好感，这一传统来自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好感。罗斯福不仅于1933年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三巨头”中最可靠的盟友。其次，美国的黑人和其他低收入阶层在选举中普遍投民主党人的票，而这一点从评价国外事件的传统的“阶级观点”来看是一个好的因素。最后一点，约翰·肯尼迪本人比尼克松更能引起赫鲁晓夫的好感，特别是在他与尼克松之间发生了世人皆知的“厨房辩论”之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访问美国时曾与肯尼迪有过短暂的接触。肯尼迪要求美国政府对苏联“表现出明智和成熟，并建设性地交换看法和谈判”。赫鲁晓夫对这段话做了符合自己喜好的解释。肯尼迪批评了U-2事件，并在一次讲话中宣称，如果他是总统，他“就不会批准这种飞行”。赫鲁晓夫认为这些都是清醒和现实的态度。肯尼迪在讲话中多次表示美国“不希望进行一场核战争”，这也博得了赫鲁晓夫的好感。

但是，蜜月的时间不长。

古巴问题引起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赫鲁晓夫知道美国企图颠覆古巴革命政权，但他没料到肯尼迪就任总统后这么快就采取了行动。

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批准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训练和武装一支旨在颠覆卡斯特罗政府的雇佣军。1960年总统选举前不久，他又决定将这支部队升格成一支常规的战斗部队，而不是一支游击队，并且急剧地增加了它的人数。

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从艾伦·杜勒斯那里听到这个计划。肯尼迪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就向新政府成员——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罗伯特·肯尼迪——作了汇报。1月28日，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一周后召集了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雇佣军的问题。这是一支挂着另一国旗子、在危地马拉秘密基地接受高度训练的部队。肯尼迪对这个计划的庞大和大胆感到惊讶。他刚上任，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掂量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紧急，如果错过眼前的机会，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就永远没有希望了。首先，卡斯特罗不久后将从苏联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飞机。一到6月1日，卡斯特罗就会拥有一支强大的喷气式空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不久将返回古巴，这对登陆作战的流亡分子将是灭顶之灾。此外，危地马拉伊迪哥拉斯总统捎话来说，那些受训人员到4月以后就不能再在危地马拉呆下去了。其原因一是由于政府受到压力，公众舆论一致要求关闭这个日益公开的、政治上引起争议的训练营；二是雨季就要来临，训练营所在的马德雷山区将成为一片大沼泽，不可能再在那里进行训练。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训练营的古巴流亡分子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渴望战斗，很难加以阻拦。

肯尼迪仍然犹豫不决。艾伦·杜勒斯直率地向他提出，他如果不批准这一计划，就等于听任卡斯特罗随意在西半球搞革命，就等于不容许那些流亡分子从共产党独裁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它还将给1964年的总统选举

带来麻烦，因为遭到解散、感到失望的流亡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散布流言，说肯尼迪出卖了他们推翻卡斯特罗的计划。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告诉这批“只求能在自己的国家中恢复自由政府”的“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将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同情和帮助”。

肯尼迪问成功的机会怎样。杜勒斯告诉他说，中央情报局曾在 1954 年 6 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共产党政府。他说：“当时我就站在这儿，站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旁边告诉他，我确信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而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计划。2 月底，肯尼迪第二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派了一个调查组去危地马拉训练基地。兰尼兹尔将军在读了调查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后，再次预言此举必然成功。海军作战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也持同样的看法。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肯尼迪又把一名有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进行调查。不久，上校送回了一份调查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训练营的指挥官年轻力壮，狂热地希望参加战斗……

他们说，他们深知古巴民众。当对方军队在他们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时，古巴人会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起，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动员多大的力量，他们都能够战胜他。

我同意他们的看法。肯尼迪终于发出了行动信号。他认为这样一种说法有些道理：政府既然能派一支美国军队到东半球去打老挝的共产党，也可以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 150 公里的共产党政权下手。

4 月 10 日，星期一，训练营全体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们宣布了行动计划：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训练营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这支远征军，包括其武装船队和小小的空军，都投入了战斗。

但是，这次战斗与总统的理解有很大出入。总统收到的报告说，这支部队是一支拥有受过游击训练的 1400 人的精锐武装部队。登陆的地点猪湾是一片偏僻荒凉的不毛之地，仅有一些现在闲着的避暑房屋。报告人解释说，这些训练有素的古巴人摸黑登陆，根本不会被发现。中央情报局则进一步向肯尼迪保证，至少在 72 小时之内，卡斯特罗不会采取行动，因为在这三天时间内，他根本就不可能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迷惑他，训练营中的 168 名突击队员将在 500 公里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作牵制性登陆。

颠覆行动的设计者们一致相信，古巴对卡斯特罗政府不满的人多得很，人们会自发地帮助训练营流亡分子们登陆。他们告诉总统，在古巴已经有差不多 2500 人参加了各种反抗起义，另有 2 万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总人口 25% 的人准备给登陆部队以积极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肯尼迪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都一再强调，美国军队绝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在 4 月 12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部队都绝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我认为它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将竭尽全力，保证

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之间的问题。”

他的安全顾问们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分子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区中”。这样一来，美国就不会受到丝毫牵连。

然而实际情况是，从1960年11月4日以后，流亡分子（当时只有300人）就再也没有接受过游击训练。后来新招募来的雇佣者大多都不适宜进行丛林战争。训练营中只有135人合格，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出纳、医生、地质学家、教师、记者、工程师、演员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其中有的已经是60开外了，最后招募来的人还不会射击，这是一群典型的乌合之众。

肯尼迪的麻烦不过是刚刚开始。实际上，这支雇佣军从未亲身体验过在山区如何活动。距登陆地点最近的山区离海岸有130公里，与猪湾之间还有一片无法通过的沼泽，训练营中基本都是些古巴人，他们可能早就报告过这一情况。问题在于从来没有过人对他们提起具体的作战方案。中央情报局自作主张，对谁都不说：对总统不请示，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商量，对入侵部队不通报。它的理由是，要是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些，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很有可能取胜之际放弃滩头阵地。

中央情报局之所以要欺上瞒下，无非是要尽可能地增强这些炮灰的信心。中央情报局的人给他们打气说：“你们到时候会强大起来的，你们马上就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支持，所以你们根本无须等我们来援助。你们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你们只要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奔哈瓦那就是了。”此外，中央情报局的人还向这些亡命徒们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事后很久，这支雇佣军的领军人物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得知，原来还有一个在不得已时可以逃往山区去的预备方案。当时他只知道放心干，美国人到时会出兵，美国人对此已经准备了一支1.5万人的部队，到时将给予一切必需的支援。

雇佣军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打击。中央情报局一向不把古巴的空军放在眼里，对其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指挥机构“紊乱不堪”，等等。

根据收集到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推算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和4架快速的T-33型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消灭这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4月15日（星期六），对古巴各机场进行空袭。晚上，中央情报局的人给雇佣军头子圣罗曼打电话，告诉他轰炸任务完成得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都被毁了——圣地亚哥机场12架，自由城6-8架、圣安东尼奥8-10架。这一次他们说的又不是实话。古巴的空军还剩下6架B-26，2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以及2架T-33喷气机。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T-33没什么用，其实这种飞机对付B-26飞机还是有办法的。它装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以对B-26的尾部进行射击。而B-26轰炸机又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B-26飞机装有自卫尾炮。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雇佣军的几架B-26飞机的尾炮拆了，代以备用油箱，以便让飞机在古巴上空飞得时间长些。这样一来，雇佣军飞行员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之手。在现代战争中，制空权往往决定着胜负。而在这次行动中，制

空权具有更特殊的意义，因为雇佣军头 10 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油、食品、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这是一艘二战时的运兵船，船身没有上漆，满是铁锈，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早就应拆掉炼钢了。拨给雇佣军的登陆船只，都是些 20 米长，没有钢板的小船。设备简陋且不说，原定在东方省发动佯攻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边。突击队员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回运输舰。

对古巴机场的轰炸引起了卡斯特罗的警觉，因此在入侵的前一天，内应人员全都被抓了起来，关在垒球场、剧院和礼堂里。古巴地下组织头子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也于 4 月 17 日，星期一，即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里应外合的日子被枪毙了。

头一天晚上 7 点 45 分，由五艘生锈的运兵船和两艘护航舰组成的雇佣军特遣部队到达了猪湾，抛锚停泊。这是进攻部队的主力。由于所有其他辅助行动——东方省的佯攻、地下组织的起义、国内的破坏活动——都一一告吹，现在只剩这一幕独幕剧了。他们全副武装地呆在底舱，偶尔打个盹。晚上 11 点，司令官佩雷斯·圣罗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气，他所看到的景象把他吓呆了。他原听说海岸上空无一人，现在却是一片灯火。自卡斯特罗掌权之后，这一带已经建成为公园。中央情报局所说的沼泽地带，也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即将完工，海滩上也有人来来往往。

情况已经够糟的了，但事情还不仅于此。猪湾的每一入口处水下都有锋利突兀的珊瑚礁环绕，夜间在这里登陆十分困难。首先要设置登陆指示灯。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引导部队登陆的闪光指示灯。可是指示灯刚一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古巴边防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雇佣军向吉普军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赶来支援。入侵者登陆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卡斯特罗那里。凌晨 3 点 15 分，卡斯特罗得到消息，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情报有误，便询问了详细情况。无线电通讯员报告说，上述两个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 50 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无线电信号忽然中断，说明电台已被占领，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卡斯特罗下令在上述两个地区防御的部队立即出击，并命令 B - 26 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一架战斗机护航，前往猪湾袭击停泊在那里的船只。

当天上午，滩头阵地混乱不堪。首先是空战。古巴空军的 T - 33 首先撵走了雇佣军的 B - 26，于是，古巴空军的轰炸机便开始毫无顾忌地轮番攻击那些生锈的货船。首先被炸沉的是装载弹药和汽油的“休斯敦”号；接着是装载着 10 天补给品的“里奥·埃斯孔迪托”号；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里奥”号又在一片火光中解体了。其他三艘船赶快驶离了海岸。

船只逃跑后，已登陆的入侵者便陷入绝境，因为卸下的军火还不足 10%，在人数上与卡斯特罗的部队相比是 1 比 13，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但入侵者情绪仍然很高，逃散的船上发来的电讯使他们受到鼓舞。比如：“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

在美国国内，有关古巴的消息成了那天的主要新闻。舆论界反应不一。右翼方面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开往古巴”；左翼方面则认



为他们在选举前对肯尼迪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们高举“公平对待古巴”的标语牌，同示威者一起涌向曼哈顿的联合广场。“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生的响应。他们联名写信，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甚至有人给公平对待大会打电报说：“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这时候，卡斯特罗已无需美国左翼力量的支持，他的军队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现在要做的只是将雇佣军一步步赶下海。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军队的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 122 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弹着点附近的雇佣军被震得晕头转向。苏制 T - 34 坦克的推进速度令雇佣军心惊胆战。入侵者不断回头望着大海。舰船逃走时，曾允诺晚上再来，但直到午夜，补给船还不见踪影。佩佩·圣罗曼不得不带着报话员登上一只敞篷船，在海上发报，但无任何回音。在吉隆滩，T - 34 坦克排成一字形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使雇佣军们进退维谷。

星期二晚，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的肯尼迪临时被请了出来。他站在办公室的一张地图前听国务卿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名成员及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汇报情况。他们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登陆部队，使其免受卡斯特罗法庭的审判。肯尼迪同意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出动六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在星期三早晨 6 点半到 7 点半的一个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以便让雇佣军的 B - 26 向环形阵地周围的卡斯特罗军队发动攻击。

这一回，中央情报局最后的努力又失算了。卡斯特罗的 T - 33 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剩下的几架飞机。

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越来越弱。电报都很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飞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告罄。敌人迫近。必须在一小时内教授”。星期三清晨 4 点 32 分，中央情报局接到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及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战斗。我不再等你们了。”

一切归于沉寂。

这一时期，对于古巴问题最为关注的旁观者莫过于不久前同卡斯特罗热烈拥抱过的赫鲁晓夫。他对事态发展的每一细节都不放过，自然，他也读到了入侵失败后第二天肯尼迪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的演说。肯尼迪在演说中色厉内荏地说，这一次他决定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

“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警告苏联，“到了那时，我们绝不会去听那些使布达佩斯血染街头声名狼藉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肯尼迪在对赫鲁晓夫进行恐吓，叫他不要染指古巴。肯尼迪认为美国的唯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唯一的敌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是肯尼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不论在古巴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对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给予更密切的注意并采取更现实的对策”，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面临一

场无情的战斗，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这类评论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个年轻而又缺乏经验的新总统这一跤摔得不轻。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看来，现在正是对他猛击一掌的大好时机。

肯尼迪刚刚当选总统时，赫鲁晓夫曾向他发去一封贺电。紧接着，赫鲁晓夫为表示愿意恢复到巴黎四国首脑会议之前的苏美关系，又释放了两名关押的美国飞行员。肯尼迪在他的首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这一行动消除了改善苏美关系的一大障碍。”他明确表示美国飞机将不再飞越苏联领空，以示对赫鲁晓夫行动的感谢。

1961年2月11日，肯尼迪就美国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腊斯克、邦迪之外，还有担任过驻苏联大使的四名苏联问题专家，他们是现任驻苏大使汤普逊，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现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和艾弗里尔·哈里曼。会议中，没有人认为两国政府首脑之间有必要举行一次正式的“最高级”会议，肯尼迪更是如此。他的观点是，这种会议在遇到战争威胁时或许是必要的，作为“最后正式批准由较低级的会议达成的协议的场合”或许是有益的，但是，“最高级会议不是一个涉及细节的谈判场合”，细节问题须由专职的专家通过悄悄的途径予以处理。最高级会议总是造成过度的希望和公众的注意，因而就产生了无根据的松懈、失望或紧张情绪。

但是，2月11日的讨论还认为，同苏联领导人举行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与举行最高级会议是有区别的。与会者一致认为，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将有助于让肯尼迪对赫鲁晓夫进行估量，直接了解赫鲁晓夫对禁止核武器试验和其他问题的观点，获得借以判断赫鲁晓夫言行的第一手印象，并能够比通过信件或比他的前任更清楚、更确切地表明美国为之战斗的重大利益。这些就是肯尼迪的基本前提。正如他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阐述得那样，“联系渠道应该保持十分畅通”，“减少发生危险的机会”，并达成可以防止核战争、到时候还可以使冷战缓和下来的某种谅解。

然而，肯尼迪没有想到猪湾入侵给会见增加了难度。赫鲁晓夫就这一事件公开表态，并明确站在古巴一边，从而使双方的关系不仅没有进一步改善，反而恶化了。在苏联国内，美国雇佣军对古巴入侵的失败激起了中央政治局以及军方的反美情绪，通过对猪湾事件整个过程的研究，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动手打古巴时很轻率，却又没有胆量打到底，显然是缺乏经验。

白宫知道，在国际政坛上闯荡了六七年的外交老手赫鲁晓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的这次大失败。但是，2月间已经安排了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的会谈。赫鲁晓夫担心美国会因古巴事件而使会谈有所变动，因此便于5月12日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又怕被赫鲁晓夫看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于是便开始全力准备会谈。有人告诉他，赫鲁晓夫认为艾森豪威尔在其所参加的两次高级会谈中明显准备不足。艾森豪威尔每次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肯尼迪认为应当让赫鲁晓夫改变这一看法，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名译员参加。

肯尼迪为了增加会谈的主动性和把握性，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对以往同赫鲁晓夫对话的回顾上。他接见会晤过赫鲁晓夫的人，研究他的政策和个人作风，深入地研究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的背景以及双方看法的细微差别。会晤前的那天晚上，在巴黎以及在飞往维也纳的途中，他还在研究，直

至会晤前的一分钟。第一天，肯尼迪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午宴。第二天，赫鲁晓夫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午宴。在这些宴会上，谈话是轻松的。当肯尼迪点燃一支雪茄把火柴丢在赫鲁晓夫椅子的背后时，赫鲁晓夫问道：“你想放火烧我吗？”肯尼迪向他保证说绝无此意。赫鲁晓夫笑着说：“啊，你是个资本家，不是个纵火犯。”肯尼迪指出，赫鲁晓夫在1959年会见过的那些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大资本家没有一个在1960年投了民主党的票。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都很机灵。”他认定这全是花招。当赫鲁晓夫说他佩戴的是列宁和平金质奖章时，肯尼迪笑了一笑，反唇相讥道：“愿你一直戴下去。”

会谈的议程包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一直未能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问题、互惠的经济联系问题、租借法案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会谈开始时，两名领导人回忆了他们结识的情景，那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期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肯尼迪提到赫鲁晓夫曾议论过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肯尼迪的年轻外貌，并说他现在老了不少。赫鲁晓夫对于他是否讲过这句话表示怀疑，因为他知道年轻人总想显得老成些，而老年人总喜欢显得年轻些。赫鲁晓夫说，他在年轻时，长相很年轻，他常常由于别人弄错了他的年龄而恼火，然而他22岁头发就开始花白了，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

肯尼迪立刻把话题转到中心议题上，即两个主要核大国要避免在互不相让的直接对抗中把各自的重大利益牵连进去的局面。赫鲁晓夫不满地指责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想消灭共产主义。肯尼迪反驳说，真正的问题是苏联企图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赫鲁晓夫对此加以否认。他说，他们只是预期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将取得胜利。苏联是反对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别的国家的。正像封建主义让位给资本主义一样，资本主义正受到共产主义的挑战。

肯尼迪回答说，历史的必然性并非表现在由少数人违反人民的意志去夺取政权，即使这被称为“解放战争”。过去，封建主义和君主政体制度的灭亡曾经带来过战争；而今天，如果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我们两国都将蒙受重大的损失。意识形态的竞赛不应影响到两国重大的安全利益。他重申了他关于估计错误所造成危险的看法。

赫鲁晓夫听到这话很不高兴。他说，他不喜欢估计错误这个词，也不喜欢肯尼迪反复使用这个词。总统是不是说共产主义只应在共产党国家内存在，而它在其他地方发展就将被美国视为苏联的敌对行动呢？美国希望苏联像小学生那样双手放在课桌上坐好，但是思想是没有免疫可言的。即使他抛弃了共产主义，或者他的朋友们把他赶下台，共产主义学说仍会继续向前发展。他说，他在国内太忙了，甚至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是谁都不知道。他笑了笑说，德国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重申不应通过战争或武力把思想强加于人，这是苏联的政策。

肯尼迪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说，不管怎样，估计错误不过是指一方对另一方的下一行动作出错误的预测，它对各国都同样适用。他先前在猪湾事件中就作了一次错误的判断。赫鲁晓夫对西方也必然要作出许多判断。他们这次会谈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些判断能更为确切。

赫鲁晓夫在这一点或任何其他论点上都不让步。他反复强调，苏联不能对每一次自发的暴动或共产主义倾向负责。他指出，纳赛尔、尼赫鲁、恩克

鲁玛和苏加诺都说过要使他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发展。但是纳赛尔却把共产党人关进监狱，他是哪一种社会主义者呢？尼赫鲁也不赞成印度的共产党，然而，苏联还是帮助他们。这就证明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他预言伊朗国王将被人民推翻，但是他声明这不是苏联策划的。他说古巴人转而反对美国，因为资本家集团支持巴蒂斯塔。猪湾登陆只会使古巴人更为担心，生怕美国人会把另一个巴蒂斯塔强加给他们。赫鲁晓夫说，卡斯特罗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美国的政策可以使他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赫鲁晓夫还说，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资本家把他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本人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能预言卡斯特罗会走什么道路。如果美国对小小的古巴也感到是个威胁，那么苏联对土耳其和伊朗又该怎么办呢？

肯尼迪对此是有充分准备的。他回答说，单是古巴并未被视为威胁。危险的是，卡斯特罗公开宣称他打算在西半球搞颠覆活动。如果卡斯特罗是通过自由选举而没有外来干涉的话，美国可能已承认他了。如果波兰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赫鲁晓夫将作出何种反应呢？

赫鲁晓夫说，肯尼迪先生如此谈论波兰是对波兰的不尊重，波兰的选举制度要比美国民主。肯尼迪说，在美国我们可以自由选举。赫鲁晓夫答道，美国的政党只是用来愚弄人民的，它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分歧。还有，美国支持反动的、不民主的政权——国民党台湾政府，巴基斯坦、西班牙、伊朗、土耳其——并镇压殖民地，这是怎么回事呢？伊朗国王说他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然而，谁都知道这名国王的父亲是怎样夺取政权的，他并不是上帝，只不过是伊朗军队里的一名军士。他又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中国提供武器，供它对付共产党人，但这没有作用，因为中国军队不愿与人民为敌。蒋介石成了向毛泽东输送美国武器的一个中转站。美国应当小心，不要在干涉别国内政方面干得出了格。赫鲁晓夫还说，美国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曾一度充当过带头人，在建国初期那么富于革命性，以至俄国沙皇拒绝承认它达 26 年之久。现在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这说明了事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肯尼迪说，他们有些联系是出于战略上的理由，比如南斯拉夫、西班牙。但是，他认为支持变革的占多数。他是主张变革的，也正是由于提倡变革才于 1960 年当选。在他还是一名参议员时，他就曾经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由于支持葡萄牙和其他盟国所属殖民地的自决，他曾触怒了它们。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前所未有的，也是对和平演变的一种贡献。但是，赫鲁晓夫在今年 1 月份表示赞同的解放战争，却并不见得总是反映人民的意愿，而且还可能使大国危险地卷进去。

赫鲁晓夫回答说，美国吃了自负的苦。美国是很富强的以至它认为自己有特权，并且可以不承认别人的权利。苏联不能接受这种“不用你管闲事”的论点，因为遇到人民的权益受到侵犯时，苏联就将提供援助。不过，苏联反对干涉他国人民的自由选择。他说，共产党人具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如果游击队是从外部派遣进去（赫鲁晓夫影射猪湾事件中的美国雇佣军）并得不到人民支持的话，那将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但是如果游击队是由那个国家的当地人组成，那么便会使敌人感到草木皆兵了。

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两次提到，他并没有受到委托或被人要求代表红色中国讲话，不过他认为，红色中国应是联合国的一员，而台湾则应是中国的一

部分。肯尼迪不同意，他说，将美国武装部队撤离以及停止支持台湾都将损害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赫鲁晓夫说，那么，按您的意思，中国只得为台湾而战了，这可是一件可悲的事。由此看来，美国对于和平共处的诚意是令人怀疑的。依照这一逻辑推论，肯尼迪甚至可以占领克里米亚，理由是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这与杜勒斯的政策有何差别。他又说，如果他处于红色中国的地位，早就为台湾而战了。苏维埃俄国在革命以后就曾击退过那些对它领土进行同样干涉的更为强大的国家，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谈话转到老挝问题。

艾森豪威尔政府花了大约三亿美元和五年的时间，妄图使老挝成为中国和北越边境上的一个明显亲西方并能有效地反共的军事前哨。但是，事与愿违，虽然美国支持了右翼军人富米·诺萨万的一连串政变和反政变，共产党仍控制了老挝的北部。1960年后期，中立派首相梭发那·富马又开始同苏联合作，贡勒上尉领导的中立部队同共产党和解，老挝的形势对美国而言实在不妙。

在艾森豪威尔卸任前，形势急剧恶化。苏联每天从河内空运大约45吨的武器和军需用品给巴特寮和贡勒的部队，不断扩大他们在老挝东北部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查尔平原上的阵地。美国则向处于湄公河流域南部的富米将军空运补给品，并怂恿富米将军对巴特寮地区发动一场进攻。富米的军队虽然在人数、装备上占优势，但对有北越人协同作战的巴特寮部队却总是心存畏惧。

1961年1月19日，肯尼迪在一次会议上就老挝问题征求艾森豪威尔的看法。艾森豪威尔承认，这是他遗留下来的最迫切而危险的“混乱局面”。他说：“你也许不得不进入那里去一决雌雄，”

猪湾惨败之后，肯尼迪对老挝问题的考虑变得慎重了。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对老挝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重新论证一下。他要求每一个成员把自己对美军在什么地方干涉、谁会参加到美国一方、美国怎样对中国的大规模反应作出反应，以及这一切结果将会如何等，写出详细书面材料交给他。

结果，大多数的人认为，军事干涉是必要的；否则美国就会失去老挝，会使泰国进入共产党的轨道，会危及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只要五六年就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并带来一系列灾难。如果将美国军队派往泰国、南越和在老挝这个狭长地带尚不能导致停火，就应对巴特寮阵地进行空袭并使用战术核武器。要是北越人和中国人进行干预，就对他们的国土进行轰炸。此时如果苏联出面干涉，美国就应“作好准备，接受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的分析认为，苏联“不大可能希望看到事态失去控制”。这些就是专家们的判断——而在猪湾事件中肯尼迪就曾依赖过他们的判断。

这回肯尼迪多了个心眼。他问，如果美国使用核弹，那么这场战争将到什么地步才能收场，而那时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结果谁也答不上来。他又问，如果不使用核武器，那么面对中国的全面干涉，美国是否不得不退却或投降？回答是肯定的。他还问参谋长们，如果美国在老挝投入更多的部队，那会不会削弱美国为了在柏林和别处采取行动而保留的兵力。回答又是肯定的。如果老挝王都和行政首都都没有陷落，而停火的争吵只是为了决定在什么地方签署休战协定，那么这些冒险是否值得？没有人能作出确切的答复。

他问道，一旦卷入，美国怎样脱身和什么时候脱身呢？美国有没有必要无限期地与一个没有热情的、深色皮肤的民族纠缠在一起，使美国的部队、而不是共产党的部队陷在那里？在同中国的一场对抗中——在其内陆邻国的

山区和丛林之中——这是不是美国最好的赌注？派往越南和泰国的部队最终是否将不得不保卫这些政权？首先，他问道，为什么老挝的军队不愿意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呢？他在5月的国情咨文中说，“经验教育了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或支配其革命潮流的力量和智慧；扩大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并不总是增加我们的安全……核武器不能防止颠覆活动；一个自由的民族如果自己没有意志和能力，就无法保持其自由……”他笼统地谈到全世界，但想到的却是老挝。

不过，他仍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一种他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的把恫吓和真正的决心结合起来的），即如果不能用别的方法“拯救”老挝，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涉。他命令驻老挝的美国军事顾问穿上军服，还命令向泰国增派一个分遣队，以此方式来警告赫鲁晓夫，让他不要把事情做过头而冒大国对抗和“升级”的危险。

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肯尼迪告诉赫鲁晓夫，美国在老挝的政策并非总是明确的，他要改变一下政策，因为那个国家不是战略要地。但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条约，美国仍然负有义务。必须找出一种解决办法，避免把大国的威望牵连进去，以保证和核实停火，搞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从而以一种双方都满意的方式实现停火。肯尼迪提议使缅甸和柬埔寨成为“中立和独立”国家的榜样。

起初，赫鲁晓夫似乎不太重视老挝，把它当做无足轻重的小事。他宁愿比较笼统地谈论殖民地的“解放战争”以及有关中国、非洲和游击战争的各种其他问题。但肯尼迪耐心地坚持把话题引回到老挝这个专门问题上来。会谈的第二天，他再度在双方减少承担的义务问题上劝说赫鲁晓夫。他说，老挝并不重要，美苏不应像目前这样卷进去。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声明苏联在远离它的边界的小国里，既没有承担义务，也没有既得利益。他承认停火应予核实，并保证推动老挝王国内的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他说，应该把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关在一间房子里，叫他们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来。

这时，通常总是板着脸的葛罗米柯突然插嘴说，日内瓦的国联大厦是一个有许多房间的大地方。

肯尼迪接着话题说，他的政府不想增加美国承担的义务，而是想减少这种义务。现在翻以往的旧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双方对此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不是在维也纳要解决的问题。赫鲁晓夫说，那很好，但是肯尼迪不能以所有这些义务都是在他就任前就已承担为托辞而推卸责任。苏联曾废除了它以前的历届政府所作的一切不合理的决定。例如，他否决了莫洛托夫有关奥地利问题的决定，因而使签订一项和约成为可能。他继续说，在使用巧妙的办法、高谈“义务”、暗中却在使用海军陆战队进行威胁方面，西方人要比东方人精明得多。但是物理学的定律表明，每一作用都会引起反作用。然而，他最终同意，双方都不值得为老挝进行一场战争，呼吁在老挝建立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政府，并且应当遵守停火协定。

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赫鲁晓夫说，一年中进行超过三次以上的现场勘查，就会被用来进行间谍活动，而且这正是五角大楼一直向往的。艾森豪威尔的开放天空计划就是这个阴谋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没有否决权，就不能放心地让联合国里的任何中立国家或其他第三方去检查他们的行动。

肯尼迪问道，他是否认为不可能物色到一个对两国来说都是严守中立的

国家。赫鲁晓夫认为是的。肯尼迪接着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三驾马车（赫鲁晓夫在联大会议上提出要以三头政治——三驾马车来领导联合国）所行使的否决权将使双方都不能断定对方是否在秘密进行核试验，这样，参议院是绝不会批准这一条约的。赫鲁晓夫说，那么让我们全面裁军，苏联就会放弃三驾马车，并且赞同美国提出的任何管制办法，甚至连文件都不必看一看。他认为，作为开端，任何其他措施几乎都比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来得好些。比如禁止使用核武器，禁止制造核武器和建立军事基地等。

肯尼迪回答说，裁军谈判迁延时日，得不出结果，而六七个其他国家却在发展核武器，与此相比，苏联所说的对间谍活动的担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成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并敦促赫鲁晓夫跨出这第一步。赫鲁晓夫说，显然你非常了解中国人，但是他也十分了解他们。肯尼迪回击说，你可能会变得更了解他们。赫鲁晓夫最后说，我已经非常了解他们了。

最严峻的会谈是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

肯尼迪在会谈前对此作了研究，并在华盛顿同阿登纳、在巴黎同戴高乐进行了会谈。他愈益明确地认识到，西柏林是美国的荣誉和决心的试金石，赫鲁晓夫必然会用它来考验西方国家的团结和抵御能力。

由于艾奇逊指出维也纳会晤不是一次谈判的会议，所以肯尼迪不打算在维也纳会谈时对柏林问题提出新的建议。但当第一天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好像是随便地提到有必要于第二天讨论柏林问题。肯尼迪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赫鲁晓夫说，主要问题是和约。如果美国拒绝签订和约，苏联还会照样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和约的签订。

第二天，赫鲁晓夫还是用这种调子提出同一问题。

赫鲁晓夫说，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作早该进行了。只能共同或分别签订承认两个德国永远存在的条约。如果美国人和侵略成性、复仇心重的西德人都表示冷淡，苏联将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这样，战争状态将结束，由德国投降而产生的所有义务将告失效，其中包括占领权、柏林通道和走廊。西柏林将作为“自由城市”维持下去，可是它同外界的联系将转交给“拥有主权的”东德人。

肯尼迪回答说，他对赫鲁晓夫如此坦率表示欣赏。柏林不是老挝。它是美国至为关切的一个问题。这关系到美国国家的安全。如果美国甘愿丧失在柏林的权利，那么我们同时也将失去他国对美国的信任。美国抛弃西柏林，结果只能使自己孤立。

肯尼迪的这一番话，显示出他把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看作有关西柏林权利的问题，而且是有关苏美在改变力量对比上的直接对峙的问题。然而，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同样强硬。赫鲁晓夫说，他很抱歉，可是他不得不使肯尼迪确信，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苏联在年底签订和约。继续拖延下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应当受到尊重。对其主权的任何侵犯，都将被苏联视为是对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公开侵略行动，对方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如果东德的边界——陆地、空中或海上的边界线——遭到侵犯，就得加以保卫。如果美国在德国问题上挑起一场战争，那就让它这样干吧。苏联也许应当立刻签订和约，并解决这一问题。

肯尼迪问赫鲁晓夫，这样的和约是否会妨碍柏林通道？他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肯尼迪再次强调，美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

赫鲁晓夫问，美国为什么要呆在那里？艾森豪威尔总统曾承认过，德国的局势是不正常的，可是他采取的政策是悬而不决，尽量拖延。现在轮到肯尼迪先生，结果还是这样。艾森豪威尔是个共和党人，而你是民主党人，但是就柏林问题而言，你们两人是半斤八两，两党的政策毫无二致。这个政策的目标是保卫垄断资本的利益及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完全不考虑其他任何人的利益。

肯尼迪回答说，不，咱们两人不是在谈论由美国前往莫斯科或由苏联去纽约的问题。咱们是在谈论美国呆在柏林的问题，美国在那里已经呆了 15 年。他坚定地说，他就任美国总统不是来接受完全违背美国利益的安排的。

在此后的一次私下会谈中，两个人的口气越来越强硬。赫鲁晓夫坚持说，他也不能回避他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责任，美国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立场不是建立在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企图让苏联丢脸的基础上——对这一点，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肯尼迪说，苏联人只签订和约还是把西方权利转交给东德，由他们废除掉，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否定西方按条约取得的权利就是一种挑衅行动。

赫鲁晓夫说，可以达成一项保全面子的临时协议来度过今后六个月，可是苏联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在签订和约结束战争状态后，西方继续留驻在东德领土上就是非法的、挑衅性的，就是对东德边界的侵犯——而这些边界将得到保护。我们要用武力来对付武力。美国应为此作好准备，苏联也将同样作好准备。如果美国希望战争，那也没关系。苏联除了接受挑战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战争的灾难是共同负担的。在 12 月份签订和约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除非有一个六个月的临时协议。

肯尼迪看到谈话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便说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一个严寒的冬季。”

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个年轻人说这句话时既无奈又沮丧。他这时不禁感到难过，还有些心绪不宁。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并没有存心要与这个上任才五个多月的新总统过不去。相反，他倒是希望两人能怀着另一种心情分手，因为两人还有一些共同点。他曾经说过，肯尼迪同他一样都害怕战争。虽然两人的出发点不尽相同：肯尼迪害怕战争是担心战争会给国家带来贫困、灾难，而同苏联进行一场战争将是世界上空前可怕的战争。这将是美国第一次被迫在本土作战。在这场核战争中，美国的经济力量将被彻底摧毁。而赫鲁晓夫害怕战争，是害怕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切将化为灰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首先毁灭，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他希望在冷战中通过一系列的反击取得胜利，而尽量避免一切热战。赫鲁晓夫认为，会谈没有达成协议是两人不同的阶级立场所致，尽管两人已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政治这玩意儿是绝无怜悯可言的，他说，但这并不妨碍他为肯尼迪感到难过。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讲，他为肯尼迪的失望心情感到难受。同时，他也为会谈没有改善两国间的关系而感到难过。

由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双方的强硬态度，维也纳会谈使冷战更为加剧，东西方关系又趋紧张。



## 第十三章

### 在战争的边缘

维也纳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一回到莫斯科，就下令公开发表他交给肯尼迪总统的关于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两件备忘录，并宣布暂停 120 万陆海军士兵的复员，征召预备役军人入伍，并将苏联的军费提高 1/3，使之高达 123.96 亿卢布。他还以德国问题为主题发表了演说。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事学院毕业生的晚会上说：“我们将缔结和约，我们将向我们的武装部队发出命令：要使任何侵略者在其一旦向苏联或我们的朋友动手时得到应有的回击。”

肯尼迪也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升级。他回到美国后，向全美发表了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把柏林边界问题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追加 32.47 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购置新武器，扩大民防计划，并修整起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舰船，向西欧增派军队，使驻欧军队总数达到 30 万人。同赫鲁晓夫一样，他也不断发表演说。

7 月 25 日，肯尼迪又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结束部分说：“在我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当时我不能体会，而且任何一个没有承担过这一重任的人都不能体会，这些担子会多么沉重，多么持久。……在这些日子里，我要求获得你们的帮助和忠告。如果你们认为我们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我要求你们提出建议。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大家都在尽全力为祖国服务。在今后的几个月，在我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的善意，你们的支持，尤其是你们的祈祷。”

肯尼迪在演说中充满了忧郁，比拥有核能力时代的任何一名前任总统的演说更为忧郁，这种忧郁是赫鲁晓夫对他施加压力造成的。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利用了他在猪湾的失败，在赫鲁晓夫眼中，他是一个可以被吓住的人，是一个既无经验又无勇气的人。现在他必须改变赫鲁晓夫的这一看法，不能让赫鲁晓夫得逞，否则今后的麻烦事会更多，他必须表现得强硬。他说：“西柏林现在已成为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伟大场所，已成为一个焦点。在那里，我们所承担的庄严的义务……目前正同苏联的野心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我们不能、也绝不允许共产党人逐步地或者用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履行我们对这个城市所作的保证对西德的士气和安全，对西欧的团结，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信心，都是必要的。……这个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自己的安全分开。……我们将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有所帮助的话。但是我们还必须准备用武力进行抵抗，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武力的话。只作一手准备是会失败的。有两手准备就能有助于自由与和平的事业……总起来说，我们谋求和平，可是我们不会投降。这就是这场危机的中心含义，也是政府政策的意图。在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下，这场危机是能够克服的。”

赫鲁晓夫获悉肯尼迪的演说后，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称肯尼迪的演说是一篇战争宣言。他对美国追加军事预算和向西柏林派遣增援部队极为恼火。他把美国的这些行动称为军事上的歇斯底里。从信中可以看出，肯尼迪

没有让步，西方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谈判建议使赫鲁晓夫感到愤怒。他自己的威信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要求稳定德国边界，并要求剔除柏林这根哽在“社会主义东德喉咙中的‘鱼刺’”，希望赫鲁晓夫能遵守诺言，“击退”美国的压力。

1961年8月3—5日，华沙条约组织各国党的第一书记到莫斯科开会。会议发表声明说，如果西方国家不愿意签订对德和约，华沙条约国决定单方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并给予柏林“自由城市”的地位。

8月3日，苏联政府向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其中所列的要求有如最后通牒：“有关与德国缔结和约以及根据这一和约对西柏林的现状做出规定的问题，必须在今年年底以前以某种方式予以解决。”

8月7日，赫鲁晓夫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警告说，苏联将大大增加驻扎在自己西部边界军队的数量，并且将征召预备役以使部队达到战时建制。

赫鲁晓夫的讲话在本已充满紧张气氛的西方国家引起慌乱。柏林处于动荡之中。自维也纳会谈之后，从东柏林流入西柏林的德国人与日俱增，到8月中旬止差不多有5万人越界。16年来，从柏林逃往西德的人差不多有350万了。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一天，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决定对边界实行管制：关闭两德之间的边界。对准许出入双方边界的人颁发特别通行证。

边界管制的日期定于8月13日开始。“13”在西方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赫鲁晓夫同乌布利希开玩笑说，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这可是个吉利的日子。

8月13日午夜，黑暗无人的柏林大街上突然警笛狂鸣，苏制T-34和T-54型坦克和载满东德军人的卡车沿东西柏林之间40公里的界线一字排开。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之后，横亘在东西德之间的著名的“柏林墙”就完全建成。墙高3.6米，墙顶盘绕着铁丝网。柏林墙使东西柏林人的自由往来成为历史。

柏林墙的建立是西方始料未及的。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接着，9月1日，赫鲁晓夫又使柏林危机进一步逼近爆发点。赫鲁晓夫下令恢复苏联的核试验。美国地震仪记录显示出苏联核试验的强度。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呼吁赫鲁晓夫停止核试验。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了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试验结束时，苏联放射到大气中的放射性物质已经超过了美、英、法三国之和。赫鲁晓夫想以此显示，苏联的核武器装置和核武器生产能力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接着，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相当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所有战争用掉的全部烈性炸药的5倍。在第二次会议上，他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的结果“证明它比核技术专家们所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但专家们并不会因这样一个计算错误而受到批评。赫鲁晓夫的故作幽默，在会议上引起哄堂大笑。

赫鲁晓夫对核武器情有独钟。他认为原子弹是他在国际斗争中制胜的法宝，是他同西方国家进行外交活动的后盾。

对赫鲁晓夫的这一着棋，肯尼迪也不示弱，他决定批准美国恢复核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须采取的那些步骤”。这是柏林危机的顶点。

接着，肯尼迪派副总统约翰逊前往西柏林视察，向西柏林的居民重申美国对西柏林所承担的义务。陪同约翰逊一同前往的是克莱将军。这名克莱将军当时已经退休。肯尼迪之所以派他去，是因为他在战后曾是驻德国的美国军事管制委员。1948年，当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陆上封锁时，克莱组织了对西柏林的大规模空运。肯尼迪是想用这个昔日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来稳定民心。

赫鲁晓夫也如法炮制，起用了退休元帅科涅夫。科涅夫曾任驻德国苏联占领区总司令，曾与克莱将军演过“对手戏”。不过，为了避免科涅夫误解，赫鲁晓夫告诉他一俟柏林局势恢复正常，就要把他调回莫斯科，去柏林的任职只是暂时的。

当舆论披露了科涅夫的任职后，紧张局势更加剧了。

柏林墙建成之后，东西柏林的通道只剩下一处。边界100米之内为隔离区，严禁任何人停留。卫戍部队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会，正式提出禁止西德国家领导人乘飞机进入柏林。但法国、西德、美国态度强硬。9月8日，赫鲁晓夫又提出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再次遭到西方的断然拒绝。

为了试探赫鲁晓夫的意图和显示美国的决心，肯尼迪增派1500名美国军人，从西德乘坐60辆装甲车，沿着高速公路通过民主德国的检查站，开往西柏林。但是苏军并没有加以阻止。美国的这一行动证明，“柏林墙”并不影响西方驻军出入西柏林。于是，肯尼迪容忍了这一事实。苏军和美军在柏林墙两边互相对峙，局势时紧时松。

1961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开幕时，形势又一度紧张起来。科涅夫报告说，美国人正准备开进来，用步兵和推土机摧毁边界工事。赫鲁晓夫指示科涅夫把苏军坦克隐藏在公路两旁，等美国人越过边界后就起动手与他们对抗。科涅夫依照指示，将坦克隐蔽起来。当美国的吉普车、卡车、运输车和推土机进入100米无人区时，发觉它们已处于苏军坦克的射程之内，于是停了下来。两军相持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代表大会的例会正在进行，科涅夫元帅来到主席团办公室，请求叫出赫鲁晓夫，说有急事报告。科涅夫报告说，美国坦克的发动机已经高速运转了半个小时。科涅夫知道什么叫战争：在发动机高速运转时，坦克手的神经有多么紧张，当千百万人的生命决定于苏联和美国的坦克手的一时冲动或操作失误时，形势将多么难以控制。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就把人类推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里只要一步不慎就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科涅夫显得很激动，神经非常紧张。赫鲁晓夫沉思了片刻，说：“把我们的坦克撤到毗邻的支路上，撤到美国人看不见的地方，但让发动机也高速运转，通过扩音器，加大坦克的轰鸣声。”科涅夫迟疑了一下说：“赫鲁晓夫同志，他们会往前冲的！”“我认为不会，我肯定在20分钟之内，或者在他们接到命令的任何时间内，美国坦克也会开回去的。他们自己已陷入了困境，只要我们的炮口还对着他们，他们是不能掉转坦克并且开回去的。我相信，他们正在找出路，那我们就给他们一条出路吧。当然，只要仇恨还没有搅乱美国军人的理智，在我们撤走我们的坦克之后，他们也会照做的。”

过了一会儿，科涅夫向赫鲁晓夫报告说，美国坦克掉头了，并且大约 20 分钟的时间便消失了。

一场剑拔弩张的对峙化解了。

柏林危机以赫鲁晓夫的退让而结束。10 月 10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 22 大的讲话中说：“我们将不坚持一定要在 1961 年 12 月 31 日前缔结对德和约。”在私下里，他更为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对访问莫斯科的比利时外交家保罗—昂利·斯巴克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并不要使他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他接着又说：“柏林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共产党国家 10 亿人民中间，200 万人算得了什么！”

赫鲁晓夫在推迟签约期限的同时，还宣布取消了要美国、英国、法国撤出西柏林的期限。

1962 年 1 月，赫鲁晓夫派他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伊去美国，同肯尼迪密谈。肯尼迪提出德国问题的解决可以再拖上 15 年。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同意，并进一步指出，西柏林问题也没有最后的期限，问题什么时候成熟，就什么时候解决。赫鲁晓夫冻结了德国和柏林问题，使欧洲的紧张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然而，好景不常。1962 年下半年，加勒比海又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这是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两人之间的又一场较量，它将全世界推向了核毁灭的边缘。

1962 年 7 月，古巴副总理劳尔·卡斯特罗访问苏联。此后有关古巴的各种说法就多了起来。

据逃到美国古巴难民说，从 7 月下旬开始，古巴港口活动明显繁忙，从黑海开来的大批苏联货船陆续驶抵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马里埃尔。船上所载货物不详，但却令人生疑。这些船吃水很浅，而特点是舱口非常宽。同样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有大批的苏联技术人员。

到了 8 月底，在古巴的苏联人已经有 5000 多名。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查询站受讯问的难民说，他们目睹成队的卡车拖着防水帆布包裹着的长形管状物件。一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曾看到其尾部，并且画了一张简图。同一周内，卡斯特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一家酒吧里夸口说，古巴现在已经有了装有核弹头的远程导弹。参议员基廷警告美国政府说，苏联正在古巴岛上建造六个中远程导弹发射场。

美国政府认为基廷的警告是在煽动，是为入侵古巴、封锁古巴制造舆论。

自从猪湾事件之后，古巴一直是肯尼迪政府政治上最沉重的负担。1962 年国会选举的迫近，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起来。从 1961 年起，肯尼迪政府就强调要在拉丁美洲孤立古巴。1962 年 1 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将古巴排除在外，拒绝接纳古巴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禁止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向古巴出售武器，并且通过了共同防御共产主义对西半球渗透的决议。除粮食和药品外，美国禁止向古巴输出一切物资，禁止进口商和旅游者带进古巴制造的任何商品，并禁止同古巴进行贸易的公司使用美国的港口和船只。这些措施无疑阻碍和制约了古巴的经济发展。但古巴仍然屹立在加勒比海岸。反对派瞄准了肯尼迪政府的这一致命弱点。

共和党参众两院竞选委员会宣称，古巴将成为“1962 年竞选运动的主要

问题”。美国民意测验表明，人们正对共产党在该岛的影响日益感到沮丧。参议员基廷的警告，在当时并没有确凿可信的证据用来证实其真实性，他本人又拒绝透露情报来源。这使得中央情报局无法核实其可靠性。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不能根据未经证实的传闻和报道或是某一个国会议员拒绝告诉我们他是从什么地方听到的东西，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要说服我们的盟国和我们并肩行动……要使自由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冒风险，我们必须根据可靠的情报来行动。”在8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仍然对西柏林问题感到关切，强调义务，反对再次入侵古巴，但是保证“最为密切地注视着古巴发生的一切”。从8月初起，白宫一系列会议和汇报的主题都是苏联人员和装备进入古巴。美国海军舰只和飞机对驶往古巴的每一艘苏联船只都拍了照片。美军飞机每月两次对古巴全岛进行空中侦察飞行。从8月27日起，每天都有关于古巴情报的专门报告。

于29日拍摄、并于8月31日送交肯尼迪的照片，提供了第一批准确的情报：防空用的地对空导弹（萨姆），保卫沿海地区的配备有导弹的鱼雷快艇和大量增加的军事人员。但是，这些照片都没有提供古巴拥有进攻性弹道导弹的证据。肯尼迪再次指出，迄今还没有发现进攻性的地对地导弹或其他值得注意的具有进攻能力的武器的证据。不过，他不无担心地说：“如果确实是有这类武器，那就会出现最严重的问题。”

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则不乐观。他认为，萨姆导弹基地很可能是用来保护进攻性导弹发射场的，但他没有把他的看法告诉肯尼迪。除麦康之外，肯尼迪的情报人员和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都强调：苏联从来没有在其领土之外部署过进攻性导弹，即便在华沙条约组织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没有部署过；苏联完全有可能继续把对古巴的军事援助限于防御性武器；而且他们显然认识到在古巴建立进攻性军事基地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军事干涉。这种进攻能力同防御能力之间的区别，虽然并不总是可以分得很清楚，却被所有有关人员看作是关键所在。在古巴出现不能用来袭击美国的苏联武器是令人不快的，但这同长期以来存在于古巴或别处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差别，因而还不足以成为美国作出军事反应的理由。

然而，苏联继续装运物资到古巴以及莫斯科9月11日的声明，还是让肯尼迪放心不下，他怀疑赫鲁晓夫有诈。

9月6日，肯尼迪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私人信件。赫鲁晓夫在信中对美国国会的选举表示关心，他说：“在美国国会选举以前，我们将不采取任何可能使国际形势复杂化或加剧我们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步骤……只要对方不采取任何改变现状的行动。这包括对德和约和西柏林问题。”

信中绝口不提古巴一字。当肯尼迪手下的人问多勃雷宁（苏驻美大使）时，对方回答，他们在古巴没有做任何新的和特别的事情，所有措施肯定是防御性的，并没有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任何威胁。

9月11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声明干脆宣称，它的核火箭威力如此之大，以致不需要部署在任何其他国家内，包括古巴。“向古巴运去的武器和装备完全是为了进行防御”，并不能威胁到美国。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官员格奥尔基·鲍尔科沙科夫转告肯尼迪说，苏联不会在古巴部署任何射程能达到美国的导弹。

肯尼迪之所以对苏联的声明产生不信任感，是担心赫鲁晓夫把他拖入与古巴的另一场纠纷中，从而使卡斯特罗成为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中的一个不

安定的因素，使美国无暇他顾，然后苏联人则对西柏林采取行动。肯尼迪并不认为苏联就防御性导弹作出的保证比古巴难民关于存在进攻性导弹的传闻更可信，两者都有待证实。不过，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美国朝野和赫鲁晓夫都应该明白，苏联对古巴的援助哪些项目是美国可以容忍的，哪些项目是不能容忍的。因此，肯尼迪认为有必要提醒赫鲁晓夫。他说：“如果任何时候共产党在古巴的军事集结以任何方式危及或妨碍到我们的安全……或者如果古巴有一天……成为苏联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进攻性军事基地，那么，美国将采取所有必须采取的行动来保卫它的盟国和它自身安全。”

赫鲁晓夫看到肯尼迪的讲话后警告说，肯尼迪讲话中所提到的行动将意味着战争的开始——一场核战争。

猪湾事件之后，古巴的命运以及苏联在这一个地区能否站住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赫鲁晓夫。无论是在莫斯科处理国内事务，还是出国访问，他都对此念念不忘。1962年5月他在保加利亚访问时，仍在考虑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古巴卡斯特罗政权被美国颠覆，社会主义在拉美的影响将等于零。苏联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将随着古巴政权的丢失而消失殆尽。这一地区的国家会因美国的强大而听从于美国的指挥。古巴是共产主义打进拉美的一个楔子，只要古巴能够保住政权，社会主义在拉美的影响就有星火燎原的可能。因此，一定要有一个对付美国的实际办法，以遏制其对加勒比海的干涉。美国现在已经在土耳其和意大利利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苏联为什么不能在美国的周围部署导弹？

就在这一时期，赫鲁晓夫想出了在古巴部署核弹头导弹的主意。他认为，在古巴设置导弹可以抑制美国对卡斯特罗政府采取轻率的军事行动。如果导弹装好后被美国人发现，那也没有关系。美国人会毁掉一些基地，但只要古巴能留下1/4，甚至1/10的导弹——即使只留下一两枚大的导弹——就仍旧能够击中纽约，那时纽约将成为废墟。其次，在古巴设置导弹，除了能保护古巴外，还可以在核武器方面同美国取得“均势”。

从保加利亚访问回国后，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每周例会上，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说，猪湾事件失败后，美国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有消息说，美国政府决心组织一支训练更为有素和装备更为精良的雇佣军以入侵古巴。如果幻想卡斯特罗能像第一次那样击败入侵者，那就太冒险、太幼稚了。美国的第二次进攻绝不会像第一次那样糟，他们会像中途岛登陆、釜山登陆、仁川登陆那样，进行周密的计划，小小的古巴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的。这一次菲德尔就会被打垮，唯有苏联能够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

苏共中央主席团对赫鲁晓夫的提议讨论后认为：苏联向古巴提供导弹并不违反国际法。古巴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有权利请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援助的范围和性质只是这两个国家间的问题。美国在日本、西德、以色列、土耳其、意大利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时也没有征得苏联的许可。这些基地有些离苏联边界很近，配备有能发射核弹头的导弹设施。这是对苏联的威胁和挑衅。虽然从苏联领土上发射的洲际导弹可以到达美国任何特定的目标，但是在未来的核战争中，胜利是以分钟而不是以小时来计算的。苏联的导弹从苏联领土上点火发射，需要20—25分钟才能到达美国，而美国的导弹从土耳其发射，只需要五六分钟就能够到达苏联西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古巴安装地对地导弹，距美国海岸不到150公里，可以取得核威慑的均势。

会议决定在古巴设置中程导弹和发射设备并提供伊尔-28 型喷气式轰炸机。

建造发射台和安装导弹的工作秘密而迅速地进行着。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估计，这项工作在中情局探听出来之前就能够完成。赫鲁晓夫认为，届时，这些导弹可以摧毁纽约、芝加哥和其他大工业城市，华盛顿就更不在话下了。

10月9日，肯尼迪批准了U-2型飞机对古巴西端领土的飞行。这次飞行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有关苏联萨姆导弹部署的情况。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是因为在8月29日首次发现的部署在那里的萨姆导弹有可能已可用于作战。由于9月间的各次飞行侦察了古巴岛上没有侦察过的地区，因此，这次飞行的第二个目的是，再次侦察这一地区军事部署的情况，并核对从古巴内部窃得的两份护航观测报告。这些报告比一般情报更准确地表明在那个地点已有一个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

由于气候不好，飞行推迟到10月14日进行。清晨，天空晴朗无云。两名美军飞行员从南向北飞过了古巴西部的领空。他们事先被告知地面可能会有射击。可是古巴导弹基地的射手却没有任何反应。两名美国空军飞行员顺顺当当地返回了基地。底片盒立即送往华盛顿，并很快冲洗出来。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专家们开始研究每一张放大的照片。

10月15日下午，美国专家通过照片分析出，在古巴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已经修起一片梯形的场地，而这种场地迄今为止还只是在U-2飞机所拍摄的苏联的照片中看到过。场地的四角都有萨姆导弹发射场，保卫着一座发射台。照片中看不到弹道导弹，然而专家们能够辨认出有导弹转运、装配和发射装置。

到晚上8点钟，分析人员对他们的发现已相当肯定。他们立即通知了中情局的高级官员，这些官员又转告了国防部和国防情报局的负责人，并到麦乔治·邦迪的家中去告诉了他。邦迪立即认识到这不是那些未经证实的古巴流亡者的报告，也不是一件小事。然而，他决定第二天再向肯尼迪总统报告，为的是让总统好好睡上一觉。

在国务院餐厅主持宴会的国务卿腊斯克当时正在与西德外交部长哈德·施罗德交谈，他被叫出去听电话。打电话的是国务卿助理罗杰·希尔斯曼。腊斯克问道：“你个人认为是这么回事吗？”希尔斯曼答道：“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分析。不过，根据从电话里了解到的情况来判断，好像是没有多大疑问。”腊斯克尽管心情烦乱，但自知不能露出形色，否则必然会引起满城风雨。他准备第二天再处理这件事。

10月16日，专家们重新研究了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照片。早晨7点半，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看到了那些照片，邦迪是在8点钟看到的。肯尼迪正在浏览当天的报纸，邦迪向肯尼迪报告说：“总统先生，现在根据一些照片可以判断，苏联人在古巴设置了进攻性导弹。”肯尼迪吩咐邦迪召集政府要员11点45分到内阁会议厅开会。

参加这次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一系列续会的，除了肯尼迪兄弟外（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还有吉尔帕特里克、邦迪、麦克纳马拉、腊斯克、林登·约翰逊、麦科恩、马克斯韦尔、泰勒、中情局的马歇尔·卡特将军、索伦森、乔治·鲍尔、财政部长狄龙、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大使波伦、卢埃林·汤普森、艾德莱·史蒂文森、亚历

克西斯·约翰逊、约翰·麦克洛伊、罗伯特·洛维特和保罗·尼采。会后，成立了由上述人员组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情报分析专家给执行委员会送来的报告表明，再过 10 来天，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便可供使用。而这一工程完成后，美国在

遭到袭击时的报警时间将从 15 分钟缩短到只有两三分钟。执行委员会成员们听到这个报告后的第一个感觉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与会者普遍认为，美国无论作出何种反应都可能使局势恶化，即便是这样，也总比听任赫鲁晓夫这样无休止地干下去好。

肯尼迪下令增加 U-2 飞机的飞行次数。执委会其他成员将研究可供选择的途径，从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提出意见。美国国务院将探索争取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欧洲盟国支持的可能；国防部要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军事方案，以及各方案的时间安排、部队军种和所需兵力。这时，执委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空袭。罗伯特·肯尼迪给他哥哥的一张字条上这样写道：“我现在才知道东条在策划偷袭珍珠港时是何种感觉。”

为了不至于引起社会上的骚乱和动荡，肯尼迪仍按原定计划前往康涅狄格州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直到午夜才返回华盛顿。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晚上，执委会都在国务院七楼乔治·鲍尔的会议室里开会。U-2 飞机拍摄到的新证据令人不寒而栗。苏联导弹专家们在日夜不停地工作。现在，从照片上已可以看到导弹。一周之内，16 个——也许是 32 个发射场就可供发射之用。照片除了可以证实圣克里斯托瓦尔确有中程导弹（射程 1600 公里）发射场外，还发现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哈瓦那之间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设有远中程导弹（3500 公里）发射场。远中程导弹的准备工作不久即将完成。按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估计，苏联用这些导弹可以向美国（西至蒙大拿州）的目标一次集中发射 40 枚核弹头。

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在总统外出期间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的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依然赞成空袭，用他们的说法叫做“动一次外科手术”。白宫助理邦迪和艾奇逊是这种意见的坚持者。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虽然轰炸和封锁都属战争行为，但封锁与轰炸相比还有不同，至少在最初阶段，可以避免流血。空袭会炸死几万名古巴人以及难以计数的苏联技术专家。炸死苏联人，就意味着要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

这一天，大家考虑了六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采取观望态度，静待形势的发展；二是派代表去见赫鲁晓夫，悄悄地解决；三是把苏联人拉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解决；四是封锁；五是空袭；六是入侵古巴。对于第六个方案，执委会成员认为可以暂时保留待以后考虑，因为这需要事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不是应急措施。不过，这一工作已经在进行之中。

据美国情报部门 18 日的估计，在古巴的进攻性导弹几乎等于苏联全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能力的一半。从对照片的分析可知，这些进攻性导弹对准一批特定的美国城市，一旦发射，数分钟之内 800 万美国人就会丧生。据情报部门在执委会会议上所提出的最新报告，第一批导弹在 18 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做好发射准备。肯尼迪对艾奇逊说：“这个星期我得对得起我的薪水。”当他与执委会的成员在一起讨论时，肖普将军说：“总统先生，您的处境可是相当不妙啊。”肯尼迪立即回答说：“你也一样。”



会上，肯尼迪责成与会者严守秘密。他强调说，任何过早的泄密都可能在美国准备采取行动之前加快苏联的行动。他说，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还要向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介绍一下情况，但那是不久的将来，当前还是要保密。那几天，肯尼迪完成了预先安排好的各项议程，尽管外界没有看出肯尼迪有何非常之举，然而其内心一直在思考古巴导弹问题，分析苏联人之所以要采取这样激烈、危险、一反常态的做法的目的。

在执委会上，各政要曾提出五种分析供肯尼迪参考。

第一种分析：冷战策略。赫鲁晓夫以实力来对美国的抵抗意志进行试探和考验。此举一旦成功，他就能从古巴用导弹扼住美国的喉咙，在西柏林问题上和对美国的海外基地施加新的压力的问题上立足于比以前更重要的地位。列宁曾经说过，民族扩张如同向前刺出的刺刀，碰到硬的它就缩回去，碰到软的它就刺进去。赫鲁晓夫在核武器上花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虽然不太希望在战争中使用它，但用它来进行讹诈无疑是他的目的之一。

第二种分析：在古巴设置导弹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圈套。如果美国真的为此作出反应，比如说，向古巴发起攻击，那么盟国就会出现分裂，联合国就会出面干涉，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就会被激化，而当美国的部队和注意力都集中到西半球时，赫鲁晓夫将以声东击西的手法在西柏林乘虚而入。另外，美国的过激行动正好让赫鲁晓夫作为证据向中国人证明，“美帝国主义”不是“纸老虎”，而是一只张牙舞爪的真老虎。

第三种分析：此举是为了保卫古巴。分析者认为，苏联在西半球有一个卫星国，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无论在其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方面还是在与中国对抗方面，它都是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他不能听任古巴垮掉。他将不借任何代价来帮助古巴防止外来入侵。卡斯特罗兄弟可以援引猪湾事件、美国国会的态度及逃往美国古巴流亡者不断发表的入侵言论作为依据，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他们曾经只是指望苏联给予一个坚定的保证，没料到苏联会以运送导弹作为更令古巴人安心的保证。

第四种分析：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根据。分析者认为，赫鲁晓夫很清楚古巴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试图利用这些导弹基地在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或者在联合国中作为同肯尼迪谈判时讨价还价的根据，以这些基地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迫使肯尼迪同意签订有关西柏林的协定，或从美国海外基地撤回驻扎在那里的美军。

第五种分析：苏联旨在显示其导弹实力。苏联已不再能从其导弹明显占优的谎言中捞到好处。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可以使他们不用花费更多的财力和物力去研制生产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导弹，迅速地大大增加以美国为目标的导弹总数。这些导弹能够越过美国的大多数导弹警报系统，在发射和到达目标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使美国不可能发出战术警报。这样，美国的核轰炸机在跑道上的15分钟地面待命就嫌时间太长了。肯尼迪在仔细比较这五种分析之后，认为第三种和第五种分析比较站得住脚，但理由还不是很充分，第一种分析最合理。但是不管哪种分析，很清楚，如果苏联的行动得逞的话，那么它就会在整个冷战中“从物质方面和政治方面改变美苏力量的均势”。苏联在保密与谎言的掩盖下所进行的工作，无疑是为了在11月时让肯尼迪和全世界面对一个威胁性的既成事实。这样，赫鲁晓夫就可以在联合国发言并趾高气扬地要求召开一次关于柏林和其他问题的最高级会议。

肯尼迪早就应允要接见葛罗米柯。他认为现在正是一个机会。他和葛罗米柯谈了两个多小时。会谈中，他不时将话题扯到导弹方面，但葛罗米柯始终不接茬。肯尼迪分析认为，葛罗米柯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在古巴发生的事。

就在这时，腊斯克在执委会提出建议，应把10月23日作为采取行动的最后限期。他说，假若届时导弹发射台还在建造，就应使用武力予以摧毁。

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也坚决主张军事进攻。肯尼迪问，苏联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李梅保证说，不会有任何反应。肯尼迪表示怀疑：“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绝不会无所作为地了事。他们发表了那么多声明，现在绝不会听任咱们把他们的导弹搞掉。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肯定也会在柏林下手。”麦克纳马拉继续为他的封锁方案鼓吹。国务院的一名法律顾问借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隔离侵略者的讲话”，建议把封锁称做“隔离”。与会者的意见逐渐趋于一致。罗伯特·肯尼迪更是极力赞成。他说，大家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美国不能进行突然袭击，175年以来，美国还从未这么做过，突然袭击是不符合美国精神的。

18日晚，执委会会议决定：实行封锁。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奉命为封锁古巴寻找法律上的根据。

19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大西洋司令部和加勒比海司令部于下午1点20分进入戒备状态。五角大楼宣布，麦克纳马拉已要求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暂留六周，以便商谈“编制预算问题”。卡曾巴赫报告说，照他看来，在当前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封锁在法律上是说得过去的。肯尼迪决定在星期一（10月22日）傍晚通过电视向美国观众报告情况。

这一天，执委会的会议开了一昼夜。会议上，大多数人明确表示赞成封锁。会议最重要的进展是决定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对封锁表示赞同。为此，必须在有投票权的20个美洲国家之中获得2/3的多数票。苏联问题专家预言，若能做到这一点，其效果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苏联人很重视合法性。

星期六下午，肯尼迪最后决定同意封锁。美国战术空军指挥部的司令官报告说，大规模空中偷袭也未必能够消灭古巴的全部导弹发射场和核武器，这使他对封锁的决定不再有丝毫犹豫。

有人建议肯尼迪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从古巴撤除导弹，美国也将撤除设在土耳其的导弹，并放弃美国在古巴岛上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结果建议者遭到了痛斥。

为了做好细节安排和整理法律依据，越来越多的人参预了问题的讨论。结果秘密开始被四处传播，最后走了样，整个美国社会开始躁动了。肯尼迪要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10月23日前不要对此问题进行报道。

海军在加勒比海部署了180艘舰艇。B—52轰炸机部队满载核弹在空中飞行。星期六深夜，美国第一装甲师从得克萨斯开拔，前往佐治亚港口准备上船。另外五个师也处于戒备状态。

肯尼迪的电视演说是在星期一傍晚7点钟开始的，所有的电视台和西班牙语广播网都同时播送：

同胞们：晚上好。本政府像以前保证得那样，对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集结一直保持着极为严密的监视。在过去的一周里，有证据表明，在这个岛上正在修建一系列进攻性导弹发射场。修建这些基地的目的不可能是别的，正是为了提供对西半球进行核打击的能力……由于引入了这些大规模杀伤武器，古

巴已迅速地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已对美洲地区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多年以来，苏联和美国都在小心谨慎地部署战略核武器，并确保在和平时期不使用核武器。美国公民已经习惯于在苏联境内和核潜艇上所设置的苏联导弹的瞄准下过日常生活。但是共产党人在一个众所周知同美国和西半球国家有特殊关系的地区，违反苏美双方的约定，第一次将战略武器设置在苏联领土以外。这是一种挑衅，如果它是要考验我们的勇气的话，我们的回答是绝不容许。我们的不可动摇的目标必然是，使这些导弹不致被用来攻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并使它们从西半球撤走或清除掉。……我们不会过早地或不必要地冒全球性核战争的风险。在核战争中，甚至胜利的果实也是到嘴的灰烬，然而到了必须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也绝不畏缩。

肯尼迪在讲话中还警告赫鲁晓夫，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袭击，必将引起美国对苏联的全面回击。企图闯越封锁线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

演说结束后，肯尼迪收到国防部的一份秘密报告：为对古巴实施军事行动，已准备好 2000 架次攻击的军用飞机，9 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伞兵以及 25 万名增援部队。

莫斯科在 13 个小时之后才作出了第一个反应。美国驻苏联大使接到一份照会，照会指责美国的“海盗行为”，并否认设在古巴的导弹是用于攻击的目的。看来，赫鲁晓夫有些慌乱，正在拖延时间，以便找到良策。但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肯尼迪已经签署了封锁的公告，24 日早晨即将生效。在公告上，被列入禁止通过的项目包括进攻性导弹和轰炸机。海军已经在加勒比海上跟踪苏联潜艇。

美国驻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大使报告说，他们阻止苏联弹头空运进入古巴的努力获得成功：他们驻在国的政府都同意不准苏联集团的飞机在飞往古巴的途中过境着陆。

罗伯特·肯尼迪到苏联大使馆拜访了多勃雷宁大使。多勃雷宁大使把两手一摊说，据他所知，在古巴没有导弹。

10 月 24 日上午 10 点钟，封锁线已经展开。位于纠察线前哨的是 13 艘驱逐舰，然后是两艘巡洋舰，每艘巡洋舰的侧翼又各有两艘巡洋舰——总共 19 艘。朝它们驶来的是 25 条苏联商船。其中的“加加林”号和“科米尔斯”号距离纠察线只有几公里。一艘苏联潜艇进入两条商船之间并排前进。

为辅助 U—2 飞机的拍摄而进行的超低空飞行所拍回来的照片表明，古巴地面上的工程仍在加速进行。8 个至 10 个导弹基地设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斯、瓜纳哈伊和大萨瓜这几个城市附近。每个基地大约有 4 个发射架。在古巴，至少有 30 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还有 20 架以上尚未拆箱的、能够向美国或拉丁美洲城市投掷核弹的伊尔—28 型轰炸机，在新拍摄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射台以及核弹仓库掩体。几天之内，有几座发射台就可以使用。

在联合国，吴丹秘书长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发出了内容相同的信，敦促双方在两三周内停止封锁和运送武器。肯尼迪的回答是，在苏联人同意拆除并运走导弹之前拒绝谈判。在莫斯科，美国实业家威廉·诺克斯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他发现赫鲁晓夫精神萎靡，疲惫不堪。赫鲁晓夫托他给华盛顿带个信。

上午 10 点 32 分，20 条苏联商船在海上停了下来，其中的 6 条船，然后是 12 条船掉头了。腊斯克用胳膊肘轻轻碰了邦迪一下，轻声说：“咱们同他们眼对眼瞪着，看来他们眨眼了。”

危机仍在发展。在古巴，导弹发射场的修建工程仍在继续进行。伊尔—28 型轰炸机正在拆箱组装。

在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代表佐林质问美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能拿出什么关于导弹的证据来。人们从电视转播中看到史蒂文森趾高气扬他说他拿得出证据。他问佐林敢不敢否认古巴有导弹。“有还是没有？”他疾言厉色地问，“不要等翻译，有还是没有？”佐林避而不答。他说，他现在不是在美国法庭上受审。史蒂文森说：“现在你是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受审。请你现在回答，究竟是有还是没有。”佐林不置可否：“到时候，你就会得到答复的。”史蒂文森逼近一步说：“我准备等待你的答复，即使你要让我等到地狱封冰之时。我也准备就在这间屋子里把证据给你。”说着，他把蒙在相框上的布一撩，一张导弹发射场的放大照片顿时露了出来。

10 月 26 日早晨 7 点，美国驱逐舰“小约瑟·肯尼迪”号与苏联货船“马卢克拉”号相遇。由美国水兵组成的一个武装检查组上船对它进行了检查。没有违禁品，立即放行。此事表明，苏联已通知所有过往船只接受检查。白宫为此很高兴。

但是在古巴，苏联人仍在拼命地干。几小时之内，第一批导弹将做好发射准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警告说，这一情况如继续下去，总统就有“理由”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罗伯特·肯尼迪通知多勃雷宁大使，美国的克制力最多超不过 48 小时。

下午 6 点钟，赫鲁晓夫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间的电传发出一封信件。赫鲁晓夫第一次承认在古巴有苏联导弹。他说，他不再往古巴运送武器；只要肯尼迪答应不进攻古巴，可以把古巴境内的武器拆除、撤离。晚上 10 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考虑这个建议。会上决定把它当做正式照会予以接受，并于次日予以答复。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将留下来连夜研究对策。

致赫鲁晓夫的回信还未草拟完毕，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第二封信。信中说，作为撤出古巴导弹的条件，美国必须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

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不仅内容不同，而且文风也不同，很像是由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报告说，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一架 U-2 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估计是苏联人所为。因为几天来在古巴进行的超低空飞行都曾遭受到古巴炮火的射击，但都安全返航，这次 U-2 飞机被击落，肯定是古巴启用了萨姆导弹。而导弹的控制权是在苏联驻古巴最高军事长官普利耶夫手中。U-2 飞机事件预示着苏联下一步的行动将是发射进攻性导弹。

情况更为紧急，战争一触即发。美国三军参谋长应邀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他们提议在 10 月 29 日发动空袭，紧接着就进攻古巴。执委会里除一人反对外，都认为舍此别无出路，反对的人就是肯尼迪。他说：“我所关心的不是这第一步……而是双方相继升级到第四步、第五步的时候——我怕我们那会儿已不能升到第六步，因为已经没人能去干了。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其实，苏联的态度也绝不是美国人所猜测的那样。苏联并未授权普利耶夫启用地对空导弹，这完全是一次基地指挥官的应急行动。此前，卡斯特罗就不止一次地向普利耶夫和赫鲁晓夫指出，在古巴上空低飞的美国飞机对苏联的导弹基地构成严重威胁，而且他在 10 月 27 日这一天曾命令古巴的防空高炮部队向美机开火。但是，古巴的高射炮没有打下一架美机。不知谁下令发射了一颗防空导弹，便酿成了千钧一发的局势。赫鲁晓夫知道此事后也十分着急，怕美国会有什么过激反应，因此除了指责卡斯特罗之外，还赶忙命令苏联驻古巴最高军事长官只能听从莫斯科的指令，以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苏联国防部长也为此事感到后怕。因为在几周前，马利诺夫斯基曾考虑过授权普利耶夫决定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即：如果美国入侵古巴以及苏联驻古最高军事长官同莫斯科的通讯线路中断、其他抵御侵略的手段无济于事，普利耶夫可以决定使用战术核武器。但最终没有签发这一命令，如果签发了，后果不堪设想。就在 10 月 26 日，普利耶夫还致电莫斯科，要求把核弹头运到导弹发射器的附近，并授权在美国入侵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幸亏赫鲁晓夫没有同意。

美国安全委员会执委会正在进行紧张的讨论。罗伯特·肯尼迪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提议不理睬第二封信，只就第一封信进行答复。晚上 8 点 5 分，肯尼迪向赫鲁晓夫发出复信，并向全世界宣布，他已经接受了苏联的条件。同时，肯尼迪派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私下会晤。罗伯特·肯尼迪明确表示：美国不能在威胁面前作出从土耳其撤走导弹的决定；但是，肯尼迪早就急切地想把这些导弹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只要苏联撤出古巴的导弹，保全美国的面子，那么“两国可以恢复和平关系”，并“在核武器控制方面取得进展”。

赫鲁晓夫领会了肯尼迪的暗示。他在 28 日的回信中，一笔勾销了以撤除土耳其的导弹为对等条件，表示将下令撤除苏联在古巴的导弹，要求美国就解除对古巴的封锁迅速达成协议。他要求双方要“谨慎、克制，不要把事件搞到致命的地步”。肯尼迪随即发表声明，欢迎赫鲁晓夫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肯尼迪要求苏联除撤走导弹和导弹发射架外，还必须撤走伊尔-28 轰炸机。

当天，卡斯特罗就美苏在古巴导弹问题上的协议发表声明，要求美国除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外，还必须作出下列保证：1. 停止经济封锁；2. 停止一切颠覆活动；3. 停止从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基地上进行海盗式的攻击；4. 停止侵犯古巴领海领空的行动；5. 撤除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国海军基地，归还美国占据的古巴领土。

为了安慰卡斯特罗和早日促成协议的执行，米高扬受赫鲁晓夫之托，专程从莫斯科去古巴做说服卡斯特罗的工作。当初也是赫鲁晓夫派人去哈瓦那，劝说卡斯特罗签署苏古关于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的秘密协议。这一装一拆，卡斯特罗都是被动的，他感觉到自己被赫鲁晓夫放到一个旁观者的地位。他愤怒了，但已没有用。11 月 2 日，赫鲁晓夫同意在 30 天内撤走全部伊尔-28 轰炸机。美国也终止了海上封锁。至此，古巴导弹危机基本平息。

肯尼迪最后一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有关地面和外层空间核武器的扩散问题，并为争取禁止核试验做出巨大的努力。”

肯尼迪的最后一封回信，使原来一直陷于僵局的苏、美、英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突然有了转机。而这一转机又源于导弹危机。回过头来看，赫

赫鲁晓夫引发的这场古巴导弹危机，其初衷绝不是单单为了保卫古巴的独立，最重要的还是为了改变苏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此外，他还想迫使美国采纳苏联对德和约的方案，使德国问题的解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古巴导弹危机表明，赫鲁晓夫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霸。

## 第十四章

### 解 冻

从第二次柏林危机到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在核战争的临界点度过了紧张的一年。对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任务及在全国执行的情况，他都顾不上了解。

1961年10月17日，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新建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以及各国外交使节、世界各国各大通讯社和各大报纸的记者作为嘉宾到会。这样大的规模在苏共代表大会的历史上尚属第一次。

赫鲁晓夫主持了开幕式，并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总结报告。赫鲁晓夫的报告肯定了苏共20大的路线，他再次指出“两个体系的竞赛成了历史现阶段世界发展的枢纽和基础”。关于垦荒工作，赫鲁晓夫说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东部其他地区已开垦了4180万公顷荒地，新垦区提供的粮食占国家全部收购粮食的40%。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用很大的篇幅强调要丰富物质生活，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他说：“党认为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相结合是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正在把我们引向、并且必然会导致富裕和实行按需分配。”他还说：“只要劳动者对许多物品的个人所有权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作为个人消费的形式，而不变成目的本身，它同共产主义建设是不矛盾的。但是，广泛的个人所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而且往往变成社会进步的障碍，变成私有风气的温床，会导致小资产阶级蜕化。”

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他说：“党的政策贯穿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苏联的阶级关系也进入了新时期，“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一方面把发展国家机构、将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改造为社会自治机构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将继续执行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职能交给社会团体的方针。”

接着，赫鲁晓夫话锋一转，开始谈到苏共党的工作。赫鲁晓夫重又提起关于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这使苏共中央委员们颇感意外。他在报告中第一次亮出了所谓“反党集团”全部成员的名单。他说：“第22次代表大会所反映的列宁主义方针，最初不得不在某些人强烈反抗的情况下加以执行；这些人是反党分子、个人崇拜时期居统治地位的那种方法和秩序的狂热拥护者、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这个反党的派别活动集团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参加这个集团的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

“最初，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激烈反对党关于谴责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谴责并纠正各种滥用权力现象、查明迫害活动的具体负责人的路线。他们的这种立场并非偶然，因为对于许多起大规模迫害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经济干部、军事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的事件，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发生的许多类似现象，他们本人都负有责任。”

报告中，赫鲁晓夫对基洛夫的被害事件又一次提出怀疑，他说：“我们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死亡的材料，产生的问题就越多。”他提出三点疑

问：为什么凶手曾被抓获过并给予释放？基洛夫的警卫员为什么远离保卫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为什么突然死于“交通事故”？

赫鲁晓夫报告中这种突然转向，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休息走廊里引起了代表们的激烈争论。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们无法控制住他们的愤怒情绪。第三天，按会议程序，代表们对报告进行全面讨论。但是讨论变成了谴责和批判。

讨论中，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登台发表讲话。他严厉指责卡冈诺维奇当年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在担任交通人民委员时的各种做法。波德戈尔内说，在卡冈诺维奇的指使怂恿下，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受到非人虐待。他把卡冈诺维奇称为早就该从党内清除出去的“败类”。他的这一番话引起全场一片掌声，接着发言的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祖罗夫。他向大会详尽叙述了马林科夫和叶若夫对白俄罗斯党的干部所进行的种种摧残和迫害。他指出，在1936—1938年期间，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人数减少了1/2。马祖罗夫呼吁大会将马林科夫清除出党。其他几名代表也陆续登台发言。福尔采娃提到了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罪行；波利扬斯基证实了卡冈诺维奇在库班地区对党的干部队伍进行的破坏；伊利切夫、什维尔尼克、克格勃主席亚·尼·谢列平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齐·季·谢尔久克等人的发言都详细地讲述了1937—1939年滥用权力的情形。

在对讨论情况进行总结时，赫鲁晓夫又用了较多的时间谈及斯大林和“反党集团”成员所犯的罪行。他详细讲述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自杀，阿·斯万尼泽（斯大林前妻的兄弟）的死亡，一些红军高级将领和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悲惨遭遇。他在总结中提议，在莫斯科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永远纪念专横统治下受害的同志们”。这一提议得到了大会代表的一致通过。

在代表大会闭会之前，来自列宁格勒地区的大会代表伊·斯波里多诺夫、莫斯科代表彼·杰米契夫、格鲁吉亚代表基·扎瓦希什维利和波德戈尔内都提议把装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移出列宁墓。杰米契夫在发言中说：“再继续放在那儿，就是一种亵渎行为。”随后，在斯大林劳改营和监狱中度过了27年的德·拉祖基娜发言。她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劳改营中政治犯的非人生活和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在她发言之后，22大通过了如下决议：

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约瑟夫·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列宁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他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

决议于31日傍晚执行。在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坑，把斯大林的棺木放进去后，并没有往里填土，而是运来了几卡车水泥浆，浇灌到墓穴中的棺木上。墓上立起一块花岗岩石碑，后来又刻上了简单的碑文：“约·维·斯大林”。

诗人叶甫图申科在一首题为《斯大林的继承者》的诗中描述了这一情景：

大理石墓碑默然无语，

水晶棺无声地闪光熠熠。



守陵的士兵们站立一旁，  
恰似青铜塑像在微风中肃立。  
几缕青烟在灵柩上缭绕，  
似有生的气息从缝隙中漏逸。  
卫兵扛着遗体走出列宁墓大门，  
刺刀的寒光是那么凄厉，  
他也那样不言不语，  
静得令人不寒而栗。  
那双涂有防腐剂的拳头，  
仍紧紧地攥在一起。  
窥视的目光透过缝隙……  
他的主意已然策划完毕，  
此刻的安息只是小憩。  
我要向我们的政府大声呼吁：  
增添两倍、三倍的哨兵，  
把这具棺木看守严密，  
千万别让斯大林东山再起，  
以免重演历史悲剧。

代表大会关于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的决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大规模捣毁斯大林纪念碑和纪念像的行动。成千上万的城市、街道、广场、农庄和工厂纷纷易名。早在 20 大之后，许多斯大林纪念像就已被拆除，矗立在伏尔加一顿河运河上的巨型斯大林青铜塑像就是在那时被拆除和熔化的，现在所有类似的纪念碑都被从底座上推倒。只是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塑像和纪念碑依然保留着；一些街道还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在当地博物馆里也能看到介绍斯大林生平事迹的展览。

官方对斯大林的严厉态度，立即在全国报刊上得到了反映。有关 30—40 年代“悲惨死去”或“遭诬陷被害身亡”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军队将领的名字和带有此类字样的讣告，大量涌现报端；20 大后获得平反的一些受害人的往事回忆，也开启禁忌，被大量披露出来。有关集中营、流放地纪事或犯其他大忌不能公开发表的文章，则以手稿形式发表在被称为“萨米兹达特”（意为“独立出版”）的地下出版物上。瓦·沙拉莫夫的《科累马的故事》就属于此列。

22 大后“解冻”的浪潮迅速波及科学和艺术各个领域。

“解冻”原是苏联作家伊·爱伦堡一部小说的名称，以喻个人崇拜的漫长冬日已经过去，坚冰消融，思想解放的季节业已到来。这个术语代表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变化的特点。

40 年代后期、50 年代初期，苏联文坛流行“无冲突论”。在“无冲突论”的影响下，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为政治口号作图解的作品，被当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硕果。“无冲突论”的政治依据是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相适应”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文艺创作中就要表现好与更好之间的矛盾，否认社会上有好与不好之间的矛盾。这时，不少苏联作家感到政治空气压抑。他们想说话，但是不敢说，也没有地方说。爱伦堡在 1948 年写成的论

文《谈作家的工作》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后，才在1953年10月号《旗帜》杂志上公开发表。之所以要在斯大林死后发表，爱伦堡解释说：“我经过了长时期的犹豫才决定发表这些有关作家工作的意见。”“我自己问自己：提出有关作家工作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了呢？我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斯大林逝世，爱伦堡感到松了一口气，呼喊“解冻了！”实际上，这不仅是爱伦堡一个人的感受，而是苏联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声。

1953年底至1954年上半年，苏联的报刊开始出现一些批评性文章。例如，《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触及文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文章。其中，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最有代表性。文章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的种种积习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文章尖锐地指出，多年来文学作品“凭空杜撰”，制造了种种“升平景象”：农村本来贫困不堪，小说电影中却爱描写庄员们大摆宴席；工人食堂的情况本来很糟，可是在一些作家的笔下，虽没有摆出奶猪冻和烤全鹅，但也看不到黑面包……作家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这类弄虚作假、歌舞升平的现象。在过去的年代，为了树立个人崇拜的形象，美化、粉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电台、书刊、大会小会上假话大话空话连篇，制造种种虚假现象，这已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波麦兰采夫和其他作家、批评家一经在《新世界》上提出这个问题，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

广大读者热烈投入了关于真诚、真实问题的辩论。一读者给《新世界》杂志写信说，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了这种丑陋现象，并且对之愤恨之极，他们想说但未能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是苏联文学替我们老百姓“说出了这句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他向作家深表感谢，说道：“所有有头脑的、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

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就此发言说：“我认为，波麦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之所以需要向社会良知呼吁，是因为“因循成习的不诚实”，这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

这样一来，由文学杂志发端、由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提出的有关真实、真诚的议题，随着讨论的发展、深化，便转化成具有最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并且被赋予明显的政治意义。

与文学的真诚、真实问题相联系，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面向人的问题。就是说，文学要不要把有关人的描写放在第一位，敢不敢真实地发掘人的内心世界，承认不承认人有个人生活的权利。高尔基早就说过，文学应该是“人学”。人是文学注意的中心。但多年来的文学实践却不是这样。这反映了社会上的一种倾向：只承认社会利益、集体生活，而不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往往只是被视作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附属物。在革命浪漫主义时代，个人生活、个人感情往往被置于一边，这在当时被看成人们的行为准则。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用这样的准则规范文学、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有悖于生活的真实。

在关于面向人、人该不该有个人生活权利的讨论中，一种把个人生活权利理解为取决于个人内心自由权利的观念，在青年人中间得到了广泛共鸣。

文学的“解冻”带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解冻”。1955—1956年，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问题的争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本质、特点和解决方法应当是怎样

的？矛盾和对抗的相互关系又如何？在争论过程中，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什么“恶意的蓄谋”和“敌人的诡计”。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远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产生的，或者是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其中一部分矛盾之所以激化，是由政策错误所引发，或者是因为不善于依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而造成的。当时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选择解决矛盾的时机，在解决矛盾时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形式，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这样，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就破除了教条主义框框，摒弃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

与此同时，《历史问题》杂志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打破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从现实需要出发阐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力图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上的有关问题。

苏共 20 大便在这一背景下召开了。20 大的召开，尤其是“秘密报告”的逐级传达，更增强了“解冻”的势头。

在这个时期，文学的“解冻”仍然跑在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前头。斯大林时期成百上千的文艺家遭到不公正待遇，这是文艺界怨气最大的问题。各种形式的作家会议都发出了加速平反的呼声，还提出了改组作家协会、取消 1946 年联共（布）中央决议的要求。文学“解冻”浪潮中引起最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是杜金采夫描写官僚主义压制创造发明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小说一发表，就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激起了对社会问题的热烈争论。接着，《哲学问题》1956 年第 5 期发表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的落后问题》和《新世界》1956 年的第 12 期刊登的西蒙诺夫的《文学漫谈》，都触及了 30 年代以来行政命令的文艺领导体制和战后一系列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

这一时期，在全苏展开的清查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的行动，也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几百万人获释还乡，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死后得到昭雪，这对社会“解冻”过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正当“解冻”势如春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了。赫鲁晓夫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从 1957 年初，“解冻”的闸门开始收紧，《共产党人》、《真理报》和《文学报》等中央报刊展开了对思想文化界、特别是对文艺界“不健康倾向”的批判。接着，赫鲁晓夫在 1957 年 5 月 13 日苏共中央举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作家的会见中，对文艺界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把《莫斯科文学》比做“裴多菲俱乐部”。在这种气氛下，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格医生》只得拿到国外出版，竟获得 1958 年诺贝尔文学奖。1958 年 10 月，苏联作协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责成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出面发表讲话，向作家发出了“驱逐出境”的警告。再加上全苏范围对他的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最后不得不写信给赫鲁晓夫，表示“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

由于官方的收缩政策，“解冻”的思潮变得平缓了，但并未停止。苏共 22 大又为此思潮打开了闸门。

1962 年 2 月召开了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和全苏历史学家代表会议，以往被作为“禁区”的大量问题成了讨论的题目：经济学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物质刺激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学中有关斯大林伪造史实的最尖锐问题也成为议题；哲学揭露了过去对相对论、共振论和量子论的压制，

进一步清理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消极影响。根据 22 大决议和苏共纲领，会议决定重新修订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教学大纲，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重新认识。1962 年 2 月 7 日，《真理报》刊登了马利歇夫的文章。文章中说，“赢利应该看成是计划的主要指标，只有利润才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劳动生产率概括地反映在利润水平上”；“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和动力”。

1962 年 9 月 9 日，《真理报》刊登了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奖金、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利别尔曼在文章中提出：应当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使企业能迫切关心最佳的生产效果。利别尔曼认为，只要把按品种的产量计划和交货期限计划下达到企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利别尔曼提出六条具体建议：1. 产量和品种计划经过协调和批准后，企业的计划全部由企业自行编制；2. 根据赢利率（利润与生产基金之比）规定各种物资奖励的统一基金；3. 为各部门以及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大致相同的各类企业统一批准随赢利率而变化的奖金比率表，作为长期使用的定额；4. 控制数字只下达到国民经济委员会，取消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各企业间摊派任务，国民经济委员会可以检查、评价和改进各企业自行编制的计划，但不得改变作为企业奖励基础的赢利比率表；5. 制定从企业利润中提取的统一奖励基金的使用方法，同时扩大企业把奖励基金用于集体奖励和个人奖励方面的权限；6. 灵活地制定新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便促使企业生产更有效的，使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即整个国民经济都能赢利的产品。利别尔曼文章的总的精神是：建议减少国家规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权限；按赢利率高低来评价和奖励企业。

9 月 20 日，《真理报》又刊出利别尔曼的文章。文中认为：把利润作为衡量生产的经济效率的总的（不是唯一的）指标，可以取得成效；利润应当成为衡量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企业在合同、订货、利润奖额的基础上，可以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计划。10 月中旬，利别尔曼在《经济报》编辑部举行的讨论会上补充说：“在我的建议中，利润并不是评价企业的‘模子’，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赢利定额，以便让企业自己努力去提高利润。”

利别尔曼的文章刊出后，经济学界反应强烈。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对利别尔曼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开展讨论。于是，由《真理报》编辑部发起，开展了关于完善经济管理问题的讨论。讨论从“如何使企业关心最佳生产效果”问题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的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工作人员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成本、劳动生产率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

《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全国性报刊、其他地方性报刊、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刊都刊登文章，参加讨论。从 1962 年 9 月到 1963 年底，仅《真理报》编辑部就收到 1000 多篇讨论文章。

除了刊登文章之外，还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讨论会。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在 1963 年 1 月举行大会，对经济刺激问题、遵守“对社会有利也对每个企业有利”这一公式的途径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气氛的认真、热烈，是自列宁逝世以后所未曾有过的。这场讨论也越出了苏联国界，东欧的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经济学界都对利

别尔曼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使之成为一场“国际性利别尔曼冲击波”，冲击了斯大林模式关于价值规律、利润、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基本理论。

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受苏共中央委托，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加托夫斯基对一年多来的讨论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说：在讨论中，某些参加讨论的人力图回避计划工作和企业刺激中存在的缺点，回避企业没有足够的经营主动性以及在经济核算中的重要作用。而另外一些人提出的建议则没有很好地考虑计划经济特点。他们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脱离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制度。

加托夫斯基在总结中还说，这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企业上，这是苏联经济的基本环节。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提高计划工作的效果，创造能经常推动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生产潜力从而加速我国发展速度的指标体系和刺激体系”。加托夫斯基指出：委员会的立场是“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

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在对讨论作总结时，还同计划机关、企业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写出了综合报告，得到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和科学院主席团的赞同。报告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建议，其中包括：改进计划、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的价值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在企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进奖励基金形成的办法，提高奖金的作用；加强对创造和加速采用新技术、科学成就、各种进步的新产品的刺激等。综合报告肯定了利润是工作质量的指标，是生产发展和刺激基金的源泉。

这场讨论是在相对宽松的气氛下进行的，它在认识苏联计划经济下利润和奖金的作用等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只是这场讨论来得太晚了，它在苏联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那时的执政者就不再是赫鲁晓夫了。这场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争论，尽管受到赫鲁晓夫的鼓励，但它对赫鲁晓夫权力的巩固并未起到些许积极作用。意识形态主管当局认为，如果继续放任“解冻”，事态将难以驾驭。

矛盾集中到是否开禁，准许发表以斯大林时期的集中营为题材的作品。赫鲁晓夫的本意是赞同解冻的。但他面对解冻的势头确实又显得心中无数，手足无措。他有些担心，害怕解冻会引起洪水泛滥，以至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冲破苏联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他想控制这一浪潮，但又犹豫不决。

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一书的处理，使他有所感悟。他曾总结说：评价一个作家和评价他的作品是不同的两回事。如果这本书的艺术质量的确不高，那么应该留待读者去评定。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引起读者共鸣——如果作品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方法不能感动读者——那么，作者就应该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当然，他会在精神上受到挫折。但是，如果他的作品未能体现和传播某些读者关注的思想，这只有怪他自己，怪不了别人。主要的问题是：应该让读者有机会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不应对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作出判决，好像他们是在受审判似的。

赫鲁晓夫对当初没有准许《日瓦格医生》在国内出版是很后悔的。因此，1962年11月，他批准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

《新世界》杂志上公开发表。

小说的发表，在苏联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性效应。数万册《新世界》杂志和印制的小说单行本旋即销售一空。小说的传播甚至使许多政治和社会新闻黯然失色。就连当时正在参加苏共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们也跑遍书市，为购小说而奔走；会上会下几乎每个人腋下都夹着红蓝两本书：红的是全会文件，蓝的是《新世界》杂志。

不久，索尔仁尼琴同一题材的小说《克里切托夫卡车站的小事》和《玛特辽娜的一家》又分别在《真理报》和《新世界》发表。这使文艺界出现了一系列尖锐题材的作品：柯切托夫继《茹尔宾一家》之后，又发表了《叶尔绍夫兄弟》，作品表现了工人的生活热情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西蒙诺夫发表了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三部曲《生者与死者》以及《军人不是天生的》。作品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战争的惨烈，以更深刻的态度，探讨了获得胜利和遭受失败的原因。马尔科夫的《父与子》、奥布霍夫的《生活是阻挡不住的》等叙事小说，都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了评价。肖洛霍夫继《一个人的遭遇》之后又发表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展现了集体农庄生活的复杂问题、农业生产的困难、以及农村的精神生活等多层次、多角度场景。小说向读者展示，不管小说主人公达维多夫采取行政手段的意图有多么美好，不管他一看见田里游手好闲的哥萨克就冒火的动机是多么善良，都没有理由为格列米雅其农庄主席的命令式和最后通牒式的工作方法进行辩解。在经过一场由于他的辱骂和呵斥而引起的与庄员不顾情面的谈话之后，达维多夫终于开始思考自己行为错误的程度。当初，他被派来领导农民时，深信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他明白，他不了解这些人，他不懂得他们的想法和心情。

为了表示对解冻的理解以及对肖洛霍夫的尊重，赫鲁晓夫特地前往维申斯卡雅，请肖洛霍夫同他一起去美国访问。肖洛霍夫也去过赫鲁晓夫的别墅，读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最后一章。悲剧式的结局使赫鲁晓夫很受感动。

“真想将达维多夫活下来啊！”他对作者这样说。肖洛霍夫答道：“应当真实。”赫鲁晓夫常请别人为他朗读，以便更多地了解文学的动向。“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会儿，您的眼睛辛苦一会儿。”他一面说，一面把书递过去。他的视力虽然不错，但由于经常要审批文件，眼睛总是感到很累。朗读成了家常便饭。赫鲁晓夫能够一连听上几小时，特别是在度假的时候。

他就这样“听了”很多类似《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有待“特殊裁决”的作品。赫鲁晓夫听得非常认真，一动不动地坐着，有时微微合上双眼。

然而，并非所有的新书赫鲁晓夫都能通读一遍，也不是所有有争议的文学问题他都了解；也不是所有的东西他都能接受，或者说都能理解。然而，他却越来越多地把对某一作品做出尖锐的毫不含糊的思想评价的权利留给了自己。他的这一做法被那些反对解冻的人所利用。

在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和波利卡波夫的安排下，赫鲁晓夫被邀请去参观现代美术展览。

这次展览在当时的首都文化生活中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它是专为庆祝全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成立30周年而举办的。在一个月时间里，它在莫斯科公众心中并未引起多大兴趣。展出的作品出自几位得到官方认可的著名画家之手，应邀参展者中没有抽象派画家。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一批十分有朝气的年轻画家又接到邀请，要他们在

马涅日艺术馆展出自己的作品。他们的油画挂在了二楼展厅。1962年12月1日，他们又被通知站在自己的作品旁边，以便对观众解说，而党中央主席团的参观也定在这一天。赫鲁晓夫勉强而至。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新型建筑技术、农业机械、莫斯科建设规划或国外工业厂矿设备的展览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对油画和雕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甚至从未涉足过特列季亚科夫绘画陈列馆。

赫鲁晓夫草草地浏览了那里的美术作品。有些作品他很喜欢，有些则不感兴趣，还有些他很反感。在一层看完后，他同那些毕恭毕敬的画家们聊了起来。

赫鲁晓夫披上大衣准备离去时，有人劝他到二楼再去转转，感受一下抽象派的作品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不得已跟着上了二楼。赫鲁晓夫皱着眉头转了一圈，忿忿他说：“这种所谓‘富于创造性的作品’同我们的人民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拒绝这些东西。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应当记住这个事实，他们称自己是艺术家，可是创作的‘画面’却使你感到迷惑不解，纳闷这究竟是人手画的作品呢，还是驴尾巴乱涂乱抹的结果。这些人必须认识自己的错误，必须开始去为人民工作。”接着，他站在热尔托夫斯基的作品前说道：“这难道是热尔托夫斯基的作品吗？他人长得倒挺帅，可是画的都是丑八怪。”“谁是这儿的负责人？”赫鲁晓夫问，“是他。”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指着雕塑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内说。赫鲁晓夫随即对雕塑家批评起来。涅伊兹维斯内说，他只能谈他个人的作品。说罢便走进作品陈列室。赫鲁晓夫也随着跟了进去，和赫鲁晓夫一同来的人以及整个人群也都蜂拥而入。

赫鲁晓夫指责涅伊兹维斯内等人挥霍人民的金钱，创作的却是臭大粪。涅伊兹维斯内生气了，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他对艺术一窍不通。他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在美学领域中只是个文盲。赫鲁晓夫断然加以否认。于是涅伊兹维斯内就问他，即然他自以为有权威的资格，那根据又何在呢？赫鲁晓夫回答说：“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了，不是吗？而您又在为谁工作？”涅伊兹维斯内看到赫鲁晓夫如此坦率，也就毫不隐讳地对他说，他们这场冲突实际上是有人事先谋划好的，这个阴谋的用意不仅是破坏思想解放的进程，也不仅是针对知识界的、针对美术界的，而且还是针对他——赫鲁晓夫本人的。

涅伊兹维斯内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批评我，但是有的共产党员，譬如毕加索、雷纳托·古图索，都赞成我的作品。”他提出了几个在苏联受到尊重的抽象派画家的名字，这些人同时也都在过问政治。赫鲁晓夫精明地眯着眼睛问道：“你个人是否在乎他们是否是共产党员？”“是的，我在乎。”赫鲁晓夫立即向他诘问：“噢，这么说您对此真的很在乎啦！那么好吧，一切都清楚了——您并不在乎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共产党人是否喜欢您的作品，您心里实际上想说，您根本不在乎这些。对您来说，重要的在于他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而我尽管是共产党人，一个世界上重要的共产党人，但对艺术是一窍不通，是吧？”说着，赫鲁晓夫向涅伊兹维斯内伸出手，边握手，边说：“您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欣赏您这样的人，不过您身上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果魔鬼赢得了胜利，我们就要压制您；如果是天使占了上风，那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您。”

赫鲁晓夫与涅伊兹韦斯内争论的消息很快在《真理报》上披露出。一大批很有名望的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上书赫鲁晓夫，为“二楼”的画家辩护。其中有伊利亚·爱伦堡、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赫鲁晓夫对马涅日艺术馆发生的这件事多少感到有些为难。虽然他绝不会放弃对抽象派艺术或“形式主义的”音乐的偏见，但是他的确想做些改变。

1962年12月17日，在列宁山的迎宾馆内召开了一次党政领导与著名艺术家及作家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赫鲁晓夫到会讲了话。出席者中有索尔仁尼琴，还有一些联名上书者，如诗人叶甫图申科等。

赫鲁晓夫讲完后，叶甫图申科要求发言。他说：“我想为抽象派艺术和我们的艺术家说几句话……我们应当对我们艺术中的这一抽象主义流派表现出巨大的耐心，不要贸然下手扼杀他，因为这将引起消极的后果。我认识这些艺术家，我了解他们的创作风格。我想强调一句，在绘画方式上他们既喜欢现实主义也喜欢抽象派。我坚信，他们作品中某些形式主义的倾向能够逐渐得到克服。”

赫鲁晓夫对叶甫图申科的话是不同意的。怎样才能克服这些艺术上的不良倾向呢？如果不进行批判，耐心静等它被逐渐克服，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呢。赫鲁晓夫说：“俗话说，只有坟墓才能纠正驼背。”叶甫图申科也不退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段时期在我国确实只有坟墓才能纠正驼背。但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向前走了好长一段路了。真的，还有其他纠正错误的方法。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宽宏大量，不动干戈，给我们的艺术家充分的时间，让我们开展自己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艺术流派共存，让我们的艺术通过艺术家的竞争，在整体上获得进步。同作家和音乐家一样，画家对任何形式的压制也都十分敏感，因此最好不要使用这种手段。一切最终都会走上正轨的。”

赫鲁晓夫说：“我不相信您本人真会喜欢抽象派艺术。”

叶甫图申科解释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抽象派艺术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重要的是它不应当挂羊头卖狗肉，变成冒牌货。我认为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到了一定的时候，用旧式的绘画风格将无法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精神风貌。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我并不喜欢我们的肖像绘画，尽管它是现实主义的。我可以对画像里的人物十分尊敬，可是画像本身对我来说似乎就像是一般的彩色照片，这无法激起欣赏者的感情。我根本不相信，您，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真会喜欢一幅表现尼·谢·赫鲁晓夫在工人中间的平平淡淡的油画。最近我的工作同古巴有密切的关联。我非常欣赏古巴的抽象派绘画。要能在我们这里举办一个古巴美术展览，那该多好呀。古巴的抽象派艺术在古巴人民及其领导人当中都非常受欢迎。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之也颇为欣赏。古巴的抽象派艺术帮助了革命……我并不是主张姑息纵容。我主张的是克制，是深入研究当代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并且最终为了人民的利益把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团结在一起。”

双方的态度渐渐缓和下来，赫鲁晓夫就不再说些什么了。在他眼里，叶甫图申科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是个好人。然而，他的性格中却有着放荡的、难以驾驭的、乃至狂暴的气息。叶甫图申科也许是对的。因为在马雅科夫斯基活着的时候，赫鲁晓夫记得他和未来派都曾被认为是抽象派并因此受到批评。可是，这些诗人留下的作品即使在现在也被看作是为争取美好未来的斗



争服务的。

会上，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发了言。他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不能容许有任何脱离苏联文学艺术主要发展路线的现象。他批评有人“不正确地理解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性质，有时候忘掉了我们的思想立场的不调和性和不妥协性”。伊利切夫火药味十足地警告说，艺术家的良好愿望也完全有可能使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为敌对力量的利益服务。他提出，党在文艺中过去和将来始终捍卫党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高标准，它的核心是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管这种真实多么严酷。

12月26日，针对国内文艺界的动态，苏共中央又召开了意识形态会议，伊利切夫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强调文艺在苏联的发展不能没有舵、没有帆，他表示党在艺术领域里过去执行了、今后仍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这样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反对动摇和脱离文艺发展的主要路线，为文学艺术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性，为文学艺术同人民的生活和同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不可分的密切联系而斗争。”

1963年3月8日，赫鲁晓夫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又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工作的会议。会场设在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这使会议的气氛显得异常严肃。应邀到会的艺术家们没有享受茶点小吃的招待，也没有酒喝。伊利切夫讲话的主旨仍然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将给予坚决的打击”。接着，赫鲁晓夫讲话。他说：“创作活动，特别是作家的创作活动，与政治密不可分，因为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掌权者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关系，是艺术创作过程的一部分。作家总是在钻研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而这类问题任何执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部想独占。如果你不去培养人们的思想感情并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你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这是党的任务，而且也是文学的任务。”对于如何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他说：“一般说来，我认为一个聪明人——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蠢人——理解一部文学作品要比理解一支乐曲、一幅绘画或一件雕塑更容易些。作家像是泥水匠或是车工，他生产的成品可以被拎起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并且作出判断。一个作家要塑造他的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不能不进入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党的生活到人民的生活。”接着，赫鲁晓夫的话题又转到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对艺术家的态度有其好的方面。他是政治家，是有高度智慧的人。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在他统治时期遭受苦难。有些人他是不喜欢的；当局没有给这些艺术家以他们生存所必需的和应有的待遇、谅解和宽容。如果由一个人或一批人来判定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这会给知识分子造成严重的苦恼，特别是在那些可以随心所欲地判断其质量的某些艺术领域，如音乐。但是，作曲家、画家和作家遭到的更大的苦难是被束缚起来，不许动弹。任何形式的限制都犹如给创作活动上了枷锁。斯大林像所有暴君一样，只有在作家的作品吹捧他本人和他的统治时，他才对他们优礼有加。在这方面，斯大林就像那个迫害普希金的尼古拉一世一样。普希金是个伟大的作家，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有。他写了不少表达他自己和人民心灵的美丽诗篇。”接着，赫鲁晓夫又朗诵了几句普希金的诗句。一般来讲，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即兴的，因此常常显得啰啰嗦嗦，前后矛盾，主题不明确，有时扯得很远，比喻又不尽恰当，这也是囿于他的教养。他继续说：“普希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流放中度过的一—先是在南方的摩尔达维亚、基什尼奥夫和敖德萨，后来在普斯科夫附近他自己的庄园里。想想看，在所有的时间里他一直

在进行创作。当然，尼古拉一世要普希金创作，但是还要他颂扬君主和支持君主政体。”接着，他又解释说：“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斯大林时代都受到压迫。例如，伏罗希洛夫曾狂热地表扬画家格拉西莫夫，原因是格拉西莫夫在他的画中颂扬过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还有一个宠爱的作曲家，他经常为伏罗希洛夫唱赞歌，这就是波克拉斯，他现在仍然很受尊重。看来是他谱写了关于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骑兵部队功勋的歌曲。有一个专门名词可用来刻画诸如格拉西莫夫和波克拉斯这样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宫廷画家和宫廷音乐家。有权势的人总是把这样一批艺术家供奉在自己周围，赐给他们官府的恩宠——更不必说物质待遇了。有些得到斯大林恩惠的知识分子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法捷耶夫就是一例。他是个有卓越才能的作家，他的《青年近卫军》是不朽的作品。可是，法捷耶夫经常在作家协会颂扬斯大林，自认为是斯大林的代言人，甚至为被控犯罪的人捏造伪证。后来斯大林死了几年以后，包括许多作家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的事实揭露了出来，这些人根本不是歹徒或人民的敌人。法捷耶夫对此不能理解，他也不能理解对斯大林的罪恶的揭露。他知道他已走到了尽头，于是自杀了。”

接着，赫鲁晓夫的口气一变，回到正题上来，他说：“如果我们每一位作家和艺术家都从其活动应该巩固而不是削弱共产主义阵地这种观念出发，那就好了。那时，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多地检验自己的活动，这样社会舆论就没有必要批判思想不健康的作品了。”他说，今后的文学作品不允许以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活动为主题，原因是驾驭这方面的材料总会出现偏差。“而整个意识形态工作，每部文艺作品都要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最后，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话：“显然，我们的过错还是在于没有及时发现艺术界某些不健康的现象，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这类现象的蔓延。对所有这些领域都应进行整顿。”

不久，官方正式的禁令便出台了。

解冻潮流因苏共中央一纸禁令而被阻止了。但这一潮流并未在苏联消失，它由外露转入地下，从此开始形成难以控制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潜流。

## 第十五章

### 问题成堆

赫鲁晓夫在这一时期不仅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失和，而且也同科技界知识分子发生龃龉。

这天，赫鲁晓夫与苏联核科学家座谈。在座的有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会上，赫鲁晓夫向科学家们宣布：苏联准备进行新一轮核试验，这些试验将会为苏联解决德国问题提供支持。萨哈罗夫对此很有看法。从1957年起，萨哈罗夫就开始注意由核武器试验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污染大气的问题，并因这一问题所负的责任而深感不安。每一次核武器试验，无论是在美国、苏联、英国、还是法国进行，都要涉及几千万吨TNT当量的核爆炸。若以每百万吨TNT当量核爆炸的放射性尘埃伤害数千条生命计算，那么每一次核试验至少要伤害近十万人的生命。萨哈罗夫在会议期间向赫鲁晓夫写了个便条，其中写道：“经过三年暂停之后又恢复核试验，这将违背核禁试条约，也会妨碍裁军的进程，而且还会引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特别是洲际导弹和反导弹防御方面的竞赛。”萨哈罗夫的字条沿着一个个座位传过去，一直传到赫鲁晓夫手中。赫鲁晓夫拿着字条看了一下，随手放进上衣胸前的口袋中，然后邀请所有与会者同他共进午餐。当大家围桌坐定以后，赫鲁晓夫发表了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萨哈罗夫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但他应当把外交政策留给我们这些擅长于这门微妙艺术的专家来处理。实力可以使我们的敌人陷于混乱。我们不能大声说我们的政策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听从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的意见，那我就不是什么部长会议主席，而只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了。”赫鲁晓夫这种傲慢的态度，以及为达到其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一意孤行的做法，令萨哈罗夫等一批科技知识分子深感失望。

如果说赫鲁晓夫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的冲突是有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那么他与科技知识分子关系的疏远则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作风造成的。

自此，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苏共思想家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伊利切夫的理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染源”已经毒化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的思想。必须挽救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毁掉自己，并给国家、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只要放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无孔不入，就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就会以绞刑架和枪杆子结束。

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理论，终于使他同过去那些最热烈的支持者闹翻了。现在，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阵营。

麻烦不止于此。欧洲的风波刚刚平息，同美国的斗争刚刚告一段落，社会主义阵营内纷争又起。这次是同中国彻底闹僵了。

22 大时，赫鲁晓夫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会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攻击，并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现领导。对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批评赫鲁晓夫说：“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

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指责，是无助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周恩来还指出：“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代表大会期间，苏中两党举行会谈，但由于双方都坚持己见，会谈毫无成效，周恩来遂率代表团在大会结束前提前回国。赫鲁晓夫去机场送行。而在北京，毛泽东率全体党政高级领导在首都机场迎接了周恩来的归来。自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和中共的关系全面恶化，后来两党公开分裂。

11月7日，即十月革命44周年纪念日，也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20周年纪念日，霍查宣布与苏联公开分裂。12月11日，苏联宣布撤回驻阿的苏联外交人员，并要求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同时撤离苏联，断绝了两国外交关系。12月15—16日，中国《人民日报》公布了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分歧的一批文件，支持阿尔巴尼亚抵制苏联的行动。

这一年，苏联要求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所有的贷款，包括抗美援朝期间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物资。这是苏联继前一年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之后的又一次要挟行动。

随后，苏中两党的分歧和争论继续升级。

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驻中国新疆的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在伊犁地区引诱、煽动数万名中国公民出走苏联，并挑起暴乱事件。10月下旬，印度军队再次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苏联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支持印度反华。赫鲁晓夫公开为印度辩护，指责中国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的正义行动。

此外，赫鲁晓夫还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并授意苏联的报刊大量地发表文章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在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间，赫鲁晓夫利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先后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对于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反华活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答辩，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连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七篇重要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从批判南斯拉夫扩大为批判意共陶里亚蒂和法共多列士，以示回敬。

1963年2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寻找两党之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然而又声称在原则问题上不作让步。从这种立场出发，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兄弟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但要求公布这一时期双方的来往信件。经协议，双方在3月14日同时公布上述两封信件。

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由于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其现阶段根本任务的总路线”。信中就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信中还提出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的一些具体建议。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3月30日复信中，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尽管苏中两党会谈即将举行，但论战的气氛丝毫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在苏

联境内是否准许散发 6 月 14 日文件引起了外交纠纷，中苏两党的关系愈加紧张。

为了消除分歧，1963 年 7 月 5—20 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彭真率领，苏共代表团由苏斯洛夫率领。在会谈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7 月 14 日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指责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信件对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莫斯科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并对苏共 20 大、21 大、22 大的决议和苏联共产党纲领进行了“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公开信对苏中分歧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苏中两党会谈于 7 月 20 日结束，大论战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这场大论战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涉及的问题很多。7 月 20 日，中国《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此后，苏联的全国性报刊发表了近 300 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1963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从“二评”起，题目分别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开始公开指名批判“苏共领导修正主义”（或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主题，批判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观点。如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九评《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主要涉及已经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涉及尚未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和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是论述各国党如何正确对待国际斗争的问题。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则论及各国党应如何对待相互之间的意见分歧问题。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报刊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和材料进行攻击。同时，世界上 80 多个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围攻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共的党也采取各种方式批判苏共的观点，只有少数党持中立态度，大论战发展到高潮。

大论战中，中共和一些兄弟党批评了苏共老子党的错误做法，打破了各国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使它们认识到苏联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固一时激动提出的口号，如 20 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不正确的。这使越来越多的党解放了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要求把马列主义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大胆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战使中国最终离开了苏联的道路，摆脱了对苏联的依靠。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中国强调“一边倒”。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不少做法是照搬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合作化也以苏联为榜样。在 50 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按农轻重顺序发展国民经济。苏联在 1960 年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和技术人员，并撕毁协议和合同，此后中国开始独立地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论战开始前，苏联要求各国党在处理国内外政策时，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问题，就给谁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苏联总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一体化”、“社会主义大家庭”等。通过论战，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再把一党一国的利益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了，那种把自己比作别国“母亲党”，要别国党对“领导中心”唯命是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党有了错误，由人家自己去判断，去纠正，不必过多地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已成为国际共运共同遵守的准则，但对搞霸权主义还是要公开反对的。中国共产党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那就不是内政问题，而是欺负别人，对此当然可以表态，既可以从内部交换意见，也可以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文章中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不允许批评霸权主义，那就是没有是非了。论战后，一党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不复存在。

论战是一把双刃剑。论战从思想上破除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从组织上冲破了苏共一党控制国际共运的局面，维护和发展了中国的国家独立自主权。但是，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很多党之间中断了关系。在各国党的内部，特别是未执政的党，不断出现分裂，有的党分裂成两个，有的分裂为三个，甚至四个。分裂，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

论战中，许多党分不清是非，区分不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因此在论战中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大胆地开展党的活动。由于论战尖锐、激烈、规模越来越大，对论战涉及的具体问题忽视了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和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论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群众运动中的左倾思想的发展。从大论战中得出的反修防修的结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是导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这都是后话，在此无需再提。

论战使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并成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在中国人的眼里，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篡党篡权者，总之，声名狼藉。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一年着实不好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8.1%，但比预期的增长率低了 1%。更紧要的是，已有迹象表明，苏联工业生产率已经每况愈下。根据专家估算，1963 年每卢布工业投资效益比起 1958 年低了 15 个戈比；据此统计，苏联的工业投资损失了近 1500 亿卢布。除了电力和冶金工业外，几乎每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在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大，这是 40 年来的第一次。尽管短缺的商品不胜枚举，但滞销消费品仍大量运往市场。积压的钟表和成衣足够销售两年，书籍、缝纫机、照相机在仓库中堆积如山。

在七年计划期间，诸多方面计划失调，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状况。如，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人占全苏工人总数的 35% 到 40%，但是这两个部门所得到的投资额只占工业总投资的 8%。采掘工业的生产率极低，而它所获投资比例却高达 30%，并使用了占全苏 20% 的工人，但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仅有 7%。农业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1963 年的农业生产总产量与 1962 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10.7%，比 1958 年的数字还要低。畜牧业的统计数字更让人糟心。生猪存栏数从 7000 万头骤减到 4100 万头。牛

的存栏数也减少了 150 万头，羊的存栏数则减少了 600 万只。

粮食产量的降低与牲畜的减少，除了天灾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为因素。比如，强行废止土地休耕的做法，使得地力耗尽而无法再生，导致数以百万计公顷的耕地沦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63 年，一场“黑风暴”降临垦荒区。5 月份，狂风卷走了数百万吨的黑土，撒落在萨彦岭的山脚下，以致一直增长的耕地面积骤减了 600 万公顷。

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在发牢骚。工人的不满是由于食品短缺，消费品供应不足。养老金领取者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一成不变。农民因自留地减少、牲畜被强行收购而怨气冲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因效益不好而无心工作。部队军官因削减退休金而忧心忡忡，内务部部队的指挥员因取消津贴而人心浮动。更为要命的是，党的中层干部开始与赫鲁晓夫离心离德，原因是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第 25 条。这一条是这样规定的：

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

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 1/4。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出色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续选入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下至少须有 3/4 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 1/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全体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可以更长期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入领导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投票的共产党员至少须有 3/4 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由于期满而不再选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重新当选。

说句公道话，赫鲁晓夫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使党的领导机构经常保持新陈代谢，实际上是推行党的干部任期制，废除终身制，其用意是积极的。然而，这一改革却意味着党的各级干部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职务看成是毕生的职业和终身受用的特权。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必须寻找别的工作并且学会适应它。由于这些新规定而受打击尤为严重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中层干部。鉴于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从而任何中央委员或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最长任期都是 15 年，而区委、市委和州委的改选按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因此在这些机关及其下级组织中的任期最多只有六年。党的基层组织干部对第 25 条没有好感，并迁怒于赫鲁晓夫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按照生产的需要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还惹恼了此前拥戴和支持他的州委书记们。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成了他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按照新建制，原来全面负责所辖地区工作的州党委将一分为二，一部分全力以赴

抓农业，另一部分专管工业。

从一开始，这种新的管理建制的缺陷就显露了出来。例如，州农业党委的任务不光是指导那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共产党员，监督这些农庄农场的党组织，而且还要负责领导所有为农场提供服务或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党组织和党员。然而，那些为城乡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那些服务项目当中包括维修农业机械的汽车修配厂以及那些生产农产品包装物的工厂，却都属于州工业党委的管辖范围。问题还不止于此，主管农业的州委书记若要在州首府召开一次农业工人代表会议，他就非得事先与主管工业的州委书记进行协商；同样，后者如果急于增加城市的蔬菜供应，也必须同前者进行磋商。一旦收获季节来临，有关组织运输和选派市民下乡支农等工作就又引出来无数的麻烦。

各州两套州委班子之间的工作分工是有若干指导原则的，相互协调配合也可能行得通，但必要的前提则是绝不能出现派生的复杂机构，造成重叠复设的局面。而实际情况却正是后者。不仅建立了两个州党委，而且还有两个州苏维埃执委会，接踵而来的又是一大堆孪生机构：两个卫生局、两个教育局、两个财政局、两个文化局、甚至还有两套民兵指挥部，等等。于是各州党政机关干部数目随之大增，其工作负担也更加繁重，相互协调成为泡影。

这一建制上的改革实施之后，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机构里不但有中央主席团，而且还设立了中央工业领导局和中央农业领导局，各局又都下设自己的分支机构。一个规模较大的乡村区如果有工业企业，那么区委书记就不再全面领导全区的工作；那些在工厂企业的共产党员现在归该地区工业区委的领导，而工业区委机关往往又设在另一处行政管理中心。

按生产性质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建制造成的一连串问题还会不断大量增加，但这一体制自身复杂化的进程却并未就此停止。随后，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中央主席团又出台了加强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权限的新规定。结果，这些委员会问世不久，弊端已层出不穷。其下属各部门的分工界限并未消失，不过界限标准并不是依据国家不同职能加以确定，而是按照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内部的不同管理系统进行划分的。对于那些分别处于不同州域但彼此业务又有联系的企业，相应的管理工作日益恶化，在全国实行一刀切的简单政策也日益行不通。现在，中央委员会又提出合并一些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同时建立一个全苏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其职能是协调其他所有地方经委的活动。但是，它的权力仅限于监督工业，而不能管理各地方通讯、运输、建设、公共事业、电站以及其他同地方行政管理有关的领域。为此，在莫斯科又设立了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这还不是一系列改革的最后一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之后，又组建了几个新的国家委员会，其业务涉及电力工程、轻工业、食品工业和贸易活动。同时还成立了负责监督供应工作的全苏一级机构。所有这一切都使党政领导建制系统变得极为繁琐复杂，使得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干部不得不经常求助于挂在办公楼门厅里的机构分布示意图。

赫鲁晓夫还决定重建党和国家的监察组织系统。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在全苏一级设立了隶属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新的监察委员会，而且在加盟共和国、州和区级都设立了相应的监察机构。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监察制度的原则，在斯大林时期被束之高阁；赫鲁晓夫这一措施旨在恢复以往的原则。但是尽管如此，新建立的监察委员会与列宁的有关学说仍相去甚远，因为各级



监委并非与党委平行，而是处于从属地位。区一级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各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任；在州级党委，由一名州委书记专管监委工作；在全苏一级，这个委员会则交由一名中央书记主管，当选者是谢列平。

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中央还宣布了一些有关任命事项：尤·弗·安德罗波夫担任中央书记，瓦·伊·波里维科夫担任苏共中央农业局主席，亚·彼·鲁达科夫接任中央工业局主席。

一句话，政府干部们被类似的无休止“重建重组”活动搞得腻味透顶。

赫鲁晓夫作为所有新花样的设计者，更是累得够呛。年近70的他愈来愈感到精力不济，每天回家时都疲惫不堪。他在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周围转上两圈，一吃过晚饭，便从公文包里取出各种颜色的文件夹——这是晚上的工作，通常他要工作到深夜。

赫鲁晓夫也很清楚他的精力已每况愈下，而且即将来临的70寿辰也标志着一个界限。他愈来愈经常地谈到有关接班人的想法。他不止一次地向家人谈起希望退下来，有时是随便说说，有时则挺认真。他与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在一起时也不时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干满了年头，应该让路了。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机会。”他说。“您这是怎么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的气色很好嘛！您的精力可要比年轻人充沛得多。”同事们大声地对他的想法作出反应。

权力继承问题在22大之后，是他想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是定不下来，他想要找到的这个人，首要条件是要年轻、精力充沛。

他终于从众多的候选者中看中了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然而，他却病倒了——中风。赫鲁晓夫从医生那里得知的情况是，科兹洛夫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康复的。至于工作，医生们的回答是：绝对不行，他会瘫痪，而且过分激动会引起再次发作，导致死亡。

看来，科兹洛夫是不能指望了。

科兹洛夫一病不起，使赫鲁晓夫面临更麻烦的问题，不只是谁来接他的班，更紧迫的是谁来担任中央第二书记这一职务的问题。他为接替科兹洛夫的人选绞尽了脑汁。他认为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既要懂得国民经济，又要懂得国防，又要懂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人。他当初之所以挑选科兹洛夫，也是从这几点出发的。他认为科兹洛夫在地方上干过，又曾独当一面处理过问题，对经济了如指掌。起初，赫鲁晓夫认为谢列平比较合适：年纪轻，经过共青团工作的锻炼，又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对经济工作接触不多。赫鲁晓夫建议他去列宁格勒当州委书记，因为那里有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和优秀的革命传统，经过锻炼后就可调上来担任中央的任何职务。

但是，谢列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他觉得挺委屈，认为让他去列宁格勒州工作是要降他的职。

“真可惜，看来是我对他估计过高。”赫鲁晓夫同人谈话时说，“这也许倒是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能出错。本想让他去列宁格勒呆上几年，成为行家里手，就可以推荐他担任科兹洛夫的职位了。现在他只能当官僚当下去。不了解生活，不，谢列平不合适，尽管很可惜，他是主席团里最年轻的一个。”

排除谢列平后，就是波德戈尔内了。尽管此人精明能干，既懂经济，又能与人共事，在乌克兰有很好的表现，且经验丰富，但美中不足的是眼界不

够开阔。调到中央后他始终处理不好交给他的食品工业方面的问题。赫鲁晓夫考虑再三，认为此人也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至于勃列日涅夫，他经验丰富，懂经济，也解人。但赫鲁

晓夫认为，勃列日涅夫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受自己情绪的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勃列日涅夫曾担任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书记。当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芭蕾舞女演员”，意思是随人摆布。而第二书记的职位需要的是一个意志坚强、别人休想将他引上旁门左道的人。

1963年底，赫鲁晓夫确信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已无法重返工作岗位。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中了勃列日涅夫。这样一来，到了1964年年初，勃列日涅夫手中已握有中央的大权，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

1964年春，赫鲁晓夫宣布了另外物色一名候选人来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意图。他认为，一个人同时身兼二职受不了，勃列日涅夫得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央的工作上。

在赫鲁晓夫看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基本上是一个荣誉职务，让一个能够在其他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得力干部去担任这一职务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担任此职者又是国家元首，应拥有无可争辩的威望，应该是党和人民都很熟悉的人。

赫鲁晓夫最后选中了米高扬。这是一个在国内备受尊敬并享誉世界的名字。而且米高扬下年就满70周岁，精力已经大不如前，他担任此职是再合适不过了。赫鲁晓夫于是宣布了自己的看法。

勃列日涅夫对新的职务并不感到高兴，但是又得服从。

尽管新的职位赋予他很大的权力，但这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职位。他要在分支机构很多的党的机体内部紧张工作，要起草决定，同各州委协调一致，密切注视部队里的工作并要对失败负责任。这个工作绝不像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那样轻松而风光——总统、国王和大使举行的宴会，检阅仪仗队、看戏、授勋、颁奖；周围都是笑容可掬的面孔，握手亲吻；获奖者讲话洋溢着由衷的感谢和爱戴之情；国事访问——又是检阅仪仗队、宴会、记者招待会、微笑、握手、干杯。勃列日涅夫天生喜欢抛头露面，出人头地，喜欢在报纸、杂志、新闻纪录片中一睹自己的风采。

如今这一切都必然要失去了。往后是极其繁重的工作，是责任的重担，必须作出许许多多的决定，它们可能带来巨大的、有时是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一切勃列日涅夫都不喜欢，他对任命的看法没有表示出来，只是对于给予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保证绝不辜负对他的信任。

1964年2月10日，例行的中央全会开幕，中心议题是农业。赫鲁晓夫仍在顽强地探索如何使苏联摆脱困境，摸索致富的途径。

全会上，农业部长沃洛夫钦科作了报告。前不久，这名部长还只是一个农场场长。他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让赫鲁晓夫十分感兴趣。他介绍了他领导的农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一些建议。赫鲁晓夫便抓住不放，大做文章。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在农业上遭受挫折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活生生的现实。赫鲁晓夫认为上来一个活跃在田间地头的人就可以使糟糕的局面有一个根本的改观。

沃洛夫钦科一跃为农业部长后，赫鲁晓夫所期待的奇迹并未出现。他的

报告题目是《论通过广泛使用肥料、发展灌溉、综合机械化及推广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以尽快提高以农业产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集约化》。题目冗长、花哨而又面面俱到，赫鲁晓夫喜欢这种做表面文章的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应邀参加全会，其中有党务工作者、各部工作人员、农业专家、学者。实际上，这已不是什么中央全会，而是全苏会议了。

近来一段时间，赫鲁晓夫时常采取这种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做法，在会上详细讨论经济问题。这个办法远非人人都喜欢。机关干部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降低了全会的威望，使全会的意义减色。不过，没有人公开讲出这种想法。

相反，对赫鲁晓夫的吹捧却愈来愈多，愈来愈过分。赫鲁晓夫的肖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他的话不断地被引用，到处都可见到赫鲁晓夫的语录。影院开始上映《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影片是按照苏联歌功颂德的传统拍摄的，充满了肉麻的颂扬和令人生厌的赞誉。赫鲁晓夫看过这部片子，默默地应允了，有关赫鲁晓夫生平的彩色画册开始出版。每次讲话，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是什么内容都要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赫鲁晓夫对此已经逐渐习惯，而且脾气也越来越大，对干部的任免，全在于他个人的好恶。

在二月全会前的一次会议上，未加讨论就通过了关于人事问题的决定。决定免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瓦·谢尔比茨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选举谢列斯特接任他的职务。谢尔比茨基被解职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在视察基辅时对谢尔比茨基所作的关于乌克兰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不满意。谢尔比茨基被免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因为此人被认为是一名好经济干部和有才干的领导人。

紧接着谢尔比茨基之后，又轮到了马祖罗夫。1964年年初，赫鲁晓夫同马祖罗夫一起应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的邀请前往波兰进行非正式访问。路上，马祖罗夫对赫鲁晓夫开诚布公地讲述了他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途径的看法。赫鲁晓夫对他的看法表示反对，结果两人发生了龃龉。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在车站对前来迎接他的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说，他很不喜欢马祖罗夫，马祖罗夫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观点和建议成问题，应当考虑把他撤掉。尽管大家颇感意外，但没人表示异议。

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不断增加着反对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生活按部就班。赫鲁晓夫频繁外出，出访匈牙利后又去了乌克兰，随后再到列宁格勒看一下。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愈来愈少，中央领导的大权逐渐落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手中。

不知不觉，赫鲁晓夫迎来了他70岁的生日。

## 第十六章

1964 年

1964 年 4 月 17 日，赫鲁晓夫满 70 周岁。

当天的喜庆活动是从早上开始的。赫鲁晓夫全家人都被巨大的响声吵醒了：警卫人员正在往餐厅里搬运里加一家工厂生产的大型电唱收音机。收音机侧面有一块刻有题词的金属牌：这是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成员集体送的礼物。这是唯一的一份礼物。赫鲁晓夫事先就打了招呼，说他拒绝生日礼物，尤其是苏联单位送的。

“没有必要浪费人民的金钱，什么礼物也别送。”他这样对别人说。

为此，中央专门发了指示，只允许寄贺词。

上午 9 时，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一起来到赫鲁晓夫家中。

赫鲁晓夫居住的寓所是一幢两层楼的独院房，可供居住和举行小型招待会。第一层是正房，有大餐厅和客厅，并带有两套两居室住房。第二层是赫鲁晓夫的卧室和书房。

这座寓所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当初，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就是在这里讨论加勒比海危机的。赫鲁晓夫曾在这里口授致肯尼迪的信。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也是把电话打到这里，报告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的消息。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一天的祝寿也是很有意义的。

笑容满面、身着盛装的赫鲁晓夫，从洒满阳光的柞木楼梯上走了下来。客人们拥向前去：握手、祝愿。勃列日涅夫亲吻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请客人们入席。大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生日宴的美味佳肴。往常即使碰到喜庆日子，客人也很少坐满半桌，这天则座位不够，房间角落里也坐着人。

勃列日涅夫首先致词，他朗读了由在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签名的贺信。贺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值此 70 寿辰之际，我们，您的亲密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谨向您，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表示特殊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我们同全党、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把您，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看成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英勇战士。

您热烈紧张的政治和国务活动、无比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无穷的精力和革命意志、坚忍不拔和不可动摇的原则性，赢得了全体共产党人、全体苏联人对您的深深爱戴和尊敬。

我们十分幸运地能同您并肩工作，并以您为榜样，从列宁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解决党的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问题，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向着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目标勇往直前。

衷心地祝愿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健康长寿，祝您在宏大而神奇的活动取得新的成绩！

以下签名的是您在座的忠实朋友和战友，全国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一并在  
此致意。

勃列日涅夫很是动情，他拭去眼泪，同赫鲁晓夫拥抱。勃列日涅夫把漂  
亮的文件夹面交给赫鲁晓夫，里面是刚才读过的信和按字母顺序和职位高低  
的签名。

大家都走过来，碰杯、祝愿。两个小时生日宴会结束，接下来要在克  
里姆林宫举行正式庆祝活动。

当天，全国大小报刊都发表了这样的消息：由于赫鲁晓夫为党和国家所  
做的贡献，“由于他在与希特勒侵略者的战斗中表现优异”，他被授予苏联  
英雄的光荣称号。莫斯科的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在这一天出版了赫鲁晓  
夫言论集的第八卷，题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官方和私人  
的贺电从世界各国纷纷打来，来自中国的贺电的署名是毛泽东、刘少奇和周  
恩来。贺电中说：

尽管目前我们两党之间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某些问题上还存在  
着分歧，尽管目前还缺乏团结，但我们仍然深信，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在一场世界主要危机事件的关头，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将毫无疑问地站  
在一起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发抖吧！  
他们必然要失败。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战无不胜的革命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赫鲁晓夫接受了  
新的荣誉称号。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兄弟党的中央书记也来到这里，  
授予赫鲁晓夫各自国家最高一级的勋章或称号。下午4时，在克里姆林宫圣  
格奥尔基大厅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宾包括苏联党政军民各界的领导人、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导人以及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代表。米高扬提议首  
先向赫鲁晓夫祝酒，接着他在讲话中说：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聚集一堂，在尼  
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70寿诞之际，我们向他的双亲表示谢忱……  
从前我们这里认为，70岁已是老年。我国革命的成就表明，这是不对的。在俄  
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2岁，70岁自然应当算暮年了。而现在，社会主义在我  
国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福利，如今70岁在我们这里只能算是中年。因  
此，我们今天是在庆祝一个中年人的寿诞。这个人，如大家亲眼所见，正值年  
富力强，才华横溢……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中央主席团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  
中央书记都对赫鲁晓夫怀有同样亲切的兄弟感情。所以，请允许我宣读我们大  
家今天的共同祝辞：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您70大寿之际，我们，您的亲密的  
战友，特别向您，我们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致以问候和热烈祝贺。在您身上，我  
们看到一位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杰出活动家，英勇无畏的反帝战士……您的热情奔放的政治活动和国务活  
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英明睿智，无穷无尽的精力和生活意志，坚定性和不可  
动摇的原则性赢得了全体共产党员、全体苏联人民对您的深深的尊敬和爱戴。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能同您并肩工作并学习您对待解决党内生活和国家建设问题所采取的列宁主义态度的榜样……我们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并在您巨大的创造奇迹的活动中取得新的成就。

亲爱的朋友，我们觉得您只度过了生命的一半。但愿您至少再活这么多年。”

下面是中央主席团成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共 25 人的签名。

列·勃列日涅夫	列·叶弗列莫夫
根·沃罗诺夫	基·马祖罗夫
安·基里连科	伏·姆扎瓦纳泽
弗·科兹洛夫	彼·谢列斯特
阿·柯西金	尤·安德罗波夫
奥·库西宁	彼·杰米契夫
阿·米高扬	列·伊利切夫
尼·波德戈尔内	鲍·波诺马廖夫
德·波利扬斯基	维·波利亚科夫
米·苏斯洛夫	亚·鲁达科夫
尼·什维尔尼克	维·季托夫
维·格里申	亚·谢列平
沙·拉希多夫	

这一天，赫鲁晓夫得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获得了很多国家的最高荣誉勋章。不过，这一切很快就成为历史，成为美好的回忆，第二天，一切又恢复正常。

4月19日，赫鲁晓夫送走前来祝寿的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代表团；25日又接待了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5月1日陪同本·贝拉总统去克里米亚。送走总统后，他开始准备去埃及的访问。

赫鲁晓夫早就有到中东去看看的想法，然而长期以来无法成行，主要原因是：在大多数中东国家中，共产党的活动被认为是非法的。许多共产党人不是被政府逮捕，就是被驱逐出境。因此，在筹备对埃及和中东地区国家访问的过程中，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提出：不解决监狱里的共产党员的问题，访问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

最后，纳赛尔同意放人，访问的障碍消除了。

代表团的成员有葛罗米柯、格奥尔加泽、格列奇科、萨秋科夫、赫鲁晓夫的女婿阿米别伊以及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代表团乘坐的是“亚美尼亚”号轮船，前来雅尔塔送行的是勃列日涅夫。

在临行前的忙碌中，勃列日涅夫的举止有些反常。平时，他总是露出一副讨人喜欢的笑脸，这一次却脸色阴沉，回答赫鲁晓夫的提问时只是简单的几个字，十分生硬。他的态度与生日庆典上的表现判若两人，因为他不久就要丢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到中央委员会工作。

轮船驶离码头，开始了航行。赫鲁晓夫和助手们埋头看文件，为面临的会谈作准备。其他成员则都围在甲板上的小桌旁交谈。船上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因为赫鲁晓夫不太喜欢娱乐，他认为那是虚度光阴。足球也好，多

米诺骨牌也好，扑克牌也好，统统提不起他的兴趣。

代表团在亚历山大港受到纳赛尔总统等领导人的欢迎。在前往开罗的上百公里的路上，赫鲁晓夫一行受到了埃及人民的夹道欢迎。阿拉伯各国的领导人也赶来参加阿斯旺大坝的落成典礼。赫鲁晓夫想利用这个时机同他们讨论阿拉伯地区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趋势。

计划已久的一刻终于来临，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同时按动电钮，尼罗河水汹涌澎湃地流入基坑。这对埃及和苏联都是一件历史性的事件。纳赛尔宣布授予赫鲁晓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最高奖励——尼罗河勋章，这勋章只授予有特殊功劳的人。

5月25日，赫鲁晓夫一行返回莫斯科，6月15日又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访问。赫鲁晓夫对外事活动确实是情有独钟，他像一个世界公民一样，享受着各国的风光景色，沉浸于异国情调之中。而国内对赫鲁晓夫敢怒不敢言的人正在越走越近。苏联最高苏维埃六届四次会议定于7月中旬举行，会议将要审议两个问题。第一个议题是执行苏共纲领中提高人民福利部分的措施问题。它包括：（1）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和补助金；（2）提高教育、卫生、住宅与公用事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及其他直接为居民服务的国民经济门类的工作人员的工资；（3）向五天工作制过渡。

问题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报告人为赫鲁晓夫，是他倡议讨论这些问题的。

第二个议题是审查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赫鲁晓夫终于下了决心，作出了将勃列日涅夫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岗位上撤下来，调到中央工作的决定。勃列日涅夫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决定“倒赫”的。

实际上，赫鲁晓夫即将被人推翻一事早就有人预见。卡冈诺维奇，就是那位曾是赫鲁晓夫上级并将赫鲁晓夫带往哈尔科夫的人，给赫鲁晓夫写过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赫鲁晓夫如今实际上已经被孤立起来，只有很小一批年轻的党中央机关干部在支持他。苏斯洛夫和他的那个鼓动宣传班子是主要敌人，正是这些人以协调一致为借口瓦解对斯大林的批判。赫鲁晓夫必须集中精力对付主要敌人，即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内部的斯大林主义者，不然，旧体制就会摧垮赫鲁晓夫。只有在中央获胜，前进的步伐才能加快，并可保证不走回头路。赫鲁晓夫身边几乎没有人能够使机关来个大换班。大多数人只是在口头上拥护他，实际上却在为所有创举设置障碍。

然而，赫鲁晓夫对这个老同志的话毫无兴趣。他认为这个30几年前的老上级是个极端主义者，将许多事情都夸大了。他认为在中央委员会任职的都是些襟怀坦白、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人。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忠于理想，怀疑他们搞阴谋、追求一己私利，特别是怀疑他们热衷于党的代表大会所谴责的斯大林主义，都是不对的。

其实，赫鲁晓夫才是不对的。

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早已对酝酿中的事变有所耳闻。最近，一名妇女给她打下个电话。那个妇女提出要求与拉达见面，面告一重要情报。拉达则拒绝会面。绝望的妇女便不得已在电话里告诉她，一些人曾在某住宅开会，密谋策划搞掉赫鲁晓夫。

“您为什么要找我呢？这种事情由克格勃来管。您往那儿打电话吧。”拉达在电话里对对方说。

“我怎么能往那儿打电话呢？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本人也参加了这些

会议！要不我怎么会想起找您谈呢。这是个地地道道的阴谋。”

谢米恰斯内当时同拉达的丈夫阿米别伊的私人关系很好，常去他们家做客。拉达对这一情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她认为继续谈下去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便回答说：很遗憾，实在是无能为力。她只是个人身份，而这是国家机关的事，请不要再给她打电话了。

这个情报传到了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的第一助手舒伊斯基得到这个情报后没有告诉赫鲁晓夫，而是自作主张把这一情报压下了。

原中央办公厅主任皮沃瓦罗夫也向拉达谈过类似的事情。拉达找到卫生部第四局局长马尔科夫商量此事。马尔科夫认为这只不过是皮沃瓦罗夫疑心过重而已。拉达接受这个权威的意见，未将此事告诉她的父亲赫鲁晓夫。

在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前一周，赫鲁晓夫才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赶回来。回来后，他就埋头对报告进行最后的加工。这项工作他从来都是自己干。赫鲁晓夫在准备阶段通常是向速记员口授初步的想法，这些想法通常是非常零散的。誊清的稿子一般是由助手来润色，并根据讲话的题目分别吸收国际、工业、军事、农业等问题的专家参加。然后稿子回到赫鲁晓夫手中，开始审订。他对报告进行重新编排，再口授删去某些字句，直到自己的思想得到清楚的表达为止。此后，助手和专家们再找出合适的例子、语录，搞出最后的文本。赫鲁晓夫仔细阅读后，作一些最后的改动，讲话稿就写好了。

赫鲁晓夫在讲话讲到兴头上时，往往丢开写好的讲稿，进行即兴发挥。他经常引用彼得一世的一句话，来证明自己的演说能力。彼得一世禁止照稿宣读，“以便看出一个人的愚蠢”。这样的风格使他的讲话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反应灵敏，与听众产生共鸣。

最高苏维埃会议顺利进行。7月15日，通过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和补助金的法令》。该法令不仅是经济措施，而且是一大政治措施。此后，农庄庄员就可以同工人平起平坐，享受同工人阶级一样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一措施的实行，使赫鲁晓夫找回了一些民心。会前所设想的五天工作制的提案，在会上没有讨论。会前，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失别伊受人之托向赫鲁晓夫游说。他以特有的能言善辩向赫鲁晓夫论证，实行五天工作制时机尚未成熟，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具有不间断生产性质的企业，包括冶金、化工、石油化工等部门，可能出现困难；尽管工作周按小时计算的总时间不变，但在向五天工作制过渡期间，总产量可能下降。赫鲁晓夫最后同意推迟这一提案的讨论，实际上，这些论据都站不住脚，如果不是阿朱别伊的插手，五天工作制的实行将会写进赫鲁晓夫执政的历史。

会议最后是赫鲁晓夫的讲话，他说：

代表同志们：

大家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已在1963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认为，让勃列日涅夫同志以苏共中央书记的身份集中精力抓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适宜的。

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解除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党中央委员会推荐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同志为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的候选人，请本次大会审议。同时考虑免去他的苏联部长



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我想没有必要对米高扬同志作鉴定。大家全都知道，在我党和苏维埃国家中，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过去和现在一直从事多么重大的政治工作和国务工作。他不愧为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积极战士。他的活动在数十年间已为我国人民所熟知。他不但在国内闻名遐迩，而且蜚声世界。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米高扬同志可以当之无愧地担当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

同志们：

我们希望代表们会赞同和接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我不揣冒昧地在表决之前——尽管这可能显得有些超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上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衷心祝愿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在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就。

代表们以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对赫鲁晓夫的讲话作了应答。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于是早已成熟的决定变成了法律条文。米高扬走马上任后，对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的情况不很满意，他决定进行整顿、调整。他点名要免去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的职务。勃列日涅夫只得给自己的老部下们在中央委员会找个职位。

转岗后的勃列日涅夫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失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令他有些伤心，但他的营垒中又增加了支持者，胜利在望了。另一方面，他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已对他有所猜疑，一旦东窗事发，结局不堪设想。然而，火箭一经点燃，就无法停止。计划已无法改变。

会见、谈话、摸底的工作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中央第二书记的新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供了不少机会——他正好负责抓各州党委的工作。不过，在办公室谈是一回事，而在克里米亚疗养地端着上等白兰地酒谈又是另一回事。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一切都很容易当成玩笑话，用种种趣闻去冲淡。疗养期间的话题无所不包。

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同许多人都谈过话。总的形势还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交谈的人大多对赫鲁晓夫不满。党委书记对把州委一分为二和实行干部轮换制感到恼火。军界人士则对继续裁军啧有烦言。经济工作者对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满。……从力量对比上看，赫鲁晓夫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中央全会中都不可能得到支持。

勃列日涅夫这时谈话的目的性开始明确起来。

1964年7月的一天，勃列日涅夫来到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谢列斯特的住处，像是随便地聊了起来。

“近来生活还好吗？”勃列日涅夫问。

“有什么好不好的？”谢列斯特回答道。“工作不好搞。”谢列斯特在1963年12月中央全会上取代了被免职的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瓦·谢尔比茨基。她的上任完全是由于波德戈尔内的极力推荐。

“你怎么样，有人支持吗？”勃列日涅夫在试探虚实。

“要是没有人支持，那就没法再干了，只好提上讨饭袋滚开。杰米扬·谢尔盖耶维奇·科罗特钦科对我帮助很大。他经验丰富。各州党委书记也都挺

支持。”

“你同赫鲁晓夫的相互关系如何？”勃列日涅夫话锋一转，切入主题。

“是晚辈同长辈的关系。你问我这个干什么？你关系更近，在莫斯科工作嘛。”谢列斯特不无防备地说。

“他骂我们，说我们游手好闲。”勃列日涅夫装出很委屈的样子。

“他也许骂得对吧？”谢列斯特显得很中立。

“不，跟他没法共事。”勃列日涅夫说。

“那你在他 70 岁生日那天干吗讲话？什么我们的同志，我们亲爱的，我们的领袖、领导者、列宁主义者，等等。你干吗不讲，尼基塔，跟你没法共事！”谢列斯特揶揄道。

“我们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谢列斯特听出一点意思来了，但不明白勃列日涅夫具体的想法，决定不贸然表态，而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你们自己去研究吧。我们在基层工作，怎么指示就怎么干……你们想干什么呢？”这回轮到谢列斯特进行试探了。

“我们想开个中央全会，批评批评他。”勃列日涅夫轻描淡写地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赞成。”谢列斯特有些失望，但还是表了态。

勃列日涅夫忙于谈话摸底时，赫鲁晓夫又应哥穆尔卡的邀请去了波兰，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 20 周年的庆典。回来后，他又到苏联东部地区视察垦区的收割准备工作。

在忙忙碌碌中，秋天来临了。夏天的休假错过了，赫鲁晓夫打算在秋天稍事休息，在休养地集中考虑一下未来的计划：11—12 月份之间将召开中央全会，会上将通过一些重要决议，议题之一就是苏联的农业状况。尽管 10 年来农产品的生产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效益远未达到预计的水平；从国外引进的综合农场的全套设备，在苏联也未达到原生产厂家所规定的产量。其次是干部政策问题。尽管第 22 次党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党的领导干部实行轮换制的决定，但还未写入苏联宪法。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新的宪法。

起草新宪法工作的最佳时间是假期，在皮聪大海角，在南方的松树下静静地思考，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认真的讨论。

然而 10 月前，仍然挤不出时间去休假。对新试制导弹的视察工作自春天拖至秋天还未成行，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又多次催促，请求尽快作出以新型洲际导弹装备部队的决定。经过多次改期，终于确定于 9 月份去导弹试验场进行视察。陪同前往的将有中央主管国防工业的书记：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乌斯季诺夫。赫鲁晓夫的儿子名字也在视察者名单之中，他也是导弹方面的专家。然而出发前，他却因腿病而未能成行，躺在家中养病。

一天晚上，家中的“自动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谢尔盖感到很奇怪，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是已经见了报的，会是谁的电话呢？他拿起了听筒，电话中传来了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可以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接电话吗？”

“他不在莫斯科。”谢尔盖边回答，边思索，能够使用这部专用电话的人，居然不清楚赫鲁晓夫如今在哪里，这人会是谁呢？

“那么请问您是哪一位？”电话里的人紧跟着问道，声音里透着一股失望。

“我是他儿子。”

“您好，谢尔盖·尼基季奇，”对方急急忙忙地说道，“我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加柳科夫，以前是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的警卫队长。从夏天起，我就一直在设法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取得联系，我必须向他本人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但怎么也联系不上。现在我总算可以用‘政府专用电话’进行通话了，这才决定给他家里打电话，但谁知又不凑巧。”

伊格纳托夫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的前卫队长会找赫鲁晓夫说什么呢？他们两人会有什么可谈的呢？谢尔盖实在有些纳闷。

“请您听我把话说完，”加柳科夫怕他放下听筒，赶忙说道，“据我所知，一场反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我想把这件事告诉他。这件事非常重要，我是从伊格纳托夫的谈话中了解到的，它牵涉到方方面面的。”

“越说越离谱，”谢尔盖这样想，“这大概是个精神病人。眼下会有什么阴谋呢？简直是胡说八道！……”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您应当告诉克格勃的谢米恰斯内。像这样的事归他管，再说您本人也在那里工作。他们会搞清楚的。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汇报的。”谢尔盖有些不耐烦了，想摆脱对方。

“我不能去找谢米恰斯内，他自己同谢列平、波德戈尔内以及其他一些人就是这一阴谋的参与者，而且他是最积极的一个。我想把一切亲自告诉赫鲁晓夫同志。他现在正面临危险。可您说他不在莫斯科，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过几天再来电话吧。他很快就要回来了。”谢尔盖渐渐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想安慰他一下。

“我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能够使用专线电话，而且能够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这样的情况也许不会再出现了，可事情又很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他说得很坚决。“要不请您听我介绍情况，然后再向赫鲁晓夫同志转达。”

谢尔盖决定驱车赴约。

他沿着莫斯科河的别列日科夫滨河大道驶去。天空布满乌云，不时地落下几滴雨点。天色已近黄昏。在镶嵌着奶油色瓷砖的中央委员会大厦的拐角处，孤零零地站着一位男子，身穿深色大衣，帽檐压得很低。

谢尔盖把汽车停下。

“您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加柳科夫吗？”

那人点点头算是回答，并朝四周瞧了瞧，看上去有50来岁。

“我是谢尔盖·赫鲁晓夫，请上车。”

加柳科夫上车后提出到城外找个小树林，在那儿谈会安全一些。

他们驶上一条通往小松树林的乡间土路，最后停在一大片林中空地上。暮色苍茫，低沉的乌云给周围静溢的世界蒙上了某种神秘的色彩。

两个人下了车，顺着一条小径慢慢地走着。小路很窄，容不下两个人并排走，脚常常陷入青草覆盖的小土坑里。

加柳科夫开始讲述，谢尔盖默默地听着。

“当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是中央主席团成员时，我在他那儿担任他的警卫队长。我们之间不仅是单纯的工作关系，还是朋友关系，他对我并不存戒心，无话不谈。”

“在 22 次代表大会之后，伊格纳托夫未被选入中央主席团。按规定不能再配备警卫队长，我必须离开他。

“这样我便在 1961 年退休了……不久以后，担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伊格纳托夫在他的总务科中给我找了一个闲职。那里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去休假或出差时，我经常陪同他一起去。我的任务是保证他过得舒舒服服。他特别关心住在哪儿、条件怎样、同谁住在一起。他想的是，与他所熟知的、享受中央书记在国家别墅休假待遇的那些人相比，自己的条件不能太差。

“今年也是这样。8 月 3 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决定 8 日去高加索休假。

“对于这种外出，我早已习以为常。我们到索契后住进了拨给我们的别墅。它坐落在花园深处，距主楼较远。伊格纳托夫对住所很满意，说：‘这间别墅还可以，够级别。出发前，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曾建议我转住到第四国家别墅中。’

“我问：‘那么，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住进这个别墅的事告诉他们？他们是否已经告诉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知道，这些别墅好像只是为主席团委员准备的。万一他知道，会不会引起不愉快？’

“伊格纳托夫沉思了片刻说道：‘此一时彼一时。他们现在不会听赫鲁什的。’（赫鲁什是对赫鲁晓夫的鄙称）他经常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尤其是最近，在退出主席团以后，不过这往往是在醉酒之后，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伊格纳托夫认为，他若是处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位子上，他会采取另一种做法。但是，不管他谈赫鲁晓夫什么，都可以让人感到，他有些怕他。然而现在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认为对赫鲁晓夫可以根本无须考虑。这是一种新调子。

“我换了个话题，向他问道：‘需要解决食品和汽艇问题，还有什么指示吗？您在莫斯科对我一点也没有谈过这些。’

“伊格纳托夫说：‘一切都办妥了。有关汽艇、食品和在我们的别墅里安装‘高频’电话的事我已同谢米恰斯内都谈好了。你去问问值班员，他们是否已接到指示？’看我吃惊的样子，他轻轻一笑。

“以前，伊格纳托夫与谢米恰斯内不曾有过这么好的关系。不仅如此，伊格纳托夫对他简直是无法容忍，稍有过错都要被骂一通。当时他有些怕谢米恰斯内，因为他知道谢米恰斯内同赫鲁晓夫关系挺好，同阿朱别伊关系更好。向谢米恰斯内提出要求，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想：‘发生什么事情了？’给疗养院值班员和克格勃值班员打电话核实后，证明他们已接到了供应食品和汽艇的指示。

“伊格纳托夫对此甚为得意，他说：‘有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这样的好人，我的任何要求都不会遭到拒绝的。’

“他们这些人之间关系的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为什么从前那种难以掩饰的敌意，而今会变得如此融洽？这里显然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加柳科夫没有下结论，只谈了第一个不正常现象：关系突然转变，找不到明显的理由，其中定有蹊跷。

接着，加柳科夫又谈到伊格纳托夫在“俄罗斯”疗养院与各州的州委书记频繁往来，以及他 8 月 29 日与勃列日涅夫通电话的内容，这是他亲自听到的。

“勃列日涅夫说，既然伊格纳托夫在索契休假，那么他邀请他到克拉斯诺达尔去住两天，并参加北高为瞭国民经济委员会‘克拉斯诺达尔石油天然气联合公司’的授勋仪式。

“伊格纳托夫欣然同意。

“他说：‘我想顺便看看格奥尔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农业党委书记，伊格纳托夫的老相识）。廖尼亚，我这里有车臣—印古什州委书记季托夫和伏尔加格勒州苏维埃执委会主席齐穆托夫。他们在一起时喝的不多，话却滔滔不绝。他们心照不宣，话语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情绪。但是格鲁吉亚使我不安。9月10日休完假后，我想到第比利斯去。应当在那里做些事情。’

“‘格鲁吉亚有什么使你不安？’

“‘我在报上读到一个120岁的集体农庄妇女给赫鲁晓夫写了封信，事情有些复杂。看来，他们那里对形势不太清楚。’

“勃列日涅夫安慰他说：‘就这件事。你不用那么担心。’

“伊格纳托夫高兴地说：‘啊，原来是你的工作？那就另当别论了。还有件事，我同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扎罗比扬谈过了，他情绪挺好。是我们的人。廖尼亚，我对你只有一个请求：一切都应该在11月份之前完成。’

“伊格纳托夫对通话很满意。两天后，在克拉斯诺达尔伊格纳托夫又与勃列日涅夫用‘高频’电话通了一次话。在门口可以清楚地听到伊格纳托夫的声音。

“‘谢谢，廖尼亚，一切都顺利。谢谢帮忙，没你可就糟透了。’

“所谓帮忙，指的是勃列日涅夫曾帮着为举行宴会筹款，因为用公款吃喝是被严格禁止的。这项禁令的执行情况受到严格检查，只有作为中共第二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才能作出这种批示。

“伊格纳托夫继续说：‘沃罗比约夫正在我这儿，我把一切都对他说了。我还同萨拉托夫书记希巴耶夫谈过。开头，我们相互有些不理解，但后来找到了共同语言。可以说同他也一切顺利，我说服了他。’

“他们说了再见，互祝工作顺利，然后沃罗比约夫接过话筒。沃罗比约夫感谢勃列日涅夫对他们工作的高度评价，表示要更加努力地争取新的成绩。然后，卡恰诺夫接过听筒，也谈了些诸如此类的话。

“9月6日晚，伊格纳托夫要我接通正在雅尔塔的波德戈尔内的高频电话。伊格纳托夫在电话中意味深长地说：‘大功告成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你。’

“9月19日，我们返回莫斯科，我曾提醒伊格纳托夫，他本来是准备去亚美尼亚的。他回答说：‘不去了。扎罗比扬已经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家里。我们该回家了。’

“星期一，我到他别墅去，安排各种家务。伊格纳托夫见到我以后，要我与正在新阿丰休假的基里连科联系。接电话的是值班员，得知是谁打的电话后，他回答说，基里连科在海滩游泳，不能来接电话。

“这是挺自然的回答，然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却引起了伊格纳托夫的焦躁不安。

“他毫无缘由地嘟囔着说：‘是真的在游泳，还是不想接电话？’伊格纳托夫接着便火烧火燎地开始往中央给勃列日涅夫挂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列昂尼德·伊里奇没上班，今天也不会到班上来，他病了。’

“这时，伊格纳托夫变得完全神经质了，他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自言

自语地说：‘到底是病了还是没病？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需要病还是不需要病？……’

“大约一小时后，我回到办公室。伊格纳托夫坐在皮椅子上，心平气和地面带笑容。”

“他说：‘没什么，一切还好。他不过是患了流行性感冒。一切正常。’”

“我不明白，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得了流感这就很好？……但这次谈话可以作为在一个月所发生的非常事件的补充。”

“如果把所有这一切零星的小事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可疑的印象：吞吞吐吐的谈话，各种微妙的暗示，一个接一个地同各个州委书记单独谈话，同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突然友好，经常地给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打电话……为什么经常提到11月？11月之前到底要完成什么事情呢？”

加柳科夫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了能典型说明伊格纳托夫对待赫鲁晓夫态度的各种情节，这些情节有些发生在过去，有些则是不久前发生的。

谢尔盖心里明白，这个伊格纳托夫的坏脾气是众所周知的，他同赫鲁晓夫的不和睦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不能接受没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这一事实。从前，伊格纳托夫在喝过几杯酒总爱在自己的圈子里发牢骚说，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工作都是他干的，其他人都是些无能之辈和懒汉，而赫鲁晓夫只不过是在他起草的决议上盖盖图章和讲讲话而已。

谢尔盖看了一下表，两人已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天已全黑了，两人回到汽车里。

谢尔盖对加柳科夫说，他感谢加柳科夫提供的消息，并表示他是以充分的信任和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他所说的事情的。他还保证，一旦他父亲回来，就把这一切都转告赫鲁晓夫。他还向加柳科夫要了电话号码。加柳科夫对他说：“谢尔盖·尼基季奇，请您只在非打不可的情况下再打这个电话，而且请您在电话里什么也别提，只约定会面地点。我的电话被人窃听，对此我毫不怀疑。我早就注意到，很长时间没人来收电话费了。按规定我的电话早该撤了，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这说明有人在窃听。”

谢尔盖感到自己似乎成了侦探故事的参与者——监视、窃听电话、密谋。这一切都那么异乎寻常，惊心动魄和难以置信。在这之前他还一直认为，克格勃和其他机关都是同一个阵营中的同盟者，他们是可以信任和可以依赖的。打从他记事起，房子四周就有穿着蓝制服的士兵。他一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当成能谈知心话的人，甚至是童年时代玩耍的伙伴。

突然之间，这个组织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它已经不再起保护作用，而是对人们进行严密的监视跟踪。想到这一点，他不禁不寒而栗。

赫鲁晓夫从导弹发射场回来了。几天来，沙漠地带的阳光把他晒得黑了一些，但他看上去气色不错，容光焕发。他对所见所闻十分满意。在试验场，他视察了三个座位的“东方”号新宇宙飞船，飞船不久将发射至人造卫星轨道。他还见到了准备上天的机组人员——科马罗夫、费奥克季斯托夫和叶戈罗夫。

赫鲁晓夫对苏联在宇航方面超过美国充满自豪感。事实上，在这方面苏联确实值得自豪。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为世界之最，率先开辟了人类征服大空的新纪元，使美国上下为之震惊。赫鲁晓夫为此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该年的世界风云人物。

为了不使赫鲁晓夫扫兴，谢尔盖一周之后才把他同加柳科夫的谈话告诉父亲。

“你知道吗？”谢尔盖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儿。我应当讲给你听。这很可能是无稽之谈，但我却无权保持沉默。”

谢尔盖接着向赫鲁晓夫简要讲述了奇怪的电话和同加柳科夫的会见。赫鲁晓夫默默地听着。

沉默了一会儿，赫鲁晓夫说：“你做得对，把这告诉我。”

两人又向前走了几步。

“你再说一遍那个人都提到了谁。”

“有伊格托纳夫、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谢尔盖自知这事关系重大，只能准确，而不可有半点差错。

赫鲁晓夫陷入沉思。

“不，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完全不是这种人。这不可能。”他若有所思地说，“伊格托纳夫倒有可能。他一直很不满，他不是个好人，然而他同那几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你没有把这次会见告诉别人吧？”赫鲁晓夫问儿子。

“当然没有啦！这种事怎么好乱说呢？”谢尔盖回答。

“这就对啦，”赫鲁晓夫称赞说，“不要告诉任何人。”

次日晚上，赫鲁晓夫回家后，见到儿子的第一句话就是：“看来你说的那事确实毫无根据。我和米高扬、波德戈尔内一起从部长会议出来的时候，我向他们简短地转述了你的话。波德戈尔内嘲笑我说：‘亏您想得出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的原话。”

赫鲁晓夫接着说：“星期三，按计划我将去皮聪大，路上在克里米亚停一下，再到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走一遭。为慎重起见，我已请米高扬同这个人谈谈。他将给你打电话。由他来核对一下。他也准备去皮聪大，他在这儿留几天，一切都会弄清楚的。他到了皮聪大，会把一切告诉我的。”

谢尔盖心情很沉重。他想，如果这一切纯属无稽之谈，那为什么还要去同别人说呢？如果对此事是认真的，那又怎么可以放掉手中的线索呢？既然要米高扬去调查，那怎么可以匆匆忙忙地交代，而且是当着可能参与了密谋策划的波德戈尔内的面呢？一切都显得极不认真。谢尔盖对父亲这种风风火火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既然事情已经捅了出去，现在也只得顺其自然了。

“您或许应该暂时留下，自己去同这个人谈谈？”谢尔盖想略微变通一下，让事情处理得稍微好一些。

赫鲁晓夫皱起了眉头。看得出，他不想介入。

“不，米高扬经验丰富。他会办妥一切的。我累了，想休息休息。总之……让我们结束这次谈话吧。”

“要不，我也去皮聪大？今年我还没休假。我想在那里跟你住一段。”赫鲁晓夫理解儿子的心意，明白了应该如何来对待这种局面。

“当然可以！这样我将更愉快些。你让这个前卫队长去见米高扬，然后办好休假手续就来吧。”

谈话后的第三天，赫鲁晓夫飞往克里米亚，在那停留了两天，然后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再转至皮聪大。

莫斯科这边，米高扬与谢尔盖约定，在米高扬家与谢尔盖和加柳科夫会面。

晚上7点，谢尔盖开车与加柳科夫一道来到米高扬宅邸的门口。门卫认识谢尔盖，什么也没问就把大门打开。

两人上了二楼，敲了敲书房的门。

米高扬在房间中央迎接了他们，对他们的来访显得并不十分高兴。

他让客人们坐在椅子上，自己则坐在桌旁。气氛极其严肃。

米高扬问谢尔盖：“有笔吗？”

“当然有。”谢尔盖一时还不明白米高扬的意思，从口袋里掏出自来水笔。

米高扬指了指小桌上的一叠白纸。

“用这些纸来记录我们的谈话，然后你整理一下，交给我。”

随后，他又对加柳科夫说：“请把您跟谢尔盖讲的给我重复一遍。请尽可能讲得确切。请只讲您确实知道的事情。推测和设想留给您自己。您懂得您应对您讲的东西要负全部责任吗？”

“是的，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我充分意识到我的责任，我为我的话负责。请允许我向您只谈事实。”

加柳科夫逐字逐句地复述了他同谢尔盖在林中空地所讲的话。最后，他又补充了一些情况，他说：“应该说，伊格纳托夫对赫鲁晓夫的态度取决于他自己在职务上的升降。在发怒时他从不正式地称呼他的姓氏，而用轻蔑的简称：‘赫鲁什’。伊格纳托夫经常提到军人的不满。‘他们讨厌赫鲁什，对裁减军备难以忍受。他们正等着把他……’尽管他没有把话讲完，但他的手势已经说明一切了。近来，伊格纳托夫显得焦躁不安，经常大吵大嚷，有一点使他非常不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为什么老不去休假。不久前，他甚至骂道：‘他怎么啦，见鬼，他还不去休假？’”加柳科夫犹豫了一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感到他对赫鲁晓夫去不去休假这么感兴趣，是同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

米高扬重复说：“您只谈事实，而结论则有我们自己来做。”

“近来，伊格纳托夫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想我同谢尔盖·尼基季奇谈话的事已经让他知道了。显然，有人已经注意到我们俩，并向伊格纳托夫报告了。他已经变得非常小心，不再与我开诚布公地谈话，并尽可能地疏远我。我虽说不出什么具体事实，但我感觉得到他已不再信任我了。

“近几天，他参加了纪念第一国际100周年庆祝大会。那天晚上，他在电话里对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会上讲了话，他讲得出色极了。’

“这些话我听了很刺耳。我很久没听他这样说话了。近来，他除了‘赫鲁什’之外什么都不说，可现在竟然用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还言不由衷地说什么‘讲得出色极了……’，我很不喜欢这种大转变。9月30日，我又给伊格纳托夫挂了电话。我心里不踏实。伊格纳托夫亲自接的电话。他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发现屋里灯光亮着，我想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外人进入住宅。请允许我来把情况记录下来。’

“‘算了，算了。明天再说吧……’伊格纳托夫一句话还没说完，就挂上了听筒。他显然是想避开我。我想就这些了。”

加柳科夫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谢尔盖终于得空放下了钢笔，写字的手指已经有些麻木，在他面前放着一堆写满缩略语、半截词根的纸张。



书房里笼罩着极度紧张的寂静气氛。

米高扬坐在那儿，陷入沉思，忘了两位客人。他的思绪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最后，他把头转过来，面部表情坚定，两眼炯炯发光。

“加柳科夫同志，”米高扬说，“您所讲的一切都很重要。您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希望您懂得，您既然向我做了正式报告，这样您便要承担很大责任。”

“我懂得我应负责任的全部分量。在我报告之前，我想了很久，我们心自问，确信自己的每句话都是真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保安人员，我不能不这样做。”加柳科夫回答说。

“喔，这很好。我不怀疑您向我们通报这些是出于善意，因此我要感谢您。我只想讲一点：我们知道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多年来为我国人民的利益、为共产党的利益忘我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我们仍然把他们当成是共同斗争中的战友。”

看到谢尔盖放下笔，米高扬简单地讲了一句：“您把我的话记录下来！”

加柳科夫困惑不解地看了米高扬一眼。目光中掠过一丝恐惧。

米高扬站起来，示意谈话结束了。

“您要是有补充或者新的消息，就给谢尔盖打电话，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叫您。”米高扬转过头来对谢尔盖说，“把谈话记录整理一下，然后交给我。我3号去皮聪大。”

谢尔盖回答说，他也会那儿。

“那么把记录带去。不要给任何人看，我将把这一切告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要商量商量。”

下楼时，加柳科夫显得焦躁不安，他尽量掩饰自己的紧张和沮丧。

“米高扬不相信我。我们根本就不该来。”加柳科夫很后悔。

谢尔盖也感觉米高扬最后一席话讲得有些不大对头，拒人于千里之外。但他不能火上浇油，只能安慰他说：“您做得完全对。他最后的几句话只有泛泛表白的性质。在核实之前，米高扬不想给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涂上阴影。”

加柳科夫没有说话，看得出，他非常失望，两人约好必要时电话联系，然后便分手了。此后，谢尔盖再没见到过加柳科夫。

谢尔盖带着整理好的记录来到皮聪大，当着赫鲁晓夫的面面对米高扬说：“我把记录带来了，您看怎么处理呢？”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交给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替米高扬回答说，“昨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书记沃罗比约夫来过我们这里。我们问了他有关同伊格纳托夫的所有这些谈话。他矢口否认。原来这些都是些没影儿的事。他向我们保证，那个人提供的消息完全是想象出来的。”

谢尔盖感到不安了，这就是说，这些天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且甚至不打算弄清楚这些消息是否属实？要知道，沃罗比约夫若确实同伊格纳托夫商定了什么，难道会老老实实告诉他吗？他不明白赫鲁晓夫、他的父亲怎么会如此轻信，如此轻率。

实际上，赫鲁晓夫当时也是很矛盾的。若不信，事出有因；若相信，简直难以理解，因为发难反对他的都是他几十年的朋友。不信任他们，在苏联还能信任谁？

晚上，米高扬要谢尔盖到他那儿去一下，他对谢尔盖说：“一切写得都正确，不过后面要加上我的话，我们完全信任并决不怀疑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等同志的正直。我们认为他们不会有什么分裂行为。”

谢尔盖坐下开始写。米高扬站在旁边，不时从谢尔盖的身后瞧两眼。他仔细读完之后，满意地点点头。他又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把稿纸交给谢尔盖说：“签名。”

“为什么？”谢尔盖问。

“这样更好些。因为你是谈话的记录人。”

谢尔盖签完字后，米高扬把谈话记录装到文件夹里，放进了衣柜，并说：“放在这里更保险些，看来你的那个人有许多事是编造出来的。沃罗比约夫昨天彻底否定这一切。有时候，人们的警惕性有些太高了。”

谢尔盖还想替加柳科夫说两句话，米高扬有些不耐烦了，说道：“回家吧，不要再谈了。”

10月12日早晨，赫鲁晓夫早餐之后，坐在游泳池边露天平台的椅子上。旁边放着一个柳条编的茶几，上面摆着一部“高频”电话。

“我们有什么信件吗？”赫鲁晓夫问助手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杰夫。

“没什么紧急信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助手说。

“好吧，现在看看我们应做些什么。那么宪法材料准备得怎样了？”

“这几天我们将研究您的意见，然后交给您。”列别杰夫彬彬有礼地回答，“明天，您要接见法国国务部长加斯东·巴列夫斯基。他乘晚班飞机到达。这是有关他的材料。”

列别杰夫把装有材料的公文夹放到桌上。绿夹里是外国报章材料，红夹里是密码电报，天蓝色夹里是各部公文。

赫鲁晓夫并不急于浏览文件。这天早晨，载有三名宇航员的飞船将飞上太空。

赫鲁晓夫对航天技术始终是备加关注，每一新的进展都牵动着他的身心。成功会给他带来孩子般的狂喜，失败会使他心情痛苦。尽管宇航员从没有发生空难，但谁也不能为他们打保票。

平时，发射之后，负责导弹技术的部长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就会马上给赫鲁晓夫打电话，报告结果，然后是航天技术专家科罗廖夫的电话。谁都想第一个报告好消息。

然而，发射的时间已经过了，电话却一直没有动静。半小时过去了，40分钟过去了。赫鲁晓夫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命令列别杰夫接通斯米尔诺夫的电话。

一分钟后，列别杰夫报告说：“斯米尔诺夫在听电话。”

赫鲁晓夫拿起听筒，不无担心地问：“斯米尔诺夫同志，科罗廖夫那儿宇航员升空的情况怎样，为什么不报告？”

斯米尔诺夫回答，发射工作正常，宇航员已进入轨道，自我感觉良好。

“那儿您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赫鲁晓夫感到从未有过的怠慢，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已经愤怒了。“您应该立刻把结果报告给我。”

“什么‘来不及’？！我不明白您！您的行为令人愤慨！”赫鲁晓夫对着电话吼道。“斯米尔诺夫同志，请记住，我要您工作更有效率！您拖延了问题的解决！”赫鲁晓夫换了话题，“在发射场时曾委托您就科罗廖夫新导

弹准备一个建议。期限早就过了，而建议却不见下文。请您记着，我对您不满意！”

赫鲁晓夫扔下话筒。他的愤怒逐渐平息下来。他要求与科罗廖夫通话。热烈祝贺他又一次成功，祝他的集体取得新的成就。

列别杰夫出去半小时后回来通知说，很快就可以与宇宙飞船直接通话。

赫鲁晓夫乐于与宇航员进行这种电话交谈。他对在别墅办公室这种简单条件下就能与宇宙飞船通话的技术，表现出儿童般的激情。他为这些成就自豪，从中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份功劳——领导有方。

稍后，值班员庄重地宣布说：“接通了。”赫鲁晓夫拿起了话筒。照相机噼里啪啦地响起来，照明灯加大亮度，电影摄影机开始工作——记者和摄像师早就闻讯赶来。

谈话与前几次同轨道上的宇航员的谈话相似。互相问好和祝贺成功，中间夹杂着几句笑话。

“米高扬就在我身旁，想抢我的话筒。”

米高扬接过电话，向宇航员问好和祝愿平安返回地面。

正当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一起在皮聪大与成功围绕地球飞行三圈的宇航员通话时，在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主席团委员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里申、叶夫列莫夫；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杰米契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和谢列平。他们在撤销赫鲁晓夫职务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会上，与会者以苏共中央全会的名义作出一份“绝密”决议——《关于因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制定新时期的远景国民经济计划而出现的问题》。这份决议的内容是：

1 鉴于计划于今年 11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的问题的主要性质和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中所出现的不明情况，苏共中央不断接到询问，因此认为在赫鲁晓夫同志参加的最近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会上对此予以讨论是刻不容缓的和必须的。责成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电话联系，将定于 1964 年 10 月 13 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本决议通知他。

2 鉴于赫鲁晓夫同志于 1964 年 7 月 18 日向各级党组织散发的《关于对转向集约化道路的农业的领导》的信件在地方上所引起的混乱和其中所包含的前后不相联系的指示，从各级党组织撤回这一信件。

3 考虑到所出现的问题的性质和即将对此进行讨论的重要意义，认为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召至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主席团向全会所作的讨论这些问题的总结报告是适宜的。

关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时间在赫鲁晓夫同志到达时决定。

决议落款是苏共中央主席团。

当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绝密”决议的最后一个字母在打字机上敲出后，皮聪大那边，夜幕开始降临了。

赫鲁晓夫同米高扬正沿着海边的林荫小道散步。天慢慢黑下来。天上有几颗星星在云块的缝隙之间闪烁。

散步被跑来的值日官打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苏斯洛夫同志请您听电话。”

大家回到别墅。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走进办公室，拿起“高频”电话。

“我听着，苏斯洛夫同志。”

停顿了一会儿，赫鲁晓夫说：“我不明白是些什么问题？你们自己决定好了。”

又是停顿。

“我正在休假。有什么紧急事，两周后我回去再讨论嘛。”

赫鲁晓夫有些火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什么‘全都到了’？农业问题我们定于11月份在全会上讨论。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谈论这个问题！”

苏斯洛夫继续坚持。

“好吧，”赫鲁晓夫最后说，“既然这有那么紧急，我明天就飞回去。不过，我得知道是否有飞机。再见。”

赫鲁晓夫放下话筒转过身对静静地听着的米高扬说：“苏斯洛夫在电话中说，主席团全体成员几乎都到齐了，他们那里出现了有关农业的什么紧急问题，需要在全会前讨论。他坚持要我明天回莫斯科。你听到了吗，我想推迟到休假之后返回，但他们不同意。我只好回去。你是否回去？”

“当然。”米高扬回答说。

“那好吧。必须解决明天怎样才能会面的问题……要求准备回去……利托夫钦科！”赫鲁晓夫朝门口大声喊道。

警卫队长来了。

“我们明天飞回莫斯科。米高扬也同机回去。请您与齐宾联系一下，让他准备飞机。接见法国人改在早上，同他们谈半小时话。午餐取消。谈话完后，随便吃点什么就起飞。起飞时间预定在12时左右，如果飞行员来得及的话。完了。”

警卫队长走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又回到林荫道。气氛与刚才偶然不同，十分压抑。第一个开口的是赫鲁晓夫，他说：“你知道，阿纳斯塔斯，他们那儿并没有什么急不可待的农业问题。我想，这个电话同谢尔盖对我们说的那件事有关。如果问题关系到我的去留，我不准备反抗。”

## 第十七章

### 最后的岁月

散步回来后，赫鲁晓夫回到自己的房间，久久不能成寐。

此时，莫斯科多罗戈米洛夫斯克大街和卢比扬卡大街上的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寓所中也是寝无安席。

勃列日涅夫每隔一小时就给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打电话，询问情况。

勃列日涅夫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都显得畏手畏足，患得患失。当他在10月初得知赫鲁晓夫已掌握了一些这方面的情报后吓坏了。他用公用电话与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通了话，要他在上班前到他那里去一下。叶戈雷切夫当时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勃列日涅夫在公用电话中也未说明。他见到勃列日涅夫时，被吓了一跳。勃列日涅夫脸色苍白，双手发抖，处于极端的惊恐状态。他把叶戈雷切夫带进里面的房间，小声说：“一切都完了。赫鲁晓夫知道了筹备全会的细节。”叶戈雷切夫安慰他说：“难道这有什么不合法的？召开中央全会并不违背党章。”

勃列日涅夫说：“你对他不了解，他会把我们大家部枪毙的。”勃列日涅夫当时完全泄了气。

叶戈雷切夫看着他那副张皇失措的样子，劝他道：“我们的行为中没有什么不符合党性的，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了，应当捍卫22大的路线。”

叶戈雷切夫尽力使勃列日涅夫冷静下来，如果勃列日涅夫退出，事情将功败垂成。

这些天，勃列日涅夫一直如惊弓之鸟，害怕着手实施“政变”计划。谈话没完没了地进行，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结局被掂来掂去，“事情”却毫无进展。

当“事情”发展到最后一步、决定给赫鲁晓夫的皮聪大别墅打电话时，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由勃列日涅夫打电话。他仍然没有勇气挑起这副担子。大家好不容易才把他说服了，硬把他拉到电话机旁。然而，在这最后一刻，他还是怯场了，只得由苏斯洛夫来打电话。

皮聪大的沉默令勃列日涅夫感到心惊肉跳。要知道，赫鲁晓夫是有经验的，凭着他的意志、机智和力量，他在1957年曾挫败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这样的人。这一次，赫鲁晓夫会出什么新招？他会带多少卫队来？尽管两天前已经通知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并警告过莫斯科军区特别处的处长：未向谢米恰斯内汇报前，任何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

但天有不测风云，明天会怎样呢？

难熬的一夜。

10月13日早晨，皮聪大天气温和。和煦的阳光透过晨雾，海浪轻轻地拍着岸边，鲜花在微风中摇曳。

早餐后，赫鲁晓夫照例在阅读文件，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只是有一点与以往不同，电话沉默了……

警卫队长利托夫钦科报告说，飞机已经准备好，定在下午1时起飞。赫鲁晓夫听了只是点点头。

法国负责科研以及核问题与航天问题的国务部长加斯东·巴列夫斯基来了。核问题与航天问题是赫鲁晓夫较为关心的，若在平时，他会同客人进行深入的交谈。这天，他却显得有些过于客气，谈话完全限于礼节性的问候。他向客人询问了一些有关法国总统大选的准备工作，并表示他坚信戴高乐会再次当选。他声言：“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永远要为保证权力奋战到底。”谈话只持续了半个小时便结束了。

午餐后，赫鲁晓夫一行到了机场，“吉尔”牌小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舷梯上站着机组人员，赫鲁晓夫专机驾驶员齐宾照例报告说：“起飞准备就绪！无故障。航线上天气很好。”

赫鲁晓夫同他握了手，快步登上舷梯。米高扬紧跟其后。

以往，赫鲁晓夫每次来皮聪大度假，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和部长会议主席贾瓦希什维利都要前来迎送。这次，他们没有来送行。两人已经提前到莫斯科去了。

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走到舱尾。政府专用的伊济-18型飞机尾舱撤掉了普通旅客的座位，安放了一张小桌、一张长沙发和两把宽大的安乐椅。这里是飞机上最安静的地方。往常，赫鲁晓夫坐飞机时尾舱部总有一些旅伴，他不喜欢孤独。这次只有他和米高扬两个人。他们在一起设想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试图判断出在伏努科沃—2机场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

热烈欢迎？还是军队警戒？

……飞机开始下降。已经可以分辨清楚树木。最后，飞机轻轻一颤，像往常一样，着陆平稳。齐宾驾驶赫鲁晓夫乘坐的飞机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在战争期间，在任何天气情况下，在乌克兰，而后又从莫斯科飞往世界各地。

飞机停在伏努科沃—2机场的政府停机坪，发动机停了，一片寂静。机前的广场空荡荡的，只是远处伫立着两个身影……

往常，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总是成群地迎送赫鲁晓夫。他也对此已习以为常，尽管每次他都对迎送者故作生气状，骂他们游手好闲，但在心里他是非常高兴的。今天的场面可是太冷落了。两个身影渐渐走近，一个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另一个是保卫管理局局长切卡洛夫。

谢米恰斯内走到赫鲁晓夫跟前，礼貌但拘谨地问好。

“平安到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然后，他与米高扬握手。谢米恰斯内俯向赫鲁晓夫，悄声说：“大家全在克里姆林宫等您。”

赫鲁晓夫转向米高扬说：“走吧，阿纳斯塔斯。”

谢米恰斯内看到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上车后，便坐进了自己的那辆“海鸥”牌轿车。谢米恰斯内坐在后排，前排坐着卫兵。这是勃列日涅夫让他带的。早晨，他曾给勃列日涅夫去过电话，询问谁去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告诉他没人去，让他自己去，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没必要全都去，并让他给自己带上个卫兵。

赫鲁晓夫卫队长的车走在谢米恰斯内的车前，他不时从后座上转过头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谢米恰斯内的前面突然坐了个卫兵。

路上，谢米恰斯内让司机停一下，他要给克里姆林宫打一个电话。

汽车抵达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进入会议大厅后，谢米恰斯内立即换掉了接待室的卫兵，通知赫鲁晓夫的卫队长利托夫钦科上校可以去休假，并指派了一名叫瓦夏·布纳耶夫的小伙子接替他。谢米恰斯内在克里姆

林宫的过道里对他严厉地命令道：“听着！现在正在开中央主席团会议，什么情况都会出现。我代表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意愿。你是共产党员，对一切都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这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记住，不经我批准，不得执行任何人的——记住，任何人的——号令、命令、吩咐。听见没有？”

克里姆林宫此时仍然向游人开放，游客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各处走来走去。谢米恰斯内已派专人在一些重要的出入口把守。

会议厅内的会议是由赫鲁晓夫主持的，会议一开始便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谢列平、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等人在会上轮番发言，对赫鲁晓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抨击几乎都集中在赫鲁晓夫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上。例如，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不理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在干部问题上狐断专行，不能克制自己，作风粗暴，自我标榜和吹嘘，等等。

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基本上没有发言，偶尔补充两句，也不像那几个共青团干部出身的人火力那样猛。米高扬的发言明显同他们的立场不同。他认为赫鲁晓夫的活动是党的巨大政治财富，党无权这样轻率地把它糟蹋掉。他建议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但是，与会者没有一个人支持米高扬。

晚上8点左右，赫鲁晓夫回到了家。一副心灰意冷和疲惫的样子。一直在为父亲担心的谢尔盖迎了上去。

“一切都和你说的——一样。”赫鲁晓夫首先开口。

“要你辞去所有的职务？”谢尔盖问。

“暂时只辞去其中一项职务，不过这没有任何意义。这只是开始……应当做好最坏的准备……”

赫鲁晓夫不愿意多说话：“别提问题了。我很累，还得想一想……”

赫鲁晓夫向楼内走去。听到门响后，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从房间出来，走到门厅。他目光中有个无言的问题：出了什么事？

赫鲁晓夫朝他点点头，慢慢地朝楼上的卧室走去，并吩咐让人把茶给他送上去——他不想见人。阿朱别伊和谢尔盖目送着他的背影，突然发现他好像老了许多。

赫鲁晓夫的身影消失后，阿朱别伊立即抓起电话机给谢列平打电话，拨了几次，没人接，又往别墅打，还是没人接，给波利扬斯基和其他人打，仍然没人接，好像所有的人都不在家。

原来，赫鲁晓夫走后，所有主席团委员都约好了一律不接电话，只有米高扬除外。

实际上，赫鲁晓夫已经决定不作斗争自行告退。夜间，他给米高扬去电话说，既然大家都想解除他的现任职务，那他就反对了。他说：

我已经老了，也累了。让他们现在就自己去干吧。我完成了主要的任务。我们之间的关系、领导作风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难道谁会异想天开地认为我们可以对斯大林说我们觉得他不合适，建议他退休吗？那样一来，我们就得彻底完蛋。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恐惧心理没有了，讲话都是以平等的身份。这是我的功劳。我不会去斗争的。

夜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又通过了一项“绝密”决议——《在中央主席团

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在苏共中央活动中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的措施》。决议这样写道：

鉴于因赫鲁晓夫同志破坏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出现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行为，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央主席团内形成了十分不正常的局面，妨碍了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去履行领导党和国家的职责。

赫鲁晓夫同志占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把大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上，在一系列情况下开始脱离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再考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意见，在未经必要的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决定极其重大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对主席团和中央的同志们表现得不容异议和粗暴，轻视他们的意见，在实施苏共 20 大、21 大和 22 大的决议所制定的路线中犯下了一系列重大错误。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作为一名工作人员，由于其所形成的不良个人品质、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赫鲁晓夫同志已不可能纠正所犯的错误和非党的工作方法。同时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所提交的声明，苏共主席团决定：

1. 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解除其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的请求。

2. 承认今后由一人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是不适宜的。

3. 认为必须于 1964 年 10 月 14 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责成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责成米·亚·苏斯洛夫同志以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作报告。

次日上午，赫鲁晓夫去了克里姆林宫。在签署退休声明前，他在中央主席团做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发言。他说：

你们大家在这里对我的不好的品质和行为谈了许多，也谈到了我的好品质，为此我谢谢你们。我为主席团高兴，总的说是为它的成熟感到高兴。我对它达到这样的成熟程度也尽了绵薄之力。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家都是党培养起来的，我们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全都是她的功劳，党的功劳。我和你们的政治与思想基础是一样的，我不能同你们斗争。我愿让位，我不会斗争的。我若是过去让谁受到了委屈，对谁态度粗暴的话，再次请求原谅。工作中什么都可能发生。不过我想说，对我提出的许多指控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在我不可能把所有指控都回忆起来并且一一答复。我只讲一点：我的主要缺点和毛病是善良和轻信，也许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不过就连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也从来没有公开和诚实地指出过我的任何缺点，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建议都统统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你们指控我同时兼任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不过客观地说，我本人并没有力争这样兼任。回想一下吧，问题是集体决定的，而且你们当中许多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坚持让我兼任嘛。也许我的错误就是我没有反对这个决定，可是你们全都说为了对事业有利必须这样做。现在你们却又指控我兼任两个职务了。

是的，我承认自己对艺术和科学工作者曾有过失当的地方，其中也包括



我对科学院的意见有失分寸。可是我国科学在许多问题上落后于西方科技，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嘛。我们把人民大量的钱财都作为科学投资，我们提供了一切条件，以便进行创造和把科技成果推广到国民经济中去。应当强迫、应当要求科研机关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做出真正的贡献。这可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真理。

接下来，赫鲁晓夫解释了当初为处理加勒比海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他在发言中说：

你们指控我撤走了导弹。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当时非得打一场世界大战不成？现在你们为什么要异口同声地指责我在古巴问题上采取了冒险行动，我们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大家一起商定的吗？

拿在柏林修建柏林墙来说吧。当时，你们也会都赞成这个决定，可现在又来责怪我了。我错在什么地方了？话说起来容易，可是要决定具体怎么办，你们谁也没有提出过、而且现在也未必提得出建议。又比如，我们同中国领导人的相互关系。关系相当复杂，而且还会进一步激化。你们再过四五年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麻烦。在所有的相互关系上、在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不要丧失阶级嗅觉，不要丧失政治灵活性和策略灵活性。

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篇政治演说，怎么说来着，叫绝唱吧。全会上，我不想讲话，不过我想对全会提个要求……

赫鲁晓夫没有说完他想提出什么要求，勃列日涅夫当即斩钉截铁地插话说：“这办不到！”苏斯洛夫也表示支持。

赫鲁晓夫眼眶里滴出了泪水。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显然，现在是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也好，我是罪有应得。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你们知道，我本来就想过我该退下来，问题一大堆，我这么大年纪了解决起来很困难。应当提拔年轻人。我明白，今天有些人缺乏勇气和诚实……不过，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至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有分量的公正的结论的……现在我要求写一份关于我辞职、退休的报告，我要在上面签名。为了党的利益我准备去做一切。我在党内已经46年了，请理解我！我想，你们也许会考虑给我安排个荣誉职位，但我不向你们要求这个职位。我在哪里生活，由你们决定。只要该做，我准备到任何地方去。我再次谢谢你们的批评，谢谢这些年来和我一起工作，谢谢你们准备给我退休的机会。

赫鲁晓夫把他自己的想法一古脑地全都吐了出来，结局如何，他已经顾不上了。他所没有想到的是，反对他的人全都是他在1957年那次中央全会之后提拔上来的人。他更没想到，他想对全会只提一个小小的要求都被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实际上，勃列日涅夫之所以拒绝，完全是因为害怕全会上有人向赫鲁晓夫提出问题，只要他一回答就会展开辩论，局面很可能会发生难以控制的变化。

14日下午，召开了正式的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在全会开始前作了简短发言。他首先介绍了前两天主席团会议的情况，接着他开始对赫鲁晓夫提出

批评。他说：

中央主席团中的局面是不正常的，其责任主要在赫鲁晓夫同志，他走上了破坏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突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中央主席团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仓促指示及其领导国民经济的考虑不周的唯意志论的行为，产生了严重混乱，出现了被没完没了的改革和改组所掩盖的严重失误。

在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后，苏斯洛夫开始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赫鲁晓夫 15 个方面的错误，他说：

1. 他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人所进行的工作，由于他犯下的重大错误而受到严重损害。他经常做出仓促草率、考虑不周的决定，鼓励任意扩大行政管理机构，致使等级层次繁多。在前两三年时间里，他手上集中了巨大的权力，并且开始滥用权力。他还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全国的成就功绩都记在自己名下。他根本不把主席团的权威放在眼里，蔑视主席团其他委员，对他们颐指气使，拒绝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以及周围所有的人总是没完没了地予以训斥。尽管主席团委员多次呼吁，他还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全然置之不理。

2. 苏联报刊沉湎于日益频繁地报道赫鲁晓夫的活动，并对他大加溢美。1963 年一年，全国性大报上共刊登了他的 120 幅照片，1964 年头 9 个月竟至 140 幅，相形之下，当年斯大林巨照载之报端一年也不过 10 到 15 次。赫鲁晓夫身边尽是裙带亲戚和报刊记者；对他来说，这伙人的看法要比主席团委员的意见更有价值。到头来，对这伙人提出的措施方案，主席团只能起到例行批准，走个过场的橡皮图章作用。赫鲁晓夫依赖报刊广播的献媚奉承来维持个人的妄自尊大。

3. 中央委员会撤去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伊《消息报》主编的职务，因为他在工作上难以胜任，只会奉迎且不负责任。他僭行了影子外交部长的作用，企图干涉最高决策层的外交工作，混淆驻外大使的视听。有一次出访西德时，阿朱别伊用轻蔑的口吻谈到瓦尔特·乌布利希，结果后来我们党费了好大力气才缓和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4. 赫鲁晓夫把州委划分为两个平行组织，一个工业州委，一个农业州委。这种做法在管理上引起了极大混乱，造成两个孪生性政党的出现，一个是工业党，另一个则是农业党。

5. 赫鲁晓夫提议用政治部门取代现存的农业管理机构。他的建议书还对这些新的专业化部门在有关畜牧业和种植业上的职责做出了规定，然而中央主席团认为建议显然行不通而未加采纳。

6. 赫鲁晓夫以为自己在农业、外交、科学和艺术等方方面面都是专家内行，而且对所有妨碍他的人都吹胡子瞪眼。譬如，有一次在民主德国，他曾毫不踌躇地指示红地农场工人怎样管理农场，一举一动俨然像是在我国的某个加盟共和国。不仅如此，许多由中央委员会准备的文件都署上了赫鲁晓夫的名字，仿佛文件中的精辟结论都应归功于他似的。

7. 赫鲁晓夫对中央主席团委员提出的要求过分苛刻，以至绝难办到。例如，他让大家在短短的 45 分钟之内便要以书面形式对他的建议书表态。结果，每次磋商都不过是形式而已，主席团的碰头会成了走过场。

8.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工业管理工作被弄得极为繁乱复杂，结果国家各部委、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各级主管部门都变得机构臃肿，运转不灵，效率低下，工业本身也是如此；工业生产力较之以前旧管理体制下的生产力，还显不如。

9. 赫鲁晓夫制定和实施了破坏工人福利的政策。肉类、日用品和某些消费品价格上涨，从而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畜牧业工作上普遍运用了完全错误的理论，结果使无数的畜牛遭到滥杀，造成市场上肉类供应日益减少。

10. 在外交会谈时赫鲁晓夫很不谨慎。例如，他在改善苏中关系方面无所作为。有一回，他竟然对几个日本国会议员讲，如果中国新疆的哈萨克人表示愿意让苏联来治理的话，我们就把他们统统合并过来。这几句话在日本见了报，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抗议；还有一次，他把毛泽东称做“老套鞋”，后来让中国人知道了，引起了麻烦。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也有失检点，谈话往往不注意时间场合。

11. 就连苏联的朋友也免不了要受到赫鲁晓夫的非难。在一次经互会会议之后所举行的晚宴上，赫鲁晓夫对保加利亚总理日夫科夫嘲弄揶揄，说保加利亚人总是当食客。当时有几十名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代表在场，日夫科夫不便发作，只能保持外交上的缄默。赫鲁晓夫的说法表明了一种傲慢无礼的态度，这同一个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的身份真是格格不入。

12. 赫鲁晓夫对苏联外贸伙伴的态度也十分傲慢。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由于他的朝令夕改翻云覆雨而受害尤深。波兰建立了一家计划生产安-2型飞机的工厂。苏联答应从波兰进口500架这种飞机。但事到临头，这批订货却取消了，因为赫鲁晓夫认为这种飞机在苏联国内制造会更便宜，结果取消了这批订货。这一决定让波兰以及这个工厂的1.5万名工人大失所望。罗马尼亚的忠诚也受到苏联的考验，因为苏联要求罗马尼亚把自己开采的原油输入“友谊”管道。而当时罗马尼亚却需要出售自己的原油以便为国家换取急需的外汇。苏联曾从芬兰订购了许多套小型别墅的预制件，为此，芬兰方面特意建造了一家专门的工厂，但这家工厂也因赫鲁晓夫坚持取消订货而停产。此事发生之后，苏联希望通过芬兰造船厂来生产新船，芬兰方面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于是拒绝了为苏联的订货投资建造新厂。此外，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全然无视苏联外贸部长的存在，不仅从未接见过帕托利切夫，甚至连电话都不曾打过。

13. 有关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问题。赫鲁晓夫得知该农学院的专家们不同意自己的农业政策后，便下令将它迁往边远地区。这一决定使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大为恼火。赫鲁晓夫的同事们想方设法建立了各种委员会来推迟搬迁这所农学院的计划，要知道，这所学院已在莫斯科建立了100多年。总之，他们抵制了他的指示。但当赫鲁晓夫有一天发现这所农学院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便下令停止该学院的招生。农学院起先没有一年级，后来则没有二年级。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教师都纷纷离开了学院。

14. 赫鲁晓夫为取消休耕地和集体农庄庄员的自留地，发起了一场完全错误的运动，把拒不执行或执行不力的所有国营农场场长统统撤职。结果那些已被充公的土地又闲置不种，听任杂草丛生，到头来还得庄员们去除草。他还全然不顾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强烈反对，竭力为李森科的胡言乱语大加辩解，甚至提出要苏联科学院为李森科的朋友留出两个院士席位。当萨哈罗夫对这两个人的人选资格提出质疑时，竟遭到李森科的谩骂。李森科对自己的门徒遭到拒绝一事大为不满，并向赫鲁晓夫汇报了这件事。于是苏联科学院本身也面临

被解散的威胁。当柯西金对哈萨克谷物播种工作表示有所关心时，赫鲁晓夫认为这是对他所管辖领域的干涉，是越权。在许多州，他鼓吹用国营农场来代替集体农庄，尽管国营农场效益并不好。

15. 赫鲁晓夫在给其他国家以许诺以及在对待别的国家的关系上，经常不顾国力而四处讨好。他向纳赛尔和阿密尔二人的授勋简直毫无道理。他许诺帮助伊拉克铺设一条长达 600 公里的铁路，而当时苏联自己每年修建本国铁路的能力也不过如此；他还下令让苏联工程技术专家专为印度尼西亚建造一个体育馆，却根本不管该国极为贫困的现状；在出访斯堪的纳维亚时，他携带全家同行，连子女和孙辈一共 12 人，结果授人以柄，让西方报界把这次访问称为“家庭野餐”。

苏斯洛夫在结束报告时读了赫鲁晓夫的退休声明和头天晚上所作的决议。退休声明当然不是赫鲁晓夫写的，但落款的签名是赫鲁晓夫。声明中这样写道：

致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同志们：

鉴于年已古稀并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我请求苏共中央满足我的请求，解除我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鉴于上述原因，我已不可能履行我所承担的职务。我向苏共中央保证我将把我的余生和精力献给党，致力于苏联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工作。赫鲁晓夫。

苏斯洛夫匆匆念完赫鲁晓夫的“退休声明”和决议之后，会议厅中有人喊道“不用讨论了”，主持会议的勃列日涅夫于是说：“同志们：你们的建议和主席团的意见相吻合。还有谁要坚持讨论吗？”于是，这份决议就被中央全会所通过。接着，勃列日涅夫建议选举中央第一书记和审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问题。这时，大厅里又有人说：“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第一书记。”于是，在“谁赞成”，“谁反对”，“谁弃权”的最简单的表决方式中，主持选举的波德戈尔内宣布“勃列日涅夫全票当选”。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选举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64 年 10 月 14 日的中央全会匆匆结束了。

在 1957 年 6 月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曾以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反党集团”，排除出领导集团。七年之后，后人如法炮制，他自己也被以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和方式赶下台。

赫鲁晓夫回到家中，把外国客人送给他的那个黑色公文包交给迎面走来的儿子谢尔盖，叹了口气说：“完了……辞职了……”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自己签署了因健康原因而退职的声明。现在只等中央全会的决定了。我说了，我服从纪律、执行中央委员会将作出的一切决定。我还说，我等着我的去向，莫斯科或是其他地方。”

“任命谁了？”谢尔盖问。

“第一书记是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是柯西金。柯西金是个够资格的人选。”赫鲁晓夫像从前那样，对人选做出评论，这个习惯一时难改。“解除布尔加宁职务时，我就提议由他担任这一职务。他真正熟悉国民经济，能

胜任工作。至于勃列日涅夫，就难说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推行正确的路线。不过，这些已不关我的事，我现在是养老金领取者，我的事情就是靠边站。”他嘴角上露出痛苦的皱纹。

谈话只得结束。

晚上，米高扬来到赫鲁晓夫家中。他被中央主席团授权通知赫鲁晓夫已通过的决议。

米高扬踌躇地说：“他们要我向你传达：这座别墅和市内住宅留给你终生使用。”

赫鲁晓夫含糊地回答：“好吧。”很难说清，这是表示感谢，还是仅仅表明他听到所说的话。他停顿了片刻后说：“我将住在指定我住的地方。”

“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也保留，不过要换人。”

赫鲁晓夫理解地哼了一声。

“退休金将定为每月500卢布，汽车也留给你使用。决定保留你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职务，不过，这还不是最后决定。我还建议你设立中央主席团顾问一职，但我的建议被否决了。”“这确实没有必要，”赫鲁晓夫口气坚决他说，“他们绝不会同意你的这一提议的。在这一切之后，他们怎么可能需要我呢？我的劝告和不可避免的干预只会让他们感到碍手碍脚。再说，同我见面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什么高兴的事。……当然，有个事儿干总要好些。我真不知道，我怎能去适应那种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的退休生活？不过，还是要感谢你，有人为我说话，总是令人欣慰的。”

谈话至此就结束了。赫鲁晓夫把米高扬送到门前的空地。米高扬拥抱并亲吻了赫鲁晓夫，之后快步向大门走去。赫鲁晓夫一直目送着他的身影，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会过面。

退休的生活开始了。

10月14日夜，赫鲁晓夫住宅的警卫队换了人，新的卫队长叫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梅利尼科夫；电话机也不响了，剩下一部市内电话和一部同卫队室联系的电话还能用；汽车由加长“吉尔”换成“海鸥”，很快又换成“伏尔加”。

赫鲁晓夫很难习惯新的生活。他每天早上浏览报纸，不过已不像原先那样标出国际国内生活中应予研究和领会的文章了。他把报纸往旁边一放，就开始在公园里散步，朝下走到莫斯科河岸边。

“应当学会消磨时间。”赫鲁晓夫总是重复着这句话。他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挑了一大堆书——从前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如今时间倒有的是，可读得并不入迷：不久前所经历的事情太难忘了，他只是无意识地翻动着书页。看不了几页，他就把书撂到一边，又开始那没完没了的散步。

事变第二天，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罗芙娜就从休养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赶了回来。在最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把全家悄悄地掌管起来。中学生时就是红军侦察员的她，圆圆的脸庞上老是挂着笑容，仿佛家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不过是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例行的决定，而这次作出的是关于她丈夫的决定。

往常门庭若市、好友如云的场面不再出现了：有的人如今已没有必要来找赫鲁晓夫；有的人仅仅是因为害怕；有的人想来，但无法来访，例如飞机驾驶员齐宾和卫队长利托夫钦科。总之，赫鲁晓夫过起了隐居生活。只有医生别祖比克定期来探望，开点镇静药，聊聊生活，讲讲新闻和“时间是最好

的医生”之类的话，临走时不忘提醒说，他过几天再来。

1965年新年就这样在烦恼中来临了。

为了使赫鲁晓夫的心情能好些，赫鲁晓夫全家准备在老地方——9号别墅过最后一个新年。因为勃列日涅夫已经通知赫鲁晓夫新年后搬家。尽管那一年全家老少无心过节，大家仍打扮得漂漂亮亮，尽量显得精神和快活。12点时，电话铃响了，是打给赫鲁晓夫的。

“喂？”赫鲁晓夫拿起了听筒。

很长时间以来，没人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因此全家人都仔细听着。

“谢谢你，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的声音变得年轻了，几乎和先前一样。“我也祝你新年快乐，代我祝家里人新年快乐……谢谢，我精神还好。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养老。我要学会休息……”谈话很快就结束了。赫鲁晓夫很兴奋，对大家说：“米高扬打电话来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目光又渐渐地暗了下来。老朋友的电话只使他精神振奋了一会儿。

几个在家中服务的妇女——厨师、服务员、清洁工在新年钟声响起的时侯也拥进房间。她们带来了特地为过新年烤制的大馅饼，摆在赫鲁晓夫面前。赫鲁晓夫多少又高兴了一些，他给妇女们每人斟了一杯香槟酒。妇女们说，她们是来辞行的——她们已被调往别处，但她们将始终保持对赫鲁晓夫的亲切感情，她们在他身边工作得十分愉快……话到末尾时，妇女们已是热泪盈眶。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也动了真情，流下了眼泪。这些平时只会做些家务琐事的人的感情才是真挚的，而平时，他却几乎很少与她们说话。这正是，人到落难时，才知真情可贵。

1965年初，赫鲁晓夫携同全家迁入新居。整整一年，赫鲁晓夫终于对退休者的生活习惯了。不过，这一年他害了一场大病。起初，医生怀疑是胰腺癌，不过未能确诊。他恢复健康后，别祖比克规定他必须严格节食，戒酒。这又给赫鲁晓夫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便。退休后，他衰老的速度突然加快了，身体的一些器官开始出问题。这令尼娜·彼得罗芙娜很是担心。“得给他找点事情干。”她想。

退休生活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一个特殊问题是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本来信息丰富。信息来源于各种渠道——国家、党、经济、外交、克格勃、国内外报刊等，现在就只剩下报纸、电视和广播了，而这三个媒介传来的信息，在苏联都是经过严格而仔细地过滤加工的，令人感兴趣的几乎没有。赫鲁晓夫一大早就把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然后冷笑道：“味同嚼蜡……难道可以这样写吗？这叫什么宣传？谁会相信这个？”

赫鲁晓夫觉得信息太少了。他找出美国商人埃里克·约翰逊早在50年代时送给他的“顶峰”牌全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然而，消息令他更为烦恼，他的所有改革措施正在逐一被取消。对于有关贪污受贿、官僚主义、好逸恶劳的报道，他最为痛心疾首，他不明白苏联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在往什么目标走？”他简直闹不明白。为排除烦恼，必须找个事干。

他想起了水栽法。早在离任前，他就听人说可以用营养液而不用土壤栽种作物。女儿列娜知道父亲的想法后，立即弄来一本《工业水栽法》的书，赫鲁晓夫对这本书进行了仔细的研读后，就开始修水塘，配制混合液。为了让赫鲁晓夫高兴，全家人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栽种了西红柿和黄瓜，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这一工作不久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接着，赫鲁晓夫又决定练习摄影。儿子为他买来一大堆照相器材。几年过去了，赫鲁晓夫把周围的景物反复拍照过多次，他对摄影彻底厌倦了，把照相机扔到一边。

平时，能给赫鲁晓夫带来最大乐趣的是点篝火。他身披法国纺织业企业家布萨克送的那件驼色斗篷，无论什么天气，即使是下雨，他也要在林子里拣枯树枝点起篝火，一连几个小时凝视着火光。

篝火使他想起遥远的童年、夜间放牧、牛群、烤土豆、故乡卡利诺夫卡。有时候，他的孩子陪他一起去，但平日里只有那条名叫阿尔巴特的狗跟着他。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带有花条棉坐垫的折叠式铝制小椅子，通常椅子由阿尔巴特用嘴衔着。不过，这条德国牧羊狗若是心绪不佳，赫鲁晓夫就得自己拿了。他的胸前还时常挂着一副望远镜——这是德国首相阿登纳送的。与他“俩”同行的还有一只白嘴鸦，这是赫鲁晓夫捡到的一只小雏鸦，他把它喂养大，因此它同赫鲁晓夫非常亲密，他走到哪儿，它就飞到哪儿，并从他手中啄食。

后来，他又想起了他的钳工活，他找来了一套钳工工具，弄到麻刀、麻和油漆，他想把一根根水管接起来，通到菜园去，他成天搬运管子。

这种不断的兴趣转移持续了将近两年。妻子和孩子们都希望赫鲁晓夫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项工作上，他们向他建议写一本回忆录，并找来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回忆录让他看。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无论谁同他见面，无一例外地都要问他是否在写回忆录，并异口同声地劝他赶快动手，因为他脑子里装着那么多无人知晓的历史事实。

1966年8月里的一天，尤莉娅的丈夫，记者廖瓦·彼得罗夫拿来一台录音机，赫鲁晓夫就开始了口授。工作很快就走入了正轨，它成了赫鲁晓夫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

接着，赫鲁晓夫的妻子加入了进来。她根据录音边打字边改稿，但速度不能让赫鲁晓夫满意。尼娜·彼得罗芙娜只能用四个手指头打字，而赫鲁晓夫早已习惯了中央委员会的职业打字员，她们都是用8个甚至是10个手指头来工作。他对妻子说：“你就这样打字？什么时候能打完？照这样的速度到生命结束那天口授的材料也加工不出来。”

儿子谢尔盖建议赫鲁晓夫请求苏共中央派个打字员和秘书，他说：“这又不是个人的事情。中央应当关心回忆录。这是历史。”

赫鲁晓夫不愿去找中央，他说：“我不想向他们提任何要求。要是他们主动提出来，我不会拒绝。但是他们不会提出来的，他们不需要我的回忆录，只会从中作梗。”

不得已，谢尔盖把自己的同事列奥诺拉·尼基福罗芙娜·费诺格诺娃找了来让她帮助打字。从此，工作进度加快了。赫鲁晓夫每天口授3—5个小时，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他希望口授时旁边要有听众，仅仅面对录音机时，他的语言就不流畅，也不生动，往往会有长时间的停顿。听众一来，事情干得是又快又好。秋冬两季最出活儿：夏天，赫鲁晓夫忙于菜园，口授就只能抽空进行。

在口授了几千米的录音带之后，他感到越来越不安：他的回忆录将会遇到怎样的命运呢？

“这一切都是白费，无效劳动，全都保不住。我死后，他们会把一切全

都拿走销毁，或者掩藏得不留一点痕迹。”他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道。

为防万一，谢尔盖决定采取保护措施，多复制一份录音带和文字记录，并把两份东西分别保存在可靠的地方。

不过，赫鲁晓夫正在口授自己回忆录的消息不久便让苏共中央知道了。

1968年4月的一天，基里连科把赫鲁晓夫叫了去，当时在座的还有苏共监察委员会主席阿·亚·佩尔谢和彼·尼·杰米契夫。基里连科说，中央委员会了解到赫鲁晓夫长期以来一直在写自己的回忆录。回忆录涉及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历次重要事件，实际上，他是在改写党的历史，而阐明党的历史、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乃是中央委员会的事情，并不是个人的事情。更不是退休者的事情。因此，中央政治局要求，赫鲁晓夫必须停止回忆录的写作，至于已经口授的部分，应立即交给中央。

基里连科曾在乌克兰与赫鲁晓夫共事多年，也曾在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局中做他的副手。

赫鲁晓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面前这几个以前的战友。他一开始作出回答时还心平气和，但愈说愈激动。他说，他弄不明白基里连科和那些派基里连科来的人要他做什么。世界上写回忆录的人很多，苏联也不例外。这是正常现象。回忆录不是历史，而是每个人对自己一生的看法。回忆录可以对历史起补充作用，可以成为国家未来历史学家的好素材。既然如此，对他提出的要求便是同宪法相抵触的，是对一个苏联公民的人身侵犯，他拒绝接受。“你们可以动用武力把我送进监狱，或者动用武力没收这些材料。今天，你们可以对我采取这一切措施：但是我坚决抗议。”他补充说。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我向您转达的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您身为共产党员必须服从……不然的话……”人基里连科坚持说。

赫鲁晓夫没让他把话说完。

“你们敢于对我采取的行动，就连沙皇时代的政府也不敢做。我记得只有一件事情与此类似。你们准备对我采取的行动与尼古拉一世对待塔拉斯·舍甫琴柯一样。流放他去当兵，不准他在那里写书作画。你们可以没收我的一切——退休金、别墅、在宅。这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你们即使这样做了，我也不感到奇怪，不要紧，我能找到糊口的办法。我去当钳工，我还记得怎么干。要不，就背上包去要饭。人们会给我吃的。”

他瞥了基里连科一眼。

“换成您就连面包渣也没人给，非饿死不行。”

佩尔谢见状，插话说，政治局的决定人人都必须照办，赫鲁晓夫也不能例外。这些回忆录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那么政治局可以给我派速记员和打字员来嘛，让她们把我口授的东西记录下来。这是正常的工作。她们可以搞两份出来——一份留在中央，一份我口授时用。”赫鲁晓夫的口气比较缓和了。但这时，他又想起了另一个问题，火气一下子又蹿了上来：“还有一件违犯宪法的事，整个别墅都安了窃听器。连厕所都不放过。你们把人民的钱财浪费在偷听放屁上头了。”

最后，赫鲁晓夫又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个权利是无法剥夺的。他的口授记录是供中央、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使用的，他希望他所写的东西能对苏联人、对苏联的领导人 and 国家有所裨益。愿他亲身经历的事件成为人们未来生活中的教训吧。

这次会见使赫鲁晓夫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波动。他很伤心，一次又一次



地提到谈话时的情况。他把口授丢在了一边，只是偶尔进行一次。“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不会罢休的，我了解他们。他们现在不敢，等我一闭眼，就会统统没收和销毁。他们肯定会这么干的。他们不需要真实的历史。”他说。

赫鲁晓夫决定将自己的回忆录送到国外保存起来。当年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封揭露斯大林制度问题的信若不是在法国发表，人们对许多情况还无从知道；列宁的信件和文章当初不是也经常在国外发表吗？

赫鲁晓夫认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是一个毕生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人的自白。其中有生活的道理，有警告，有事实。回忆录应当让人们读到，就算最先在“那边”问世吧，总有一天“这边”也能看到。当然顺序颠倒过来更好。可怎么能活到这一天呢？需要赶快行动。

1970年5月底，赫鲁晓夫在菜园里忙到中午。回到家后，他没吃午饭，说身体不舒服，心口疼。他在屋里走了一会儿，希望疼痛会止住。医生到来后，确诊为严重的心肌梗塞。赫鲁晓夫立即被送往医院。

别祖比克解释说，赫鲁晓夫必须长期住院，得住几个月，但头10天最危险。什么都可能发生，随时有死亡的可能。

与此同时，对回忆录的缉查越来越紧了。克格勃终于逼谢尔盖交出了回忆录的录音带和文字材料。谢尔盖不敢将此告诉赫鲁晓夫，因为医生说了，不能让他激动——他随时可能死亡。

谢尔盖交出所有的“副本”后，立即向美国的出版社发去了约定的信号，并很快得到了反馈。第一卷在年底或第二年年年初出书，10月公布出书消息，11月开始在杂志上连载。

8月底，赫鲁晓夫出了院，回到家中，他身体虚弱，面色苍白。他很少散步，多半是坐在阳台上，或是坐在房间内的安乐椅上打瞌睡。身体渐渐复原后，他常常去菜园或是去欣赏河上的风光。谢尔盖看到父亲恢复了常态，便在一次散步时对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克格勃、没收、不久将出书。赫鲁晓夫赞成向国外发信号出书。既然他们对他如此放肆，他也可以放开手脚作出决定了。

“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就算暂时不能在我国出版吧……在国外出版固然不好，但也别无他法。早晚会在我们这边出的……”他痛苦地说。

11月11日，十月革命节刚过，佩尔谢就从书记处给赫鲁晓夫打来电话，命令他立即去党的监察委员会。

赫鲁晓夫知道他们找他去的原因——西方发布了关于利特尔·布朗公司即将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一书的消息，消息中说，该出版公司拥有打印材料和由赫鲁晓夫亲口授的录音带，经专家鉴定，录音带确系真品。

佩尔谢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声明，声明中说赫鲁晓夫从未写过回忆录，也从未交给过任何人，所出版的书系伪造品。赫鲁晓夫断然否定了这个声明，并表示这样的声明他不会签字。这是假话，而说假话是罪过，在他这样的年纪更是罪过。应该考虑一下身后的事情了。他写过回忆录，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这些回忆录是为人民而写的，他的回忆录就是历史，他今后还要写下去。然后，他又说，如果声明的大意是回忆录尚未完稿，因此尚不具备出版的条件，那么他可以签字。

当谈到书在国外出版的问题时，赫鲁晓夫同意写上他本人并未把材料交到国外出版的字句。这一妥协使佩尔谢感到满意。草稿很快拟好并打印出来，

赫鲁晓夫签了字。

佩尔谢认为此次会见该结束了。但赫鲁晓夫却向他提起没收回忆录一事。佩尔谢没有准备，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接着，赫鲁晓夫又提起一个新话题，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

他说，他们甩开他已经干了六年。当初，他们给他加上了种种罪名，他们说：只要甩开赫鲁晓夫就会事事如意了。结果怎么样呢，农业仍然是一团糟，向美国购买粮食已经成了通例。可见问题并不出在他的身上，而是出在有缺陷的经营管理体制上。

国际关系又如何呢？过去他们说，是赫鲁晓夫使苏联同中国闹翻了。六年过去了，关系却更加恶化了。

接着，他又谈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埃及问题，等等。最后，他结束了自己的“控告词”，不再作声。

佩尔谢试图辩解，但赫鲁晓夫却不听他讲，说：“已经满足了你们的要求，现在想回家了。”

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同苏共党的领导人、同他的继任者见面。他向他们倾吐了六年来他孤身独处时苦苦思索、郁积在心中的一切。

第二天，他又住进了医院，仍然是心肌梗塞。

在1971年新年到来之前，他出院了。但是身体的恢复很慢，极易疲劳，散步中途必须坐下休息一会儿。“阿尔巴特”狗已经死了，没有了衔椅子的帮手，赫鲁晓夫感到更加孤独和寂寞，他愈来愈多地被忧郁的念头所支配，他伤心地抱怨说：“已经到了我对谁都毫无用处的对候了。我只是白白地活在世上，不如一死了之。”

9月6日，他又一次住进医院。这一次，他再也没能健康地离开医院，他终于没能挺过去。

1971年9月13日，为赫鲁晓夫举行葬礼的那一天，苏联《真理报》没有刊登通常的讣告，只是在第一版下面用小号字登了一则带黑框的消息：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告，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71年9月11日逝世。终年78岁。

## 附 录

### 赫鲁晓夫年表

( 1894—1971 )

- 1894 年 4 月 17 日 赫鲁晓夫生于库尔斯克省(今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村。
- 1908 年 赫鲁晓夫的父亲携其全家迁居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的尤索夫卡(后改名斯大林诺,现名为顿涅茨克),其父在那里当矿工。
- 1909—1912 年 赫鲁晓夫为养家开始在尤索夫卡鲍谢工厂学习金属装配工手艺。
- 1912—1918 年 在法国资本的鲁钦科夫和帕斯图霍夫矿场的发电厂中当金属装配工。
- 1917 年 代表矿工参加政治集会和群众集会,第一次与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会面。
- 1918 年 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 1919 年 参加红军。
- 1919—1921 年 成为第九步兵师的士兵和俄共(布)党的工作者,那时第九步兵师属于布琼尼第一骑兵军。
- 1921 年 赫鲁晓夫的第二个妻子死于饥饿和伤寒。
- 1922 年 国内战争结束,从前线回到尤索夫卡。在尤索夫卡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鲁钦科夫煤矿副经理。被提名为帕斯图霍夫煤矿经理,但申请去尤索夫卡工人学校学习。
- 1924 年 开始在尤索夫卡党组织中担任各种职务。与尼娜·彼得罗夫娜结婚。
- 1925 年 任斯大林诺(前尤索夫卡)省彼得罗夫斯科—马林斯克区委书记。  
出席卡冈诺维奇主持的第 9 次乌克兰党代表大会。  
以列席代表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 14 次全苏党代表大会。
- 1926 年 在哈尔科夫乌克兰党的会议上作第一次有记录的公开演说。
- 1927 年 作为代表出席第 15 次全苏党代表大会。从斯大林诺的区级机关提升到省一级党的机关工作。
- 1928 年 被卡冈诺维奇提拔到哈尔科夫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继而又被其提升为基辅党组织的组织部部长。
- 1929 年 申请赴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学习,时年 35 岁。
- 1929—1930 年 在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学习,同斯大林的妻子、党的工作人员娜杰日达·阿里卢那娃相识。
- 1931 年 当选为鲍曼区第一书记;六个月后被提升为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第一书记。

- 1932年 学业中断，担任由卡冈诺维奇领导的莫斯科市党委第二书记。
- 1933年 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
- 1934年 在第17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 1935年 接替卡冈诺维奇的职务，任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 1938年 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 1939年 出席二月中央全会。  
3月，任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以乌克兰第一书记和基辅军事委员会文职成员的身份进入西乌克兰。
- 1940年 主持西乌克兰的苏维埃化。
- 1941—1943年 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代表的身份，先后在前线的几个方面军中担任战时中将军衔的政治委员。从事恢复乌克兰经济和重建乌克兰党组织的工作。
- 1944年 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同时留任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
- 1945年 在莫斯科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率领专家团去波兰帮助重建华沙。
- 1946—1947年 被降职，卡冈诺维奇接替了他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 1948年 官复原职；重新在乌克兰执掌全部大权。
- 1949年 赴莫斯科任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
- 1952年 在第19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 1953年 排名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卡冈诺维奇之后。  
9月，取代马林科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 1954年 偕同布尔加宁访问北京。  
垦荒运动开始。
- 1955年 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和解。赴日内瓦参加最高级会议。
- 1956年 2月，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4月，访问伦敦。  
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
- 1957年 与反对派的第一次较量。  
7月，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10月，撤销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的职务。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1月，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会议”，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会议。
- 1958年 3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 1959 年 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能技术。  
9 月，生平第一次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
- 1960 年 击落美国 U-2 侦察飞机并俘获了美国飞行员。  
5 月，参加巴黎最高级会议。  
11 月，在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关起门来”攻击中国。
- 1961 年 在维也纳与肯尼迪会晤。  
10 月，将斯大林遗体迁出陵墓。
- 1962 年 古巴导弹危机，战争一触即发。
- 1964 年 10 月 14 日，被解除所有职务。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柯西金升任部长会议主席。
- 1971 年 9 月 11 日，病逝，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